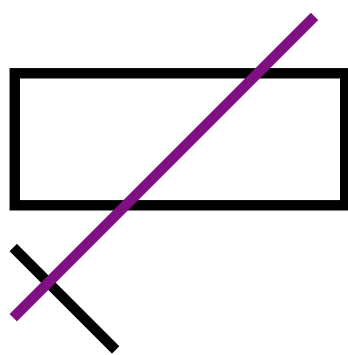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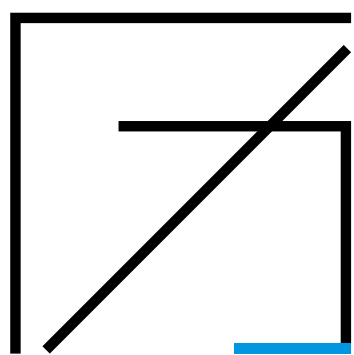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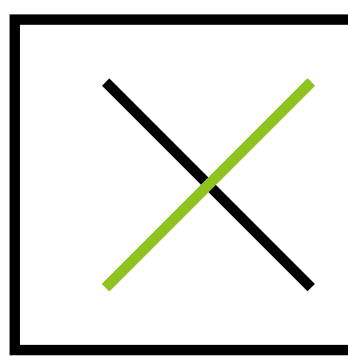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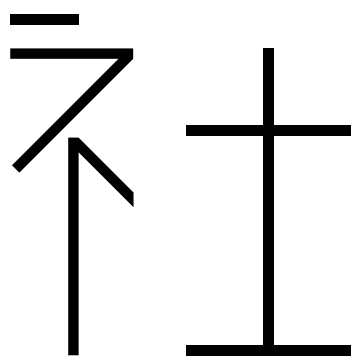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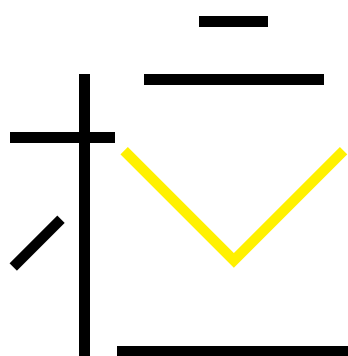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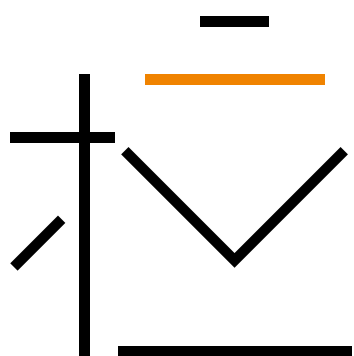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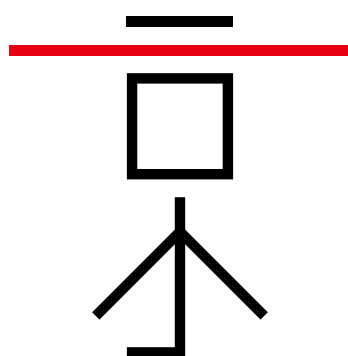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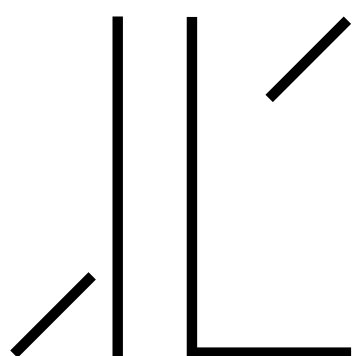




个人故事

北京拉拉社区 发展口述史 · 贰

个人故事

出品：同语
作者：柯晓，Trim
校对：齐羽
版次：2013 年 第一版

© 本书版权为同语所有。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抄袭。

关于同语

成立于 2005 年 1 月，同语关注中国在性倾向、性别身份与性别表达上遭受歧视和暴力的群体，旨在通过社群培力、援助服务、公众教育和政策倡导，推动公众对多元性别的认知，消除歧视和暴力，争取平等权益。

邮 箱：tongyu.org@gmail.com
网 站：http://www.tongyulala.org
微信公众号：tongyu2005-ii
微 博：@ 同语 CommonLanguage

前言

同语于 2009 年 2 月开始策划北京拉拉¹ 社区发展口述史项目，同年 6 月正 式启动，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共采访社区活跃人士 24 人，考察了 9 个民间小组 和活动空间，录音资料超过 50 小时。我们主要关注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的十余年间北京拉拉社区的发展，试图通过重要的事件、个人与时间点来拼接出北京拉拉社区、组织与运动发展的大致轮廓；同时，结合中国近二十年的时代变迁、社会思潮特别是政治环境的微妙变化，反思社会运动的各个影响因素在北京拉拉社区发展中的实际作用，为目前中国大陆的同志运动和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同语
2013 年 6 月

1. 本文中“拉拉”指同性恋和双性恋女性。

目录

石头：女人与武器	3
乔乔：我就是搞个娱乐	9
闲：一种探索生活的方式	14
追命：从幕后走向台前	18
sam：让世界更明亮的热情	22
gogo：梦的坚持	28
Eva：我的政治身份是双性恋	34
小白：漂泊的梦想，不羁的青春	40
小黑：我拿什么面对你，我陌生的身体？	47
Karen：行者无疆	53
罗名：一件有意义的事	57
乔晓彭：找到最被压迫的声音	62
苏茜：把疯狂的同志派对带到中国	69
灰烬：坦诚相见	76
大拿：用修炼的心态做一份没有功利的事业	83
Kim：女同志要整个“天空”	88

蔡一平：探索第三世界女权运动	93
荣维毅：男女平等到多元性别平等	99
吕频：从女权主义走近女同志	104
刘伯红：女同志运动的支持者	109
冯媛：慢慢打消“恐同”的习惯	114
章义：用纯真的心善待多元	119
江晖：北京要做男女同合作的表率	124
范坡坡：你是拉拉还是 gay	129
angel：永不言弃的女同网络平台搭建者	134
Ana：跟西方不一样的拉拉文化	139
万延海：激进地对待事业，温和地看待社会	145

石头：

女人与武器

整理 /Trim，访谈 /Trim、罗名

石头——艺术家。代表作有现代画《武器》、《女友》、《鸳鸯蝴蝶》等，主演第一部反映中国女同性恋情感生活的电影《今年夏天》，导演《女同志游行日》、《女人 50 分钟》等作品。

90 年代中开始参与大陆的同志运动，参加过中国大陆第一次同志及女同志大会，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女同志小组“北京姐妹小组”的核心组织者。进入 21 世纪，石头不仅主演了大陆第一部女同性恋电影，更是第一个在电视节目中“出柜”的拉拉。时至今日，当这些活动参与者们诉说回忆的时候，常常第一个提起石头。



石头

“我印象特别深刻，而且特别向往，能够跟一个女生有一种挺好的关系，能够两个人在一块多好……”

80 年代末的时候，我在贵州同仁那个小县城，我在那个地方出生长大的，父母亲是四川的，从小就有很好的女性朋友。我从小就很向往跟女生在一起，就想长大不结婚，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挺想跟女生在一起。不过我不知道是同性恋，从来不知道同性恋这个词，80 年代没有同性恋这个词。到 90 年代以后会有偶尔听到同性恋这个词，都是笑谈的那种感觉，觉得跟自己也没什么关系，我也不会去嘲笑别人，取笑别人，说别人是同性恋，有时候别人会取笑我，说“你是同性恋吧”，我当时说可能以后是吧。

我最早知道拉拉是 1988、1989 年的时候，我在家乡经常看到两个女孩子，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拉拉，一个女孩子长得比较像现在说的 T，有点胖胖的，而另外一个女孩长得特别漂亮，我印象比较深刻。那个城市特别小，一条河，两座桥，经常在那边看到她们，我就觉得特别欣赏，觉得挺有意思的。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渴望，而且特别向往，能够跟一个女生有一种挺好的关系，能够两个人在一块多好，走哪都在一起的感觉。

1992 年我先从家去了西北，想去敦煌，敦煌那边不是有壁画么，我想去那边的研究所，想去那边画画什么的，特别向往西北那种文化，我觉得那个好像特别打动我。还没有走到敦煌，我先在兰州呆了一段时间，后来一不小心到北京来，到北京是为了看展览。当时在中国看一个艺术展可不容易了，就是看一个外国的艺术展，世界名画的。我的性格就是那种，在一个地方要留下来去观察一下、体验一下、生活一下。后来就在圆明园租了一个房子，就在那边住下来，我想租一个房子住上两个月，结果在北京一住住了好多年，一直住到现在。

圆明园艺术村算是中国第一个自由的艺术家村落，那个时代，不像现在，在那个时代每一个人一般来说，必须要有一个工作，一个单位，才可以生存，但是就有少数的人那个时候就辞掉了工作，在圆明园这个地方住下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时候圆明园特别美，树很高，福海可以游泳。但是 1995 年政府取缔了那个地方。他们

现在觉得后悔了，要做一个艺术博览会，想邀请圆明园艺术村过去的二十个艺术家，我也在其中，其实这都是蛮社会的问题，也很有意思，是社会的变迁。

1995 年以前我没有交过确认自己是同性恋的女朋友，但已经有女生来找我，因为那时候住在圆明园那边，她们可能知道那个地方，那是一个艺术家村，很多人都会慕名而来，全世界的人都来，他们会来采访或者是看你的工作室、看你的画，而且还邀请我参加展览。其中夹杂着有女生来，我那时候性格比较豪爽，来了大家都很好，喝酒啊吃饭啊，有时候还可以留宿，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很清晰的那种关系。那时候我没有确定的男友，也不跟圆明园村子里的男生交朋友，因为那时候男生那么多，我都比较拒绝那种关系，我也觉得挺怪的。女生找我吧，就在我那待着不走了。因为圆明园当时还是很多文艺青年，或者是关注文化的人，有时候也会有报纸报道，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她就到了我那，我们就挺聊得来的，在我那住。好像当时村子里面的人除了我还有点暧昧以外，其他的人没有同性的暧昧关系，确实挺难得，要不我早就做拉拉了，按说我也算比较敏感的了，那时真的没有。我觉得我肯定有拉拉倾向，但是跟女生不是特别的亲密，那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欲望，也不懂同性恋那种感觉，是有人对我比较偏爱，想和我很亲近，然后我就观察了一下，思考了很久，但是真正的开始接触标榜是同性恋的人，还是后来认识苏茜。

“在一个人家的 party 上，我问那个女孩子说，‘你喜欢的这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1995 年的秋冬，那时候在一个人家的 party（注：派对）上，我都不记得在哪家了，那个 party 比较好玩，中国人、外国人都有。苏茜就跟我讲话，因为那时候我剪了一个短头发，样子比较像拉拉。当时有一个女孩子告诉苏茜说“我喜欢一个 party 里的人”，然后我就问那个女孩子，“你喜欢的这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因为这句话苏茜就觉得我性倾向有问题。肯定是在那个年代，一般来说喜欢某个人，人性所指，男人就是喜欢女人，女人就应该喜欢男人。

后来苏茜就跟我要电话，让我过几天就去她家的 party，然后就那样开始很正式的在那个 party 见到那么多 gay，好多帅哥哟，我那时不是特别分的清自己，我觉得我看帅哥也看得挺喜欢的。苏茜家的 party 是那种家庭式的，是在外交公寓，主要是男同志女同志，或者有些疑似女同志像我这样的好多个。苏茜她是英国人，在联合国大厦里面工作，她的普通话讲得很好，是个酷儿。她比较 open（注：开放），跟人家讲话比较大大咧咧。她家的 party 没有定期，好像就是通知，用 BP 机（注：寻呼机）什么的，一个一个的通知，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这些人的。我忘了她们后来怎么就把我发展的了，就比如说有没有问过我喜欢女孩子么或者你是同性恋么，就像我现在去问别人。

那时有个叫“一半一半”的酒吧，她们也会去，她跟那些 gay 也是比较好的朋友，有些国外的，她又在找中国的 gay，她也跟中国人做朋友。我感觉还是中国人多，而且拉拉里面大部分都是中国人。一进去就发现那些人就是同性恋，好像他们有些玩得很过分，gay 和拉拉都玩在一起，然后特别亲密，我觉得比现在看起来更亲密，就特别过分的那种玩法，打打闹闹，搂搂抱抱，就是又要脱衣服又要脱裤子。所以我很困惑，因为我完全不懂这种同性恋的文化，我坐在旁边的时候又很害羞，然后我就想我肯定不是同性恋。

那时候好像也知道了同性恋这三个字了，但是听到的比较少，而且听了之后我从来不觉得难受，也不觉得紧张，因为自己不是从小就只喜欢女生，然后就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我虽然小时候是觉得自己可能跟别人不是很一样，但是没有因为是同志身份觉得特别压抑，真的我都没有这种感觉，所以说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可能后来知道可以是同志的时候，可以这样跟同性生活的时候，其实觉得挺开心的，跟一般人的经历不太一样，有一些受到压抑的那些状态不太一样。我那个时候没有不开心，只是觉得有点纳闷，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文化，这是我自己没有接触过的。而且我还跟我的一个朋友，我们两个在她们家玩，回来以后我们觉得我们肯定不是同性恋，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其实好多人她说她自己肯定不是，你不要相信她，因为她不明白，其实人并不明白自己。像我长这么大了未必就明白自己，

但我现在更愿意搞清楚自己潜意识是什么，或者潜在的我喜欢面对那一个东西，我是发现当时我没有跟一个人有那种亲密的感觉或者说那种很亲密的关系，还有他们那个方式，我还没有完全理解，所以说就说自己还不是吧。

“我当时觉得那种女性的思潮给我特别多的力量，让我可以完整一点。”

我觉得重要的是我在认识了同性恋的同时也加入了东西方小组，这也是苏茜她们召集的，就是在联合国大厦里面，差不多每个月一次的女性主义小组，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小组，这个小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每个月聚在一起交流一些话题，我也是这个成员之一。当时在女界的像冯媛，刘伯红，还包括像中国女子学院（注：中华女子学院）的张莉西（注：音），反正就是那种女界很不错的、可能也是比较先驱的人物，当时我们都能够在一起交流。世妇会¹ 的时候她们没有参加，普通人不能参加。我加入进去的时候不太记得时间了，但是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应该算比较鼎盛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特别热火朝天的讨论，每次都有二三十个人，有些人的思想犀利。

我觉得至少同性恋对我来说倒还在其次，但是女性主义的这种思想特别对我的路子，我从小就不喜欢那种男女不平等的东西，所有男权的那些东西。我也发现可能我自己已经被男权的思想污染过了。前几期参加的时候就会讲很多女性主义的话题，男女平等的，我也觉得被她们讲得挺晕的。她们讲的男女关系的时候，就特别不可调和，男的都是那么大男子主义，我也为她们难过，说这些异性恋都怎么活呀。因为我也交往过男生所以我也能理解一点点，有些男生可能是不太好交，但我的态度还比较温和，因为现在跟男生没关系了。东西方小组的人从那时就已经说实际大家就都是双性恋。后来我也会在那边讲我的画、介绍作品，然后慢慢的女同志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多，搞得有一天有一个女生就站出来说，我觉得我们异性恋也不应该受到歧视。

1. 1995 年 9 月联合国第 4 届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石头（左）与朋友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足以让我成为一个女同志，一定是要当你遇到一个人，你看到这个人来电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足以让我成为一个女同志，一定是要当你遇到一个人，然后你看到这个人来电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可以身体力行，就可以去做同志了。在这之前我是精神上的女同志，我觉得我从小在精神上就是一个女同志。学习女性主义对我来讲也是把自己认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好多观念也随之清晰了。那个时候我都不敢讲我是女权主义者，但是我当时觉得那种女性的思潮就是给我特别多的力量，让我可以完整一点。我觉得所谓的女性主义对我来讲就比较简单，就是一个平等，众生的平等，男性、女性或者是中性的平等，这是最重要的。但是一讲到女性主义，我的很多男性艺术家朋友就很反感，他们说不要说什么女性主义、女权主义，他们不理解也不接纳。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去搞清楚过，所以就很反感，会特别恨女权主义。

这个东西方小组大概持续了三年，好像苏茜 1998 年走了以后就没有了。我一直都参加，我特别喜欢那个环境，特别开心。

第一个女友大概就是在 1995、1996 年吧，我们常常参加很多文化活动，看戏剧也是叫了一帮拉拉一起去，因为那个时候苏茜好像有很多人力资源一样的，她总会叫一些新的朋友加入，然后有一次在那里面有一个新来的女孩。好像就是那次就突然有电了，可能这就是一见钟情，不是见了她就动心，是在告别的时候，我就突然这么觉得。

告别的时候，大家好像都要拥抱，拥抱的时候好像脸贴了脸，我突然觉得贴了她的脸之后那么舒服那么好。我这个是好直接的，完全是身体的感觉，略微亲密的接触，感觉特别好，特别难忘，然后我的同志的基因就开始激发出来了。后来几天就开始挂念她，然后大家都各自忙自己的事情，就是想着想着就经常幻想一下。在那之前我一般处于幻想状态，对拉拉的关系都处于幻想状态，而且这种事情我也不会特别身体力行，不知道怎么去迈开第一步。我就想着有一天她会给我打电话。果然有一天电话响了，是她给我打的，然后就慢慢的开始了，一起出去玩。那时候全国风风火火的，像五四青年一样讲很多关于同性恋的东西。因为那时候就没有什么东西，



石头在酷儿文化节和艺术展

突然遇到这帮人大家都讲那些新鲜的思想活跃的东西，那时候我就已经接触到了对性的观念。中国那时相对封闭很多，关于同志的话题，那时候我们已经听到很多颠覆性的观念，关于性别、性倾向什么的。那时候跟准女朋友，就是简单的约会，见面、玩，那个约会不是定好了的，不是说我要跟你做女朋友，就是见面聊天。经常会在一个草地上坐着讲很多东西，两个人会单独的交流，会讲很多那种可以颠覆观念的东西，比如说对性别的看法，每天都是崭新的感觉。

从那开始以后就打开了，知道了原来自己还可以做什么。自己是同性恋或是什么恋都行，有一段时间她们也讲双性恋。最近因为我一直跟女生在一块生活，没有几个人讲我是双性恋。我小的时候也交往男生，只是一直觉得不能释放自己。我觉得跟男生在一起解放不了，老是解放不了。

“我现在发现很大的意义在于之前那个 1995 到 1998 年阶段，大家已经在一块，已经形成很大的人力资源，还包括女性小组，当时的拉拉都去那转过。”

李京是拉拉，北京姐妹小组应该是她组织的。1998 年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次男女同志的大会，在北京西山大觉寺，这个活动来了有四十来个人，以大陆为主，有香港的，还有台湾的。1998 年 8 月那个时候。男女同大会我还是主持人之一，因为要有男女么，那时候很重视男女平衡，虽然好多事情是他们男同志安排的，可能钱也是他们出，但我们女生也来了不少的人。李京就有参加那次大会，好像 Kim 也在，还有一个我贵州的老乡，还有一个跨性别的叫陶陶，当时他是女生，但他想变成男生，女跨男，他是湖北来的，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很有意思，有些人好像之前都没有接触过同志的议题，突然就参加这次会议了。后来大家都觉得我们也应该开一个女性的会议，一个拉拉的大会，所以在十月份的时候就做了拉拉的同志大会，主要的联络人是李京。男女同志大会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台湾的杨（注：音），以前给张惠妹写歌词的，也做摄影。他讲了一些同志消费的东西，而我们这边连同志还不太见得到，同志的权益更不用说了。也请了刘伯红这样的女权主义者。我现在发现我们那个很大的意义在于之前 1995 到 1998 年阶段，大家已经在一块，已经形成很大的人力资源，还包括女性小组，当时的拉拉都去那转过。

这个之后我们就成立了那个北京姐妹小组，我觉得成立小组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我们做这个小组主要是做了那个女同志大会后挺有激情的，觉得应该继续推动下去，大家还说要建立一个网络。因为在大会上从不同城市来了四十多个人，大概有二十多或者三十多个是外地的。当时参加会议的人有些可能后来就慢慢的不太有声音了，这些人现在可能有不同的生活了，她们未必过着拉拉的生活，我知道有人结婚生孩子了。

我是那种如果有一个人她一直在牵头做这个事情，我就无条件支持的人。我在主持方面那时候比较活跃一点，还有找场地、邀请人这种配合性的事，李京做联络。开始都是李京在做召集人，后来因为那个 Kim 的个性很

不一样，她们两个有点合不来，李京居然就退出小组了，这应该是 2000 年的事。我是因为觉得很有意思才参加这个小组的，我不喜欢争端、有矛盾什么的，如果合不来的话就没必要在一起，所以当时李京说她要退出时，我觉得可以呀。虽然我觉得她是主要的工作人员，但当时觉得她退了也许还好一点，要不然她们在这闹矛盾，这事情怎么做下去呀，像小孩子一样的冲突，当时我就是那种态度。

“有些时候要注意方式的，她这种方式其实适合在那种西方的开放的国家，干什么都可以，打扮的怪一点也可以，但是你在中国，你干不成这件事情，那就没有意义了。”

2001 年女同志文化节。我的态度就是不要伤及无辜，因为好多人是胆子好小的，又不是说要闹什么革命，又不是说要颠覆政权，同志是想找一个说话的地方才来聚在一起的，才来参与这个文化节，结果你被警察关了，她会怎么想。她不是想干这些的，为什么大家都一下子就鸟兽散那种感觉，因为太意外了么，政府做的不好这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小组应该慎重一点。为什么我们做那个男女同志大会会顺利举行呢，虽然我们在说话中很大方，都没有什么关系，去的好几个酒吧还是我认识的朋友开的。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讨论男女同志大会的时候，在新华社旁边的一个朋友的酒吧，我们在那都没什么，公开说话没什么关系。可是安排事情的时候你真的要保护别人的，也要保护自己的。

姐妹小组没有宣布解散过，我没有说过，我是不会宣布的。2002 年我在纽约见过 Kim，闲也见过她，我们去看电影，看《今年夏天》。我从美国回来以后，被邀请去 1088 (注：酒吧) 做放映和展览的活动，去了两百多人，还卖票的。我觉得比较成功的地方就是把人给召集过来了，什么人都可以来参加活动。后来认识 apple，然后认识安可。因为我跟闲很早就认识了，后来大家都交叉的互相认识了一下。我觉得拉拉沙龙挺不错的，这几年不管来什么样的人，就可以推荐她们去这个地方，还有

一些议题讨论。闲在那做主持挺重要的，闲每次都做主持，有时候一个人做主持，有一个嘉宾来主讲。

2005 年同语小组成立，那天去的人还蛮多的，二十多个人，在西厢房（注：酒吧）的地下室，大家开始讨论怎么取名字，开始有人提议同女，后来确定叫“同语”。我觉得我当时可能可以在文化方面做一些支持，没有固定的定位。那天我们就说要做杂志，但是大家都说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2006 年二月的时候我们做《鲁豫有约》那个活动，主题挺直接的叫《拉拉的故事》，正好那么多朋友去现场，那个现场演播的时候里面很多人的镜头都是拉拉。还做过一次贵阳（贵州卫视）的。天津卫视是 2007 年跟复旦大学的老师我们三个去谈的同性恋。现在那么多人都可以去，我就觉得挺好的，我就不用去了，我干别的，那如果大家都愿意去媒体讲的话，我就不用去讲了，要不然老是这几个人在讲。

2007 年我记得 2 月 14 号的情人节，一开始是小白提出来的，想情人节到外边发传单，然后闲跟我通电话，我就跟她聊，那个发单子很容易让人家以为发广告，我们要不送花吧。小白就是那种比较激进的做法，有些时候要注意方式的，她这种方式其实适合在那种西方的开放的国家，干什么都可以，打扮的怪一点也可以，但是你在中国，你干不成这件事情，那你就没有意义了。我是比较喜欢参与这种集体活动的，特别是这种大家在一块出去的。我们 90 年代那时候确实比较少做这种公开的。

2008 年酷儿巡映，我们跑了好多的地方，现在酷儿巡映还在继续着。我们发现用这个酷儿巡映一起来做事情蛮好的，因为我们在放映的时候，会激发好多东西，会来好多的人，有的人是冲着电影来的；有的人是冲着导演，有的是想来接触更多的同志的。这是一个行动，每一次放映前后都要做很多的铺垫工作，什么都有，比如我每次把那个 T 恤挂出来，每次穿这个衣服，每次解释这个东西，这个是跟国家的政策、法律有关系的，然后通过影片的内容引起探讨，就特别有意义。

（本文访谈于 2009 年 7 月）

乔乔：

我就是搞个娱乐

整理 / 范范，访谈 / 范范、静茹

乔乔——酒吧老板。中国大陆第一位公开出柜的同性恋艺人。

开办了大陆第一家拉拉酒吧枫吧。枫吧对于“混过圈”的北京拉拉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地标，为当时并不活跃的拉拉社区创造了一个“自己的”空间。乔乔不爱“搞政治”，但对这帮“革命”的拉拉运动家，豪爽的乔乔曾在危难时刻伸以援手。她说，“甭管到什么地步，我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圈子”。



乔乔

枫吧：“拉拉酒吧就是给拉拉一个乐子”

老枫吧是 1999 年开的，中国第一家纯拉拉酒吧，就是禁止男士入内的。当时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是拉拉专场。之前的拉拉聚会都是跟 gay 一块，是在 ON-OFF（注：酒吧）之类。当时我就觉得，拉拉跟 gay 聚会，gay 觉得拉拉消费低、人少，就把拉拉给逼到一个角落里，分开，而且歧视拉拉。当时所谓的大型聚会，最早二三十人，后来满满演变到七八十人了。我想，有多少 gay 就应该有多少拉拉吧？我想也不可能相差这么远。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自己的地方，（我就想开一个）。加上当时我签的是天中的唱片公司¹，刚进拉拉圈没多久，比较年轻、疯狂，后来被《三联周刊》给登上了。当时老板就让我选择，一个是退出同性恋圈，一个是退出娱乐圈。那我就退出娱乐圈吧。你要让我当一个戴面具的艺人，那我宁可这辈子不出来。我就离开了。加上那时候也许心情不好，就想自己没事儿就开一个吧。当时就跟家里人商量商量，主要还是我女朋友帮我，那是我前妻吧。

最开始的枫吧是在秀水南街，投资一共 180 万吧，能装三四百人，七间包房。老枫吧开在街面上，挂招牌，写着“枫吧”俩字。枫叶最早是代表拉拉的。第一天开业，我想撑死也就 100 人吧，我那时的女朋友给我打电话，“你快醒醒，快过来吧。”我说，“干嘛呀？”“你快过来看看，爆满！看都多少人啊！”我说多少人也就不 100 多个。她说，“你赶紧的。”当时也就晚上 8 点多吧。我进去一看，“噢！”当时我就劈了。怎么那么多人啊，300 多人。

当时有“拉拉俱乐部”聊天室，枫吧就去那里宣传。这个 BBS 到现在十多年了也。那时主要是北京拉拉和上海拉拉里面，我人气挺旺的。

老枫吧从没碰到过便衣查。哪个酒吧都被查过，枫吧没有。枫吧还是比较有底的，在朝阳这边，我们家部队的，跟上头关系都挺好的。包括我们在里面跳脱衣舞什么的，找那些可漂亮的法国女孩，在里面跳脱衣舞。因为都是女孩么，然后也没有人查。有人报警，别的酒吧恶性竞争（举报枫吧），派出所直接把那个电话给我们了，告诉我是谁报的警。枫吧没有出过任何的（意外），所以才能干到十年。但枫吧开这么长，最主要说，还是一个

标志吧，枫吧怎么着也是中国、北京第一家拉拉吧，（尤其）北京拉拉还比较认这两个字。

枫吧选址一定要市中心，绝对不能离开朝阳这一带，离开朝阳我不认识人，公安局这边我也不行。所以我要找还是在这一带吧，工体这一片儿。

老枫吧开到 2003 年非典时候，生意一下子完了。其实经营上维持了半年好的状态，之后的三年半都是在赔钱。老枫吧赔了以后，我就不敢再天天做了，不敢再自己花钱开场子了，就包场了。为什么会赔钱，因为拉拉，毕竟女孩子么，不是说像 gay 呀，男的么，一方面他那个群体比较大，另一方面他们的经济条件相对比较好。

现在这个（枫吧）为什么关了，因为拉拉酒吧现在让这帮小孩搞得恶性竞争。这边 80 块钱畅饮，那边 60 块钱畅饮，那边 50 块钱畅饮。像泡泡吧，80 块钱畅饮，听着很高，（但）随便喝，洋酒什么酒。到（包场的）她们手里，一张门票（里），酒吧老板最后才给她们 15 块钱。枫吧是 30 块钱门票，不送酒水。以前的酒吧是我自己开的，门票 25，送饮料。然后后来包场。你每个月得给人（老板）钱么，你包这个酒吧。然后现在这帮孩子做得，挺牛的，就说 80 块钱当门票，65 给老板，自己拿 15。你说这钱相当于都让酒吧老板挣去了，落在她们手里根本就没有多少钱。这帮 90 后小孩，小屁孩，为了想挣点钱，弄了几个群，就开始搞拉拉酒吧，跟我们最早开始做拉拉酒吧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拉拉酒吧就是给拉拉一个乐子。我就是搞个娱乐还行。你要让我喊个口号啊？我又不是搞政治的，我只能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娱乐的场所。

从我开枫吧那一年就开始搞一年一度的京城四大帅 T 四大美 P 选举。还有 T 台反串秀，T 穿婚纱，穿旗袍，上台走秀。还有“力大无穷”，就是 P 掰腕子。一到大型选秀我们就不让 gay 进，他们在门口说：“（学娘娘腔声）你们这儿什么活动啊，还不让进去？”然后我前妻就说：“今天是力大无穷比赛。”“力大无穷是干嘛呀？”“掰腕子、摔跤。”“唉呦，真爷们！”他们说你看我们那边也在比赛呢。我问你们比什么？比绣花（笑）。查我们呢。从枫吧开始，gay 吧和拉拉吧就分开了。现在 gay 可以进，但我要控制人。男士不能超过 10 个人。

会所：“当时我就想，搞一个 JT 场吧”

这个会所是前年（2007 年）开的，当时是想给外地拉拉提供住宿，想一条龙：吃、住、玩。因为有不少外地拉拉来了，这也是后来出现的一个趋势，来北京工作，顺便去酒吧玩。有些拉拉可能没什么钱，我给她们提供一个小房子，让她们住。像旁边这个（房间）就住了一个。便宜，80 块一天，可以长租也可以短租。

坐台 T，最早是看日本、台北，还有泰国这三个地方。人家说泰国——我没有去过泰国——色情服务档次最低的是 MB（注：Money Boy，男性性工作者），就是 gay，纯做男人生意的。然后是鸡，也是纯做男人生意的。MB，鸡——然后是鸭子，做女人生意。然后档次最高的叫做 JT（注：指做女性性工作的拉拉中的“T”）。这种场所只有台北、泰国，还有日本有。日本也是档次最高的。她们是做异性恋女人生意的，也做女同生意。特帅的小 T，画着小胡子，穿着西装，就相当于台北的牛郎店，只是换了女人。经常玩鸭子玩腻了的那些老女人就会去找这些帅 T。当时我就想，搞一个 JT 场吧。JT 太难听了，叫公关 T 吧。这警察也挡住了。钻法律空子，擦边球。就算警察过来，怎么啦，女孩跟女孩不行啊？聊天，怎么啦？也不属于卖淫嫖娼啊，是吧。拉拉和异性恋都可以来。欢迎异性恋女孩来。异性恋女孩来还给打个八折。一般来找公关 T 的都是年轻漂亮小姑娘。

我这儿目前属于自己人的话有五个。一开始是 3000 块钱。但是这帮 T 不着调，没职业道德。跟人客人好了，就走了。被女朋友踹了，又回来了。你看过哪个鸡坐台把客人当老公了？这样是不行的。

“甭管到什么地步，我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圈子”

大部分来枫吧的都是来找女朋友的，先进圈儿，找到对象了，就自己回家过日子了；失恋了，再回到这个圈子里来。特讨厌，过河拆桥，所以就永远不像人家 gay 圈。拉拉挺散的。只有小部分群体，比如说我们七八个人关系特别好，我们一小拨人在一块儿玩。

我那会儿就给她们讲，这样你们早晚会受伤。你脱离了你的圈子，你跟人家步入主流社会，俩人过小日子去了。她面对的是主流社会的问询，你跟人走了，时间长，日子过烦了。甭管到什么地步，我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圈子，我得让她……因为我从来不搞圈子里的女孩么，我喜欢异性恋女孩，我就把她弄过来，让她随着我的这个圈子走。即使分了手，她也得考虑她的人际圈，几乎都围着这个圈子，对不对？我也有我自己的主流的文化圈，但我也不会离开这个圈子。就像 The L Word（注：美剧《拉字至上》）。你在主流社会工作或干嘛，是一个很出色的人，但你的生活、情感还是不能脱离我们自己的（圈子），毕竟在中国没有（公开），各方面没有（接受）。在自己这个群体里生活可能还是比较舒服的。

自我：“（她）从小就喜欢女孩，不是同性恋么”

我觉得只有天生的 T，没有天生的 P。得看那个 T 的魅力是什么样。这都说不上来。但 T 还是很坚定的。你给我放到社会，放多少年，我也不可能喜欢上男人。我从小就知道自己喜欢女孩子，喜欢太多个了。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对女孩子有冲动，对男孩子没有，没那概念。跟男孩也一块儿玩，反而男孩伙伴比女孩多。我觉得小孩儿是最原始的吧。你对男孩说我喜欢那个女孩，男孩不会说你同性恋吧，变态吧，一点都没有，都觉得很正常。一直到初中都没这个概念。反正都顺其自然，（别人觉得）好像乔乔你就应该喜欢女孩，跟我们一样。他不觉得你的身体跟我不一样。连问都不问你，就很自然的。包括家里都很自然地接受了。只有我妈妈开始接受不了，但是我姥姥啊，舅舅啊，都觉得很正常。我妈妈说，知道吗，乔乔在搞同性恋。他们说知道啊，（她）从小就喜欢女孩，不是同性恋么。就觉得很正常。慢慢反倒是大了一点，别人开始对你有这怪想法。

最早我进圈的时候，人家问，你到底是什么？我说我是 T 啊。她说，你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你是 T？我说，你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她说，我同性恋啊。我说，你试过男人吗？她说，没有。我说，你没试过男人你怎么就知道自己是同性恋呢？我说，一个道理，这不需要试。我不需要试个 T 然后知道，噢原来我是个 P。

1. 天中文化唱片公司

“搞同运，我不适合。”

那天那帮老拉拉坐在那儿跟我说，嗨，十六七岁的小孩，胡说八道，说自己是同性恋，她知道个屁，搞清楚了？我说我好像五六岁就知道自己是同性恋吧。这跟年龄没关系。你那属于年龄歧视。你现在四十多岁可以倚老卖老，其实你十多岁的时候清楚自己是拉拉，只是你不愿意承认。今天社会开放了，人家十六七岁的（就明白了）。我说你这属于嫉妒，自己心态不好。

我觉得性取向是很坚定的。没进圈的时候，我不懂TP，但我就知道，我不可能找一个男孩一样、像我一样的女孩，那我宁可找男人，对吧。我以前就说过，我不同意有同性恋、异性恋之分，我只同意心理上阴柔之美和阳刚之气。你让我找一个男性化的女人，我宁可找一个女性化的男人。一个O和一个T，我宁可找O。我欣赏阴柔的那种女性气质。没进圈的时候我就知道。再加上审美，你要让我找一个特别丑的女人，或一个特别漂亮的男的，那我宁可找那个男的。不是说因为你是女孩，我是T，见一个都得喜欢。

我觉得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变（弯）。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女人，只要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同性恋。但也可能只是这一段时间是拉拉。我觉得你要想搞异性恋女孩，一辈子，难。但是你要是想搞定的话太容易了。还是要看那个T。你给人家能掰弯，那就看怎么给它一直弯到底。还是以你自身为主。我觉得从人家（被）掰弯的那天起，说爱你，人家就不存在要跟你一辈子啊，或者说人家也不存在外来的压力。还是只在于爱与不爱。今天我爱你是因为你是个女孩，明天我不爱你了，还会说因为你是个女孩。这不扯蛋吗？我觉得跟压力啊、社会啊，这些都没关系。我今天爱你了，什么都狗屁不是了。我今天不爱你了，任何一个理由都会成为一个理由。

做同志运动，离我们生活太远了，太革命了。最早没有同志酒吧的时候，大部分都搞同志运动，开会呀什么的。整天打电话开会。那时候 Kim，还有石头，最早的，挨个打电话。那时候宣传基本靠吼。打电话，啊，那什么，开会了啊，礼拜六有组织活动。

给我打电话，我第一件事儿（就是问）：“哎，有美女吗？”她们不是来探讨什么的，整个儿来钓鱼的。每次一开会我都开始睡觉。她们让我发言，我发什么言啊？聊自己是一个同性恋，有什么觉得自己悲哀的地方。我说什么悲哀啊，哪跟哪儿啊？有什么可说的呀。我说我从头到尾都没觉得自己有病。

以前没有什么酒吧，就通过网络聊天室，通知大家聚会。就去山上开会，先两个小时研讨会，还要卖画儿、捐款，喊口号，“我们要为我们的权利”。当时还有万延海。她们说北京要搞一个艺术节，拉了基金，办女同大会。她们那时候不是被公安局逮了吗？把她们当法轮功，按到三里屯那个旅馆。我心想，能不把你们当法轮功吗？全国聚集在一块儿，闹。然后 Kim 找上我说，要不乔乔帮个忙吧。我说干嘛呀？Kim 说合着在你们家看电影行吗？我说看什么？看那个拉拉的电影。（她们）电话被追踪，没人敢接这个活儿，然后我说，那我接吧。她给我钱，我说不要钱，30 多人，连在我们家三天。

我觉得搞同运，必须得有这样的人。只能说我不适合。可能是因为我是搞娱乐的吧，所以我的朋友圈里大部分都是干这一行的，就是拉拉圈子里的搞这一行的，比如经纪人、编剧啊、导演啊、演员啊什么的。

“华八，枫吧，这两个不可分”

北京拉拉圈从网上开始的。聊天室，梦圆啊、拉拉聊天室啊，语聊啊什么。现在都已经完全开（放）了，跟丝绸之路似的，已经打开了，不存在什么问题。以前是每个礼拜六，大家集体上网聊天；现在是每个礼拜六，满世界找拉拉酒吧。

华八¹也是一个大的聚点，比枫吧还要早一点。男同性恋的聚集点那时候是东单公园么，女同性恋的聚集点就是西单华八。因为华八便宜，也不需要最低消费。往那儿一坐，没钱的，开始抽烟，那儿又凉快，就开始聊天。十个人慢慢变成二十个，二十个慢慢变成……

华八不可磨灭。要算历史，它是不可磨灭的一个点，很重要很重要。也是酒吧一开始很好的宣传的地方。礼拜五下午人就开始多了。我们搞活动，在网上先做一个礼拜的宣传，然后星期六下午，去，给我华八喊去，发传单去：晚上去枫吧啊，有活动。华八，枫吧，这两个反正是不可分的。

西厢房（注：酒吧）反正就是开了一段时间就关门了，让枫吧给挤的。我们是面合心不合。那时候我也去她那儿玩，她没事儿也去我那儿玩。她那儿有段时间超过我，恶性竞争，不收门票。我又不能跟她明着来，因为表面关系都还行；她这边跟我也不明着来。我说那就玩呗。结果我跟我老婆说，咱们自家跟自家打擂台吧。我就说咱俩分手了，去给我开一个彩虹吧，姐妹吧，你跟你妹妹两个人，P 当家的一个彩虹姐妹吧，干起来。假装跟枫吧打擂台。你到（礼拜）五开，我礼拜六开，就为了挤倒西厢房。拉拉后来一听，哦，楚楚跟美娜分手了？咱们去美娜场子捧捧场吧，再去看看老板娘。然后一百、二百人。然后慢慢就把西厢房给挤垮了，后来就没人了。然后彩虹开了一年就收了，可以不干了，和媳妇又和好了。

（本文访谈于 2009 年 9 月）

1. 华八：北京西单华威大厦八层，餐饮娱乐场所，年轻的拉拉比较多的聚集处。

闲：

一种探索生活的方式

整理 / 柯晓，访谈 / 静茹、柯晓

闲——社会运动家。北美紫凤凰（1997）、华人性 / 别研究中心（2003）发起人。同语发起人和负责人。北京同志中心理事和华人拉拉联盟顾问。

1990 年代初期开始关注多元性别议题，长期致力于拉拉社区建设、民间草根组织发展、跨区域合作平台搭建、以及公民社会联动进行反歧视和平等权益倡导。

从 90 年代至今，无论在美国或中国，闲一直活跃在华人拉拉社区中，以她的话说“因为能遇到好玩的人和好玩的事儿。”



闲，NGO 工作者

“对于同性恋的兴趣，当时只能通过资料、书本或者信息去了解一些。”

我念中学的时候是 80 年代，那时我对同性恋挺恐惧的，会觉得同性恋是很不好的事情，也很怕自己会是，或者跟某人的关系会是同性恋。但另一方面，男女生谈恋爱被算作“早恋”，女生和女生交往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障碍，所以那时候也不断有很多亲密的女性朋友，到一定阶段就突然发现这个似乎越过了友谊，一面是亲近，一面是紧张，因为很害怕成为同性恋关系。

在二十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和睦、幸福的理想家庭环境里，我有一个姐姐，但家里人更宠我一些，从小到大，父母希望的跟女儿的关系就是亲近并且双方彼此了解，所以同时，他们就要求对我的生活全盘掌握，如果发现不太赞成的东西，他们会进行某些控制，但我通常不会特别设防他们。

大学几年，我虽然有女朋友，但这对我的身份认同没有太多帮助，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有很亲密的女性朋友，这些人很难说她们都是异性恋，但是我觉得她们肯定也不是同性恋。我不是那种天生就知道同性恋是怎样的，我也交过男朋友，大学跟几个男生有过暧昧，但我觉得我从情感上还是更偏向于女性。与其说更喜欢女性不如说我更喜欢女同性恋，我觉得这种关系非常吸引我，如果两个女人相爱，我就觉得很神往。所以我就很想找一个真正的同性恋，然后看看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但在校园的生活中不太可能遇到。

对于同性恋的兴趣，当时只能通过资料、书本或者信息去了解一些。先通过书本，因为是免费的，学校里图书馆有，但是特别少，当时我把能找到的书都找了，大部分还是英文书，中文书还是说精神病之类的，英文书我看了一些，但那也是非常有限的。大学后几年，正好我准备出国，申请国外的学校。学校里刚刚开始使用互联网，在当时，这是与国外的学校取得联系的最便捷的方式。那时候网费特别贵，在学校专门的机房，除了按小时计费，收发邮件也要额外收钱。那时还没有 www，但已经有最基本的 search（注：搜索）功能，所以我就通过互联网发现了国外是有同志群体的，也是可以通过网络认识他们的。当时我一方面是去图书馆找了一些书、资料，另外也跟那边写信，美国的一个同志出版社，主要是寻求资料。

我在互联网上发现一个新闻组（newsgroup），每一个人都可以公开发言，有点像现在的论坛（BBS）。我也发了一封信，介绍了一下我自己，我说我在哪儿、然后这边相关的信息特别少。我那封信更多的是描述我的状态，没有说是想了解自己的身份，更多的是想了解这个群体。有人跟我回信，像 BBS 上大家都能看到，说在美国也认识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拉拉，可以介绍我认识，这个人当时在美国读心理学，她认识万延海，是她把万延海介绍给我的。

“就像把社会的大门向我敞开，而且是一个很鲜活的生活。”

我第一次见万延海是 1995 年，他组织了一个世界艾滋病日的小研讨会，三十人左右，人很杂，有一些研究者、官员，还有外媒记者。当时我傻乎乎的，发言时我就介绍了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干什么，我当时就说我对女同性恋文化、文学方面比较感兴趣，我了解、研究一下。我发完言，就立刻有一个澳大利亚或者加拿大的电台要采访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类的活动，有趣的是，这第一次并不是真的见女同性恋，也不是同性恋聚会，它其实是跟我现在的工作非常像的，是同志权益的一次活动。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么多，就准备认识一下万延海，他就直接把我招去那个活动了。

万延海的人脉很广，认识我之后就立刻把我招作志愿者，包括我当时的女朋友，我们都给他翻译东西，介绍美国的关于同性恋的材料。当时他们还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只是有一些社会活动。我家在北京，周末还得回家，如果要跟他们参加一些活动还挺麻烦，我父母会过问我交往的朋友圈子，还要编很多借口。我女朋友不是北京人，她当时也是一个小孩儿，而且很难说她是同性恋或者异性恋，因为她注重情感，也注重生活本身，不太理会那些标签，她接触了同性恋这个圈子之后，她会觉得这真的很不公平，为什么社会会这样子，所以她就特别理直气壮地去街头发放同性恋宣传传单去了。

出国留学之前，我向我的父母出柜了，其实是被他们发现了，被逼跟他们谈这件事。因为我当时在看很多资料，包括当时国外一个女同志文学研究刊物，我写信给出版社说我挺想了解的，她们就给我免费寄她们的刊物，寄到学校，但我把它带回家看了。当然我也不敢明目张胆地看，躲在我自己的屋子里看，父母最后还是发现了，虽然是英文的资料，但我爸从 80 年代就经常出国的，英文很好，知道我在读什么。他很厉害，发现我在读这些东西就专门去做了一下研究，把当时李银河、张北川的书都找出来看了一遍。他做了这番研究有知识上充足的武装之后，就找我谈话，他那时候对我的状况并不是很了解，虽然我从小到大女性朋友带回家一波又一波，但他们都没有往这方面想，但这其中也不都是恋爱关系，因为我从小各种朋友就是很多。但可能还是与他们的时代有关系，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同性恋是犯罪，是“流氓”，他们很难接受我也属于这个群体，这对他们的打击非常大。我后来发现我不能被接纳不是我父母的原因，是这个社会的原因，所以我才会想到要做些工作去改变这个社会的情况。

我父母反对的第二点，就是他们会觉得政治的东西我不应该去触碰。参加万延海的一些活动、认识社会上的一些人，这和我家里期望对我的教育非常不一样。我父母是传统的理工类的知识分子，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期望把我培养成好好地用技术贡献社会的人，因为这比较容易判断好坏，而对于社会、政治，他们觉得太复杂了，是没有办法把握的。虽然我父亲其实对社会很关注，但他经历过文革后就认为这些事情还是要远离，因为那个时候社会运动太多了，他们经历过，但很少跟我讲，他们的结论就是：远离政治。

其实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对 NGO（注：非政府组织）、社会议题、政治方面，是非常不感兴趣。我学生时代喜欢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文学、哲学、音乐美术一类的，文艺青年那样。其实，90 年代的文艺氛围不如 80 年代那阵，80 年代改革开放后国外的思潮很快涌入了，像我姐姐，1989 年正好大三大四，但在那之后就很快出国了，基本上再也没回过国。她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对社会、对政治还是蛮感兴趣的，但在 1989 年之后对政治完全失去了热情。不过我不一样，我从小就不感兴趣，我从小就很个人主义，喜欢玩。我小时候读托尔斯泰还是印象很深，按理说托尔斯泰还是挺关注社会的，我读



闲（第一排中）

托尔斯泰反而是觉得他很关注个人，当然他笔下的个人会和社会发生很多关系，但是我首先看到的是他对个人内心的刻画。我觉得这种喜好跟我现在对社会的关注还是有关的，每个个体与社会发生很多关联，它的成长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成长。当时还读萨特和波伏娃的书，给我的印象很深，讲到他们当时也是大学刚毕业，边教书，思想又很活跃，社会又很动荡。读的时候我就很羡慕他们那种状态，相比之下，我在大学里的生活方式就是比较单纯的理工科学生一类，接触不到真实的社会里面的人。

但后来，开始对社会、非个人的东西感兴趣，我觉得是接触了万延海之后才渐渐发生的。起初是个人影响，当时我就觉得万延海挺好玩，挺有意思的。认识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他被国家机关开除，他也不是一上来就跟你说自己这样那样的人。他当时认识的人特别杂，关注的社会议题很广泛，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比如关注宗教的，也有关关注女性的，虽然杂，但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在思想领域很活跃。他们也没有张口闭口谈政治，更多的是一些社会的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议题，那时候那种社会的样貌、不同人的状态很是吸引我，它让我发现别的生活的可能。当然我现在回过头去看会觉得这太通常了，只能说我以前在校园里的那种生活非常有局限。

这样下来，大四那年，我就认识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人，就像把社会的大门向我敞开，而且是一个很鲜活的生活，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一次万延海请我去一个私人派对，我就是在那个私人派对上认识石头的，那个时候她是画画的，艺术家，也是圆明园村出来的人，那时候她还不是同性恋，我也不是（笑），那时候我们俩可能也都在探索吧。当时我俩都说关注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对妇女的东西感兴趣，但又说具体感兴趣些什么呢，我们两个好像都说不出来，因为那时候知道的比较少。我想，如果我当时继续在北京，我可能卷入 NGO 会更早。

“女同志似乎还没有这样一个机缘去行动，或者说还需要一点催化剂。”

1996 年下半年，我到了美国，确实对我的改变比较大。因为美国的民主运动发展了很长时间，它有一个深厚的民间运动的基础，在美国都讲“个人的都是政治的”，这完全不是一个在中国成长的人对政治的想象。当然美

国也有美国的问题，我不会说它什么都好，但我觉得确实是给我提供了另外一种看世界的方式。

那时候，我又遇到一些人，包括一位台湾的拉拉，后来她介绍我认识了另外几位资深的做社会运动的人，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中国大陆的，都是来自台湾，或者是移民在美国长年定居，但是她们会比较关注中国文化，包括关注大陆的情况。我觉得他们的那种方式会让我觉得特别棒，我就觉得这样一种存在、这样一种人，可以用 amazing（神奇）来形容。

但是当时我并不会觉得他们这么好、那我也要成为象他们这样的人，因为那时候我还在读我的书，虽然我的书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我的专业对于我来说一向只是一个工具，我对我的专业从来没有那么投入。所以后来我在美国当时也比较迷茫，也不知道将来读完书出来是做一个工程师或者干些什么其他的。工程师所有的前景我都能想象，包括在美国留学生的一些道路、他们能干什么、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完全都能想象。我对这些能想象的东西就是兴趣不是那么大。

在这样的一个境况中，我被这些朋友拉去，参与了一个项目，后来这个项目有个名称是叫“华人性 / 别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Tongzhi Studies），其实是做同志运动的一帮人成立的这个中心，但由于他们当时资金的限制，也不能太做运动的事儿，就跟学术沾点边儿，从这个角度去关注大陆的同性恋研究，或者说性 / 别研究。

这个机构从 2002 年开始构思，2003 年开始运作，2004 年是第二年的时间，就在 2004 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机会资助中国大陆的同志去参加香港的华人同志交流大会。这次大会在华人同志史上可以说占一席之地，它最开始是台湾香港大陆三地的运动人士，想促成华人地区的同志运动发展而创办的，而当时相比而言，大陆是经验、历史、资源、知识都最缺乏的地区，所以也是希望能集结这种三地联合，尤其能够推动大陆的发展。

在 2004 年的时候正好有一笔钱，可以资助大陆地区，我负责那个项目，后来就发现大陆男同志特别特别多，在 2004 年的时候就有几十个小组，分布在很多城市，但是女同志，居然就找不到一个。当时我们的资金可以资助 20 个人去，我们是想 10 个男生 10 个女生这样一个分配。男生就有好多好多人报名，我们得挑，女生，我们就得找，根本都找不出来 10 个人。后来从这个项目我就发现，中国近几年的民间运动就是有了一个蓬勃

的发展，有了非常多的契机，所以不仅仅是经济，不仅仅是一些观念，包括这种公民社会运动也有了一个机会。当时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女同志似乎还没有这样一个机缘去行动，或者说还需要一点催化剂。

所以在 2004 年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觉得如果有什么人、怎么样的一些力量，能够在这个时候做一些事情的话，女同志社区的潜力会被激发出来。而从我在国外的一些经验和了解，其实在同志运动中，女同志的潜力是非常大的。这是我听到的一个国际经验，至于这个背后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给一个简单的答案。有人说其实女人更关心社会议题，比如美国的民主运动的时期，包括黑人民权、妇女运动、和平、反战、环保，女性的参与度都非常强，女性似乎更关注与一些社会公平相关的议题。同时，女同志又更是被压迫的女人，因为除了别的女性被压迫的议题，她们还有性倾向的这种压迫，所以女同志一般在某种意义上会更加激进，因为有这些压迫，她会有更强烈的反弹，会有这种更强烈的欲望去改变这个社会不公平的地方。

（本文访谈于 2009 年 7 月）

追命：

从幕后走向台前

整理 / 罗名，访谈 / 罗名、鸽子

追命——NGO 从业者。同语创建者之一、核心小组成员、运营主管。

一直关注“奇特”事物及性质上的少数人群。2004 年底由于私人原因从网络转到线下开始参与同运，期望以同运为突破点实现人人平等。同运初衷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不用“偷偷摸摸”。

那时花开——“那时我主要看的就是上海的想起做的‘花开的地方’…现在花开的地方已经没有了”

我 2001 年的时候开始在网上找同性恋网页，那个时候拉拉网站就有挺多的了，像深秋小屋呀，拉拉俱乐部呀，拉拉社区呀。有的网站我注册了，有的我没注册就只是上去浏览。有些网站网页的一侧有很长的列表可以点进去，有的板块还挺文学的，有同志小说什么的。但是后来到了 2003 年、2004 年的时候，好像因为服务器要开始收费了，好多网站就找不着了。后来我主要看的就是上海的想起做的“花开的地方”。

刚开始能够上网时间不太多。2001 年那会儿我们家还是拨号上网，计时收费的，又慢又贵。而且后来我工作的单位也不能上网。2003 年底的时候正好赶上一波给北京市民免费安装 ADSL，上网的速度才快了起来，而且也是包月的。这样上网时间才比较长，可以在花开的地方潜水。花开 2002 年初刚建的时候比较简单，没有很多版面。后来就老改版呀老改版呀，版面越来越多。也分得特别细。有介绍各地活动的；有专门介绍各种各样群聚活动的；当然还有放照片的，这种版面就特别火，帖子特别多，回复的人也特别多；另外还有特别文化的，原来有一个艺版，就是发一些艺术性的评论文章，关于电影什么的，当然都是跟同性恋有关的；还有个口水版，就是你想随便发帖，或者不知道应该发在哪里的时候就可以发帖到这个版面。等我的硬件条件一具备，特别凑巧，花开的地方正好开始广招版主。我就申请了。

我申请做版主的版面叫做同片蓝天，有点类似热线电话的性质，就是别人发帖问问题，然后有人在那儿回答，差不多有些像心理支持或者答疑解惑。我觉得这个版还“正经”些。我从来都不随便瞎聊天什么的。我就觉得那个版还有点意思，比如它要回答一些问题，还能帮助帮助别人。同片蓝天里面的帖子问什么问题的都有，比如，会问 T 和 P 的那些，什么是 T 什么是 P，T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自己是 T 还是 P；有些人可能不太确定，问自己是不是拉拉，不知道什么就是拉拉，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这样是不是；有人准备出柜，问该怎么跟父母说；怎么找女朋友，俩人怎么相处之类；还有时候可能会有

父母发的帖子，有个妈妈就觉得她的孩子可能是拉拉，然后也来发帖，就问她孩子是不是，好像是因为偷看了孩子的日记什么的，就想知道她闺女到底是不是。这种帖子虽然不多，但还挺热的。大家都很积极地去回。回复的人呢，一般都持“正面态度”——“她不一定”或者“她可能是”，“如果岁数小的话，她可能不是”，但也有人一听就会说“哎呀，就是！”也有人劝她妈，不要对她怎么样怎么样。花开的地方中途关了一年，一年之后重新开，这个妈妈又上来了，说她确认女儿是了，虽然还是有点接受不了，但是也真没对她闺女怎么样，还算不错。如果有机会，真的该开一个父母版。

花开的地方对版主的要求还挺高的。我申请了之后，站长会要求我在之前回复一些帖子，大概几十个。她会查一下你是怎么回的，看你大概的思路是怎么样的，然后才决定是否让你当版主。版主的工作主要就是整理帖子和回复。版主是被要求必须回帖，还有要求一天必需得有多长时间在那个上面，大概 3、4 个小时都可以，必须保证得有在版上工作的时间。虽然也不用每天都在，但是不能一星期都不上版面。有特殊情况版主是需要请假的。如果不请假的话，就会被踢走。每个版大概 3、4 个版主，版主也不用排班，因为要求是所有的版主都应该上线。同片蓝天提问的帖子挺多，要是光一个人也处理不过来。还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帖子，也发在那儿了，得把它挪到别的地方去。所以版主的工作不是光回答问题，还有这些处理工作，把乱七八糟的帖子归于原位的工作。当然也不光版主在答疑解惑，别人也可以发，也可以回帖，但是对于版主来说这是必须要做的，因为这是版主的工作，其他人就是自由回复了。

现在花开的地方已经没有了。这种网站本来就经常被黑，花开也被黑过，黑客把你东西全删了，就得一点点重建。可能因为做网站的那些程序，也是从别人那儿拿来用的，源代码都是开放的，所以可能比较容易被攻击。花开的地方 2007 年关了一年，然后 2007 年底又开了，开到 2008 年底。当时正好赶上经济危机，网站服务器托管的那个地方宣告破产，结果连服务器都被卷走了。找不到服务器，花开的地方上面所有的东西也就全没有了。那个网站就彻底没了。

一个人到所有人——“她说她受不了偷偷摸摸的生活”

花开的地方的版主我做了半年就没做了，有两个原因，一个吧工作太忙，身体不太好，坚持不了了。第二个原因是，我当版主的时候把我的 QQ 号留在那个上面了，就是人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后来呢，连续有两个人加我的 QQ 号，其中有个人是要自杀。另外一个吧，我现在忘了，她应该不是自杀，但是也有好多好多问题。这俩就跟我聊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总算把那个要自杀的给劝住了。我觉得网上回答不是个儿事儿。你再怎么回答吧，顶多今天回答这么一个人，明天劝住一个人，但是这不是一个能够解决所有人问题的办法。所以后来我就决定不当版主了。

但是当时我并没太想做什么工作，或者说我还没决定要做实质性的什么工作，也没有想过走到公众层面上。我原来做版主就只是在网上的，没怎么见过人，不太想出来。首先我就没什么兴趣版聚，都是网友。另外，说实话，我对同性恋这个议题不是特别感兴趣。2004 年十一放假我去上海的时候，想起想把我引荐给当时刚刚回国的闲，继续做一些可能更加实质更加公众层面的事情，我回绝了。

结果凑巧的是，就在 2004 年的 11 月份，我大学时候的女朋友回来找我，说想跟我一起住。但是后来我问她是不是想跟我和好，重新开始，她却说她并不想跟我和好，她只是想跟我一起住。因为她刚刚跟她的男朋友分手，心情特别不好，只是想让我陪陪她。听她那样说，我挺生气的。我就问她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俩不能在一块儿，她说因为她受不了偷偷摸摸的生活。

我想偷偷摸摸这事儿，不是一个人的能力能够改变的。一个人是改变不了的。原来我觉得只要俩人好就成了。两个人工作好、生活好、其他什么事儿都好，就不用往外跑呀，搞活动呀什么的。当时的想法可能跟当时或者现在大多数拉拉的想法是一样的。在那之前我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这个情况让我觉得同志或者同志运动实在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不是因为工作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两个人就能真的怎么着的。我觉得这个实在是，需要改变一下，应该把这个社会改变一下的。所以我就决定了准备开始做公共层面的或者什么实质性的工作。

花开网站现在的博客



我们能够做什么——“其实好多时候，开会的目的，是想促进一些人之间的联系”

但是一开始，我也不太知道我能做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做这种宏观上的事儿。性格上我比较胆小，比较害怕认识人，也不敢认识人。除非是我真的看上谁了，或者很有目的性的去见谁，我并没有特别非常想去认识更多的拉拉。我很少参加版聚或者见网友之类的。后来我在上海的一个朋友又向我大力推荐了闲，我就鼓起勇气去了当时闲还在做主持人的拉拉沙龙。这样认识了安可，也认识了闲。

（2004 年）12 月底认识了闲她们，（2005 年）1 月初便在天涯（注：华人社区网站）上看到了闲发的帖子，想成立一个小组。天涯上好多人回应回帖。我觉得这是一个办法，就是一些人一起做这种小组可能就是一种改变社会的办法。对我来说也是参与公众层面的途径，于是我就去了同语的成立大会。在那次会议上，我们讨论了小组的名称、宗旨、理念，然后大家还讨论了在女同社区里面能够做什么事情，或者说大家都想做什么事情。但是当时其实大家也没有什么真的想出来具体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因为那个时候都没做过小组，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样 1 月份成立完，每个月例行开一次会，2 月份好像也开过会。但是 2 月份那次开会也还是大家说说想做什么。除了热线是在成立大会之后很快就做起来了之外，其他的事情或者其他的活动还是很少。（2005 年）5 月份我们开始筹划做一个全国的女同社区的会，请北京和外地的一些拉拉来参加，一起讨论一下在大陆的女同社区能够做些什么事情。在筹备阶段讨论会务的时候，就问谁来负责会务，但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那时候真的都是这样的，因为大家都挺忙的，真没有什么时间做这个。我看见没有人做，正好我那会儿刚刚把工作辞了，所以我想那没人做就我做吧，我就自告奋勇做那次会议的会务了。

当时其实也没有什么社区活动。北京当年的姐妹小组也解散了，好多人都找不着。闲就从她之前就认识的人里面找了一些人请他们过来，也请男同小组帮着联系了一些拉拉。这样全国各地的零零星星都有一些人来，黑龙江的，西安的，上海的，成都的，广州的。另外还请到了香港的 connie 和台湾的王苹。外地的这些人里面有一些是版主，一些大网站的版主，比如深秋小屋的那个 dongdong；有一些是开同志酒吧的。因为当时全国各地都没什么活动也没什么小组，所以就更别说小组的发起人或者活动分子了。

会议的流程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了，主要就是想看看大陆的女同性恋能做点儿什么，讨论可以做的事情。另外也是想号召号召大家，加强一下彼此之间的联系。其实好多时候，开会的目的，是想促进一些人之间的联系，社区的拉拉的活动，或者小组的成立。比如后来想起回去成立了女爱小组，于是他们的小组在那之后也开始了组织活动，算是那次大会的收获吧。不过开完这个会以后还是有好多参加会议的人就找不着了，不见了，没有联系，也没有了回音，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同语借这个机会开了第一次志愿者招新会。一方面为这次大会做准备，一方面也为当时一个拉拉健康调查项目征集志愿者。这是同语的核心志愿者 Sylvia 当时刚刚申请到的一个学生暑期项目。就像那么一点小火苗一样，我们都是一点一点的做起来的。

（本文访谈于 2009 年 11 月）

sam:

让世界更明亮 的热情

整理 / 宫宇, 访谈 / 大拿

sam——大陆拉拉纸质杂志《les+》联合创始人及轮值主编。les+ 工作室负责人之一。作为媒体人，她将本职工作的前沿模式带入同运中来，用文化的力量改变世界。



Sam, 大陆酷儿女性社群杂志《les+》联合创始人及总编

创造一个自己的东西——我觉得一般人做事情都不会说“我为大同”，而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2005年我刚毕业、接触社会，那时候就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底层，不太能有自己的存在感。我当时挺悲观的，从拉拉角度、个人角度都觉得没什么希望。…有一个朋友对我说，“现在你讲话都特别悲观，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积极一点、阳光一点、明亮一点的。”…于是我去找 gogo。我记得去找 gogo 那天的天气很符合我的心境：天特别灰，就好像一个水彩画，乌云笼罩头上。我就这样走去她。

最开始有做《les+》的想法是 2005 年的事情。我觉得一般人做事情都不会说“我为大同”，而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我当时挺悲观的，从拉拉角度、个人角度都觉得没什么希望。2005 年我刚（大学）毕业、接触社会，那时候就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底层，不太能有自己的存在感。所以我想创造一个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存在感。做这个基本上是跟我的专业也有关系的。我学中文，我记得以前，应该是在我做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但当时想的是我先去杂志社（工作），有经验之后再去做。那个时候（2005 年）我觉得有点等不起了，每个事情都在发展。可能从个人角度我想能够去发生吧。另外，我不想要等到以后，“以后”是什么？而且我当时也没有在杂志社。所以就干脆先做，做出来再去锤炼好了。

官方的讲：一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刊物；二是网站里面讲的话也都很消极。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确定要怎么做，但是我跟很多朋友聊的时候大家都会给一个想法。有一个朋友对我说“现在你讲话都特别悲观，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积极一点、阳光一点、明亮一点的”。我还记得那是十月份，于是我去找 gogo。

gogo 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网友，当时我们都在一个叫深秋小屋的网站。我觉得她的故事很感人的，后来就加她、和她聊。她可能以为我是 P，约我出来见面，我们就这么认识了。虽然她大失所望，但我们还是认识了。我当时特别羡慕她，因为认识她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和外界的拉拉接触过，但她有一帮拉拉朋友。我就特别想加入她们，但又觉得好像挺乱的。她后来可能觉得跟她们（那些拉拉朋友）在一起，过那种纯粹的小孩子的生活对她自己也没有益处。她觉得我这个人比较老实靠谱，就经

常找我和一一玩。这样我们就越来越熟，就是这样认识的。

我记得去找 gogo 那天的天气很符合我的心境：天特别灰，就好像一个水彩画，乌云笼罩头上。我就这样走去她。我在大四的时候参与过制作学校的刊物，大致知道那个流程。当时是想按照我们学校的校刊那样，做成一个大开纸。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容量自己还是可以去掌控的。我问 gogo 可不可以帮我一块来做，因为她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当时挺疯狂的，（2005 年）12 月底就做完了（第一期）我就一直跟她念这个事情，她说“你要不做就不能消停。”其实当时也没有设想就只做女同的，但是我不认识什么男同志，也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怎么找到学生去跟他们说这东西。我甚至还给一个不认识的不知名酒吧的老板打电话，问可不可以一起合作。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理我，他们只会“嗯嗯”，说你们做出来吧。其实听一听就算了，所以最后就只做了女同。

那时候我利用自己仅仅认识的几个人，约她们写稿，包括做第一期的访谈，“快乐”这个主题的深入……当时我负责文字，gogo 负责设计。当时我们的定位就是要明亮，积极地，希望尽量比较风趣，但最基本的是不能做得太学术。

虽然我们希望有一天能把这个东西发出去。但我们的心态都很轻松，就好像这是我们自己的博客、一个自己预想的空间，给一些身边的朋友发就行了。当时我听说了闲，就找了很多朋友想认识她，后来不果，所以就直接去沙龙去找她。当时她可能也挺意外的。她之前也是想有一本这样的杂志，所以很爽快的答应做发行。基本上《les+》当时的结构就是我跟 gogo，闲做发行，一一做网站，就这样第一期做出来。

现在想起来，第一期的《les+》其实内容很少：一篇作品是我写的，一篇是台湾关于拉拉的基本名词解释，有一篇人物和一篇电影的，还有关于主题的。其实主题很简单，就是每个人来讲自己的感想，或者是怎么看待快乐。那个时候篇幅真的很小，我们甚至还没有构成一个核心团队。

梦想的足迹——刚开始做这本杂志的时候，我设想的是，希望《les+》有一天会能够正规化，不再是地下刊物。…《les+》已经走了这么久了，希望它有一天能够成为正规出版的刊物。…gogo 说她愿意等十年。我是一个意志力非常不坚定的一个人，能做这么久，对我来说也是挺意外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它（《les+》）在推着我走。

现在的《les+》分为六个结构：编辑部、发行部、推广部、设计部、财务还有顾问。这分管这些结构的六个人都是核心的成员。包括 gogo、一一、我还有后来参与进来的大头、蛋挞和雪飞，这三个是我们创刊几个人之外加入进来的核心的成员。组建起我们的这个核心创作团队，主要有两种渠道：第一是有人看了杂志联系我们，我们会和她建立联系，看看这人靠不靠谱、能力够不够；第二种方式就比方说大头，我们认识的时候也挺早，大概是第二期出刊的时候。我们认识大头后就跟她聊了一下，她是非常著名的知识分子，然后就开始先约她写稿。其实我们与正规的商业杂志最大的差别，不在于我们是不是一本杂志，而在于我们是一个非盈利机构，是一个靠热情、友情联结起来的团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认同的友情找到适合的人。

要说最开始出刊的《les+》和现在的《les+》有什么最大的区别，我想是现在的杂志从结构相态更加符合一本杂志的定位。其实刚开始做这本杂志的时候，我设想的是，希望《les+》有一天会能够正规化，不再是地下刊物。我还记得就这件事闲问过 gogo “你觉得什么时候有希望”，她说她愿意等十年。其实我当时没有想太多，但还是越来越希望。《les+》已经走了这么久了，希望它有一天能够成为正规出版的刊物。

我是一个意志力非常不坚定的一个人，能做这么久，对我来说也是挺意外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它（《les+》）推着我走。可能会有很多人说“你都做了四年多了”。其实不用看这四年，或者甚至十年。我们就看今天出了十九期，我要出二十期。这就可以了。不用想那么多，先把二十期做完。以这样的心态往前走就好了。不管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还在做，出现问题再想问题好了，不用老想这么多困难。

其实我们一直都很幸运，至少没有碰到像“饭否”¹ 这样的情况，至少我们一直在做。曾经动摇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原因是我们核心成员之间出现了分歧。但从某种角度来讲，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困难，不论是外部还是内部的。这个社区和团队相对来说都比较支持。我们不讲大家怎么样一期一期的坚持做下来，很多相对固定的成员承担了很多压力。有的时候如果我主编这期杂志，我都觉得我都要“脱一层皮”。像一一是一只要她在线，她就会把她的客服启动接受骚扰或咨询，还是挺辛苦的。新成员的加入虽然可以帮她们分担一些，但也有很多问题。一一和 gogo 这两个人要求也比较高。比方说 gogo，我们也试着帮她找过（帮忙的人），但存在的问题却比较严重，而且我个人也还是觉得 gogo 做得最好。她是创立人，对这个（les+）的感情最深，也还希望做的更好。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努力，比方说杂志的设计形态相对固定化，这样 gogo 就不用每期都做一个新的设计。一一这边，现在目前打算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能够坚持下来都挺不容易吧。

les+ 这个团队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做杂志，所以最大的成就是每年杂志都要成长、都要进步。我们觉得自己做得更专业了。比方说第一年，第一年是一大张纸；第二年是三十六页的，不是全彩的；去年我们又大了，就是相对的固定媒体形态，五十六页，是全彩；今年是七十六页到八十页。每年我们都在变，都在成长，都做得更好、更专业化。

《les+》也成就了我。2005 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什么也没做，有很多疑惑也很悲观的人。现在我觉得自己是依靠这个平台一点点在成长，心智更加完善也更加乐观、理智，而不只是一个青少年的迷茫状态。这是《les+》带给我的。现在当我有什么困惑我就去做（相关主题），去寻找答案。比方说有一期是“同志老了怎么办”。当时我自己也有这个困惑，所以就去找相关的人去谈，从相关的国内国外的背景找答案。然后我把自己找到的答案呈现出来。又好像有很多朋友问我“形婚是不是很简单”，但其实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就做了马上出刊的这期形婚专题。

1. 饭否：中国首批微博客服务的网站之一，2009 年被关闭，2011 年 11 月又重新开放。

《les+》可以改观我们生活的很多面态，举个简单的例子：gogo 当时想做《les+》是希望雪飞能够看到有很多很不错的拉拉，而不只是每天坐在那里混的小孩。她不希望雪飞看到拉拉的人群是这样构成的。她希望看到大头¹、闲这样的人会让雪飞会更加的坚定。从私人生活来说，我们共同都有这样的愿望。但对我个人来说，现在我觉得《les+》就是《les+》，自己的生活就是自己的生活，你不能期望太多。它（《les+》）对我来说当然是自己的成长，但不是说做了《les+》我的生活就依靠它来完善。

成长的烦恼——我和 gogo 两个人都在成长，每天都在调整和反省自己……我今年特别大的感慨就是做 les+ 四年，…虽然我确实做得很多事情：我去完善、或者去拓展、并且成功了，但是我忘记了自己最根本的问题，我忘记了自己要先回答的两个问题，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回答这两个问题。

去年（2008 年）les+ 遇到了一些困境。拉拉营的时候——就跟邵文² 讲了一下我们现在的情况。她建议我们成立核心委员会。我们觉得这半年核心委员会是很有效的。它平衡了一个组织，成员们各自都做了什么，或者应该做什么也都比较明确。大家都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和分工，然后共同来决策。而且我和 gogo 两个人都在成长，每天都在调整和反省自己。

去年我们是双月刊，但是今年变成了季刊。这是我们核心成员共同决定的。虽然我个人是一个执行和行动派，很少退缩。但是其实相应的后退与反思是必要的。像去年（2008 年）做双月刊的时候，（杂志）已经是五十六

页了。那时候的压力相当大，也无法去管这期要做得多好。因为要完成的就是正常的出刊，赶快做出来。其实去年（2008 年）有几期杂志都做的挺差的。后来我们都觉得太累了，所以今年年初开第一次核心成员会的时候，我们共同决定今年要休养生息，不能让自己那么累。因为如果透支的话很有可能提前让这个杂志或者这个团队结束。所以今年我们就做季刊。这样我们会有时间想想怎样把这本杂志做好，至少不会因为疲于奔命而失去了思考或者是缓和的余地。

目前我觉得 les+ 的非核心成员或者是核心成员之间可能有几个问题——对于这本杂志的认同、理解不够深刻，还有团队建设不够完善。我觉的我们是一个资讯杂志，但它不是一个只提供简单资讯的东西，它应该有深入报道或者分析。我当然希望 les+ 能够变成一个正常出刊的杂志。可能那个时候（《les+》）就不用是季刊了，至少是双月刊，可能月刊会比较靠谱。但这有三个方面的需要：

第一是外力，希望政府或者是相关出版集团以及社会舆论能够认同这本杂志的存在。第二是要有钱。目前 les+ 主要就这三个方面的资金来源。第一年我们打算自己出然后找闲做发行。我还记得那时候接到她的电话，她说你们做这个已经很辛苦了，杂志印刷费你们就不要出了，她来想办法。虽然同语也没有钱，但是闲会帮我们设法找到或告诉我们哪个地方可以找钱。前几年就是爱知行³ 出的钱，现在也是通过闲了解到“正义女神”⁴（基金会）。其实去年（2008 年）我们开始卖杂志，还有很少的广告收入。所以我们，包括一一，一直要做下去是希望 les+ 有一天能够不靠外来资金，可以自己就做杂志。第三，做杂志的基本技能要足够，我认为在这一方面自己还不足够，至少还需要三年的成长。

我今年特别大的感慨就是做 les+ 四年，比较专心的是去年这两年。但是我个人的职业的成长却没有赶上自己应该走的步伐，对我来说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要做一本杂志，我先要知道一个好的杂志应该是怎么样的，其次我要知道一个好的拉拉杂志是怎么样的。虽然我确实做得很多事情——我去完善，或者去拓展并且成功了，但是我忘记了自己最根本的问题，我忘记了自己要先回答的两个问题。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回答这两个问题。

未来我希望自己做杂志的技能已经达到，能够去担当这个位置。因为如果真的要担当一个商业杂志，那么它的要求要比现在高很多——要具有一个专业的杂志技能，还要知道怎样运营、怎样去寻求资金、怎样保证每个月的广告收入……

“我们还有想让世界更明亮的热情”——les+ 其实也是在历史洪流里面，我们有义务去当今的女同志的运动的前线。…我还是愿意把《les+》定位为一个去前线记录拉拉的女同志运动还有生活的杂志。…这本杂志存在的意义是它记录、展现了这个年代拉拉的面貌和状态，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内心的…我们利用了杂志、网络、资源平台尽力去推动了这个年代女同志运动…同运的前景肯定是乐观的…虽然也有遇到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在积极开放的、热情澎湃的做这件事情。

《les+》我定位为生活类杂志。但其实我们是一直在调整的，比方这几年的女同志运动开始做起来了——就好像大头的刊首语说的：它停滞了十年，现在出发就不会轻易的再停下来了。我们 les+ 其实也是在历史洪流里面，我们有义务去当今的女同志的运动的前线。现在来

讲，我还是愿意把《les+》定位为一个去前线记录拉拉的女同志运动还有生活的杂志。

另外一方面，在 les+ 看到各种各样的组织活动开始爆发出来的时候，也想到了自己做。

07 年我们第一次自发地想做“les+ 和朋友们的创意市集”。我们特别在创意市集申请了一个同志专区，然后邀请我们的那些会做东西的实体的设计产品的同志朋友。因为 gogo 要把 les+ 的风格，从品味延续到实体，就邀请她来做这个活动。

去年（08 年）我们承办了 lalacamp（拉拉营）培训的北京站。07 年的时候我们参加了由闲、王苹¹、Mai² 这些组织建立一个两岸三地的夏令营（注：2007 年珠海首届拉拉营）。当时参加拉拉营之后，每个人都觉得热情澎湃。还记得大头写了这个过程，之后我写了很短的几个句子去冲击这个专题。那时候我写道“我们为之付出的努力，是在建设着我们的未来……因同一信仰而相聚一堂的人们，我们还有想让世界更明亮的热情”。所以当第二届拉拉营希望在五个城市做，每个城市由当地来主办的时候，我们就很自告奋勇的承担北京站的工作了。

这之后（08 年）我们还做了十个城市的酷儿电影巡回展。那个也是多个组织共同去完成的，但是创意是我想出来的。作为酷儿影展的主办方，这个影展的构成和面态是我们来完成的。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关于国内独立拉拉电影的报道，觉得很多人想看。之后我们就主动去做并且找同语来合作，就问它可不可以提供这些影片。北京的反响非常好，两个下午来了六百多人。然后我们又跟大家接着谈，说把这个普及到外地去。

1. 2010-2014 年华人拉拉联盟委员，时任《les+》杂志轮值主编。

2. 台湾同志运动家，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成员。

3.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由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发展而来，于 2002 年在北京市海淀区注册，目前主要从事非盈利性社会工作。从 1994 年开始从事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和倡导，推动了政府和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推动了艾滋病相关领域草根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4. 美国纽约正义女神基金会（Astraea Lesbian Foundation for Justice）致力于支持 LGBTI 的基金会，注重有色人种、妇女权益、跨性别人群，而尤其支持女同权益。
<http://www.astraeafoundation.org/>

1. 台湾性 / 别人权协会秘书长

2. 美国正义女神基金会工作人员



2012 年《les+》借助同志媒体的身份开展媒体倡导项目进行发声，出版物包括《LGBT 媒体报道建议手册》《性少数发声指南》

艺术展（别·性艺术展）我没有参与太多。虽然最初这是我的一个创意，但后来 gogo 决定做起来。les+ 年终派对是一年一次的，这算是是对自己 and 读者的一个回馈。

做 les+ 网站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及时获得读者的状态、听到她们的回馈。其实之前在推广方面我们并没有一个自己的主体。我们今天在这里发个帖，明天在那里发个帖，推广的人员会觉得我们有一个自己的网站是对推广来说就相对比较好的。我们认同她的这个决策和建议，所以做了这个网站。其实参与这么多杂志以外的工作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打开杂志的影响力。

在 les+ 发展的过程中，它是有推动一些事情的。这本杂志存在的意义首先是它记录、展现了这个年代拉拉的面貌和状态，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内心的。第二，就像我

们宗旨上写的，让包括同志在内的更多的人听到同性恋群体的生活。我觉得我们在做，而且基本达到了。我们利用了杂志、网络、资源平台尽力去推动了这个年代女同志运动。

我不知道 les+ 在同运中能够做多少。我们尽力做自己能够做到的，但不可能立下豪言壮语说会做的多大或者多好，只要有精力只要能参与我们就会以我们的特长或者资源去做。

我觉得在 05 年的时候（同运的）报道，特别是女同志的报道还是很少的，但近几年有众多的活动、媒体宣传，还是靠这几年的同语以及各地的组织的成长，所以我觉得现在确实是一个（同运）开始欣欣向荣的状态。它预期会做得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中国有中国的特色不可

能单纯比照国外的。比如说美国当时跟民族运动和女性权力运动走在一起做，他们有他们的成功，台湾同样也是如此，他们跟民族运动走在一起的。中国来说相对比较特殊，中国的民族运动很难做，那么一个去倡导个体的权利或个体存在的运动在中国很难做，要去推动同性恋个体的存在和相应的权利就会更难做。所以我觉得以中国的特色和符合政府的尺度我们在很小心谨慎的动。

我觉得中国的民主运动或者是政府对同性恋的看法还是会改变的，但是时间有多长我不知道。这不是一两个组织而是每个地方的组织都在做的一个东西，就看大家怎样一齐努力去推动它。（同运的）前景肯定是乐观的，只不过看这几年我们怎么去（推动它）。虽然也有遇到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在积极开放的、热情澎湃的做这件事情。

（本文访谈于 2009 年 7 月）

gogo: 梦的坚持

整理 / 宫宇, 访谈 / 大拿

gogo——设计师。大陆拉拉纸质杂志《les+》联合创始人及设计总监。“别·性”中国首届多元性别艺术展项目发起人。《les+》杂志美编及 les+ 创意文化产品设计者。

为了这个想法单纯的拉拉杂志之梦，自我和固执的设计师 gogo 时不时要走出理想世界，为一份没有薪水的事业放弃闲暇，让最初在一旁不屑的女友信服，与一群彼此各抱梦想的拉拉朋友沟通出一条所有人都为之努力的道路。



gogo, 设计师。大陆拉拉纸质杂志《les+》联合创始人及设计总监

“当时，我们的想法特别单纯”

《les+》的想法最初应该是 05 年十月份。那之前大概是 03 年十一月份，我在深秋小屋上认识了 sam。我记得 sam 那段时间也说“这一大堆人每天在一块，有一个人脉的基础，不能做一点什么事吗？”有一次几个人一块吃饭喝酒，说到做一个拉拉杂志没准能赚钱。但是当时也没有特别仔细的想过。又过了很久一段时间，sam 跟我说“咱们做一本杂志吧”。她最初的想法特别简单：用几张 A4 的纸直接打印出来就行了。我说那是一个传单而不是杂志，而且如果要打印几千份的话费用也存在问题。所以我提议做一个大折页。当时我们的想法特别单纯：因为那时候网上到处都能看到特别压抑的故事，但那并不能够完全反映年轻人的现状。至于具体的杂志以后会变成什么样，我们没有特别仔细的想。

《les+》的这个名字其实特别波折。最开始 sam 想用一 个中文名，而且要有“同”这个字。但是我总是觉得中文字在设计上不是特别好看：中文的刊头太满、太方总是不容易做，而且做出来也不好看。所以为了设计上比较容易操作，我希望用一个英文名字。因为英文空间感比较强，而且本身就有很强的符号化感觉。那时候我坚决用一个英文的杂志名字，sam 就坚决用一个中文的，而且还要叫“同”什么。我赌气跟她说：你叫“同一首歌”吧。为了这个名字我们纠结了特长的时间。后来忘了是有一个什么提示，脑子里一闪念，我想到了 les+。它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含义，而且那个“+”可以理解为家园的家，也可以理解成加减乘除的加——这个加号可以赋予它的意义特别的多，而且从设计上特别好去处理和把握。说实话在出杂志之前我也比较担心这个名字不被人理解。不过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大家好像都能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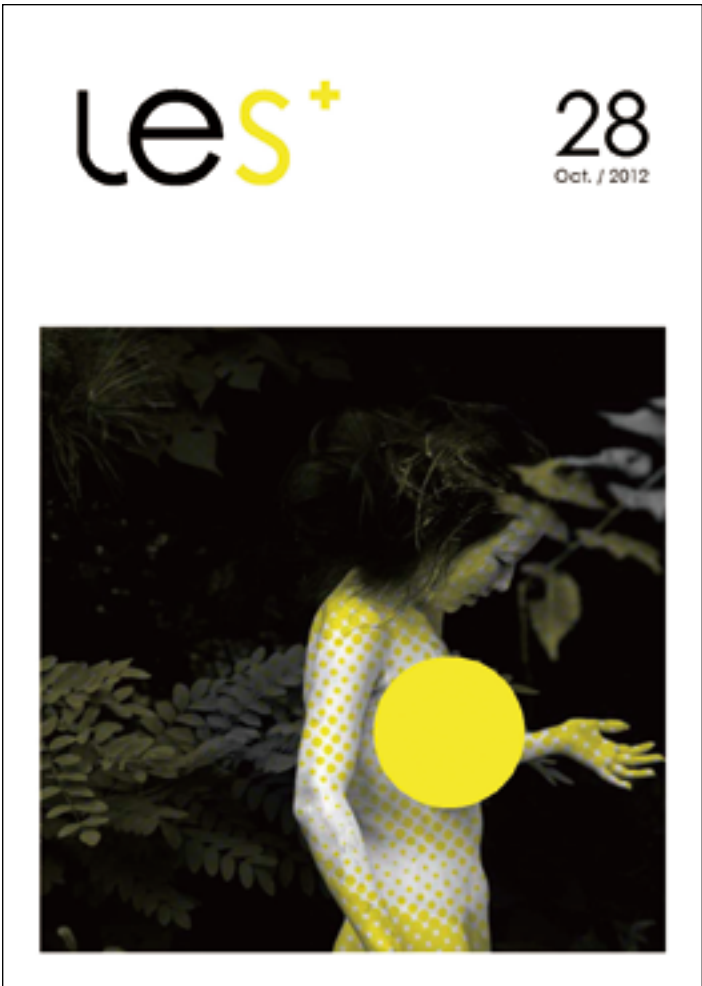
《les+》第一期的参与人主要是我和 sam。文字部分主要是由 sam 一个人负责的，尤其是整个文字方面的创意。第一期杂志刚做出来的时候 sam 在我家，当时我们兴致勃勃的讨论要把《les+》做成一张大纸应该怎么样折、怎么样拼。那时雪飞跟——（les+ 核心成员）在旁边特别不屑，她们说“闹吧，她们俩做不出来。”

在西厢（注：酒吧）发放第一期的那个晚上，我觉得发的挺好的。当时雪飞跟——可能比较受鼓舞，从那之后她们俩改变了特别多。其实现在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全都是因为 les+ 的原因而逐渐加入进来的。记得第一期去（拉拉）沙龙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人跟 sam 报名说要做杂志。大头¹应该是从第一年就加入进来的。也有好多人是看到杂志之后逐渐加入进来，变成 les+ 的编辑也好、作者也好，甚至直接开始控制整个杂志的内容。

“对 les+，我的期望是它能带来多大可能”

从我的角度讲，做第一期杂志突出的困难就是出片打样和印刷。我和 sam 去拿第一次顺利出片的杂志是晚上九、十点钟。那个地方在南三环，特远，我们对路途也不熟，就顺着三环走。那天我的鞋还磨脚，走路一瘸一拐的。我觉得这辈子没受过那么大的苦。而且两个人口袋里一共就只有十多块钱，打车也不够。当时还特别饿，我们走在路边看到一个卖地瓜干的，就买一袋地瓜干边走边吃。这个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最开始我们的想法是自己拿钱做这个杂志，但 sam 在第一期做出来之前就已经利用自己的一些关系去跟别人聊 les+，征求别人的意见和想法。那时候有人介绍她认识了闲，所以第一期出来之后闲就开始帮我们找钱。现在想想第一期杂志并不像后来所遇到的困难那么多，是在两个人特别有冲动的时候做出来的。像出片打样这种困难是体力上的，它不像杂志之后尤其是今年、去年（2008,2009 年）遇到的问题那样严重。

我觉得（做杂志的）第一年（2006 年）就是吸引和冲动，当时特别有热情特别有干劲。第二年的时候知道除了冲动之外，应该赋予它（《les+》）更多的内容。第三年的时候，整个杂志都处于特别焦虑的状态。因为那时的 问题已经不是杂志的内容，而是真的涉及到杂志的定位了。杂志定位对我的压力没有对 sam 那么大。在形式



2012 年 8 月 第 28 期《les+》，终刊。

设计上我可以不断的试验，但是从内容上大概没有什么可做试验的。第三年整年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杂志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杂志？那时候人员方面也有 一种疲惫。现在事越来越多，但是精力根本照顾不到那么多。每一个疏忽的地方，都会在今后带来很大的麻烦。另外的问题是“靠谱的”人不多。而且做事特别靠谱、写文章很好的人都很懒。现在 les+ 整个志愿者的管理和培训有很大的问题。从去年开始我就希望扩大 les+ 志愿者，扩大 les+ 的核心人员。

（les+）这一群人怎样沟通也是一个问题。其实最开 始一两个人做 les+ 的话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一旦它逐渐成长起来不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了。很多人一起来做一件事情的问题是大家的想法会有冲突和偏差。而怎样在众多的想法中找到一个能让所有人都为之努力的方向是很困难的。现在 les+ 的所有编辑人员都没有薪水。那么怎样让一群不为钱而工作的人愿意继续在一起工作就成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这就一定要使 les+ 成为一个有凝聚力、有团队感的“家”。而这种感觉的营造跟几个主要成员的做法是有关系的。

对于这个杂志我没有一个比较常规的预期。从最开始我就希望它是不断突破某种概念的东西。就像第一期的大折页，好多人说它有点像化妆品的宣传单、一张报纸，不能叫一本杂志。可我觉得杂志的概念不在于它有多少页、多大的开本、多少篇文章、多少字。杂志的概念是由它的内容、思想而不是形象来定的。在我第一天做（《les+》）的时候就希望它能够突破所有人的传统概念。所以第一年《les+》宣传的时候，它是一本反传统的杂志。别人说“反传统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找不到话说了，杂志（《les+》）实在不像一本杂志”。其实不是那样。一直到今天，每次我在排版的时候都问自己：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叫一本杂志？我想它不应该由一种形式所限制，而是应该由内容——内容决定它是一本杂志，它传达了一种思想、记录了一种现状。所以我最开始对《les+》这个杂志的期望不是它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杂志，而是它能够带给我多大的可能。我希望它能够不断突破那些现有的东西、固有的概念。我不希望《les+》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杂志：一本《时尚》，或者一本《知音》。我只是希望它是一个实验平台，能够让很多人去试验她自己的想法。从这点上看，到目前为止我们做的还好。

les+ 的意义就是它一直存在

我自己给 les+ 的定位是：在内容上它应该有一种引导性。时尚的东西一定会有，因为那是吸引一部分人的前提。但是更多的会定位在文化上——对拉拉的文化以及现在城市中年轻人（文化）的关注。对于一本杂志每个人都会从自己的角度有一份期望。我做这么长时间杂志也听到很多意见，但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满足所有人的期望。所以当你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期望的时候，首先要满足自己的期望。只有这样才能激励周围的人，带动志愿者继续做下去。

以前我一直期望某一天走在街上看到某个小孩穿着 les+ 的 T 恤或者拿着一本《les+》。但是现在这种心情慢慢的平静了下来。有的时候我的工作和梦想不一定会被别人理解。所以别人对我的夸奖也好称赞也罢只是别人的评价。它们不能够左右我做一件事情的决心。我不想再对别人的评价抱有期望。我觉得是自己的梦想就要坚持，即便所有人都不理解。

其实杂志就跟人一样是有气质和个性的。记得以前我就跟 sam 说其实《les+》就应该是一个小 T，它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可能很腼腆，会犯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她懵懵懂懂的，每一步都是自己在学习成长。我甚至能具体的想到她白白静静的很瘦、很柔弱但内心又很坚强。我希望她是一个有思想、有内涵，而不是一个很时尚的人。我一直希望《les+》是有气质、有看法的，哪怕这个看法错误、偏激、不可理喻。我觉的杂志卖的就是态度。我希望《les+》不只是简单的记述一个新闻事件，讲述一个人背后的故事。甚至是时尚大片也好，这当中都要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我觉得杂志出一期精品的意义并不是特别的大。这个杂志的意义就是它一直存在。虽然杂志目前来说有很多问题和缺点，但是它一直都在。哪怕现在我们改成季度刊，它还是会一直都存在。

我想 les+ 在未来两三年内做的更多的是对现有内容的继承而不是扩刊。主要是从团队到杂志内容上要稳固起来，然后才能想扩刊或者其他事情。至于说能不能够拿到刊号、正常发行就太遥远了，我不想这些事情。虽然 les+ 越来越多的去参与到同志运动里面，但是我觉得做杂志和这件事是可以分开的。杂志还是像杂志那样稳固的发展。但 les+ 不仅是一个杂志，还是一群人。这一群人能够生产出一个杂志，同时也可以生产出其他的东西。这群人可以去参与其他各种各样的事情，参与其中之后 les+ 就有了一个记载，成为了一个记录者。我想 les+ 这个组织的发展和杂志的发展不会相互干扰，它们可以一起发展、一起做很多活动。但是对于杂志我们只是保持现状。

做杂志到现在，我开始能够体谅那些人和事

出杂志之后我觉得自己的生活跟着它有了调整。以前可能每到周末我可以尽情地去逛街、去玩，但做这个杂志的时候就不可能。做杂志到现在我发现自己没办法把个人生活和这件事分开了。大家长时间一起做一些事情固然好。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样会禁锢你的想法——周围总是同样的人让你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接触其他的东西。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总是想看更多新鲜的东西。

当然这个杂志也有很多特别积极的意义。比如说我是做设计的，许多在工作上可能行不通的想法我可以在《les+》试验。我的工作和《les+》都是跟视觉、设计有关系的，它们其实可以互相促进。另一个积极的意义是我自己想事情的方法变得不一样了。排杂志的过程让我不可避免的接触到很多概念，比如同志运动、性别、多元文化……我的思想其实在慢慢地改变。最开始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很极端的人，有好多事情我没办法理解也不能接受。比如说怎样对待已婚拉拉、形式婚姻。其实《les+》每一期的专题都给我很多新的想法。以前我不太理解别人的生活状况和处境。我觉得人在任何困境之下，都不可以违背自己的心意。可是做杂志做到现在，因为看到了更多的故事，知道了很多很多东西不是一个人抱着特别单纯极端的想法就能解决的，我开始能够体谅那些人和事。

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比较自我和固执的人，不太喜欢跟人家沟通。以前我觉得设计师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是需要固执的，而且我也比较喜欢自己的那种不被环境和外界因素改变的性格。可是在做《les+》的时候不能这样，我要和很多人沟通，要知道和照顾很多人的想法。有时候我去酒吧或者哪里看到很多 80 后 90 后甚至更小的拉拉那种每天泡酒吧、认识姑娘的生活状况我就会问自己：这就是我要做的这本杂志所面对的人群吗？后来我都不敢问这个问题，因为每次问到我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悲哀。这时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为这群人改变自己。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时尚大片，喜欢交朋友。我们要因此把杂志做成一种时尚的东西吗？



2009 年 6 月 “别·性” 艺术展展前会议 中为 gogo

去年整整一年我都处于挺痛苦的阶段。我觉得自己做这个杂志的目的是要实验很多种可能，可最后的结果却是很多种困扰。我辞职很大的原因也是《les+》。因为挺长一段时间我白天上班晚上加班到十一二点，之后还要再继续加班加点的做《les+》。那段时间我觉得满脑子就是设计和排版，看见字就想把它往一块排。我设计《les+》的时间特别难以把握。因为《les+》不是一个程序化的东西，我总是希望在它上面有所突破。那些在工作中不被客户允许的想法我可以在《les+》上实现。所以排版的过程中我总是不断的在推翻自己，重排再重排。不过现在好像也没有当时那种执著了。我想没必要一下子把自己累趴下了，以后再也不想做。我想人有时候就像一杯水，自己特别满的时候就没办法再吸收新鲜的东西。所以我想潜下心来。在基本生活可以保障的情况下，我觉得现在这样还挺好的。

其实跟 sam 工作以来我们之间的争执特别大。在跟她争吵的最激烈、在我想“就是不改变”的时候，我会问自己：这种坚持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一种固执或者傲慢，是不是不对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喜欢这种拷问，这挺糟糕的。les+ 开始或许是我跟 sam 两个人的，但是现在它是很多人的。再那样固执的坚持自己，就变成了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行为。可是花很多精力去做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又是特别痛苦的。我甚至开始怀疑这个杂志存在的意义。经过去年一整年的纠结我给自己找到的继续前行的理由是：其实很多还在做的人也没什么希望，但是大家一直都在做。就是这点人和人之间的激励最重要。

我对同志运动的感触始于艺术展

les+ 想要承办艺术展最开始是在 07 年的拉拉营。当时同语有一个小额资金资助项目，于是我们就报了一个图片展。最早的图片展是 sam 的想法。因为这个展览主要是视觉部分，所以由我负责。后来我希望做成艺术展。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次从头到尾做这样的项目，很多的不合理分工导致最后一段时间特别的忙乱。

其实最早的项目报告是叫“缝隙”艺术展，不叫“别·性”。我那会儿希望这个展览本身呈现很多作品，但是这个展览本身又是一个作品。我的想法是在开展当天在画廊门前立起一个很古朴的像山西老院子的那种门。我们用斧头把门劈开几道缝，人们可以绕过门去里面参观，也可以通过这个门缝看到整个场景。我想让观众会感觉到，如果从缝隙去观看着整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只在缝隙当中存在。这可以反映同志所处的一个现实：如果周围的环境是通过一个缝隙看待你的话自然就会把你的世界看扁了。

这个报告在拿出来讨论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叫“缝隙”有点太压抑。而且如果这样做又可能会以“缝隙”这个作品的角度解释了别人的作品，那么参展的所有艺术作品都要受到影响。我想艺术展更多的时候是在呈现别人而不是自己，所以当时我也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想法。之后就要给展览找一个主题，当时一直想不出来什么。后来聊天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别·性”这个概念。我觉得“别·性”这两个字的概念特别的大、特别取巧，什么样的作品都可以塞进去，即使是这个东西不是关于性别性倾向的。这样对把那些作品组合到一起也会比较容易的。

这次艺术展基本上是达到了我的预期。我没想到一个展览会有那么多人看。可是关于后期的想法：网站的建设、艺术作品的代卖这块应该是很遗憾的。如果网站建立起来的话甚至可以变成同志的艺术中心。所有关于同志、性别、性倾向的艺术品都可以在那个地方找到。这样不管是对公众、同志人群、艺术家，它都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我对于同志运动的感触始于艺术展。艺术展之后我觉得或许是因为我们国家还没有反歧视的法律，我们做的好多事情都始终没办法彻底改善同志的现状。比如说艺术展就遇到了官方的阻碍和警察的施压。之前我对同运一直特别乐观，但是艺术展之后我变得不那么乐观了。问题是在中国想通过反歧视法太难，几乎不太可能。但是在不能够取得立法上支持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作还是要做，只不过是更注重策略。这不是指做事情的热情，而是指一种做事情的方法。如果要问我对现在整个同志运动的看法，我觉得应该是策略先行。

我觉得 les+ 应该在中国同志运动的历史当中作为历史见证人而存在。它是很难得的一个从女性的角度去记录这段历史的角色。对于中国同运未来的发展我不好说。我一直都觉得中国人的接受能力也逐渐在变强，人们逐渐变的宽容。或许有一天在我们做了很多东西之后，所有的老百姓都接受了。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本文访谈于 2009 年 7 月）

Eva:

我的政治身份是双性恋

整理 /Trim, 访谈 /Trim

Eva——澳门人，政治身份双性恋。无界限小组创建人，粉色空间发起人和核心成员，同志亦凡人主持，同语拉拉反家暴项目负责人，ILGA 亚洲区委员。

一直以来，Eva 希望能够为女性、为少数群体争取公平的机会和更多关注。对跨区域同志活动的频繁参与、与世界各地的资深同运、妇女运动活动家的交流和合作，让 Eva 坚信平权运动的未来是光明的。



知和社上演《阴道独白》
照片中人是 eva?

“我一直知道自己对这个女孩子与对其他朋友不一样，可是我没有为这种心情付一个名字。”

我有意识的喜欢女孩子是在十五还是十六岁的时候，我跟那个女孩子早就认识，到十五、六岁的时候都认识两三年了，之前都是好朋友的关系。我一直知道自己对这个女孩子与对其他朋友不一样，可是我没有为这种心情付一个名字，而且十几岁的时候会很容易对一个人有好感，所以我可能不只是对她一个人有好感，但是女的只有她。后来我就突然间觉得对她比对其他好朋友的那种牵挂要更深，觉得不是那么单纯的友谊，觉得我可能也有同性恋的倾向。

从初中开始，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就有看日本那种现在都还是很流行的 BL 漫画，然后也会知道什么是同性恋，我是从漫画里知道的，但是之前我没有想到。我只知道有同性恋的事情，但是没有看到任何女同性恋的东西，到很后边我才知道有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就是大概 1996、1997 年刚升高中的时候，家里买了电脑，我开始上网才知道的。知道有男同性恋网站之后，也有极少的女同性恋网站，就是那个时候才开始觉得我会不会是同性恋。但是当时十几岁，青少年的时候一切都是很模糊的，到现在我也是贴双性恋的标签。我当时也对一个男生有好感。但是两种感觉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我是希望被别人需要的人，跟男生会比较少那种交流，很多东西不能说，但是女生之间好朋友好着好着就变质了，她非常依赖我，在那种情感上非常依赖我，可能是我天性吧，就是比较喜欢被依赖。

跟她认识时我十三岁，她十四岁，我每天下课会去为小学生补习，地点就在她常去的那家麦当劳的后边，如果早到了的话我就坐在麦当劳里面，她每天下了课会在那边混一小会，然后就那样认识了。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而且认识不久之后她就移民到国外去了，但是我们都会写信，她会给我打电话，然后一直都保持着朋友的关系，直到我跟她表白。上高中时我开始上网，更容易保持联系了。有次在网上我问她“你怎么看两个女孩子在一起这个事情？”，她沉默了很久，回了我一句“我不是同性恋！”。当年我就以为她是拒绝我，所以后来我有点故意的疏远了她。

再见面是八年之后，也就是 2007 年元旦，我在澳门再见到她，那时候我已经搬到北京，交了第一个女朋友一年半了。那次我只回澳门三天，她基本上每天都打电话给我，每天都要见我，然后我就觉得这事不对劲，因为她会总是问我“你现在谈男朋友没有？”，那我肯定说没有了，这个就是事实啊。但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带过我北京的女朋友回家，见过我以前的很多同学，我觉得这个瞒不下去，因为我已经跟所有人出柜了，后来我还是决定告诉她：其实我是同性恋，我有女朋友。告诉她了以后，她不是惊讶我是同性恋，她是惊讶我为什么不告诉她，我就说了我十几岁的时候尝试跟她表白。我告诉她因为你以前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接受不了，但她说她不记得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

后来我分析，她自己也承认，因为她的外表比较 T，一直被人取笑或者说她是同性恋，所以她自己，我觉得也是恐同吧，整个社会对同性恋的一种恐惧。她累坏了，所以她以为我是在试探她“她是不是”，而不是对她表白，所以她当年非常恐惧，而且她后来完全不记得了，所以证明在她心中这个事情不重要。

那次我们坦白了以后，她告诉我她一直在喜欢我，然后我回北京，跟北京的女朋友分手后就跟她好了。这就像小时候爸爸妈妈不愿意给你买的一个玩具，当你长大了，自己有钱了，终于有能力去得到它的时候，说什么都要买回来玩一次。我就是在一个感情上特别纠结的人，我觉得我就是想了这个东西一辈子了，觉得就是不死心，必须要让自己同一个坑掉进去两次，所以就那样纠结着，最后还是跟她分了手。

“在一个已经发展较完善的体制下，你就只能做一个螺丝钉,你做不了很多,而我对自己生命的期待没那么低。”

澳门是非常适合养老的地方，是特别小的一个城市，谁都认识谁，谁都知道别人家的家长里短的事情，我特别不喜欢。我的家庭背景比较复杂，小时候直到我十八岁离开澳门之前，我都觉得澳门像个鸟笼，我是被困在里面的小鸟，我必须要离开那个地方。

我记不得在澳门时有特别看到过，但是我肯定听说过一些同性恋的故事，因为还有男校、女校，就是谁有一个女朋友，或者哪个女老师跟学生搞上，就那些耸人听闻的东西。在澳门我觉得尤其是女同志的声音更明显一些，因为我觉得其实港、澳那边女孩子的那个女权的意识挺强的，那边男的总是觉得被女人骑在头上，男同志反而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明显。我觉得因为男同志受到更复杂一点的歧视，他更害怕别人觉得他娘娘腔或者说就什么搞屁眼之类的，而且跟艾滋病也有关系，所以他们会更隐秘一些。对女同性恋，我觉得大部分人讲的是“哎还小还小”，因为比较醒目的都是十几岁的小 T 们，所以觉得她们还小，以后会变的。而且那边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更强烈一些，女孩子无所谓反正是要嫁出去的，男孩子就是完全不一样了，需要传宗接代的，所以对男孩子的管制厉害得多。

我不知道葡萄牙有没有保护同性恋权益的法律¹，但其实葡萄牙人在澳门不多，葡萄牙也不强，它也不会推广自己的语言，很少澳门的中国人会讲葡萄牙语。她的文化也没有推广，除了吃葡国菜还是蛮普遍的，但是除了吃迎合了广东人爱吃的这个特性，其他的事情我觉得没有在中国人心里扎任何根。

我以前上的是一个亲中的学校，想想看我六、七岁开始学唱国歌，我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上的是同一个学校，在这个学校十五年。那是一个比较好的学校，理科特别强的学校，然后顺其自然的就选择在内地上大学，尤其是不想太靠家里人上大学，如果在内地读的话那就便宜得多。我以前就有打工攒钱，有一部分大学的学费、生活费是自己支付的，所以一方面是金钱上的考虑，另一方面是在回归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是在中国的发展比较好。在一个已经发展较完善的体制下，你就只能做一个螺丝钉，你做不了很多，只能为别人打工，而我对自己的生命期待没那么低。

我们那边挺普遍的重男轻女，我有一个弟弟，母亲觉得宝贝儿子就什么都行，女儿就随便。我当年被保送复旦，得到我被录取的消息特别高兴的回到家里跟我的父母说，“我要去上海读大学了”，然后我妈马上翻脸说“跑那么远读大学干什么，女孩子你就是应该在澳门，

最多去广东念个师范，回来做个老师，结婚生子得了。”当然我马上也摔门走了，第二天我把我的全部积蓄拿出来交了学费。我十三岁开始打工，就是知道会出这种事，所以我其实是为自己铺这种后路，我一直知道必须得要为自己存读大学的费用，所以我从不乱花钱，才能存下那么多钱。长大以后我心平气和得多，觉得重男轻女也不是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成长环境就是这样的。以前我是非常愤怒的小青年，我觉得凭什么！所以我才会为自己留那么多后路，因为我不喜欢跟别人商量，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商量的，我不会让你可怜我，我不需要你的可怜，我有能力，所以我一直都是这样子。现在我长大了，觉得他们也不是说恨我或者怎么样，他们只是很习惯的被那套重男轻女的价值观控制了，觉得好的资源就是要给男孩子。

“我觉得这是我整个大学里面最难得的一个经验，通过做《阴道独白》认识了一些我觉得可以做一辈子战友的朋友。”

在复旦上学时，一个非常偶然的机遇，因为当年有两个留学生看过《阴道独白》，然后她们想在复旦做，就在复旦的 BBS 上发了个帖子，说有这么一个女性的话剧，约有兴趣的学生们某一个时间去教室里，给我们发了那个剧本看。当时对我来讲是一个挺大震撼，因为我不知道阴道也有话语权。读完那个剧本之后，对我启发很大，我觉得必须要让更多人知道这些事情，去思考自己。我读英语挺多空闲时间，就开始搞这个话剧。我觉得这是我整个大学里面最难得的一个经验，通过做这个认识了一些我觉得可以做一辈子战友的朋友。2003 年年初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那个剧本，后来非典，就酝酿了一年，2004 年做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就是几个学生，把所有的事情都能够联系起来，把一个话剧给弄出来。

一个法国的留学生，她认识一个避孕套品牌，说我们产生的任何场地的或者是其他有发票的费用都给我们报，算是找了这么一个赞助，钱我们不用担心了，第二年就有杜蕾丝的赞助，也有个人捐助。还有一个演员的妈妈，

1. 澳门在 1999 年 12 月 20 日之前为葡萄牙的殖民地。

那个演员也是留学生，她的妈妈就给了我们五千块钱，场地是在学校里找。第一年演出，有史以来复旦大学《阴道独白》举办第一场的下午，还接到电话说“今天晚上有可能还演不了”。因为当天那个场地才知道我们要演什么，开始租的时候没跟他们说，然后当天我们的票都不敢公开发，后来还是被知道了，到最后我们估计肯定是有老师给我们说了话，就顺利的演出了，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复旦就再没有任何场地问题了。

知和社¹是在 2005 年初成立的，我们第二年（2005 年）的演出有几个演员来自这个社团。第二年做的时候，正值我毕业之前，这个话剧做完了之后，我把自己锁在图书馆一星期憋出了论文，然后紧接着就找到了工作。听说《阴道独白》原作者说这个剧有一个神奇的魔法会让参与的人事情很顺利，我觉得还蛮准的，真的是，我五月底做完那个剧，然后一周把毕业论文交出来，紧接着找到工作，人家花半年要安排的事情，我就两周。

“我就是没有想一定要找女孩子，我没有这样一个假设，所以我不会主动的去找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碰到谁是谁。”

我上大学后就交男朋友了，很零散的交男朋友，有一些是约会而已，就是没有确定关系，直到我跟那个北京的长距离。那个人是我非典之后的暑假去丽江玩认识的。

我觉得我的生活有很多内容，尤其是我跟男的跟女的都行，我就是没有想一定要找女孩子，我没有这样一个假设，所以我不会主动的去找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碰到谁是谁，没有一个条件。而且在复旦我身边的，后来我知道是女同志的那些人跟我的状态也差不多，不会去找圈子，因为我们不需要，基本上全部都是忙过头的人，所以也是碰到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

来到北京以后，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我基本没有朋友，只有两个在复旦认识的，她们也是过来工作的，都很忙，没有时间每个周末都一起玩。知和社里有个小 gay，他去了北京的同志大学生夏令营²，去了北京拉拉沙龙，

他说“我觉得你跟那群人特别像”，他当时也不知道我有可能是女同。当时我挺无聊的没什么朋友，所以就去了拉拉沙龙交朋友。

我男朋友在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跟我在一起，因为工作，可是那个时候是我最需要人陪伴的，刚到一个新的城市，觉得就很寂寞，就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事情都去摸索，去问人，所以我需要本地的朋友，有一个指路的，但他总是不在，没时间。

我去拉拉沙龙是 2005 年 7 月，当时其实我知道我会喜欢女孩，但没真的交过，所以一开始就说我不确定。后来我认识了我北京的女朋友，就跟男朋友分手了，我是一个不一脚踏两条船的人。我跟他直接说，然后他挺崩溃，有一次半夜喝多了给我打电话骂我，然后我无言，我觉得我给你机会的时候，你没有良心的对我，那对不起，我不可能永远等你。而且其实当年我是很喜欢他的，喜欢到一个程度我提议过我们结婚，但是他没接那个茬。那时候我非常年轻非常冲动，而他是结过婚又离了婚的，所以他有很多顾虑，他比我大十三岁，比较害怕我太年轻，又觉得我比他有能力，我觉得他还是有点不知道能不能锁我一辈子吧。后来我觉得他是因为没有安全感，但当年我觉得他是不够爱我，这是一个特别大的理由，要换人。分手后的头一两个月我还是蛮痛苦的，因为心里还是要慢慢的忘掉一个人。

“人的观念要去改变，是非常漫长的一个事情，不是说你去影响别人的生命，我觉得是尽量的用生命去改变生命。”

上大学的时候上海有一个叫 1088 的酒吧，我去过，想要去找拉拉的，结果没有找到，没有明显的拉拉，男女都有的，我就去过一次，还蛮失望的。我在上海的时候其实不知道还有女同小组。

2006 年春天的时候我女朋友的工作非常忙，特别多的时间不在，我觉得也不能老憋在家里，其实在我灵魂里面还是有一些做公益做志愿者的热血的，那个时候工作



2012 年，澳门的首次同志游行

也没什么压力，就觉得反正有时间，就想要看看能不能做点事情。第一次去沙龙之后，我就知道同语了。我就跟闲联系，说我可以做志愿者，然后闲说有一个什么会议，你过来了解一下，后来就认识了 sam 和 gogo 她们。因为我是学英文的，一开始就做了一些编译工作，也没做多少，就是吃喝玩乐为主。

后来从 2007 年“拉拉反家暴”的这个项目开始，才真正做一些具体的事情了。开始是闲主动联系我的，她知道有这样一个资源，又结合我以前做《阴道独白》的经历，因为《阴道独白》也是反暴力的主题，问我可不可以来做。当时我的工作也是挺闲的，就决定试试，反正有一个资源在那边不拿白不拿，试一下能批给我们就批给我们，不能就算了。三、四月份开始，憋了几天，写了一个项目书，居然被选上了，其实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因为以前没有写过这种项目书，之后就开始一步一步去做具体的事情。

七月份的时候参加了第一届拉拉营，我是第一次在除了夜店外的同一个场所看到那么多女同志，那么多女同志为争取权利而努力去做一些事情，觉得挺鼓舞，因为觉

得自己不是独自的在做白日梦，就算做白日梦也有人跟我一起在做，觉得不是孤军作战。尤其是那些资深的女同运动的人士，像台湾、香港的那些人，看到人家坚持那么多年，也做了不少很辛苦的工作，就觉得做事情还是要坚持。

2008 年初的时候我参加那个 ILGA¹ 的会议，还是同语的渠道，闲觉得我合适，希望我能够去参加，正好请到假所以我就去了。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还是挺开眼界的，中国的拉拉没有资源，所以我就觉得对外公关也是很重要的，也觉得以后如果我能够在这个进程里面起到帮助的作用也蛮好的，会上就代表同语当选了 ILGA 亚洲区的委员。

2009 年我去了洛杉矶同志活动中心实习，最大的感想就是我们同运缺乏领袖型人物。人家开会主要发言人说出话来就是做秀一样，特别有意思，特别激动人心。回来后我做了“无界限小组”，没有具体的目标，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站出来。人的观念要去改变，是非常漫长的一个事情，不是说你去影响别人的生命，我觉得是尽量用生命去改变生命。

1. 知和社是复旦大学的学生社团，以社会性别为主题的学术类社团，宗旨为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为协助塑造一个更和谐包容的校园环境乃至社会环境，做出学生能做的一份努力。

2. 2005 年 7 月北京首届大学生同志夏令营，主题是“如何创造对同志友好的校园环境”。

1. 〈国际同性恋联合会，International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 and Intersex Association〉



2008 年，Eva（第一排左三）在 ILGA 亚洲区会议上

从 2005 年毕业来了北京以后，慢慢开始做同运的工作。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人，我觉得闲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因为她是我进入这个圈子，开始做同运工作后，跟我最密切交流、又一起工作的人。然后看到她还是蛮坚持的，虽然很多条件都不好，以她的背景，她应该可以做更舒适的工作，这让我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超脱。然后是 sam 和 gogo，她们年轻、热情、有梦想，都让我有很大的启发。跟闲、sam 和 gogo 她们是战友的那种友谊，我觉得很多时候不知道自己做了那么多事情对长远来说能有什么影响，可是最少我知道这些友谊是实实在在的，以后能够保留的一些记忆。后来像何小培对我影响也蛮大的，何小培也是通过闲认识的。她是老一辈，听她讲以前那些组织的经验，然后看她怎么过她的生活，让我很开眼界，觉得生活没有说一定是那样子，一板一眼的。

同运方面，我觉得不是女同志那么简单，是为女性能够争取公平的机会跟更多关注，因为我觉得这样女同志的权利才可以得到保护。这也是为什么 2007 年底跟何小培她们组成“粉色空间”，我觉得人的命运都是相惜相关的，就更别说拥有同样生理结构的女性，所以我就觉得应该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来推动女权这个事情，我也慢慢越来越偏向于为更少数的群体双性恋、跨性别说话。我本身就是一个双性恋，也认识了跨性别的朋友。我觉得其实要推广包容和理解这个概念，还是要鼓励少数群体的人站出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达到反歧视的效果，短时间之内，在内地要去推立法有点遥远，还是要做那种倡导的事儿。

（本文访谈于 2009 年 9 月）

整理者后记：文稿整理好的时候，Eva 刚刚作为 ILGA 亚洲区委员会委员组织了第四届亚洲区的大会，在印尼她们经历了“死里逃生”，希望经过这次的事件后，ILGA 亚洲区会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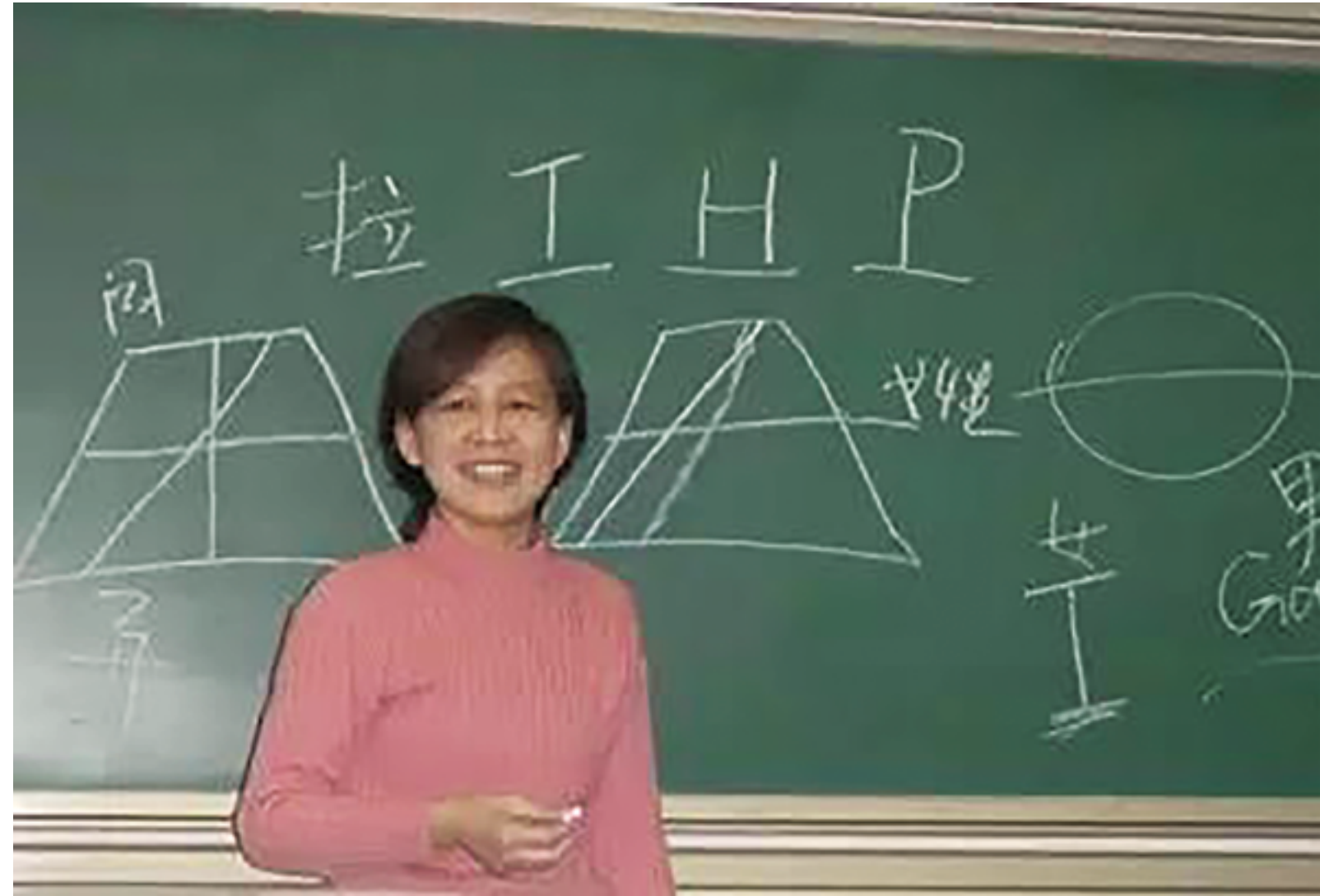
小白：

漂泊的梦想， 不羁的青春

整理 / 宫宇，访谈 / 静茹

小白——从事艺术类工作。曾经北京拉拉圈活跃分子，2007 年情人节活动的发起人。

小白来自新疆达斡尔族。对边缘处境的感知，让她对于少数群体的平权、反歧视运动有强烈的感召。曾公开同志身份，给总理写信，主持乌鲁木齐广播电台同志节目，独担网络电视节目制作。这些行动皆来自于她的社会理想：消除社会歧视，为人们争取平等权益。



2008 年，小白受方刚邀请，在北京林业大学的课堂上为学生做分享活动

“怀着对这个群体的同情，觉得自己应该为他们做点事。”

那时候（2004 年末）是怀着对这个群体的同情吧，觉得自己应该为他们做点事。我当时看到李银河在提交同性婚姻立法的提案，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去支持一下。但是作为一个个人来说我的能力还是有限的。所以我想作为同性恋的一份子先写一封信给国家领导人，呼吁他们去支持这个提案。但是那时候我在家里养病，没办法写。我当时父母都在身边，也很不方便。2005 年 1 月份我就向父母出柜了。我这个人平时很坦诚，跟父母没什么遮掩，而且做事向来都是自己做主，告诉他们只是让他们知道而已。给温家宝写信这件事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我爸妈可能会从别人口中听说我是这样的人。我想与其让他们听说，不如自己正正式式地去跟他们说。我爸妈听说我要做这事的时候都疯掉了。但是我的态度、立场很硬，事情一定要自己做主。我只是让他们知道，我肯定会做的。

2005 年上半年我在家养病，下半年我回到学校上学，之后我开始经常上网查资料，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来之后就发给张北川，让他帮我挑挑错。他指出了一些数据问题，还有哪些地方应该做得更严谨点儿。我就按照他的建议去改了一下。在 2006 年的 2 月份我赶在两会之前寄了挂号信给温家宝。我又把这个发在博客上，希望它有一定的公众影响力。这之后我就算是出柜（对公众）了吧。这个博客是一个公开的同志博客，上面有我的名字、介绍、经历、我对同志问题的认识、对同志婚姻的一些看法。当时博客上的内容也被很多人转载。

2005 年 10 月份时候我还到了新疆当地的 CDC¹ 同志工作组。2006 年 1 月份我不想考研了，想专门下点力气去做拉拉的工作。2006 年的 4 月就开办了新疆的拉拉热线，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做了很长时间。当时预防控制中心有一个男同志热线，我就跟它时间错开，就那么着每个周六两小时。2006 年 5 月份开始有一些拉拉过来认识我，希望跟我一块做小组或者参与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当时就有一个叫“蓝凡”的拉拉提议跟电台合作去做一个同志节目。一开始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实现，但是可以

试一试。于是一个周三下午，我就带着另一个大学一年级的老同志去了乌鲁木齐市人民广播电台。去之前我心里其实就想好了——我看好的一个节目叫“红山夜话”。我上中学时候就听这个节目，在新疆影响挺大的，收听人次大约有三万人而且涉及面特别广，是晚上的一个访谈类节目。它的听众一般都是比较年轻的、比较闲、愿意听、愿意思考的人。我们去了市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二天，“红山夜话”就打电话来问“你们今天晚上能不能来做节目”。我们都没想到，根本想不到会有这种合作。我当时还去找过新疆的《都市消费晨报》，因为这个晨报是民营的，在新疆算是比较开放、多元的报纸。但是我去找《晨报》的时候，他们连门都没让我进。就这样我们开始跟“红山夜话”合作，持续了两年的时间。后来是因为没有人可以做下去，才停了下来。

红山夜话的节目一直有个同志坚持着，还有一个电台主持人。每期还邀请不同的嘉宾、专家，包括李银河、高燕宁、崔子恩、星星、牧羊的父亲、同语的闲、les+ 的 sam 等等，我给他们拉了很多关系，这个圈子里能采访到的人都被采访到了。一开始是每周四晚上一期节目。但到后来实在是太累、赶得太急，就改成了双周一次。这样“红山夜话”是天天都有，但是同志话题是每隔两个周四。当时我帮他们联系被采访者。虽然我后来离开了，但也一直在帮他们找各种人，提供各种便利，或者提供一些选题。这个节目从 2006 年的 7 月开始持续了两年，其实做得很成功。但是虽然电台主持人很关心这个议题，但他毕竟是圈外人，有些东西不能深入，有些东西做不到那么高。这就需要有一个同志去做编辑，做选题的策划，才能把节目继续下去。所以当坚持两年的那个同志退下去之后，就没有人能够做下去了。原因一是没水平，二是没有人能够坚持。我自己做了五期吧，后来因为离开新疆了所以就没做。

“来北京时候状态是——我人生的意义就是搞同运了。”

2006 年 5 月份吧，我跟北京同语的闲认识了。当时我已经在网络上对同语、拉拉沙龙、闲有一定了解。对于拉拉沙龙的运行模式很感兴趣，希望能在乌鲁木齐也做类似的活动。通过网上看到的报道，我已经对闲的背景

有所了解，我对她和组织都有强烈的好奇。我和闲邮件联系后，她给了我她的电话，我们通了电话。她的声音很有磁性，也很温柔，给了人非常美好的感受。我想象她是长卷发、有书卷气、带着近视镜的女博士。这是最初的一些美好感受。我联系她是希望跟她学习怎么做社区工作，但是一开始也不好开口。后来她们找 Les+ 在各地的代理点，我就给闲写信说愿意做乌鲁木齐的代理点。后来她告诉我北京有一个同性恋大学生夏令营，因为我当时还是大学生，就报名参加了。2006 年 8 月份，我第一次来到北京，跟闲、sam 认识了，也去沙龙做了嘉宾。在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参加了第二届同性恋大学生夏令营，那一次对我的提高挺大的，因为接触各方面 NGO 的人，这是很大的学习。

其实我当时还是把同运当做一个业余的时间去做的事情。但是那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2006 年的 10 月份我的初恋女友跟我分手了，原因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公开的同志。当时我做电台那个节目的时候是以真实姓名上去的，等于说我对整个社会出柜了。再加上我在博客上也是公开身份的，这些东西对我女朋友来说是特别大的压力。她跟我提出分手时我特别痛苦。本来我还有一年大学本科毕业，但当时我就决定不上学了。那时候学校正忙于应付各种检查，退学也不给你办，后来我连手续都没有办就直接从学校走了。

社会歧视确实很伤人。自从这次打击之后，我有一点抑郁症。我排解这种抑郁的方法就是去搞同运。所以我来北京时候状态是——我人生的意义就是搞同运了。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因为我没有办法化解这些痛苦，没有人去说。即便是父母也不行，虽然我父母已经接受我了。我做人的习惯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把我的难处告诉父母，包括我缺钱呀，这些坎坷呀，从不告诉父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回家了一趟，跟父母打了个招呼就来北京了。但是当时有一点我没有说清楚：我说我来北京就能有工作了，他们就觉得能工作也好。其实我来的时候什么工作都没有。

“当人们看到同性也可以作为一种婚姻状态的时候，就很容易认可你了。”

我当时想到北京有两方面的事情要做，第一是推动立法。因为一个法律的确立可以给这个社会以政府的压力。在中国，政府的力量是最大的。以立法的力量去推动一个群体的权益的时候，这种力量是很大很大的。我当时觉得要先推同志婚姻。在中国这个社会背景下，婚姻的地位、价值特别高，特别受到人们的肯定。当你以这种被人们肯定的价值面貌出现时，人们会比较容易接受这个群体。当人们看到同性也可以作为一种婚姻状态的时候，就很容易认可你了。而当你以个体的同性恋出现的时候是一个人，别人可以随便歧视你。但婚姻是一种关系。当你以这种面貌出现时，讨论的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关系该不该被人们接受。同性恋的这种身份问题就被提到另外一个层面了，这也是一种策略吧。

来了北京之后，我就跟北京这方面的人都打了下招呼，去了同语的办公室——当时同语和爱白在一块，拜访了闲和冰蓝。sam 听说我到北京也见了我，让我给 les+ 写稿子。当时我刚来北京两个星期吧，就有人在我博客上恐吓我：让我滚出北京，说我是来北京骗北京拉拉的钱的。而且这个人所有的话都是冲着我个人来的。其实我来北京的时候心里也在打鼓。一是担心我的地域身份有麻烦，另一方面是搞一种运动的时候身份确实会非常敏感。最初的时候我的心里警惕性特别高，觉得每一个人都不可以去信任。在跟 sam 接触的情况下，我觉得她还能让人比较放心。当时我想在两会前做一次同性婚姻的倡导活动。我就去找 sam、gogo，并且希望她们能替我保密。主要是怕这个事情一旦被泄露，威胁我的人会给公安局打电话，说这儿在搞反动活动，把我们都抓起来——我不希望搞一个失败的东西。所以我当时就说这个事情能不能保密，能不能找几个人去地铁里发同性婚姻的宣传单。我说如果你们觉得透露身份不方便可以蒙面。她们说这样会觉得很怪异。打算在地铁里发传单是因为我觉得很安全：在一个封闭的车厢里不可能对你做什么，可以立马换一节车厢，换另外一个方向的地铁。后来闲约我见面，问我这个事情。我想既然她知道了就告诉她。她说好像有一个规定：不能在地铁里散发传单。我一看，诶，就是。我说那我们就会在地面上做吧。我还和闲一道在五道口、西单勘察地形。当时本来很想在西单做，因为人流量很大，而且也很容易混入人群。但是去了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有警察直接把卖玫瑰花的人卖的玫瑰花都没收了。当时我就想“哇塞，幸亏我们来看一看，不然这个事情会很糟糕”。

1. (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然后，当时我们就一起开会讨论这个事情。当时我很注意保密，每一个参加的人都要经过我的同意。而且我还特意把我一个外地的朋友叫来参与。当时参与的人有我、gogo、sam、老四（成都的朋友）、闲、石头、明明、赵柯，还有一个谁忘记了——总共九个人。当时石头说既然我们在两会之前不如在情人节搞。因为情人节恰好在那个时段，而且那时候宣传比较好。如果在那个时候我们不如送花吧，石头提议。

一开始没想到裹传单，就想送花。因为玫瑰太贵就订了康乃馨。包花的时候我们就顺手把那传单包在上面了，没有预先的策划。然后发现包上去很好，（单子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从外面看到，而且更加安全了。一开始我不想通知媒体。但是活动的前一天晚上，冰蓝给新京报打电话，通知了新京报去采访。好吧，既然你知道那就来吧，我就想。当时新京报是国内唯一一个报导这个事的媒体。还有就是国外 Time Out 的一个老外，她也给很多国外媒体、同志媒体撰稿。（《新京报》的）记者就在现场跟着我们，还帮我们提花。当时去的是建外 SOHO，但是并没有事先去观察。说实话，当时这个挺冒险的。就在吃中午饭的时候，给老人、小孩都发了，还给环卫工人发，给保安发，给路过的白领发，很快就发完了 200 朵康乃馨。活动很成功地举办完了，还采访了一些路人。

“我当时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不是在作秀。”

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想把这个活动做成一个传统，就是每年两会前都做，给提案造势。我希望第一年（2007 年）在北京做，第二年就可以在更多的城市，甚至台北、香港。第一年这么做了也很成功，虽然采访的媒体很少但是很好。2007 年我就想联系一下香港、台湾那边的人。当时就问闲要了香港 Connie、台湾王苹的 Email，跟她们写信说希望她们也能参加。王苹当时没有回信，Connie 回信了但是说她们这边有她们的事情，她们可能也不是很想参与。当时我还跟成都爱白的雷刚联系了，雷刚说 he 不想参与。跟广州的阿强说了，他说 he 不想组织这样的活动。所以 07 年想铺到更多地方的想法就没做成。

2008 年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还在杂志社工作。说实话，为了做这个我还把工作给丢了。第二年（2008 年）的时候大家都想来参与。我们就开了一个 MSN 会议，

当时参加会议的有爱知行的万延海老师、赵柯，然后还有同语、爱白、les+，还有我这样的个人。当时商量了好多东西，比如做一个网页，在网上发起网络签名，还有实地的活动，比如找一些有社会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媒体人等等，去签名支持这个提案，另外就是发动社区内的签名。当时就想在两会之前把这个给李银河，让她给人大代表递交提案的同时把这个签名也递上去。虽然当时商量的很好，但是执行的时候不是你忙，就是我忙，没有做下去。

NGO 的成员有业余的，工作本身就很忙，所以活动有时候做不下去。几乎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忙了。有一次我去沙龙之前，我们杂志社有个东西要赶，虽然已经是过年放假时间了。我跟主编说，我参加完这个事马上就回来赶。但是主编说那好吧，你去了就不用再回来了。我说我必须得去。实际上我们主编是支持同志的。她只是觉得我太多的心思用在搞同运上了。

我当时是去发动签名的。还找许多名人，比如性学方面的专家马晓年、方刚、李银河，还有一些媒体人。我在两会前把手上能有的签名全都给李银河了。我去她家没见到她本人，我就跟她助手说“能不能让李老师在博客上提一下，说我把这个送到了”。李银河也确实在她博客上提了一句：白咏冰把什么什么送到了我这儿。我当时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不是在作秀。后来他们用那些签名就做了一个展览，也没按照我们预期的去交给人大代表。我觉得这件事就是在社区内大家很轰轰烈烈了一把，其实没有形成舆论效应。最后我只能安慰自己说：发动社区的参与也很重要。可是虽然社区的参与也很重要，但是要推动一个立法，只让社区内部去想这个问题而不把它变成整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的话永远都不能成功。

“做这个节目是希望以同志的多元视角去解读社会”

我来北京想做的另一方面就是文化的倡导。当时一方面觉得同志的文化方面很缺乏，另一方面我觉得文化的力量很巨大，它是代沟最小的，很多东西不能言传只能意会，比如看一部电影，看一本书，对人的观念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所以我决定去做一些文化上的推动。

2007 年送花的时候，石头她们去拍摄了，做成了一个四分多钟的纪录片，在网上传。看到这个我觉得特别棒，



就想可不可以做我们自己同志的访谈节目。因为我看“鲁豫有约”采访拉拉的那期节目很不满意。我觉得它的视角、解读的方式一是有猎奇，二是还是没有把同志当平等的人去看待。当时恰好爱知行有一个项目是支持同志文化的，我就去申请了。开始准备做的时候，我听说凤凰宽频在准备做一个同志的节目。我想我们再大力度，肯定也不如这么一个有背景、有实力的大媒体去做的宣传。那么不如先观望一下，可以在他的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借它的东风，去做我的节目。但是我发现它的节目做得很烂，而且很猎奇，很多带有对同志很歧视性的观点。他们做节目的态度也是以吸引眼球为目的，而不是真正想要为同志做点事。我还专门写博客去批判他们了，给他们拍了很大一块板砖。

这之后（2007 年 5 月）我开始做自己的网络视频节目——“同志沙发”。叫“沙发”是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流行“抢沙发”。当时做这个节目是希望以同志的这种多元的视角去解读社会——你们异性恋做节目做了那么多年，我们同性恋来给你们讲讲我们怎么看世界，怎么看社会的很多问题。这个节目并不拘泥于同志问题，包括素食主义、环保、独立电影……都是它关注的议题。比如有一期关于安全套的节目：我的观点就是安全套就相当于安全带，必须每次都带才能有安全。还有就是关注结婚：因为我刚开始出来提同性婚姻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太前卫，还有很多前卫的人觉得婚姻这种东西太落后，我们同志就不该要。很多人批判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人性的枷锁。我当时就找了一个异性恋的朋友，她也结婚

不长吧，让她谈谈婚姻，到底有没有意思，有意思在哪。

当时做这个节目挺苦的。因为申请的时候只有两万多块钱，而我要做四十期。为了压缩成本我两天拍九期节目。为了准备这些节目，我都累得在公交车上直接睡到终点站。记得有一场拍的时候，我坐在那儿累得半天说不出话。我是既当制片，又当导演，又当主持人，又当策划。几乎除了拍摄和剪辑之外的事情我都做。

当时一起做的大概有十个人：有志愿者，有一个固定的帮我们拍和剪辑，他收钱，好像 250（元）一期。当时还拍过一期南锣鼓巷反思的节目，前期拍了很多素材，但是后来没有剪辑。因为我们钱太少了，这个摄影师撂挑子不干了。我也实在是太累了，做不下去，钱太少了。这个节目一共才做了一万多块钱。最后播放的节目大概有六期，还有几期没有播放，还有一些有素材但是没有剪辑好。我觉得我已经非常厉害了，能做这么多期节目，而且点击率不差。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看，有一期节目点击率是一万八，但我没有做任何宣传。其实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我想在新浪上传，因为新浪的受众特别广。但是节目一传上去就被删了，再传上去又被删了，很郁闷。后来就通过朋友跟新浪的编辑交涉。新浪的编辑说这是个人行为，可能是某个当班的编辑觉得“啊，居然传同性恋的节目？删了！”没办法，这东西吃哑巴亏不可能跟他们怎么样。于是我只好悄悄地在土豆上传，没有做任何宣传，就怕引起别人注意被删了。但就是这样，点击率一万八也很高了。最后，这个节目从（2007 年）5 月份做到 11 月份，中间还停止了两个月。这是我在文化方面做的一些事情。

“我个性是爱自由的那种，很反感别人关注我。”

后来我爸得了胃癌。我在新疆忙碌了两个月又回了北京。之前我对自己就反思很多，觉得自己不适合站在前面搞同运。因为我个性是爱自由的那种，很反感别人关注我。别人的关注都会让我不舒服，无论是赞美还是贬斥。做同运而被别人关注让我很不舒服。我觉得我应该去做一些幕后的东西，比如在 les+。所以 09 年情人节他们在送花的时候，虽然我知道他们在做这个事情但没有去现场。

回来北京之后我也就跟 les+ 那帮人一起混。我爸生病

的时候 les+ 那帮人也让我挺感动的，好多人都第一时间给我寄钱。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让我能够交的朋友，而且平时的爱好、关注的东西很相近。所以我经常去 les+，帮她们做一些很“杂碎”的事情，比如说最近策划的骄傲月的活动。一开始 sam 希望做街头行动，还是给大众发同性恋的宣传品。不过我的经验，这个事无论是政治上，还是运动策划上都觉得不妥。因为今年（2009）是个敏感年，而且同志骄傲月是在六月份，整个一个月都会很敏感，全国的警力都会加强。而且 sam 希望是全国代理点的人一起去做。但是很多代理点的人是学生，没什么社会经验，他们如果没抓的话肯定要记大过。于是我就提意见说：不如做社区内部的活动，比如搞家庭派对。我想搞这个主要是因为看了一些历史数据，比如美国四五十年代最初搞同运时，包括北京九十年代中期，都是搞家庭派对：大家坐一块什么都聊，经常聊一些跟身份政治有关的。家庭是很重要的一个细胞，组织都是在这种状态下萌芽。我觉得不如把这种细胞植入到各地，搞家庭派对。探讨关于骄傲月的话题的时候，我就写了骄傲月怎么来的，算是骄傲月前的话题。骄傲月这个活动 les+ 已经搞了，在十九个城市，遍地开花了。这算是我今年参与的一个事情。

“我还在思考中，我必须为自己的生命负责。”

我的父母现在很支持我做的事情，而且让我赶快找女朋友。我对自己以前做的事情，包括出柜，一件也不后悔。这些事情也都在我的预料之中，后果也是我能够接受的。虽然我对自己的同志身份并不焦虑，但是社会歧视还是会让我在生活中面对很多的问题。包括我现在找工作也是，很大的障碍就是我曾经在同志 NGO 工作。如果我隐瞒这段经历，别人会觉得我这人有什么问题不说，或者这人什么都说不出来肯定也没什么能力吧。如果说了我在 NGO 工作的话，很容易被问出是在同志 NGO。我现在考虑找其他一些 NGO 的工作。像黑社会一样，先把自己身份“漂白”一下再去上“正道”。而在最严重的时候，这些年的社会歧视实际上对我的精神造成了很大创伤，导致我到现在都还有很严重的焦虑症和抑郁症。2007 年 8 月我差点自杀。在做“同志沙发”的时候有一个拉拉联系我，说她女朋友被她家里囚禁了。因为她们俩在一起，所以逼着她（女朋友）结婚。我说“我在北京做完一件事情之后立刻去找你（当时《同志沙发》开拍在即），我去跟她家人谈”。结果过了两天，她给我发短信说：她（女朋友）自杀了。这件事情对我的打

击特别大。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失眠，根本睡不着觉。从天黑坐到天亮，很清醒很清醒。这事情，包括中国的一些社会现实让我很绝望。最后我还是想通了：我必须为自己的生命负责。

关于以后的生活，其实我还在思考中。因为毕竟我二十六岁了，要结合个人的发展，更何况我还欠那么多朋友的钱。我可能会希望捡起当年的学者梦吧：考个本科文凭，再去深造，还是希望做社会学研究。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写一些带有性别视角的社会评论。我不会再回新疆做同运，还是会留在北京。因为本身我确实想生活在这个城市，而且新疆发展机会还不够。

（本文访谈于 2009 年 6 月）

小黑：

我拿什么面对你， 我陌生的身体？

整理 / Karen，访谈 / Karen

小黑——跨性别者，无界限小组创建人，les+ 核心志愿者。

小黑在《les+》杂志上做跨性别专栏，而在生活中其实很少接触其他跨性别的朋友，但她希望这些不愿现身的观众们能够看到，原来还有那么多人和他 / 她们自己一样。现在的小黑，对于自身和“跨性别”的理解仍在不断调整，而曾经每一份的理解，或许稚嫩，也都是她“旅途中的一个脚印”。



小黑，跨性别者，无界限小组创建人，les+ 核心志愿者



怪人——“只要你不符合老师或者家长给你设定的那种男生和女生的标准，大家都会觉得你是个怪人。我从小就是在旁人异样的眼光当中长大的。”

小时候，不同性别间的差异还没有很严重的时候，似乎对性别这个东西感受不是特别强，只是偶尔会觉得有些不对劲。小学二年级以前，我跳过舞，穿过裙子，扎过辫子。但是随着年级的增高，对不同性别的要求越来越清晰，我就接受不了了。基本上二年级以后就不再留头发，也再没有穿过裙子。随着第二性征的发育，我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的身体性别。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我妈妈就特别兴奋地告诉我说，这是一个女性成长的重要标志。我听到这一句话，瞬间的反应就是，完了、坏了、错了。我觉得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

当时我看到了两本杂志，一本是《读者》，里面有一篇文章是讲上海市的一个医生，他同时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做手术，把他们的性器官进行对调，当时我就觉得我应该去做这个手术。还有一本叫《半月谈》，上面有一篇比较学术地介绍变性手术的文章，讲的是中国第一例变性手术的实施者。看到这两篇文章之后，我就很坚定地觉得，长大以后一定要做这样的手术。

刚看了《半月谈》以后，有一个医生的具体联系方式，我把它抄下来了，结果这个纸条放在一个书包里，被我妈看到了。我特别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我妈就对我哭，她说，如果我们有病的话就去看病，去治疗。那时我可能三、四年级吧。但关于性别身份，我和我妈的当面交流只有这么一回，之后谁也没有再提起。



小黑说“很早就阅读了相关书籍，让我没走太多认知弯路”

小一些的时候家里拿什么衣服出来，我就穿什么衣服，不会有很大的反应。但是小学二年级以后，我记得我姑姑当时从香港给我带了很漂亮的小公主裙，我相信如果我穿出去的话，一定是我家所在的那个小矿山里头最受瞩目的，因为当时只要穿上很漂亮衣服的女孩子都会被夸奖，但是我就死撑着，哪怕有很激烈的争吵，我也不穿。

小学毕业证发下来的时候，我快笑死了，上面性别写的是男，然后拿笔划掉了写的是女。估计是一开始看到我的照片，所以写了个男上去，后来发现不对，又划掉写了个女。不认识的同学看到我上女厕所，会惊讶，会说这个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做操的时候排队，我排在女生这边的话，旁边人就会拿很诧异的眼神看我。其实我从小就是在旁人异样的眼光当中长大的。

那时候我们班有一个男生，他夏天穿短裤配长筒丝袜，我记得当时全年级都轰动了，就特别热闹，大家都去嘲笑他，去挑逗他。因为他长得很清秀，表演节目的时候，会让他涂上口红，头上点上印度人那种红点。他讲话的时候还挺娘娘腔的，于是大家都开他的玩笑、找他的麻烦。只要你不符合老师或者家长给你设定的男生就是这样、女生就是这样的形象，你只要不符合这种标准，大家都会觉得你是个怪人。

厌恶——“哪怕我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人来要求我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我也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厌恶的是这个性别的身體。”

被周围的人错认成男生的时候，心情其实蛮复杂的，直到现在都是这样。一方面有窃喜，觉得心里那点小秘密被认可。另一方面是更加地紧张和沮丧，紧张的是如果他一开始认为你是男生，然后来一句：喔，原来你是女生啊，你看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子，搞得我都认错了。这其实比他一开始错认还要尴尬。或者大家一惊一乍的时候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这就加强了我对自己身体性别的不满。

但是我知道，以现在的身体状态，不能期望别人对我有更好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大家首先没必要那么惊讶，一个女生形体的人，她有权利把自己打扮成各种样子，包括把自己打扮成完全像一个男生一样。另一方面，我的确有变性的欲望。

因为我不喜欢我的身体，极度地排斥。我一直都觉得这个身体不是我的。同时我还会觉得别的地方也不好，比方说手太小。总之，这样的一个人的身体，我是不接受的。

有人会觉得，很多我们小时候不喜欢的东西，也许随着时间，慢慢地我们就把那种抗拒淡化了。这么说吧，我小时候不吃苦瓜，但我现在还算比较喜欢吃。但我小时候不吃葱，到现在，我还是不吃。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是不一定的。一方面你可以淡然，毕竟生活中有很多某个时间段内更重要的事情，或者说比对身体的厌恶更棘手的事情，让我暂时忘记这种厌恶。但另一方面，人越来越长大，社会性也越强，越来越需要跟人交往，越来越需要面对他人，这时候我对自己的身体就越来越厌恶，越来越强烈地希望有一个改变。

很难说我到底是不接受我的身体，还是不接受社会对具有这种身体的人的一系列要求，我觉得，两方面都有。我可以自动过滤掉很多外界的东西，有人错认也好，怎么样也好，我都会笑一笑也就 OK 了，这些事情对我产生不了一个持续性的杀伤力。但是，哪怕我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人来要求我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我也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厌恶的是这个性别的身體。

“出柜”——“以前只知道我想这样，很多理论的问题我很少去想，但是当有人问的时候，我就要去考虑，为什么会这样，或者说世界上有没有其他的人是这样。以前只是自己有一个认同，但是现在就慢慢的去了解这个群体。”

后来我离开家到省城上中学，到外省读大学，2007 年我来到北京。那时候我大学校友蛋挞也在北京，在她那里，我看到了 les+，认识了做这个杂志的一群人。当时就经常和她们在一起玩，帮忙写写稿件，当年 les+ 和同语主办“蕾丝杯”篮球赛的时候，我也有参与。反正就是觉得，那么多女孩在一起，感觉挺好的。

很多人会问，你如果要是变性的话，到底是喜欢男生还是女生？我是喜欢女生的，我一直被当成是拉拉，其实我是拿一个男生的身份去喜欢女生。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很喜欢和女孩子在一起。我从小也是跟女孩子玩得很好，和男孩子可能也就是一些哥们，但是很少有关系特别亲密的那种。

有时我可能会刻意地去以传统的男生形象来要求自己。我觉得自己应该就是这样子。因为一直都自我认同是男性，所以就觉得应该像个男人一样去生活。当然，也有转变，做了 LGBT 工作，了解更多关于酷儿的东西之后，可能对自己就不会有那么多限制。但是我想这是一个文化观念，这么二十年来的熏陶吧，不是那么容易破除。

后来 les+ 的主编 sam 说，想找人做跨性别专栏，我说我有兴趣，所以 08 年的时候就开始做跨性别栏目。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向北京的朋友们公开自己是跨性别的身份。

之前我压根什么都没说，大家就自觉自愿地把我归类到 T 里面了，反正是没有人问我，所以我自己也不会讲啰。讲了之后，她们大多数反应是有一点惊讶吧，但是做运动的人，之前对跨性别也多多少少有些了解，所以惊讶过后也都觉得蛮有兴趣的，会问我一些相关的问题。我应该回答过 N 百遍了，但是我觉得这样问答其实有好处。因为以前我只知道我想这样，很多理论的问题我很少去想，但是当有人问的时候，我就要去考虑，为什么会这样，或者说世界上有没有其他的人是这样的。特别是我做这个栏目之后，就会绞尽脑汁去联络一些人，去问问他们是怎么样的，或者会去找一些资料，看看国内国外是怎么样的。这也充实了自己，以前只是自己有一个认同，但是现在就慢慢地去了解这个群体。

决心——“和不想看的照片一样，可以把它藏起来，但总有一天要面对。身体更糟糕，我压根就不可能把它藏起来，我要时时刻刻面对它，其他人也会因为它而用一定的方式对待我。所以，不管多大代价，也要变性。”

现在国内来讲的话，政府是不会给做手术的跨性别者提供资助的，只能是自己来负担费用，所以个人财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不单单是一个手术，它包括手术前的荷尔蒙治疗，以及手术后因为不可能马上恢复，有很长一段时间需要静养，那段时间的生活费和疗养费，所以一个变性人确实是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性别的改变手术是一系列的工程，这对于很多人来讲，是种很奢侈的东西。不仅需要很多钱，手术效果还不一定好，你不一定会变得很完美，甚至于可能会有后遗症，可能会残疾，严重的可能因为一些后遗症而死亡。如果说需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你还是要去变性的话，那么可想而知，对自己性别不认同这件事情，会给一个人造成多么大的压力。

为什么性别会对一个人如此重要？我觉得一个是对内，它是自己的一个身份标识，或者说就是我们的身体。我可能说很多东西我不想见它了，比如说，不想付的账单，可以把藏起来，但总有一天要面对。身体更糟糕，我压根不可能把它藏起来，我要时时刻刻面对这个身体，同时其他人也在时时刻刻面对这个身体，他们会因为这个身体而对你作出判断，会因为这个身体而用一定的方式对待你，或者是要求你展现出来某种姿态。

其实我觉得社会也很矛盾，比如说工作中它觉得假小子很好，你很豪爽，你很容易沟通，但是如果说出去参加宴会，它就希望你要是能穿晚礼服就好了，或者是，你在跟别人竞争的时候，它说，你看你，你不是女生么，你就不能稍微婉转一点吗？！其实社会它有一个双重标准，这个标准也是让人觉得很尴尬的东西。

跨性别人群现在北京还没有一个小组在做，我们之前对这个人群是不怎么了解的。les+ 的这个栏目更多的是为了做一个普及，就是告诉拉拉们，告诉同志们，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他们和我们有什么不同，他们可能会遭遇什么。就像普通人看同志一样猎奇的心态，很多同志看跨性别也是有这种心态在里面。而对于跨性别人群，就像当初很多人看到这本杂志之后发现，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喜欢同性，原来还有那么多人和我一样，跨性别栏目起到的也是这样一个作用。

上图为 10 年前的台湾综艺《我猜》剧照
下图为 2017 年大陆新生代女团 FFC-Acrush(“被迷恋的美少年”)



而我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少接触其他跨性别的朋友。因为这样一群人愿意出来的可能性很小，可能会有一些男变女的朋友愿意现身，但是女变男，大家很难找到这群人。性别改变之后，他很可能因为社会压力，从而不愿意别人知道他过去的经历。如果变性了，基本上都会离开他原先的生活环境，去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一方面是他身边的人对他的态度可能是恶意的，另一方面是他也不愿意面对自己的过去。我看过很多资料，在全球范围内，变性手术之后的病人流失都是相当严重的。医疗机构再想跟踪他手术后的生活状态，发现很难再联系上这些人了。

当年最有名的跨性别影视作品



2017 年 3 月刊法国版 Vogue 杂志首次启用变性模特 Valentina Sampaio

自问——“对于变性人，很多人实际上还是不认同。我现在看到一些男变女的跨性别，实际上也不能够很平和的看待，但是我会努力让自己接受她们。”

我讲了自己是跨性别之后，朋友们也没有另眼看待我。有些朋友还会提供一些资源，比方说介绍我了解台湾的旭宽主持的“TG 蝶园”，那是台湾现在唯一的跨性别小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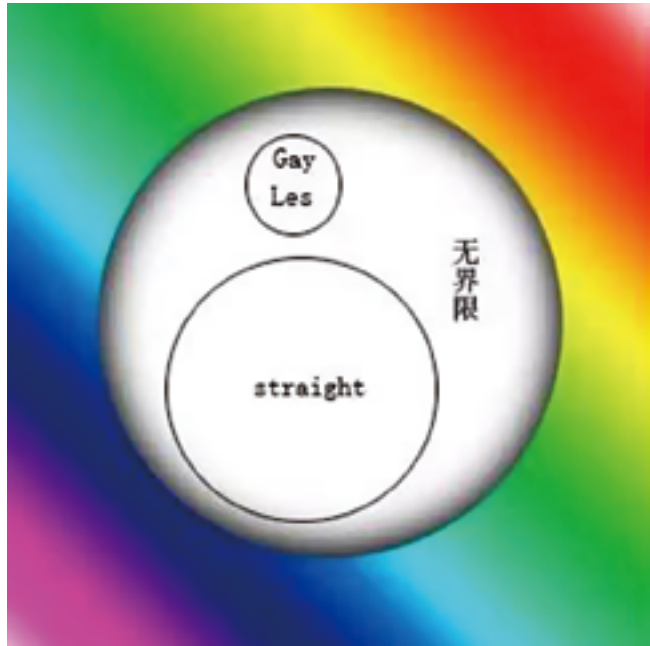
我觉得普通的同志和同运中的同志不太一样，区别在于她们的理论，或者说眼界的开阔。可能同运的人她们对 LGBT 会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或者她会了解的更理论化一些。而普通的拉拉可能就会更多的关注身边的事情，就比方说有没有聚会，但是多听一些名词，多认识一些人，她也会觉得很有意思。那对她们就会有一些很基础的跨性别知识要传达，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人有很多疑问，有很多误解，甚至有一些歧视。

当时在 les+ 做跨性别专栏的时候，很多人都建议我单独做一个小组，或者开一条热线，来填补这一片的空白。我一直在犹豫，因为首先我加入同运的时间就很短，积累的资料有限，还有一个虽然我的自我认同很早，但是我对这块的理论介入也很短，像《男孩不哭》这一类很经典的跨性别电影，其实以前都没有看过。可能是因为有一点内化的恐惧，以前会顾忌、逃避这一类的信息，

会觉得我自己认识到自己的就 OK 了，别的我不想多去了解。但是如果要做这项工作的话，就要去了解很多东西，越了解就越觉得自己欠缺很多，而且如果说我没有接触跨性别人群的话，那工作我跟谁做去呢？

2009 年初 Eva 提出，双性恋和跨性别都是关于流动性的问题，一个是性倾向的流动，一个是性别的流动，她觉得这是个蛮有意思的交集。后来我们就决定做一个这样的“无界限小组”，宗旨就是为双性恋，跨性别、以及不带标签的其他的酷儿人群提供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

这两部分人在国内都是很少数的，或者说是以在以往的同志运动中不曾提到过的，甚至很多同志对双性恋是有偏见的，认为双性恋滥情，水性杨花。而对于变性人，对于改变性别这样一件事情，很多人实际上还是不认可。而易装，大家可能会更看不惯，特别是觉得男人穿女人的衣服，很受不了。或者说好好的一个女人你非要穿西服，打领带，画着胡子，这种人，在拉拉社区里也不是特别受欢迎。如果这样的一个人出现在我面前，其实我个人来说，也会觉得不顺眼。包括现在一些活动中会看到一些男变女的跨性别，实际上我个人的感受来讲，我也是不能够很平和的看待，但是我会努力让自己接受她们。



当年设计中的无界限小组标志

跨越——“跨性别不是男跨女、女跨男那么简单，有的人可能不做手术，或者手术只做了一半，但他希望你以另外的身份来看待他，至少不以男女的性别来规范他。这种宽容、理解和认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无界限小组”现在活动了三次。第一次活动一半都是朋友捧场，没有选题。然后第二次活动，当时正是世界反恐同日，因为当时发生了一起变性人被杀的事件，所以在反恐同之外加了一个新的主题，反对跨性别恐惧。但可能因为这个话题太严肃了，大家都没什么兴趣，来的也还是一些认识的朋友。但是也很有收获，当时有一位爱白的资深志愿者，他原本只有一点了解，但聊了一下午，他也很愿意听，最后他对跨性别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第三次就是一个电影放映，当时国内唯一的跨性别小组云南“跨越中国”的赵刚来北京参加一个会议，我们就看《美丽拳王》，是泰国的一个变性拳王的故事改编的电影，看完之后就 and 赵刚交流。

后来我想，为什么每一次人都不是很多，或者是只有朋友捧场这种状态？我觉得可能一方面就是这两个人群，之前虽然说“混迹于”同志人群，但是他们还是有一定的隔阂，还是不太愿意参与到有点严肃的活动当中来。

而 Eva 对此的解释是，因为双性恋很受欢迎很吃香，所以都很忙。我觉得不管什么理由吧，总之这个小组目前没有达到它预期的作用。因为所影响到的个体太少了。

因为当时建这个小组是 Eva，后来我问 Eva，那我们这个小组到底是一个什么方向呢？她说就是提供一个社交平台。因为有同志文化活动中心这个先例，很多同志平常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会觉得很压抑，好像自己有了心理疾病，结果到了中心发现了很多同类以后，这个症状就好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宣传途径的问题，或者说一些人脉的问题，至少目前小组对跨性别这个方面，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至于说，跨性别是不是一定要从男女两种当中的一个跨到另一个，其实科学界已经认识到，人不只是有两种性别。但是人的社会惰性很大，以前分为男女了，似乎大家总要把每一个人都归纳到传统的男或者女这个行列当中去。但是我觉得跨性别，它一方面是用变性手术，来挑战你生来是什么性别就是什么性别这样一个规范，它同时也挑战了另一个规范，就是传统的二元性别。现在有很多跨性别人士不单单是我们想的男跨女、女跨男那么简单，可能有的人他不想做手术，但是他希望你以另

外的身份来看待他，或者至少不以他现在的性别来规范他。而且我听说有些国家，你即使不变性，也可以更改身份证明上面的性别，甚至选择男女之外的“其他性别”。所以跨性别的很多人是在挑战非男即女、非女即男这样的一个模式。

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因为主观或客观的原因手术他只做一半，那这种人你怎么给他归类性别呢？跨性别这个词，产生时间还很短，它的概念，它的内涵和外延还是一直在变动当中。而且随着现在的人越来越开放自己的个性，顺从自己的个性，而不是说传统让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时候跨性别的表现形态也会越来越多样。我不单是希望大家不要歧视这些变了性的人，也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能够让他们变性不变性，或者说变一半，或者其它的，都得到宽容、理解和认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本文访谈于 2009 年 7 月）

口述者补注：

时隔一年再看到这份采访，心里敲起了小鼓，原来当时的我是这样想的啊。其实这一年时间，也是我个人心智和对 LGBT 社区认识的成长期。比如说对“跨性别”这个概念的理解，对“无界限小组”的作用，就比当时要更加宽泛和深刻。不过还好，这就算是我旅途中的一个脚印，可以看到曾经的稚嫩，也可以看到未来更多的可能性。

（补注于 2010 年 7 月）

Karen:

行者无疆

整理 / 罗名, 访谈 / 罗名、柯晓

Karen——人类学硕士。同语项目协调人。同语 2009 年国际不再恐同日活动召集人。

在同语，起初拍照和翻译是 Karen 热衷并擅长的工作，Karen 认为编译这些图文资讯，可以给读者们增添力量。

在厦门念书期间，Karen 策划举办了一系列多元性别校园教育活动。这让她从一个细致的后台图文编译者，走向前台组织者的角色。

求知欲让 Karen 不满足于复制同样的事情、接触同质的观念，她像个不设边界的行者，用“吃不饱”来形容“又一次希望有所改变”的自己。所以，这篇三年前的《行者无疆》在 karen 看来也已经是过去时。

.karen, 人类学硕士, 同语项目协调人,
同语 2009 年国际不再恐同日活动召集人



“对另外一个人付出感情是一种示弱的表现，去爱另一个人是一种缺陷，去恋爱的权利，我不给自己”

到北京上大学之后，我就去找一些拉拉活动的场所。上大学之前，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学校——家里——学校，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自主权。也没空，因为作业太多了。所以我当时很好奇，好奇在北京的这些人的生活状态，我希望去了解学校之外的人是什么样子的。我之前已经做了十几年的学生，我觉得很厌倦了。虽然上大学意味着还要继续做学生，但我觉得这不样，因为以前我基本上是被“囚禁”在学校和家庭里面的。但是到了高等教育阶段，我就可以离开父母的这个原生家庭，可以开始有自己的空间。

有关同性恋的东西，我最初是通过阅读书本来了解的。主要是萨福和尤瑟纳尔这两个作家。文学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途径。在家里不方便上网，如果要上网的话，必须到客厅里用我爸的电脑，这样总会有一些蛛丝马迹留下来。我爸对电脑这块是比较熟悉的，我不希望有任何的麻烦。

身份对于我来讲，并不像对于很多人那样，好像我知道我是同性恋或者我觉得我不是。因为在 16 岁之前，我基本上认为，去爱另一个人是一种缺陷。我认为对另外一个人付出感情是一种示弱的表现，是一种应该避免和克服的东西。所以，尽管我从来就对女性感觉到亲近，也有一种情感上的渴望，但是我不会给自己任何机会。去恋爱的权利，我不给自己。其实我是在同语做了志愿者之后才开始了解什么是同性恋文化、什么是同性恋社群、什么是同志的平权运动的。在这之前对于我来讲，同性、特别是女性之间的这种情感模式，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不过，它也是我认同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我完全不了解的时候，我会觉得去了解就是很好的，但是，当我了解一些事情以后，再重复给我灌输同类信息，我就会觉得我吃不饱了”

上大学后我就开始上网查，看北京有哪些同志的组织或者活动地点，然后就看到女同志这边的沙龙，在那边就碰到安可，也碰到闲。我已经不记得第一次去沙龙是什么主题了，我那段时间大概每周都去，但基本上就是去听她们在说什么，并不在乎主题。我对于学校以外的生活完全不了解，也不知道作为一个成年人生活都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坐在那里听就得了，她们聊什么我就听什么。大学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沙龙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接触更多的人，这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讲是非常需要的。但后来，我发现它不能够满足我的求知欲，因为，第一，它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情感问题，而很多人是带着种种情感的困扰来的。第二，我发现她们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一种类型的重复。我已经大概知道她们过的什么样的生活。但是，在北京这个城市还应该有很多其他的生活样貌。我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在我完全不了解的时候，我会觉得去了解就是很好的，但是，当我了解一些事情以后，再重复给我灌输同类信息，我就会觉得我吃不饱了。

相对于这些校外的活动来说，我在校园里面的社团经验基本上为零。我没有参加任何社团，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同样的学生，同质性太强了。在一个同质性很强的群体里面我觉得没发展。我想接触并了解不同类型的人，但是我自己的交往能力很缺乏，所以在一个异性性较强的群体里，我反而比较事半功倍。之后我的精力就主要放在参观北京的博物馆、各种展览、以及到农民工子弟学校当志愿教师上面了。

我当时去做志愿教师的一个原因是我一直很怕小孩，我希望自己能克服这种“恐童心理”，但大半年下来，我非但没克服反而更严重了。我觉得小孩很吵，他们一直在运动一直在发出声音，很可怕。其实我做了很多努力去克服这种心理，比如我会去学习怎么样控制小孩的情绪，怎么样帮他们纠正一些不好的习惯。跟我一块去的其他志愿者对我的评价都很高，学生们也很喜欢我，但是我内心不快乐，非常不快乐。而且后来，我又觉得我吃饱了，我又是在做重复的事情，没有发展，所以我又一次希望有所改变。



2005 年，karen（右一）刚上大学



2007 年，karen 在北京一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教时的学生

“对于需要去了解更多资讯来为自己解答疑问的人来说，对于觉得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足以面对来自他人的质疑的人来说，这些文字是可以为她们赋权的”

恰好在这段时间，我接触到了沙龙之外的其它拉拉活动。虽然好些活动闲都会叫上我，但是很多事情我不知道能帮什么忙。有次我到同语办公室去开“拉拉反家暴”项目的会，她们问我愿意做什么，我说：“我愿意学习。”

后来听说需要访谈员，我倒是愿意尝试一下，一来这个工作我没有做过，二来我觉得这应该不是那么困难。当时我对访谈的理解，就是有主题地提一些问题，然后让对方尽量把他的经历讲出来。所以，我觉得我还可以胜任，或者说我可以试一下而不会搞得太糟糕。但是我第一次访谈的感觉不太好。可能是因为需要录音，结果我和被访者都变得很紧张。记得当时她来我的学校，我们就在校园里面找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坐下来，然后开始访谈和录音。我那时候没有什么访谈经验，犯了很多低级错误，比如别人说一句我重复一句。“你哪一年碰到你女朋友的？”“07 年”“哦，07 年”。到后来，连被访者都发现我这些错误太明显了，于是她说：“咱重来吧，把这段销了”。第一次访谈搞得很糟糕，后来的几次就慢慢地好一些了，觉得顺手一些、上路一些了。

后来我发现我还能够做的就是拍照和翻译。08 年我跟着拉拉营活动做了全程的拍照。但是我太专心拍照了，拉拉营究竟做了些什么我都不大知道。虽然我会在现场，她们讲什么我都会听到，但是作为一个摄影者和作为一个直接的参加者心态是不一样的，参与程度也是完全不同的。我的精力放在我要知道有什么事在进行，在这个事情进行过程中，某个人表现出了如何的样貌，以及这一群人合在一起表现出了如何的样貌。我既要拍整个场面，也要抓拍一些比较个性的照片。活动的进行反而变成了一个背景声。

而翻译，它让我学到了很多東西，我觉得比我在大学学的还要多。我在大学上过一些翻译理论的课程，虽然我

大学专业是非英语的另外一门外语，但都是欧洲的语言，都是外语和中文之间的翻译，所以我觉得我大学的翻译理论课对于我在同语做的翻译是有帮助的。但是我在大学课上并没有得到很多的实践，虽然有课后练习，但只是一些短句子，而且大量的精力是花在了查词典上面。我们的教材很好玩，总是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连母语者都不知道的词，来让我们翻。所以在同语做的大量的翻译实践对我很有用。而且，我觉得我编译的那些人物传记是有可读性的，也是会对一些人有帮助的。传主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她们都是一些面对自己的处境和问题、以及面对整个社群的处境和整个社会的问题，有过思考、有过行动、也有过答案和结果的人。对于需要去了解更多资讯来为自己解答疑问的人来说，对于觉得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足以面对来自他人的质疑的人来说，这些文字是可以为她们赋权的。

“做人是第一位的，做女人是次要的，做一个爱女人的女人更是次要的；所谓性身份和性倾向，只是你所有的个人素质里面很基础、同时并不具有特殊性的一项而已”

2009 年的 1 月 19 日到 2 月 17 日，我到美国洛杉矶同志中心做了四个星期的实习。我和同行的另一位志愿者是这个实习项目的第三批学员，但我们是第一批女生。

去洛杉矶同志中心实习的这四个星期，看到很多听到很多。对于我个人来讲，它是一种开阔，一种深入。开阔就是异文化，而且它是一个具有异质性的异文化，因为洛杉矶是一个多族群的都市。深入就是你跟很多优秀的人聊，你不仅知道他们在工作当中的样子，而且也知道他们个人的性格，了解到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情。

我去美国以后，我跟同学或者父母都一再说，这群人太优秀了！我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一来因为我作为

一个外国人在那儿，首先语言上很吃亏，就算我用英语进行表达毫无问题，但是你到了别人的老家以后，你就发现还是不行。另外，我在那儿面对的几乎所有人的年龄都比我大。跟我一起去的另外一个志愿者比我大，比我有社会经验。更不用说同志中心的其他职员以及主管了，他们很多人都在中年以上。我看到的是一群很有成就的人，或者说很能够独当一面的人。他们跟我在平常生活中，比如每天上课，周围一群小孩儿，根本不一样。

在美国我开始想关于身份的问题。在北京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身份对我来讲是模糊的，我没有想过，性身份和性倾向对于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没有想过它给我带来了什么，让我失去了什么。我之前没有想，是因为我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和资源促使我去想，而去洛杉矶以后，环境让我去想。洛杉矶同志中心有这样的一些项目：比如法律援助，它帮助跨性别的人面对在工作当中所遭受的歧视；比如青年项目，它帮助那些因为出柜而无家可归的孩子，为他们提供食宿和学习辅导；再比如文化中心，它经常搞一些挺有意思的演出。这些东西都是很实在的，而且它们让我看到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的性身份作为一种负面的存在，而是作为积极的动力。我开始意识到，性少数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我开始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少数者，而所谓性身份和性倾向，只是你所有的个人素质里面很基础、同时并不具有特殊性的一项而已。

我开始明白，做人是第一位的，做女人是次要的，做一个爱女人的女人更是次要的。这样一想，就不会觉得有那么多压抑在那儿，有那么多疑惑在那儿。这么多疑惑和压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是自己加给自己的，或者说，自己比较被动地成为了社会迫害的共谋。某个人的处境可能是社会决定的，但是，你也可能是加害你自己的那群人中的一个。如果你自己觉得同性恋是个问题，那么这种认识就会给你带来很多的不自信。自己觉得没事儿就会没事儿。这就跟信仰一样，你觉得神在，神就在，对吧。

（本文访谈于 2009 年 6 月）



2008 年，karen（左持相机者）在拍摄拉拉营



2009 年，karen 实习的洛杉矶同志中心



2009 年，karen 在别性艺术展上拍摄

罗名：

一件有意义的事

整理 / 柯晓，访谈 / 柯晓

罗名——社会学在读博士，性别研究青年学者。同语核心小组成员，同语拉拉反家暴项目调研部分和口述史项目负责人。

罗名于2007年加入同语，主要参与行动研究的工作，相继完成《拉拉反家暴项目调研报告》与《北京拉拉社区历史》。

在同语的工作经历促使她辞掉工作，选择了读书与研究的道路。



Asuka，在读博士，性别研究青年学者



“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没有什么问题，我没有身份认同的一个纠结的过程，我是能很快就坦然接受现实的一类人。”

我最初参加活动是因为大四那年我跟 GZ 在一起，我之前没有交过女朋友，她觉得因为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些团体或者组织，她的私人目的是想让我去确定一下自己的身份，但是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没有什么问题，我没有身份认同的一个纠结的过程，我是能很快就坦然接受现实的一类人。

我最早知道闲，也是从 GZ 那。那个时候正好同语申请下来那个家暴的项目。那个项目当时是闲、Eva 她们两个商量着说有这个项目可以申请，她们去申请下来了。因为我是社会学专业的，比较自然去参与其中，也是像现在做一个项目的话就会招一些志愿者，如果有兴趣的就可以去参加。当时 GZ 就说你就去看看呗，我第一次见到她们是在山木蓝。山木蓝是一个酒吧，在南锣鼓巷，然后那次是有一个活动，是东南亚来了一帮做艾滋病相关公益活动的人，在那个活动上 Eva 做的是翻译，我就去跟 Eva 打了一下招呼，Eva 就说我们下次开会你就来吧。第二次开会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就一直跟着在做这个家暴项目，其实在这中间我没有特别专门去认识一些人，就是后来在开会的过程中熟了。

我真没把“身份认同”那个东西当回事，也可能是因为之前我们社会学专业比一般的人接触到这个话题要多一些。我觉得就是只是说我喜欢的这个人恰好是一个女生而已，然后一起在同语做项目的这些人也曾经是、正在是或者将来想要跟女生在一起。

“我觉得我有那种欲望，比如说我谈恋爱什么的，我想让别人知道，就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大学同学有两个知道我是拉拉，她们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当时是怀着喜悦的心情跟她们讲，她们倒没有说我变态，但她们对我的反应有点异样。她们大概略带为难地跟我说你不要陷得太深、不要走下去。我对这两个人“出柜”算是失败，但是我觉得我有那种欲望，比如说我谈恋爱什么的，我想让别人知道，就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在跟大学这两个朋友出柜失败之后，我还没死心，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关系挺好的，后来高中她就去了加拿大，我跟她说了，因为我觉得她是国外回来的会不会好一点。她的反应也是那样，说她能理解，也不会觉得变态或者怎么着，但是她会觉得走下去会比较难，可能之后面对的生活也会有很多问题，包括对父母、对家里人、甚至对应这个社会给你的压力，她大意是说要是想玩就玩会儿，别搞得太过。

有了这三个失败的案例，我之后对我的同学，包括我家那边的初高中同学、小学同学，我觉得还是不要说，因为保不齐什么事情就能传到我爸妈的耳朵里，但是我还有一个高中同学知道，因为她也是拉（拉），她就懂，虽然她现在又跟一个男生在一起了，但是她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好很多。另外，像我的同事之类，也完全不知道。

在同语做志愿者，我最大限度的认识或者遇见了这些人，一些参加活动去的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拉，不仅仅在街上看见那种抽烟、说脏话、打架的小 T，也能看到更多的 P，这个是很难得的，可能在街上就认不出。之前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会是拉，但是我去参加这些活动认识一些人之后就知道，其实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拉，她们并不是特定某一种人，也不分教育或者其他条件，三六九等什么样的人都有。

家里面，我爸妈会对我说，怎么还没有男朋友，然后大概 09 年八九月份我跟他们说我有男朋友。这个比较巧，因为我大学时候的一个师兄是 gay，这个人去过我家一趟，我就跟他说，要不我就跟我家里说你是我男朋友吧，

他也同意了。我家里人见过了他，也不会急于让我再把这个人带回去，于是他们就不会催我了，用我姐的话来说呢，就是说他们并不是特别着急你没有结婚，他们着急的是到现在你还没有男朋友这件事情。我想，那行吧，那就有一个男朋友吧，那之后我爸妈明显就被安抚了。

跟 GZ 导师（出柜）这段比较神。GZ 想问问张老师（GZ 的导师）说我也想申请出国，看有什么可以帮到我的。GZ 就跟张老师说，“罗名也要申请出国”，张老师就很奇怪，说罗名要申请出国她可以自己跟我说，她也是我的学生啊，然后 GZ 就说，“我们是要一起出国”。他就懂了，当时沉默，GZ 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说，然后张老师就问，“你跟她”，他还在想这个词怎么表达，“你跟她有特殊关系？”，GZ 说“嗯”，后来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很尴尬。张老师最后就说，“嗯那你们确实要一起出国”。

那时候我们一起住在学校的研究生寝室，不是说我们推门进去就宣布，我跟 GZ 是拉拉，我们住在一起。虽然 GZ 的大学宿舍里是知道的，但 GZ 的研究生那个宿舍全部都是后来考进来的，刚开始就介绍是同学来帮搬东西，搬完东西就睡在那啦，最后这个事情就被默认了。到最后我已经基本上那个寝室的一员了，虽然不是立马就在那边天天住，可能就是一个星期住一两天。当时我在上班，我在望京有一个租的房子，我在那边住，离我上班近，GZ 有时候放假，她就会到我那边去住。宿舍里那几个人还挺好的，反正也没有觉得怎么样，我就这么住下了。

我们现在住在张老师的房子里，张老师的妹妹也住这边。有一次张老师打电话过来说你们住过来吧，我们就说挺好的啊，离学校也近，张老师是觉得有人跟她妹妹一起住，比他妹妹自己住安全。然后我们就说可以没问题。之前我让 GZ 给张老师打电话，说还是要跟张老师的妹妹大概说一下我们两个的事情，好在她妹妹是从英国回来的，是同性恋可以结婚的国家，就还比较接受。

“同语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群人。”

加入同语完全是一个新鲜感，你想，一帮拉拉，而且还是一个不能注册的敏感组织，我有一点猎奇的心态。我之前就知道闲做过这样一些事情，觉得特别传奇，可能知道闲的人都会觉得她是一个传奇的人。第一次去见她时，我是带着敬畏的心态，我的预期就是，她可能没有那么平易近人、那么亲切，可能会比较接近老师、学者给人的感觉，或者是社会运动家。但容你真正接触她的时候，你就发现她的这些所谓的传奇是一点一点平实、踏实地做下来的。她做这种女同性恋边缘的不能注册的敏感组织，还可以申请到国外基金会的钱，做一些社会倡导的项目，然后这些事情可能上报纸什么的。我就想，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带领着一个敏感的、危险的组织，我觉得挺好玩的就去了，后来它能够给我这么大的影响实际上是我没有预期到的。

同语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群人。从起初加入做志愿者到后来做兼职研究员，我很难去想一个“加入”或者是“退出”的状态，这会太正式，好像需要有一个仪式或者是有一个文字的东西。同语不是这样，只是一群人，我们共同来做一件事情，如果我时间多，我可能花在上面的时间多一点，如果这段时间我比较忙，可能就会逃避的去做一些事情。但如果我已经开始在负责这件事情，所有人都能离开，那我应该坚持到最后，即便做得差强人意，但至少咱们把它做完了。而闲总是能在我在上一个项目刚刚做完的时候就提出了下一个，引诱我继续做下去的想法，刚刚做完家暴，就觉得终于做完了好轻松啊，突然闲又说再做一个口述史。

先说说“家暴”项目，这是一个有点熬人的项目。2006 年的七八月份，我第一次去开会，刚开始我在其中是一个志愿者。最初项目前半部分是调查，后半部分是基于调查做一系列的倡导，后来钱上面不太够，就想先把调查做完。当时开会，主要在讨论调查的问题，社会调查我参加过一些，包括做问卷、访谈，于是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闲跟 Eva 就觉得我比较有经验，让我做这个调研部分的负责人。其实那些经验在这

“如果你写的东西能够留下来，就像我们现在看的书一样，我们是不断从书里面学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就很了不起。”

同语的事情基本上是在周末，可能平时需要抽一点时间推进一下。另外我自己也是一家外企工作，上了这么久的班，觉得那个工作真挺没意思的。我在公司的排头是分析员，就是把那些数据捌飧捌飧，然后分一下国家，跟老板说这个国家涨了、这个国家跌了、那个国家做的不好什么的。

我是觉得，其实在同语做的事情能够给我更大的成就感，虽然可能你的力量很小，但是你确实能影响一些人。在这个过程中你做的事情，包括你跟其他一些人的交往，你能够对别人的生活有促进，比如说让她们生活得更好、或者是交更多的朋友。相比而言，我的全职工作就是给一个公司打工，所做的事情就是帮他们挣钱，当然你可能跟一些同事交往，但同事之间的交往既不能远了又不能近了，是隔着的。不像我在同语，我能够把每一个跟我一起做这个事情的人当做朋友，至少在交往的过程中，基本上不会去特别避讳一些什么事情。当我出去，我就是同语的志愿者，感觉同语是我的后台，你通过同语认识到了一些人，她们也认识了你。可能有一些人走了，但是之后还可以有进一步的联系，同时你还会认识更多的人，所以其实她是一个人跟人的结合。

说在同语这份工作有意义，是对我自己来讲的。其实帮公司挣钱也是有意义的，但我一直都觉得“有意义”是对一个人有一些比较深层次的影响，不仅仅是她跌到了你把她扶起来，或者是饭卡没钱了你把饭卡借给她，更有意义的是你在她——尤其是在她这个情绪或者是心理上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够开导她、能够帮助她，当然如果力所能及的在物质上或者生活方面我能帮忙的，我会帮，但是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你能让另外一个人过得更好一点。

但这个“有意义”是你一对一的角度来讲的，从一对多的角度怎么来讲呢。比如说你之前一对一的方法你只能说你是一个知心大姐、妇女之友的状态，但是怎么能够

帮助到更大范围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继续读书是件挺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可能你写下的一些东西，它们虽然只是文字，或者是你做的一次调查，它们可能只是些受访对象，但是你这些东西真的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人。如果你写的东西能够留下来，就像我们现在看的书一样，我们不断从书里面学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就很了不起。如果说生命突然终结了是意味着一个人之后什么都做不了了的话，那人活了这么久的意义在哪里呢？像我有一些比较先知先觉的同学，他们会初中就在考虑这个人活着有什么意义的这种问题，他们去看叔本华的书之类，我当时还完全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名字。他们会来跟我讲，但我当时觉得我不应该考虑这个问题，我应该每天好好活着，但是后来呢我觉得确实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几千年来人们都在考虑这个问题，那你活了几十年你说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呢？比如说你养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小孩，然后呢？比如说你挣了很多钱，然后呢？你死了之后这钱它马上又进入流通领域了，你对世界没有什么贡献，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

我是后来看了那个杨绛的书《走到人生边上》，她写的时候九十多岁，朝不保夕，她就在想如果有一天她突然没有了，回顾这一辈子为什么这样活着，其实什么都剩不下来，可能剩下来的就是她的灵魂，她是相信灵魂的。当然我觉得可能是人岁数大了一点还是希望死后有一个什么东西能够继续存在，有一个寄托，她就那个东西叫作灵魂。问题就是你留下来的灵魂的好坏，其实就是你留给后人的一些东西，所以对她们来说呢，就像她写的书，说不上万古流芳吧，但是肯定还会继续影响一些人。我觉得我就比较认同这种“有意义”，我挺容易没有安全感的，这安全感包括我会去想突然有一天我不在了，或者我没办法工作，就感觉特别空虚。所以我觉得我进了同语之后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长进，因为她们给我这样一些机会去表现了一下我的价值，至少是能影响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所以未来，我是希望能够继续念书，做研究，写些东西。

（本文访谈于 2009 年 11 月）

还是不够用的，很多事情还是需要闲和 Eva 来，我基本上是在她们的保护之下，从专业方面尽可能的去帮助这个项目。一开始是做问卷，之后就是找访谈，访谈确实比较难找，一个你必须是要有家暴经历的，另一个是要愿意谈。最后我们访了十三个人，那时我们的访谈员比较少，一个人可能访两三个，不过像有一些访谈员是打了一枪然后就换了个地方，她可能就只访谈了一个。当时几乎每周都要开会，但流转速度比较快，到后来真正盯着做完的人和最开始的人就完全不一样。从头到尾能盯下来的是我、闲、Eva、追命，大拿和 Karen 也是后来才加入的。

我之前没有参加过这样的 NGO，不会体会到这些，它会中途进来一帮志愿者一起做这个项目，但你不能以一个特别严格的标准去要求志愿者，包括她的工作质量、工作时间。也可能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拖的人，你拿给我做的事情，我可能警告着自己能做完，但是要去催别人，我就会先拖着。当然和这个项目本身的难度也有关。这可能也是同语的工作风格。经验上来说，刚开始都没有特别明确的分工，除了定负责人之外。之后更多是看谁在某一个方面、或者时间上合适，负责人慢慢就会把这类事情都交给她。另外，我发现比如开完一次会之后，志愿者们都挺有工作热情的，但是（如果）这中间——尤其是像我负责跟人去协调这个东西的——一旦停止下来了，那对于一个志愿者来说，她如果一、两个星期都没有接到你的任何音讯的话，热情其实也就没有了。所以我这次就是鞭策自己如果每一次会议下来有一些我要去做的事情，或者是我要去催谁、去协调谁的时间，我就会尽快的去做，这样就有一个上行下效（的作用）。

你就不能按照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老师带队的项目来要求，因为这中间没有上司 - 下属、老师 - 学生的强制性关系。它不好的地方是你对它的效率没有办法那么高的把握，好的地方就是你其实基本上个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挺好的，一个项目做下来你总能够私人结交一些朋友，但是你在公司、在老师的项目里面很难达到这一点。



山木蓝酒吧



杨绛《走到人生边上》



《中国性少数群体家庭暴力研究报告》

乔晓彭：

找到最被压迫 的声音

整理 / 懒人，访谈 / 罗名、鸽子

乔晓彭——资深性权利社会活动家。

生于 50 年代，经历过文革末期的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大学生，参加国家登山队攀登海拔 7700 米的西藏南迦巴瓦峰，后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中枢——国家体改委工作十余年。90 年代中后期，乔晓彭成为北京女同社区从萌芽到建立这一过程的亲历者，此后她远赴重洋近 10 年深造性别与性相关课题。博士学成回国后发起创建“粉色空间性文化发展中心”，致力于为那些在性和性别方面最受歧视的人群争取性权利。



“谁都觉得同性恋是精神病，我们觉得我们不是精神病人，也不是变态，我们就是相爱。”

1975 年，我十八岁，经历了文革末期的上山下乡，我和中学同学都到北京郊区的延庆插队，其中有我的第一个女朋友。在延庆那会挺苦的，但是我和女朋友在一起，觉得特好玩。当时还是文革，男女之间都不怎么讲话，女的跟女的就没人管，我们俩都说我们不是同性恋，但我们不要结婚，要永远在一起，但是后来大家都结婚了，又都离婚了。

1977 年恢复高考，我 1978 年上的大学，学经济。在大学里我也有女朋友，那时候不许谈恋爱，男女之间交往别人会认为特别差劲，个别公开谈恋爱的学生，学校会警告他们不许那样，但是女孩和女孩在一起根本没人管。我跟女朋友老在一个床上睡觉，就有人说我们是同性恋。当时她有本什么精神字典，打开一看就写着同性恋是变态什么的，谁都觉得同性恋是精神病，我们觉得我们不是精神病人，也不是变态，我们就是相爱，也说过不结婚。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就都开始找男的，她也找了，我也找了，可能我们俩都是双性恋，我那时候是有男朋友也有女朋友，都觉得挺喜欢，女朋友知道我有男朋友，但男朋友不知道我有女朋友。我女朋友比我大好多，快毕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岁数大了应该结婚，我们班十几个女生大概九个都跟班里或者学校的同学结婚了，她也觉得该结婚，就结婚去了。

大学毕业我在一个机关工作，特别无聊，整天坐在那没事干。当时听说国家要组建登山队去登最高的处女峰，海拔 7700 米的西藏南迦巴瓦峰，体委公开招队员，但是招不上来女的，我就想办法找到登山处的人要求面试，去了之后跟人家吹牛，说我怎么怎么棒，他们就让我先去训练一段时间，然后测试，我就参加了中国登山队。那会我特别害怕，面试的时候那些人没有耳朵的、没有鼻子的、没有手的，要去西藏了，我就觉得自己要死了，就想赶快结婚吧。我当时有两个男朋友，我先问了其中一个，那人说“别问我，我不结婚，你问那个去吧。”我就问另一个，我觉得他当时有别的女朋友，我一逼着他，也就跟我结了，不是马上结婚，就是先登记了。我当时就想挑战，也觉得有意思，西藏确实特别美，到那你就觉得自己特别特别渺小，太美了。那一年我好像跟谁都没联系了，去一个特别生的地方，就知道是探险，什么后顾之忧都没有，先训练然后爬山，就干这个事，当时都觉得不想回来了，但是后来还是回来了。

1984 年我回来以后换了一个单位，也是国家机关，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中南海里上班，调研各种跟经济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挺有意思的，你写的东西要是写好了能给总理、副总理看。最开始我搞收入分配，后来做社会保险，涉及医疗和养老制度的改革方案，能到不同的地方去调查，见到很多领导，然后写点不疼不痒的东西给领导交差。后来朱镕基要把医疗制度改成私有化，个人交钱，你交多少就可以保多少，单位再给你交一点，等于你不交钱就没有保险。我觉得社会保险就应该讲公平，大家都应该有同样的东西，而不是看个人交多少钱。我们当时就老写东西批判，不赞成这么改，但是也没办法，你只能听头儿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干着没什么意思，正好我后来的女朋友苏茜回英国了，她在念书，我也想跟她一块去，1998 年我就出国了。

“有一个男孩跟我说，我知道今天是谁的生日，是我们大家伙的生日，那个时候真的特别感动。”

苏茜是一个外国朋友介绍我认识的，她来北京来找工作，住在我家，有一次她跟我说她是双性恋，后来就经常找一堆人在我家里开 party，都是 gay。我看她都敢自己是双性恋，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告诉她其实我也有过女朋友。后来我们俩就好了，我就把我老公轰到别的屋子去睡，我们俩就慢慢开始了，不是特别认真的那种关系，也没讲清楚是当女朋友，就是打炮之类的，但是一直两个人特别好。后来她在 UNDP（联合国开发署）找到了工作，有了房子就搬走了，我们差不多也就吹了。

苏茜认识一个北京的 gay 叫吴春生，那男孩好多次想组织男同性恋一块搞聚会，都被警察拦着不让开，在私人家里开 party 都不让，他曾经叫过四十几个人，警察就逼着他当场给这四十几个人打电话取消这 party。后来吴春生搬到苏茜家去住了。那时候三里屯有很多外国人来，他们俩就说每星期三叫大家都去酒吧，也不说什么就是喝酒，当时三里屯大概只有五六家酒吧，他们就选了一个叫 City 的吧。那个酒吧的老板是个女的，挺欢迎同性恋去的，她其实也能看出来，但她说没事反正



2009 年，乔晓彭（右一）在创意”Spark09“大会

有生意就行。那会每个星期都在 City 聚会，挺高兴的。后来 City 换了个男老板，他不愿意要同性恋，把那个酒吧开成了一个小姐的吧，人家不欢迎了就又换地方，换不同的酒吧，变得特别闹，每一次你都不知道该去哪个吧，有的酒吧老板特别不欢迎，有的特别欢迎就是为了钱，反正就是换来换去。

1995 年在北京怀柔召开世界妇女大会，是一个非政府的论坛，一大堆女的，有不同的帐篷，不同的主题，你想去听什么就去听什么。我是代表中央国家机关去的，但是整天待在女同性恋的帐篷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女同在那里谈女同的问题，她们有的时候就是玩，有的时候是有主题的讨论。我当时还找了一个女朋友，我们俩整天在她的屋子里玩，在屋里玩够了就出去，在不同的帐篷里乱听。

苏茜告诉我，世妇会的时候吴春生组织了一个大 party，把世妇会上的女同志，和他能叫的所有男女同志都叫到北京的莱特曼迪斯科跳舞，后来变成一个特别

大的事，吴春生事后被警察抓了起来。他当时和苏茜一块住在外交公寓，有个警察跟他说，你出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他刚一出公寓的门，有个车把他弄起来就走，什么都不说就关起来了。然后苏茜就天天去找，她爸在联合国工作，也给中国的一个什么大官打电话，活动了半天，警察什么都没说又把他给放了，放回到原籍，跟他说你再也不许回北京。他一放出来马上就坐飞机回北京了。

1996 年有一天苏茜在一条小胡同里发现一个艺术家的酒吧，特别空，里面还有点画什么的在那卖，她就说这个酒吧不错。当时正好是 6 月份，她想要搞一个纪念石墙的活动，就去问酒吧的老板能不能在他那开一个 party，生日 party。老板说行，来吧、没事，你们干什么都行。他们就开始通知人。之前这么多次聚会一般都没有女的，每次苏茜都拉着我，来吧来吧假装是女朋友，其实我们俩也不是女朋友，就是为了有 visibility（可见性），让人能看见还有女的，每次进来人我们俩还抱在一起，给人表演，一来女的我们都特激动，但是就真的没超过三四个女的。那时候我正好参加一个业余登山队去西藏登山了，苏茜给我打电话，说你回来、你一定回来，我们要开纪念石墙的 party，这回一定能开成，还告诉我有 8 个女的要来，我当时说北京有 8 个女的吗？她说真有 8 个，让我一定得回来，我就提前回来了。当时我们整个登山队都没离开呢，到拉萨机场超过 100 公里的距离，就我一个人回来的。

Party 那天本来是吴春生做主持，他进了那个酒吧以后发现有警察，便衣的，他就说我不能做主持了，因为之前警察抓他的时候跟他说了你再也不能干了，而且也不能来北京，他就让我做主持。我说好吧，反正是生日 party 嘛，我就跟大家说，谁知道今天是谁的生日，就耳朵对耳朵传，别说出来，不知道的问知道的，有人说是纪念石墙多少周年，大家就相互的传。我说大家知道的都来告诉我，每个人都过来告诉我，有一个男孩就跟我讲，我知道今天是谁的生日，是我们大家伙的生日，那个时候真的特别感动。都知道有警察，不能说今天庆祝石墙，只能说是谁谁的生日，真买了蛋糕，真有蜡烛，还发点糖、发点安全套什么的，大家都吹着玩。我在一个文章里写过那天的活动，来了 60 个人，8 个女的。

这次 party 之后那个酒吧就成了北京的第一家同志酒吧，叫 half and half，一半一半。之后就不用每次打电话通知人去不同的地方，换不同的酒吧了，然后女的也多起来。女的一多呢，我们就开始有不同的活动，有的时候去公园玩，有的时候去打球，有的时候去吃饭，有的时候去莱特曼跳舞。活动一多了，就说是不是有人能负责组织，你爱运动你就负责通知大家组织运动，你喜欢逛公园的你就负责通知大家去逛公园，反正就这几个人，大家谁都认识，但是你就负责通知。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了什么公园委员、运动委员、吃饭委员、跳舞委员，什么委员都有。有了 hotline（热线）之后，我们就开始讨论 hotline 里面的问题，每个星期天我们在一对男同开的咖啡厅里讨论，因为大家都没培训过，就讨论都遇到过哪些问题，问题怎么回答，这些讨论完了，就开始讨论还有什么问题，凑问题下次讨论，慢慢也有了讨论委员。

“这个会开完之后真的有了热线，真的有了杂志，后来福特还给了钱,她们就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叫北京姐妹。”

1997 年的时候，香港支持开了第一次男女同性恋大会，我们都觉得那个会组织得不那么来劲。开完会有两个女的就跟我说，咱们女的也开一个会吧。然后三四个人就在我家一块商量，开会要讨论什么主题，邀请什么人，还要有人负责。之后十几个人来我家一块选了六个委员，本来要选我，因为当时已经知道我 1998 年要出国了，我就没当那个委员。我们先想，假如开会我们要出什么结果，有人说想办杂志，有人说想办热线，还有人说想做一个 network，就是网络，我们就确定了三个主题，六个委员每两个人负责一个主题，会上主要讨论这三件事怎么做、谁去做，这两个人不一定要管这件事，她们就组织大家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讨论，最后会议的结果是这三件事有人负责做下去。开会当然也要有分享的时间，大家不都得诉苦嘛，诉完苦、讲怎么难，然后再谈希望，谈这三件事是我们大家现在能看得到的。这个会开完之后真的有了热线，真的有了杂志，后来福特还给了钱，她们就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叫北京姐妹。

我们当时有十几个人，可能十个都不到，那时候还没有网络，就是通过口口相传。有一个人我觉得她特别有用，她跟谁都睡，都把人家带过来，这圈子人就多了，她跟

人家睡，还不愿意时间长了，她跟人家一吹了人家还得到这来找，我觉得她特别棒，她是发展社区的积极分子。反正那时候她可能没有不睡的，每次来都能带新人，挺不错的，有时候也挺讨厌的，来的新人她跟人睡了，又不要人家了，人家也有特伤心不来了的。还有一个女的叫李京，她最开始给李银河写信，给方刚写信，因为他们都出过同性恋的书，可能还有张北川吧，就说想知道别的同性恋。她自己在邮局里弄一个信箱，这些信不能寄到家里，都寄到这个信箱，她去取，然后给每个人写信。所以第一次女同性恋大会在 1998 年的时候开成了，都是李京联系的人，从外地来了好多人。

开会之前我说需要钱的话我们做一个大 party，我找的地，因为我要出国挺长时间，就把家里的东西都打包，包得特别好看，就卖这些东西。谁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我让所有志愿者都来包，包完之后就十块钱一个卖，二十块钱一个 CD，她们都特懒，把五个 CD 放在一块了，才买十块钱。我说你别呀，一个一个包好了好卖钱呀。有些特破的东西，你包得特好看，人家就都买了。后来什么都卖光了，没得卖了，她们还说卖我，我就穿着衣服在上面走来走去，说谁买？然后就有个女的把我买了，300 块钱。那次可能赚了 5000 块钱，我说这个钱给李京，外地来开会的人需要钱的就用这个钱，开会租场地什么的也需要钱。后来李京说一分钱都没花，外地的人来开会都觉得特高兴，不要钱。因为这个钱是大家一块挣的，谁都有权说这钱怎么花，挺好的，这是一个社区活动么，那时候都不是特正式，但是都搞得特别热闹，谁都不是为了钱，都是为了好玩。

“我就在慢慢找，谁在性和性别方面最受歧视，我就做这个人群。”

1998 年可能 10 月份我就走了，先是工作一年，然后去念书，念书本来是一年，接着就念下去了，2007 年才回来，走了快十年。我当时念的是性别，Gender development（注：性别发展）。之前不是一直搞医改嘛，后来因为参加了世妇会，发现还有男女不平等的，就说要不然学学这个吧。那时候苏茜回国了，我也想跟她在一块念书，就去申请钱，可能因为我在中南海工作，人家觉得搞医改也应该懂性别，就给了我钱让我去念。念完了性别又去念性，就是英国的那个叫 Sexual

dissidents，性持不同政见者，美国就叫 LGBT。念完两个硕士我又读了一个四年的博士，博士论文做的是艾滋病，2003 年回来做了一年的访谈，又回去写论文。念完博士之后到印度工作了不到一年，在亚洲性资源中心当主任，那个老板特别差劲，我就辞职了，2007 年回来的。

我都不知道回来干什么，就想有工作就做，做顾问什么的。福特基金会找过我两次，问我想干什么，我都没想法。“粉色空间”是后来几个认识的女同说好一起做的。我其实不想只做女同，我们现在主要做的都不是女同的项目，因为比较起来，小姐没有组织，同妻没有组织，女同还是有一些组织，有一些声音，有一些渠道，有一些资源的。我就在慢慢找，谁在性和性别方面最受歧视，我就做这个人群。比如同妻，我采访过一个同妻的故事，被《嘉人》杂志登了，好多小白领打电话过来怀疑自己是同妻，有些真的是，都挺惨的，比那些男同性恋惨多了，那些男同性恋还能出去找，这些女的就觉得受骗了，没地说去。我问过一个同妻：这跟老公在外面有外遇，找了一个女的，有什么区别吗？她说，有区别，那个你能说，人家能理解，这个不能说，没人理解。就这么大区别，不能说，她就惨。同妻是全世界的问题，美国的同妻网和我们链接，最近《经济学家》登了我们的同妻组织，根本没采访我，我都不知道怎么登的，然后《参考消息》全文转载，中文报纸能写同性恋就不错了，我挺高兴的。我就想接着做这些人群，我刚请了一个专家，要做残疾人与性的项目，我们要推广，要不然别人也不知道原来残疾人还有性，还有性的需求，还有欲望，还有感情，人们尽看你的残疾，不把你当人看，所以我们就做这个，我相信能做得特别好。我还看过一个单身母亲的小组，很多都是中年妇女、下岗女工、很多离了婚，没有别的工作能要她们，她们就去当保姆。又是下岗女工、又是保姆、又是离婚的，多重歧视，我也想做她们的项目。现在女同可以有一些渠道去争取性权利了，这些人群可以和女同去学，怎么去组织，怎么发出声音，怎么样去做自己的 representation（注：表达），把他们的故事也表达出来，鼓励他们去成立组织。

同妻的工作我可能等一段再做，现在不做了，因为我觉得有点不舒服，现在主要是一些受了教育的人在做，不像我们以前做女同的时候，什么人都可以做，三教九流，什么阶层都有。那些受了教育的、有收入的、城市的人，觉得自己是领导者，可能排挤那些受教育低的，不是城



2011 年，一元公社纪录片放映活动上 主持人闲（左）与乔晓彭（右）

市里的人，我就特别没喜欢，我觉得确实受了教育的人能力强一点，但是她们不是受压迫最深的人。我见过有 50 多岁的同妻，来的时候那脸，盖张纸都哭得过了，这是北京话，就是说跟死人差不多，脸都是黄的，从来没笑过，一辈子受这个苦，丈夫也不如他，又不挣钱，又不好看，但是根本就不能想离婚的事，这个婚姻压着她，没地去说。同性恋就是一个污名，你不敢跟家里说，不敢跟孩子说，你也不敢离婚，你想这一辈子多惨啊！我特别感动就是有一个农村的同妻，第一次来开会，说觉得是死刑变成无期了，第二次来开会，觉得无期徒刑又减了几年，觉得能活了，能想一个出路了，以前就压着你都不能想，没有出路，就这么压着，就这么忍着。可是那些受教育少的、年纪大的、农村的人，她不会上网，也没有 Email，你要找这个人，就得给她打电话，第一次找不着还得再打，三次、四次、五次，有时候也不知道她愿不愿意接电话，因为同妻家里有老公嘛，你也觉得不方便，好多事变得特别麻烦，我都得忍着，是挺累的。但是我觉得就得帮助这些人，不然这些人永远没有出头的时候。我根本没想要一群有知识的人来开会，说那些话都是一套一套的，什么样的人来才有意思，组织运动应该组织不同的运动，做小姐、做同妻、做艾滋病感染者，我都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



《宠儿》剧照，女主角张希和丈夫在她的生日聚会上

做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动力。比如 disability（注：残疾人）这个事，我知道艺术的形式感染力特别强，肯定能给残疾人的感情生活，他们的性，他们的欲望一个再现，要不然的话没人知道。我去英国开会的时候，请一个老师给我介绍一本关于 disability in sex（注：残疾人的性）的书，他想了半天说，没有。我说，好，太好了，没有的话我就要做，我就特别想做这事。包括那个残疾人之家的主任都说，快来做做这个吧，残疾人没完没了的生孩子，你说都生一群废物，这个社会可怎么办呢！真的，我不想改变太多，我就想改变一点他的想法，对在他的关爱之家的那些残疾人都会有帮助，他首先把他们当作人，他知道这些人都是有感情的，是有性的需求的，从另一个角度，他能学到一些东西，都是有意义的。

“我从来不把自己当学者，我也确实不做什么研究，我就说我是积极分子。”

我们主要是支持几个积极分子，然后由他们再去发展。我原来给一个艾滋病的组织，国际艾滋病联盟做过顾问，主要就是给那几个男同积极分子做培训，2003 年我回来的时候全国才找了 7 个积极分子，我们就培训，全国各地去培训，他们回到社区里就是骨干，他们再发展下线的积极分子或者他们的骨干，你提供给他们培训的能力，也鼓励他们做同志怎么开心、怎么光荣，让他们别老藏着，藏着没法组织。2003 年我给他们做的培训，到 2005 年已经有几百个同志组织了。所以培训积极分子特别有用，无论是小姐的工作还是残疾人的工作，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是积极分子，但是有积极分子就能通过活动锻炼一些人。

在英国上学的时候，给我做考官的一个老师是搞参与式研究的，研究得特别深，他每次开会都是用这个方法，特别有效。我们开会都不会坐成一排一排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一小圈一小圈的人聊。我觉得我知道参与式的精髓，我就愿意用这个方法去组织活动，你就得依靠这些人，你说你哪能帮得了那么多人？就是让他们自己去做事。当然方法也挺有用的，但是最主要的是理念。我们叫同妻来开会也是，大家先倾诉，每个人哭一圈，先都哭够了。大家在一起相互诉苦，诉了苦才知道我们有共同的身份，才会有身份认同感，可能就有几个志同

道合的人愿意出来做事了。人都是不同的，有人喜欢干这个，有人喜欢干那个，有人特点是这样，有人特点是那样，我们就得找共同点。粉色空间现在是三个人，我、Eva 还有凌，我们就找共同的兴趣点，大家都跟性有点关系嘛，也都觉得女同的工作做够了，想去做别的，所以就志同道合。

我们有经费，有福特的钱，也有别的机构的钱，都是外国机构，没有国内的。我现在都懒得申请钱，申请钱之后，doner（注：资助方）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没意思。我们之前申请到过钱，关于女同的研究，但是就非得要求你做什么定量的调查，我就得把它改着弄，改成定性的，你也得有一些定量的东西，让它能过得去。刚开始就是在拉拉沙龙里面，可能那天去了 50 个人，分成 10 组，让大家提出所有关于女同的问题，我就贴在墙上分类，分完类可能就分成七八个小组，比如说形式婚姻是一个组，把形式婚姻所有的问题拿过来，再让这个小组把问题细化。我们的问卷就是这么出来的，都是参与式的。我下到地方的时候，基本还是这个问卷，这些基本就是女同关心的问题。不是你坐在家里闭门造出来的，通过大家讨论就哗哗出来了，通过问题也就把故事讲出来了。

我从来不把自己当学者，我也确实不做什么研究，我就说我是积极分子。我觉得把别人作为一个 object（注：客体、对象），去研究别人，而不为这个群体服务，这是不道德的，做博士就更不道德。可能更多的人是为了自己的名，或者提拔做教授啊，不一定完全是为了改变政策。我就特别高兴能做党校读本，写这些故事，加一点分析，让那些党校的人看，这个有用，能影响到政策，影响到他们的思维就有好处，他们不接触老百姓，不可能到戒毒所去住，不可能去感受一个村子的人都不理你是什么感觉。要是理论文章人家不会看，故事人家就看，我读博士的时候最喜欢看的几本书都是故事，也都是最棒的教授写的，其实理论怎么来的，都是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所以故事特别有用。

我没想到过要衡量是否成功，就觉得做得高兴，也觉得有用，对这个群体有用，他们也觉得有用。肯定是想要做得更好，比如小姐、同妻，想让她们也变成有组织，像同性恋似的，有更多的组织，更多的声音，有能力替这个群体说话，最后可能影响到政策的改变，这也是一个期盼。

（本文访谈于 2010 年 3 月）



乔晓影执导的电影《奇缘一生》(2013) 海报



《宠儿》海报

苏茜： 把疯狂的同志派对 带到中国

整理 / 柯晓，访谈 / 大头、柯晓

苏茜——来自英国的女双性恋，先后在英国、美国、中国、比利时学习与生活。

现任福特基金会中国办公室性与生殖健康教育项目官员。苏茜 80 年代中期曾留学中国，十年后飞来北京找工作。在“北京世妇会”前后几年间，苏茜组织的家庭、酒吧派对聚集了一批勇敢的中外男女同性恋者，促成了北京同志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并吸引了一批女性主义者的目光。



苏茜

“我老看新闻说中国经济特别成功，然后我知道在这儿（95 年）有一个妇女大会，为什么不回中国。”

我在英国长大的，现在学中文的西方人很多是想做生意，那个时候学中文的很多西方人是马克思主义者（笑），我当时十三岁，我就（因为）喜欢熊猫，没别的想法。伦敦当时有晚上上（中文）课的夜校，是免费的，我妈就帮我联系。我都不住伦敦，离伦敦两个小时的火车，当时我就每个星期去两次，然后变成那种没有朋友的小孩，就老去学习中文，但是当时我也喜欢。十五岁的时候我搬到美国去了，我妈原来是美国人，我爸的一个联合国的工作在纽约，所以我们全家都搬过去了。然后我就 1984 到 1985 年上了一年的康奈尔大学，那个比较灵活，你可以离开一年再回来接着读，所以我当时没想特别多，就想去中国学习。（但是）我不懂怎么能找到一个学校，然后我就给所有的省，加了一个大学的名字，（各）寄了一份信，其实武汉大学特别有名，但是我都不知道。四川大学他们有一个外国留学生的项目，给我一个答复，然后湖北大学给我一个答复，没有别的学校回答我，我就去了（湖北大学）。然后他们说你想学什么，我说我想学中文，想学中国文学，我说我对妇女问题有兴趣。

那个时候是 1985 年，就很不一样。就像你给国外打电话，你去他们学校的 switchboard（注：接线总机），就是有一个人在那儿拿钱，然后就插进，好几个洞，把线插进去，有时候有运气，好，能到国外打，但是经常要插插插一个小时才能插对，好，赶紧打，所以就特别不一样。你那个时候不能上网，不能写 E-mail，所以真正的是一种很大的距离。不像现在，有星巴克，什么都（有），就不会那么想家，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文化冲突，对我来说也是，对周围的人来说，就没见过老外，肯定不会马上就理解我。当时我差不多就觉得我还异性恋，没怎么觉得我是同性恋，但是当时我记得我提过这个问题，然后永远人家就跟我说中国没有同性恋，没有碰到过别的反应。我就是那个时候去了湖北大学，就觉得这就是我的地方，我就在这儿，我都想象不到英国什么样子，都忘了，就那种感觉。但去了湖北大学（后）没回康奈尔大学，后来回英国了，重新开始读大学，在牛津。

我在英国上完大学，后来找工作，找哇找啊，那个时候特别不好找，可能像现在经济不好，老申请工作，老找不到，最后就在比利时那个欧洲议会有了这个 internship（注：实习），到了那边，我就想赶紧把当地的那些议员拉好关系找工作，然后就在那里找了一个比较固定的工作，可能干了三年。但是三年之后我的老板落选了，（我）就没有工作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 what can I do（注：我能干什么）？就等于我得有一个新的开始，假如留在比利时，也得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老看新闻说中国经济特别成功，然后我知道在这儿（1995 年）有一个妇女大会¹，为什么不回中国，就没想特别多，差不多就开了一个大 party（注：派对），跟大家说再见，然后买了一张票，我就拿了一些东西就走了。（这样）也确实冒犯了很多，她们觉得你就那么轻易地走，我们以为跟你是好朋友，你就这样（就走了）。哈，我离开这个地方，就有人觉得我有点不对。我也觉得我当时没想得特别多，但到了中国就开始特别想家，（想）我怎么做这种决定都那么轻易的。但是（当时）也年轻，也激动，也有劲儿，所以就到了中国，就到处乱找工作，最后还是找到事干了，就这样留下来。

“我在比利时之前，在牛津和在纽约我也做过双性恋小组、同性恋小组，女权小组，我就觉得这是生活的意义，这很好玩，所以我就肯定得做。”

我姐姐是女权主义者，她也双性恋，所以可能从她那儿（受到影响）。我可能比较佩服我姐姐，又吃醋，（当时）她在学校参加什么青少年女人的一个小社团，她们自己弄的，然后她老不让我参加，她觉得我讨厌，我是她妹妹，这个妹妹（老）跟着，所以我老觉得这个东西很神秘也很有意思。其实我姐姐现在一点不厉害，她特别保守，当时（觉得）她就特别疯。

我在比利时之前，在牛津和在纽约我也做过双性恋小组、同性恋小组，女权小组，我就觉得这是生活的意义，这很好玩，所以我就肯定得做。在我那个圈子里，也（包

括）在纽约，就觉得那些人都特别有意思，特别前卫。（当时）假如在（英国）那个地方说我是同性恋，人家觉得没那么大的关系，但是假如你说这个东西跟你做的这个发展计划有关系，应该在发展计划里面考虑性，或者同性恋，人家就觉得你在说什么呢，就不懂这些联系。

我也当然知道中国是不可能没有女同性恋，但是确实我八十年代在中国住过，在湖北大学，每次提“同性恋”这个问题，人家就会跟我回答，中国没有同性恋，所以我觉得肯定（不对）。

在北京之前我在比利时认识了两个中国的男同志，特别疯，特别夸张，特别好玩，他们就跟我说他们认识一个女同志，让我跟她写信。我说她是怎么样的女孩，他们说她就喜欢瘦的、特别白的人，就是说得特别傻，我就说好，然后我给她写信，还给她寄照片。有一个照片是我刚生病了之后，特别瘦，特别白（笑）。然后就把那照片寄给她，写信说，我是一个比利时的女同志，希望你跟我联系，以后我打算来北京。她那时候始终不回信，后来我到了北京我还是给她打了个电话，她就过来玩，我说你为什么 not 给我回信，她说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不喜欢你这样子，看照片我就觉得不喜欢你干嘛回信（大笑）。

但是还是通过她认识了一些人，然后后来去了一个万延海开的会，在一个大学里面，就在那边可能认识了一些男同志，就这样，一开始就是通过一些个人去找几个人，然后就开始开 party，就是会请认识（的）、所有的有一点像男女同志的人来我家。然后就找到了章义，章义挺公开，然后他特别会去发现女同志，他差不多就在街上发现人，我们都叫他妇女主任，妇联主任。那个时候没有网，他就在街上，两个女孩手拉手，或者女孩有点亲密的样子，或者是有点 T 的样子，他就会过去跟她们说话，有时候就直接说，你是女同志吗，有时候就让她们过来玩，然后这样他拉（来）了一大堆女孩。

（认识）小培是小培（之前）去了美国，在 Harvard（注：哈佛）做访问学者，到了 Harvard 她就爱上了两个女人，其中之一是我的朋友，她也学过中文，她说你去中国的

话你就可以跟这个人联系。然后我到了这儿了，其实（那次）是我爸当时出差到这儿，我就跟他一起来，几个星期，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工作，做什么翻译顾问，那个之后我没别的计划，我也在比利时刚丢掉了我的工作，所以我就想在北京留下来，但是怎么留下来我不知道。所以我就给小培打电话，打了几次电话，然后就聊起来，我们都没见面，我就说能来住你家吗，就住几天（笑），后来她说，成，然后就，（笑），就这样搬进去了，住了六个月才搬走。她当时就老说我是个特坏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女同性恋，来把我的一些女同性恋的想法灌输给可怜的中国妇女，反正小培喜欢批评人嘛。我后来跟她好了，但我也特别不清楚她什么身份（认同），什么情况，当时小培也是结婚的有老公，其实小培也早就（和女人）谈过恋爱，文革的时候就有过女朋友。

“那个时候北京的圈子特别少（人），所以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国际的女同志，我们都特别激动，谁都想跟谁做（笑）。”

（来中国后）我在福特基金会找了一个（工作），差不多是做行政，他们就专门为了妇女大会要了一个人，可能（干了）一个多月。（后来我）就做了好多小的（职位），在联合国也不是一个正规的（职位），说是志愿人员，但给你发工资，也给你个房子——那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后来做了三年差不多，做到 98 年初。

当时我是负责联合国志愿人员的一个项目，我们总部的大头（还）有一些人来了，就来参加这个会²。他们（联合国）给我们的任务，一个是我得照顾这些人，另一个我们应该去 lobby（注：游说），他们有了一个行动纲领，大家都同意，政府都在那儿争几个字。他们让我们去游说那些政府的官员，就让他们把 volunteer（注：志愿者）的这些概念放进去，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没用、不是重要的，（但）支持这个概念的人想把它变成一个特别右派、特别保守的东西。当时我特别不知道我应该在那儿干什么，我就记得天天早上开一个 breakfast meeting（注：早餐会议），特别早，有可能七点到那儿，开完

1. 1995 年 9 月联合国第 4 届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2. 指 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



breakfast meeting 就让我找那些政府的人说我不想说的话，然后（我）就特别 lost（注：迷茫）。那个时候有几个美国人，一些女的特别 butch（注：男性化），我就没见过，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就差不多是跟踪她们，我就跟踪那些特别男性的女同志，她们有的特别懂怎么游说，然后集体讨论怎么让这些性权利进那个行动纲领，这是在政府那一块。假如在非政府那一块有好多种好玩的讨论和活动，我会一方面得在联合国那里（的）一个什么信息处推广他们的资料，但是很多时间也是自由的，（我就）去那个女同性恋的帐篷，lesbian tent（注：女同性恋的帐篷）。

因为一方面是有一些人特别专业，懂得怎么说服政府，这我没学过的，所以（那时）我学的很多。然后另一个，可能开始有一些酷儿的分析和概念，那个以前我也没学过。反正就挺多（可学的），也挺国际，特别多不同的国家和环境的人，所以当时我还是觉得学的（挺多），虽然特别乱，太多事情，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但是就很多有意思的讨论，很多我没见过的东西。

但是（后来）女同性恋参加那个 lesbian tent 的只有小培，没有别的中国女的去了。我就想让这些来北京的国际的女同志也去认识一些中国的女同志，因为（不见）太可惜，确实有了一个小圈子，应该认识，所以就安排了，在酒吧。当时好像是在 City Pub（注：酒吧名），就（说）谁是同志谁在那儿集合，我估计有十到二十个中国女同志，这些国际女同志也都到那儿去了，大家就聊，一起喝酒。然后也在我家开了一个 party，同志的 party，特别 funny（注：好笑）。

那个时候北京的圈子特别少（人），所以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国际的女同志，我们都特别激动，谁都想跟谁做（笑）。（在）我家开 party，我是忙着照顾人，因为我是 hostess（注：女主人）。差不多我就发现哪儿都是一对一对的，（在）地上，在床上，在沙发上，就都已经开始做了。我就觉得，有点像假如你是战士，你是男同性恋，你没见过女的，好长时间你去打仗，你回来，就想要一女的，谁都可以，我们都有点那种感觉。

“讨论完了我就说那下星期六去我家开 party 吧，你们大家都来，后来就变得特别好玩。”

94 年开始，福特当时有一个人叫 Lisa Stearns，顾了一两年，专门准备世妇会，然后它就开始这么一个小组，叫东西方翻译小组³。（为了）支持中国妇女参加这个联合国妇女大会，所以它可能 94 年开始就鼓励一些中国女权的人聚在一起，也不一定是那么女权，就鼓励一些对这些问题有点兴趣的人，先聚在一起开始一些讨论。（来参加的）什么（人）都有，就是挺非正式，谁愿意带谁过来，她们就带人过来，不用比较公开，但是不允许男人参加。有人来就特别女权，有人来就一直特别重男轻女，也还特别热情老想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回事。

我们会翻译在新闻媒介的一些文章，翻译成中文，为了登在中国的一个妇女杂志（上）。翻译是一个特别舒服的过程，又没有时间限制，为了翻译两页，可能会讨论好几次，开好几次会。因为就觉得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语言、特别好的中文（来）表示这些女权的东西，所以就讨论得慢慢的，用哪些字，就是为了创造一种女权的语言，登在那篇杂志。也会有小组的成员写一个舆论，说我怎么看这个，这是讲美国，但是这个我觉得跟中国有什么关系。一开始时这么做，后来就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就是讲中国妇女的一些经验和想法，然后翻译成英文，就为了在妇女大会发给人家。所以不光是把西方的一些想法介绍给中国，也是把中国一些想法用英文介绍给别人。因为就怕这些国际的女权主义者来，跟中国的女权主义者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就做了这个。

东西方小组，其实我不是组织者，我就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通过女权的圈子也不一定是认识一些女同性恋，就像第一次，在那个女权的小组（注：指东西方翻译小组），我并没有公开（性倾向）。因为我刚到了中国我就觉得我特别像小培说的那个大帝国的老外，（比如）说我是什么，然后你们愿不愿意参加我们的什么运动。我就想我还是先（不要这样），不光是性倾向，我就先什么都别说，差不多一年，就慢慢了解，慢慢听别

人是什么情况，我才那么明确（地）再去追求我的那个目标。后来可能过一两年我就建议——因为我每次跟东西方小组开会我就讨论不同的题目——我就跟她们建议我说要不要（进行）女同性恋问题的讨论，然后她们就挺积极挺愿意，后来讨论女同性恋问题，我就请了我认识的女同性恋让她们一起来。那次来开会，我差不多没法说话，因为女同志我就觉得都是我的朋友，然后女权那个小组，我（也）觉得跟她们特别近，所以我特别怕她们（吵起来），就是她们互相有什么问题，其实我特别紧张的，应该是我主持那个会，（我）变得差不多结结巴巴地不会说话，但是别人都讨论得特别来劲儿。

讨论完了我就说那下星期六去我家开 party 吧，你们大家都来，后来就变得特别好玩。她们都来了，好多女权的人应该是完全直的人也开始玩起来，然后我记得是有一个女的，有一个女同性恋，都跟她女朋友一起在那个 party，然后她跟一个结婚的女（异性恋）进我的卫生间，锁门，然后她们俩在里面接吻，（笑），然后她女朋友就敲那门，（问）在里面干什么事儿，（笑），说“开门儿”，然后就都闹起来，后来那个锁都弄坏了。好多这种事儿，就像这么成功地把直女马上就吸引过来了，（笑），就没明确谁是谁不是（同性恋），就叫人大家一起来玩。

“崔子（后来）也跟我说，说我的这个做 party 的形式，就带有这种西方的概念，有的是批判帝国主义的，像他和小培就比较会批判，我就（说）批判的对。”

96、97 年（在中国）的时候，（我）是一开始就觉得应该搞政治运动，应该女同志就讨论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社区、我们的身份，当时我特别年轻积极，也特别女同性恋，就觉得该搞运动，也什么都激动。但是好多女孩根本没兴趣，就觉得想玩，也渴望着认识别的女同志，就钓鱼、钓人。以前我们开始有一些女孩的玩儿的，我请大家到我家，就说你们想做什么呢，（她们）就说

不想讨论，想去踢足球、去公园、去一起玩，所以我说好，就组织玩的。每次都是我组织去公园、去踢足球、去干什么的，不是那么难，十几个人就都打电话，就说在哪哪哪见。我也记得挺好玩的，有一次在荷兰搞 gay games 就是搞同志奥运会，他们就跟我说有没有什么中国女同志愿意参加，然后这应该是个出国的机会，他们还给你买飞机票，我就以为人家都会特积极，但是我记得在我家十几个人，差不多没人听，然后我就说“诶，听着，谁想去荷兰？有这个机会！”然后人家都没兴趣，就觉得跟她们没关系，特别复杂，差不多没人听。我就觉得你想让人家好好谈一个荷兰的（活动），大家都不愿意谈。

可能 97、98 年开始组织（一些）讨论会，我们叫“北京女同志”⁴，先有 12 个人，包括小培和石头这些人，在谁的家讨论。就（问）人家愿意讨论什么，愿意讨论性、讨论权利这些问题也好，第一个讨论，讨论（的）还是“性”，“性高潮”。但是马上我们就说（要）做组织，然后谁被选成委员，每个部长我们都是不同的。然后小培她们五个人，（包括）Kim、石头都（一起）组织了那个中国第一次女同志那个会⁵，可能有 30 多个人来。怎么找到（这些）人，（之前 95 年）方刚出了那本书，《同性恋在中国》，然后李京就写信说，我是个女同志你有没有（联系网络），不知道（还）给他说了什么，就给他写了信，后来别的女孩开始给方刚写信，他把信都给李京。有好多是全国（各地）的，可能有三十几个人，不在北京，李京就特别好，谁愿意来北京玩，她就会让她们来玩，住几天，住她家，然后跟我们大家一起玩。所以那些人是 98 年（女同志大会）的那个网络，因为我们的网络就（只有）在北京，她就找到了一些别人，那个时候就开始鼓动人员。而且那个时候，刚开始能上网，有 email，可能 97 或者 98 年，我就才开始用 email。

（开会时）那是秋天，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了，6 月份（就）走了。我也觉得好，因为我我觉得我是一个老外，我可以参加，但是我不应该带头。我回（英国）是去读一个硕士学位。一方面是特别理智，跟事业有关系，我

3. 这里也可能是指“东西方相遇小组”，在其他文中有提到。

4. 1998 年中国大陆成立了第一个女同性恋小组“北京姐妹小组”。

5. 1998 年 10 月北京召开了女同志大会





2006 年 6 月苏茜（左）与友人一起庆祝骄傲月



美国加州棕榈泉的“The Dinah”女同性恋派对



2013 年，苏茜在第五届亚洲性教育会议上发言



2016 年，上海骄傲节的女生派对



2016 年，苏茜在上海交通大学公益慈善论坛发言



2016 年，上海骄傲节的闭幕派对

觉得我需要（的）不是瞎找工作，我觉得我需要深深地思考这些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是特别感情方面的东西，我觉得我想家，想回家，我去的那个学校就是离我父母特别近，离我姐姐也特别近，我都没申请别的地方，我就想回家，我长大的地方，回家（后）我可能几年都没出国。

崔子（后来）也跟我说，说我的这个做 party 的形式，就带有这种西方的概念，有的是批判帝国主义的，像他和小培就比较会批判，我就（说）批判的对。我把一起喝酒、一起玩的、一起做 party、一起做酒吧的（人组织起来），我是用这个形式开始，因为这是我熟悉的东西。

我 1995 年当时住在三里屯，我就选了这个 City Pub(注：)，我就看它比较友好，不在乎（来客是）同志，我就说，好，我们先每个星期三在那儿。Half and Half（注：酒吧名）也是我找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在酒吧每个星期集合。但是为什么在酒吧，这完全是模仿西方的一个模式，（西方的）同志社区一开始是从酒吧开始，（我）把西方这个模式（带过来），这个也是跟中国市场经济其实挺配合，但是，不一定是适合中国的方式。确实很多人就没这个钱去买啤酒，当时 15 块钱一个扎啤⁶，我记得，好像是这么贵的，也会有人去让别人给他们买酒或者不买东西，但是当然不是那么舒服的。所以我组织的这个东西就已经有一些问题，就（会）排斥一些人。

在北京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同志，我应该支持世界上的同志，争取他们的权利，我在中国我当然会参加这个同志运动。（但是）我确实也觉得我是外国人，我不能代表中国的同志说话，我不应该领导什么东西，我应该听当地的人怎么想，然后去支持她们，我已经有这个意识。但是比如我组织了那个 gay pride（同志骄傲），是 95 年或者 96 年，我们在 Half and Half，跟小培、吴春生（一起）⁷。台湾同志（就）不（纪念）那个，就有人说应该把屈原的就那个中秋节当中国的同志骄傲日，因为屈原他应该是同志，我们为什么要（过）一个西方的（节日），纽约的石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我（98 年后）回去学了那些，我想，哦，那我原来支持中国的

同志搞石墙活动是带过帝国主义的这个含义，就（像）这些，我觉得我（回英国后）思考了更多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更早，加入（的）那个时候完全可以我不组织，就（可能）会有好多中国人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好的坏的我不知道，但是确实有这一些西方、东方（的差别），我（的背景）是英国、美国、比利时，就把这些想法跟中国（结合），有时候混在一起挺好，但有时候（可以期待）有更本土的东西出来。

（本文访谈于 2011 年 1 月 ~ 2012 年 8 月）

6. 注：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6 年全国城镇人均收入是 4844.78 元 / 年，消费性支出是 3919.47 元 / 年，其中除食品、衣着、居住、交通、医疗等基本支出外，人均的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性支出仅 374.95 元 / 年，酒吧无疑是城市的高消费娱乐场所。

参见：<http://www.stats.gov.cn/ndsj/information/nj98n/J041AC.htm>

7. 1996 年 6 月何小培组织的纪念“石墙运动”同志派对，乔晓影的个人故事里有提及。

灰烬：

坦诚相见

整理 / Karen ， 访谈 / Karen

灰烬——同志运动、性别平等的积极实践者。

80 后，乐观开朗、真实自我、渴望自由，有改变社会的理想和激情。大学期间曾自发组建拉拉娱乐活动 QQ 群。接触同志组织后迅速成为社区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曾在北京同志中心、同语、les+ 等多家机构做志愿者，先后担任北京同志中心项目经理及执行主任。现任北京同志中心理事、华人拉拉联盟委员、发现自我之旅酷儿视频工作坊协调人。她说，同运会成为她一辈子都不愿意放弃的领域，因为在里面做任何事真的就是很开心。

“这跟在高中对别人出柜的时候说法很不一样，那时候是说我喜欢女生，我可能是双性恋，感觉说自己是双性恋，可能比说自己是同性恋，要不那么严重一点。这时候我就是直接说我是同性恋！不会说虽然喜欢女生但还不是同性恋，不会用这个逃避的方法。”

那时候我十六岁，我自己还搞不清楚自己是双性恋还是同性恋呢。如果别人主动问起来，我就告诉她说我喜欢女的，然后说我可能是双性恋。那时候感觉说自己是双性恋，可能比说自己是同性恋，要不那么严重一点。因为主流社会都认为你喜欢男性是比较正常的，双性恋两方都包括，你还算是主流社会中的一员，只不过比其他一般人更多一个兴趣而已。

高中的时候，我交往了第一个正式的女朋友，通过她认识一些她的 LES 朋友，经常在一块玩，一共就那么四五个人，都是同龄人。那时候我们就是吃吃饭，唱唱歌，还没有想到去各种 LES 据点玩一玩。那时候北京的中学生当中还没人谈论同性恋，我倒是观察到有疑似人物，班里有个女同学有别的女生追，追得很热烈，大家都作为一种八卦来传播。

这样持续到上大学，又认识了一些大学里的朋友，就一块儿去酒吧。这些朋友是别的专业的，但因为都住在同一个宿舍楼，经常上下电梯碰到，就觉得那不是一对，就使点眼色，最后搭讪一下就那样地认识了。干脆我就想建立一个 QQ 群，方便和别人联系，方便出去玩。我开始组织见面，第一次来了十几个人，大家谈得挺愉快的。刚成立群是 2005 年，后来群发展到四十多个吧，还有很多人一直不露面，露面的也就将近二十来个吧。

后来群里把恋爱关系搞得比较错综复杂，互相勾结来勾结去，我也被搞进去，反正搞得很不愉快，后来就没有再多组织 QQ 群的活动，群自然就解散了。但是我还是会跟比较好的朋友一块儿出去聚会。那时候去 LES 吧比较多，有出于找女朋友的目的，也是因为跟相同性倾向的人在一起玩比较放得开比较有意思，不像跟其他的朋友在一起共同话题比较少，有的时候还得顾及她的感受，不能多谈自己情感方面的问题。

直到 2008 年初的时候，我去画楼酒吧参加 LES+ 两周年派对，那时候才接触到一些比较活跃的北京女同组织的人。然后 08 年三月份，也是在画楼，有个酷儿独立影像放映会，期间闲出来讲话，她说成立了一个同志活动的地方，“同志文化活动中心”。闲是运作女同组织的，我问需不需要志愿者，她就把我的联系方式给留下来了。我在中心参加了各种活动，同志学英语，同志看电影，同话话不完，讲一些出柜啊，父母之间的关系呀之类的。那时候我在中心还不算是志愿者吧，只是一个来参加活动的人。

我会去的活动一般是请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人，像 08 年夏天台湾比较牛 X 来的人，像王苹，何春蕤来的时候比较热闹。和以前在学校和酒吧里相比，中心提供了多一个途径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而且它是一个比较积极向上的地方。它的活动会加强参加者的自我认同，让他们更有归属感。中心娱乐性没有那么强，社交之余可能还会认识到一些有关于同志的知识，有一种跟其他朋友在娱乐场所不能触及的谈话深度。关注的点除了自己的情感还可以放到更广的区域，放在整个群体方面。

同志的权利，可能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有了这个意识。比如说你去面试，有一些私企的老板可能会问及个人生活的事情，还有对你的穿着外表会有很大的看法，这个时候你就不可能跟他讲实话，只能编造一些谎言应付过去。在学校也很难在大家面前展示出你生活的所有方面，总有一些要隐藏的地方，如果说你不那么低调的话，很容易就会招致一些人的反感。

我也不是很在乎在直人同学面前暴露身份，如果他们因为这个而不能完全接受我，不做我的朋友，我也就随他去吧，因为他真的适合做朋友的话，他就不会因为这些跟你疏远。父母方面，我一直以来的想法是必须得经济独立以后，我没有了把柄抓在他们手里以后，才能告诉他们，省得如果他们掐住你的经济来源，你还不得一切就言听计从。毕业以后我也没有特别想主动出柜，只不过掩饰得更少了点，主要还是在网上发一些同志活动的东西，关于同性恋的一些文章，后来被我各种同辈的亲戚看到了，八卦就在家族中传播开来，很快就传到了我妈我爸的耳朵里，他们就主动来找我谈，我就承认我是同性恋。

这跟在高中对别人出柜的时候说法很不一样，那时候是说我喜欢女生，我可能是双性恋。这时候我就是直接说我是同性恋！不会说虽然喜欢女生但还不是同性恋，不会用这个逃避的方法。了解各种同志的理论、近况、发展，还有跟社区内其他朋友的交往，这些都有助于加强自我认同。

我长在离异家庭，父母双管齐下的压力很少。而且我在成长过程中受的是无性别差异的教育。我从小就不太喜欢做女性化的装扮，我父母也不会说因为我是女生，就限制我说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也不会给我灌输什么女人就应该怎样，男人就应该怎样的观念。他们都非常强调个人奋斗。我爷爷现在还每次回家都对我说，你一定要努力啊，以后谁也不能靠，只能靠你自己，一定要努力学习，好好工作，赚钱养活自己。我觉得我我现在对于性的态度啊，性别气质的发展啊，和不受家庭干涉也有关系吧。我出柜也没有特别大阻力，因为我跟家里的关系不是那么紧密。我一直都很强调个人自由，所以我一直都觉得他们不应该对我私生活有过多的干涉，因为这是我的生活。我个性比较强硬，亲人很难影响我。

“我之所以在同志社区里不断深入，我觉得还是交往女朋友的最原始的动力给了我最大的推动，另外就是交往相同性倾向的朋友。我感兴趣的点大都是跟性倾向、跟性有关的……所以在社区认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人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阵子社区活动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中心办的“拉拉串串”，就是拉拉营，我还特地为那个培训请了两天假，跟单位撒谎说家里有事。因为以前 07 年的时候就听过有这么一个培训，我就一直很神往，08 年终于有机会可以参加了，终于能见识到各地同运领袖的风采，美国的、台湾的、香港的，她们个人魅力很不错，我还花痴了很多。这次拉拉营开阔了眼界，首先在主观上就更加积极一些，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一点点事情，其实还是可以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的。其次还有工作的方法，那些天的课程有教到一些怎么招募志愿者；怎么宣传；怎么把人组织在一起共同进行一个项目；还有讲怎么筹款，资金申请之类的。参加完拉拉串串以后，我在同志社区做的事情就多一些了。

在中心主要是策划每周六晚上的拉拉扯扯。活动形式是一个主题讨论。热闹好玩为卖点，吸引她们来社交啊，找女朋友之类的，来了以后再加料，我们做得还是比较娱乐化，不会是很死板地说教，但是会加入一些可以让她们更好自我认同的内容，让参加的人有思考。基本上每周一期，除了在中心室内的，还有一个月一次到户外去活动。参与的人大都不一样，流动性还是很强的，早期就是拉一些比较熟的朋友来撑场子，后来每次都有新面孔。

我从一个志愿者到一个活动的负责人，这个变化首先是要有一个意愿，要有做这个活动的想法；还有一些资源，人的资源，场地的资源。其实在中心做活动，不用考虑资金的问题，所以首要的资源是人，有人帮你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一个人的能力始终是有限的，精力是有限的，还是应该聚集一些对这个活动、对这个事业都有兴趣的朋友，并且她们也有这个能力去做的。

我之所以在同志社区里不断深入，我觉得还是交往女朋友的最原始的动力给了我最大的推动，另外就是交往相同性倾向的朋友。我感兴趣的点大都是跟性倾向、跟性有关的。这个内容可能跟异性恋的朋友共同话题不是那么多，而且我觉得处在社会规范下的那些异性恋的朋友不是那么具有多样性，不太好玩，所以在社区认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人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09 年的 6 月份我在 3 家组织作志愿者，北京同志中心，同语，还有 les+。到了 09 年的下半年，我辞职开始专心考研。同志中心夏天因故关闭了几个月，所以就没有举办任何活动，拉拉扯扯也就此中断。大概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我没有在社区内参加什么活动。我顺利考上研究生以后，在 10 年的 7 月份吧，我看到招募青年同志夏令营的消息。它的年龄要求 18 到 25 岁，然后那个时候我正好 25 岁，然后我就以边缘的高龄去参加了。

首先是三天的发现自我之旅视频工作坊，每个人做一个同志的生命故事短片。其他人做的都是怎么发现自己的性倾向的啊，然后苦恋一个男孩子或者女孩子未果啊，或者是什么跟父母怎么怎么样啊，那些比较舒缓、悲情的东西。然后我做的是积极向上运动风，比较有喜剧风格的、节奏比较明快的视频，听说开创了发现自我之旅的一种新风格。

范坡坡来做视频剪辑的讲师，我才知道那个时候他在北京同志中心做执行主任，他想招一个做活动策划的职位，我就投了简历，跑去面试了。当时，我和我女朋友的关系比较疏远，我也需要很多的社交活动。另外，也是觉得现在同志组织的发展，看起来还挺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应该会需要一些人手吧。

我应聘上了这个北京同志中心项目经理，负责活动策划，从 10 年 9 月份到 11 年 1 月份。后来中心的行政主管辞职不做了。所以我还代理了大半个月的行政主管。我一直都在上学，只当项目经理的时候，工作和我的课程我还能处理好，还没忙得焦头烂额。后来职责扩充以后，就占用了我超级多的时间，学校那边我就尽量能拖就拖，导师那边能混就混。再后来范坡坡因为个人的发展，决定辞去中心执行主任的工作。经过一些周折，最后就决定从 11 年 4 月份开始由我接替做执行主任，这以后我学业上受到的影响就比较严重了。

之前公开招聘过执行主任，但效果不太好。在我看来，原因还是同志组织的人才储备不够。有能力的人，都有自己的一摊子事，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全职工作什么的，他们也就无暇再做别的事情了。其他人呢首先不了解同志组织，甚至不了解同志社区，也不了解 NGO。而且我们的招募启事发放的渠道也就是中心的渠道和一些 NGO 招聘的网站。所以符合我们要求的人实在太少了。

招聘碰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招全职的工作人员。很多人不会把在同志组织工作当做一份自己的事业来做。因为很多人做志愿者就是业余的时间过来，不当真的，过来玩的。而且同志组织开始招全职工作人员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大家就看不到这个职业发展的前景。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会把这个工作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我只觉得，赚点零花钱，然后丰富一下业余生活。后来逐渐地深入了解，就觉得是可以的，对于一些肯奉献的人，就可以当成一个正经工作来做。但是这份工作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经济回报却很少。

“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自我的、真实的人……我希望别人能够看到的我，是一个在某些事情上还是很严肃认真、很很靠谱的人，也很有牺牲奉献精神，有时候还有点理想主义。”

中心的执行主任，主要职责是筹款、设计项目、管理工作人员，以及和其他组织和个人进行外联，很多时候是一个形象大使的感觉。做执行主任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一个全职的人会更适合。但当时的情况就是没有其他人选来做这个执行主任。所以我只能把这个担子挑起来，从四月份到八月份，挑了有五个多月吧。期间最得意的一件工作，是找到了非常有能力非常靠谱的项目经理和争取到基金会资助。最遗憾的事情呢，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拉拉来讲，没有把北京同志中心的女同志活动做得更有声有色。真的，推动这个工作太难了。然后我就逐渐接受了男同志更活跃这个现实。我在洛杉矶看到的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去投入到执行主任这个岗位上，我觉得一个理想的工作状态应该是能够把北京同志中心的

各方面工作都制度化。不能让个人经验占工作的主导因素。如果换了一个人，上一个人的经验就没有办法得到传承。如果说这个组织运作更制度的话，一个人走了以后，另一个人能很快接替他的工作。如果我只有一句话的空间可以传达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我会告诉未来的中心执行主任，别让自己太忙。因为，我得到后来的时候，我就被各种琐事所缠绕，很难去好好地想未来自己的发展与组织未来的规划。

别人交给我的工作越多，我自己感觉责任就越大。有时候给自己揽太多的事情，就变得对于我来说太沉重。我辞职一方面也觉得这个责任太大了，我现在的能力、经验、个人情况已经不足以承担这一切了。我现在发现我有点公众人物的感觉，经常出去，做个人介绍，然后别人就会说，灰烬就是你啊。公众人物还是有比较大压力的。经常会有人提醒我，说做一个组织的负责人的话，要更多注意自己的言行，要多为组织考虑。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样的感觉，我的个性就是喜欢做自己啊，有的时候不太介意别人的感觉。我不是一个很装 B 的人，我更喜欢做个比较真实的人，我觉得我还是自由自在地做一个性少数比较好。我觉得我应该重新定位我在同志运动中的角色。也许做一个这样的领导者并不适合我。

也许还是领导力不够吧。领导力就是一种影响力，就是把自己的理念、想法传导给别人的能力。传导的目的当然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这个运动中来，一起团结起来做一些事情。这个影响、开发更多人的过程，我觉得是我所享受的，但不一定是我所胜任的。因为我觉得我的表达能力不是特别强，很多时候描述不清自己的想法。我是一个执行力比较强的人。所以，可能做一些具体的事情会比较适合我吧。

我还是需要继续学习。现在有一种之前的积累被耗尽的感觉。不管是全职的、还是兼职的、业余的，这种充电都还是蛮重要的。这些充电会影响一个人做事的方法，影响一个人解决问题的策略，影响和别人的合作。所以我觉得适当的休息啊，然后再获得一些其他的知识还是挺重要的。

辞掉执行主任的工作这一个月来，生活简直有太大的变化了。以前基本上睡得很少，现在每天可以睡好长时间。还有很多的私人生活和空间。我上一段关系是工作和私

人生活相混合的。因为我上一个女朋友也是在做志愿者，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工作中碰面。而过去的一年的时间，我放太多的精力在同志工作上面了，导致我学业现在碰到很大的困难，我得赶紧花更多的精力去把学业给补回来。

毕竟我的专业跟同志 NGO 的工作相关性真的很少，始终会存在一个自己的专业和同志工作的矛盾。其实我还是很想在同志运动中做一些事情，我也尽量规划自己以后的事业能够配合它。我觉得现在专门做同志工作的话，其实还蛮难生活的。还需要很大的激情，然后有奉献精神。我刚毕业，我需要一定的事业经济基础才可以。也许日后随着同志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或者是我个人的生活的变化，也许以后也有继续全职做同运的机会。同运之所以会成为我一辈子来讲都不愿意放弃的领域，首先是因为在里面做任何事真的就是很开心。另外一点就是，符合我改变社会的理念，我一直对社会运动还是比较有兴趣的。

有一段时间我还比较愤青，是“右愤”。我比较注重机会上的平等，也很在意人权。关键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渴望自由的人，我觉得不受干涉地生活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社会。然后我发现在性倾向方面的身份使我变得不自由了，很多时候都会有点限制。不能完全充分表达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要改变。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可能只能影响身边的人。但如果我能团结更多的人来为更自由美好的明天而努力的话，那是一个很好的事。所以当我发现有些同志团体在做这样一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很感兴趣。

我也是一个对物质要求不是特别高的人。做这个同志工作，虽然说在物质上回报很少，但是在精神上有很大的满足。我有一些朋友，我也想影响他们来做同志工作。但是他们可能更注重个人发展，所以对于同志运动的参与并不是很多。所以我想，通过做同志工作，也可以认识更多跟我有一样想法的人。这些人也在不断地激励着我继续工作下去。

同志 NGO 工作真正的吸引力还是一个理念吧，一个感召力，就是这份工作确实能改变很多人的生活，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这个改变不是你能看得到的，但现实的挣扎，是你每天都感觉得到的。这个矛盾，就需要不断

地给自己打鸡血呗。不断地通过同事的鼓励，通过自己工作取得的成绩，以及不断地进行一些培训，来激励自己。我能坚持下来，一方面是我还是做兼职的工作，另一方面就是，确实我在这份工作中获得很多的乐趣，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也确实能感觉到服务了很多

人，能让他们生活有一点改变。

而我自己也有改变啊，首先可能是责任心的改变吧。因为以前做志愿者，现在是当作一份工作来做。志愿者凭自己兴趣啊，想做就做，想帮就帮，不想做撂挑子都可以。作为工作的话，我会有更大的热情去投入到上面。因为更多的事情让我知道了，让我负责了，我就会对这个组织更了解，对同志运动更深入。而且以前我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有宏观上的价值，现在做了比较能够统揽全局的工作以后，就会更觉得自己工作是很

有意义的、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人来做这些工作是肯定不行的。

在私人情感方面，我还是比较希望能够和一个伴侣长期稳定地生活。但这点目前还没有达到，因为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吧。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自我的、真实的人，和那种特别不能真实表达自己、太在意别人观点的人不太搭。还有就是别人对我的误读以为我不喜欢稳定伴侣关系，我发现好多人对我的印象都是重口味、性活跃，淫荡都快成了我的标签了。我觉得这可以是我在人前所呈现的形象，但不是我唯一的形象，不能因为我主张性解放、性权利就承受污名或者刻板印象。我希望别人能够看到的我，是一个在某些事情上还是很严肃认真、很很靠谱的人，也很有牺牲奉献精神，有时候还有点理想主义。

口述者补注：

我的想法变了，现在我不那么强调我的同性恋身份，因为我感觉自己已经超越了身份政治，不那么确定吸引我的一定是生理女性，娘娘腔男也不错啊；也不那么确定自己的社会性别就是女性，我也可以是不男不女。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我说自己是跨性别，有的时候说自己是同性恋，有时候烦了性倾向、性别这些条条框框就说自己是酷儿。我最近总在策略性地使用不同的身份标签，如果去大学校园里给零基础

（本文访谈于 2011 年 8 月）

（补注于 2012 年 12 月）

大拿：

用修炼的心态 做一份没有功利 的事业

整理 / 懒人、柯晓，访谈 / 柯晓、典典

大拿——现任华人拉拉联盟委员，同语核心小组成员。

“封建迷信”相关事业研究人员，长期关注边缘学科与边缘人群。大学期间通过同语首次触电同志运动，随后在同语的工作经历进一步增加了其对北京、大陆甚至港澳台的同志运动的了解与认识。现为港漂，但仍热衷奔跑于辽阔的祖国大陆，为各拉拉小组与社区牵线搭桥。

“（我）会觉得自己可能是个自我认同不好的异性恋，受了太多这种东西的影响，才会认为自己是喜欢女孩子的。”

我接触（同志）比较早，初二的时候身边就有两个朋友是，我们学校就有，那时候都只是隐隐约约、模模糊糊的。高一时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女孩子未来可以在一起，也是用“同性恋”这个词，但我们是用 gay 而不是 les 来形容这个群体。

05 年的时候，我一个朋友的好朋友是个 T，这个朋友就了解了很多同性恋的事，我去找她玩，她给我看了很多 T 的照片，跟我介绍这些东西，她说的时候可能无心，我却挺感兴趣，于是就想进一步了解，但她不太想让我去接触这些，后来就不告诉我了。

那时候有网络，她不告诉我，我可以自己上网搜，一下子就知道了很多比较专业的词汇，然后我就自我认同是 T。因为是这样的——即使到现在我的审美上都是——比如说我在网上喜欢看的都是比较漂亮的，长发的美女，对应地，我就觉得自己应该是 T。（后来）很快有第一个女孩跟我表白，我们就在一起了，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拉拉，是个 T。后来各种原因，感情出现了问题，然后分手了。

我跟我第一个女朋友分手以后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可能不是同性恋。因为那个时候是她先表白，然后我就觉得也不错，所以我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属于那种被动接受型，这样的话，可能我就不一定是同性恋。（我）会觉得自己可能是个自我认同不好的异性恋，受了太多这种东西的影响，才会认为自己是喜欢女孩子的。所以有近两年的时间，我跟这些东西完全没有来往，把之前认识的那些朋友全都断决，手机号、QQ 号都换了，任何与这个有关的人都不来往，穿著上也慢慢女性化，努力尝试去做一个异性恋。

然后，我就想开始试着接触一些男生，（结果）两个谈的比较好的都是 gay，我当时就觉得，这是命运吧。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他们，只是觉得不像别的男生那么讨厌，有好多的话聊，兴趣比较一致，他们都是搞电影的，而且大家对女人的审美、感情观这方面的观点都很接近。（其实我和他们）基本上就是朋友关系，所以不会觉得

有多可惜，反而当知道他们是 gay 以后，可能更亲密了，就是觉得什么搂脖子抱腰也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是 gay 嘛。

因为认识了闲，她给我营造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拉拉运动的图景——就是感觉我可以认识特别多的姑娘——于是就加入了同语。08 年 4 月，我好像是在豆瓣上看到酷儿影像展的消息。那段时间我对同性恋议题的电影很感兴趣，又因为我选了一门社会学的课，做性别研究，正好那门课要写论文，我就想去看看。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闲，她在影展开始的时候作了一些介绍，我跟她聊了几句，说我对她们的工作还蛮感兴趣的，如果她们需要人或者有这方面的活动可以告诉我一声，我留了邮箱给她。

后来没有收到（闲的）邮件，又过了有半个月吧，有一次在校门口（偶然）看到了闲和追命、还有凌和她女朋友四个人，她们刚好来我们学校看音乐会。那是（我和闲）我们第二次见面那次才交换了手机号码。大概一个星期以后，她要来清华听一个讲座，那天晚上九点半我们约到了清华东门的盒子咖啡，我、闲、追命、Karen 还有一个闲在美国的朋友，一共五个人。刚开始就聊我，其实主要就围绕着寻找经历啊、认同过程啊，一些挺八卦的事，那天聊得挺晚的，聊到十二点多。

5 月底的时候吧，同志中心（有）一个活动，有一对 gay 结婚，闲让我去看，那次特别搞笑，她跟我说是晚宴。（我觉得）婚礼么，然后闲（还）特意强调是晚宴——因为我之前没有参加过同志活动，我不知道同志活动的规模，她又说是晚宴，我还觉得挺紧张的，穿得很正式的了。结果推门进去一看，就是同志中心现在的那种风格，都挺家居的，我有一种被调戏的感觉。我那天穿的高跟鞋，下边小短裙，上边是一个稍微有点正式像礼服性质的东西，去了之后就觉得傻了，全场没有人跟我（穿）一样的。那次我正式认识了 Eva、石头、老刘（？）、gogo、小伟、安可，那天的活动就是一帮人聊天、吃东西、喝点小酒……很闹，一群人唱歌跳舞，谁也顾不上谁。

因为认识了闲，她给我营造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拉拉运动的图景——就是感觉我可以认识特别多的姑娘——于是就加入了同语。（认识她们）那时候同语正在做家暴的项目，我就开始整理（访谈）录音，（后来）我就接替小白做了秘书的工作。做秘书工作很杂，因为我做事情很快，于是我就做了更多更多的事情，后来我离开同语才发现，我之前做的工作被拆成几个不同的人在做。

“可能婚纱照这件事情在整个同运过程中算得上有一笔，但它对我个人来讲并没有那么强的影响，我觉得我在当中更多的是在做一个花瓶；而我本身不是一个花瓶，我现在做的事情也不是一个花瓶做的事情，我觉得那个花瓶跟现在的我是有很大差距的。”

大概是 08 年底的时候，我记得新年之前开过一次会，江晖提出要做同志婚纱照的创意，需要找男女模特。当时我就说如果要拍婚纱照、可以穿婚纱的话，我就报名。情人节之前没多久才最终定下来要做这个活动，只有我是最先定下来的模特，另外三个都是之后找的。那个时候也没钱，刚好爱之行有个工作人员，愿意把她结婚时候的婚纱借给我们，我就去她那取，取之前根本不知道婚纱是什么样子的，而且直到活动当天在同志中心换衣服的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活动的另一个新娘，永垂不朽。

活动之前我根本没有想过会有危险性、安全性这种问题，直到活动前两天开安全策略的会议，大家坐到一起说，如果警察来了我们就说是帮朋友的影楼拍摄，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个活动是有风险的。

活动现场没有发生什么状况，我们女生这边情况特别好，围观的男性更多，很多男性也要求跟我们合影。女生的态度也都挺随和的，对（同性恋）这件事情上很难看到那种歇斯底里的女人吧，可能有一些大妈觉得不好。我觉得不能说公众对女同性恋的接受度更高，你可以看他们接受的是哪些女同性恋，如果说这两个女的是那种胖胖的、丑丑的话，可能公众的态度就不会那么友善，因

为本来媒体上就有一些人说，女同性恋就是因为找不到男人才当女同性恋。

活动现场我们周围全都是好听的，都管我们要花，要求合影，问谁是新郎谁是新娘，我们就说都是新娘。我感觉很多人冲到我们面前要花，男同那边花是要给的，我们这边是抢的，我连头都抬不起来，着急啊，就唰唰唰一直在给，有很多只手伸到我面前，当时很多人跟我说话我根本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现场有两部摄像机，一部是（范）坡坡拍的，另一部是香港女同学社曾经的一个志愿者拍的。虽然都是从头拍到尾，但是两个人视角不同，剪出来的片子也不同。坡坡有一些剪辑很搞笑，整个是挺还原也很有意思的，我上装什么的一些镜头没那么好看，可以看到活动当时的面貌。那个女生就剪了一个两个人结婚的小短片，特别唯美，那里面我特别漂亮，没有任何一个镜头有缺点的。我觉得视角不同，深度不同，坡坡的感觉更有意义。

我看（前门婚纱照）明信片的感觉是，那上面的人跟我是两个人，没有特别强的联系，我不希望大家觉得那个人是我。因为已经是过去时了，就好像我现在已经是一个研究生了，如果还跟人说我小学一年级是第一名，会

觉得很无聊，我觉得那只是你在某一个时刻的某一个身份吧。可能婚纱照这件事情在整个同运过程中算得上有一笔，但它对我个人来讲并没有那么强的影响，我觉得我在当中更多的是在做一个花瓶；而我本身不是一个花瓶，我现在做的事情也不是一个花瓶做的事情，我觉得那个花瓶跟现在的我是有很大差距的（我）从来就没觉得自己好看，至少我长大的环境里，从来没有觉得像我这种长相是好看的。

（以前）在同语其实是你可以偷懒的，不是说会限制你，如果你愿意思考，你可以去想，但是你有偷懒的机会，人一旦有偷懒的机会就容易偷懒嘛。而在联盟是逼着你去做决定、去思考，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种修炼。

加入（华人拉拉）联盟也是因为闲，她给我营造了一个特别好的、在联盟工作的图景。感觉每天都可以认识新朋友，其实也不用干什么活，只是跟人家吃饭聊天啊，就可以做运动，多好啊。10 年 4 月，华人拉拉联盟在厦门召开委员换届大会，当时闲怂恿我去竞选委员，我当选成为联盟的五个委员之一。换届大会的选票刚好用的是我前门婚纱照的明信片，大家一人拿一个在上面写票，也许我竞选成功就是因为那个明信片。

当选联盟委员之后我就一直在做联盟的事情，比如拉拉营、年会、季报、小额资助，还有联盟自身的组织结构建设，定期整理一些资料，资金申请这些常务的工作，每两周就要开一次会。联盟的组织结构是 5 个委员作为决策层，执行层只有一个全职的秘书处，没有同语那种比较稳定庞大的志愿者团队。

（以前我工作的）同语，是先有自己的 task，它已经摆在那了，要做的事情都是旗帜鲜明的。而当选联盟委员以后，变成没有人告诉我要做事情，我要自己决定做什么事情。因为联盟本身的 task 之类的东西都是很模糊的，就说要建立一个跨区域的网络，促进发展，但是没有很明确、具体地说是长什么样子。你进去之后要去为她量身打造，它应该、它可能变成什么样的组织。

（在联盟）我们就要去协调，选出一个综合类的，可以代表我们五个人想法的东西。这就是五个人要协议的过程，这个过程里你没有办法不动脑子，如果你不去动脑的话，可能出来的是跟你完全没关系，你完全不喜欢、不认同的东西。但是你还要对它负责任，按照它去做事情，所以如果你不想到最后去做一些自己根本不认同的事情，你就只能前期去参与，据理力争把你的想法说明白。去说明白想法的时候，你要有整个运动的视角，因为联盟本身是跨区域的，你要把它放在整个华人拉拉运动的大环境下考虑。所以你要对这个大环境有一定的认识，你才可以去考虑应该做什么运动、要怎么做。

（以前）在同语其实是你可以偷懒的，不是说会限制你，如果你愿意思考，你可以去想，但是你有偷懒的机会，人一旦有偷懒的机会就容易偷懒嘛。而在联盟是逼着你去做决定、去思考，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种修炼。我的成长背景是从一个小城市走出来的，有些人可能从国外或者来自大城市，每个人的经历、知识背景都不同，对很多事情的理解也不一样，就是永无休止的会议，需要不断地协商、交流想法，你要不断去培养自己的情绪、态度，如何心平气和地跟别人吵架，我觉得沟通成本比较高。但是对我个人来讲，这跟我自己的事业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承诺去做一件事了，你就希望可以稳定的去做，让它可以实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一些差距——当你去听一些台湾的，比较资深的运动者，或者是搞理论的人，她们讲的观点、事情，都会让你看到差距，这些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你也能看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差距在缩短。这是一种动力，促使你去进一步缩短这个差距，可能也是属于好胜心理吧。

参与同运极大地影响了我的个人生活，比如无限地剥夺了我的个人空间，有时候还会影响我的情绪。我个人的理想是教书育人，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同运跟我个人的学术研究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时间上还会有很多冲突。因为时间有限，有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一边要赶学术文章啊，一边还要赶开会呀，或者说赶报告，那时候很讨厌。

（我的）工作跟学术（是）分开的，（如果说）有关系的，都是（需要）写东西。因为我现在在联盟工作，写字的时候比较多，然后我现在平时也是写文章，也是写字的时候比较多。再有的话就是，从根本上来讲，我觉得我自己的学术方向，中国本土宗教，（对于它）现在是在文化里面根本就意识不到的歧视，（我也）是在为更加边缘的群体在努力，这个（与同志运动）可能是联系的。

（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人信佛，我从小就生长在宗教的环境里，我妈妈他们（那边）都是信佛的，他们都有佛号的，我们家以前就有佛堂的。所以整体来讲，（我）对这个宗教的感受，不像是我从别的地方所获得那样的，阴暗呐、扭曲啊，或者是所谓的精神寄托呀。可是就是因为看到你看到有很奇怪的现象，这些人他们是信佛的，可是他们是没办法说自己是信佛的，他们说自己是学佛的。（但是）同时的话，像信基督教的那些人，他们就（很得意）。本土的佛教和基督教都是一门宗教，但是你会很强地感觉到那些说自己是信基督教的人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就觉得好像自己在跟着一种前卫的东西在走一样，所以那种比较是很快就可以看到的。

我大学的时候就在（关注边缘群体），（那时）是对少数民族感兴趣。黑龙江（有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少数民族，所以那个时候特别想去拍他们的纪录片。后来有别的兴趣，就转移了，但是一直对边缘人群很感兴趣。我觉得就是好奇吧，就是想看看别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然后那种生活可能不在自己（的）想象中，不在自己（的）世界中。如果你去（以）不是那种俯视的态度，正常地去融入那个边缘群体的话，就自然地可以跟他们产生共鸣，然后看到一些主流文化对他们的霸权。所以你一旦产生了那种共鸣，有了那种感受，就自然地去想你可以做什么，于是你就会做什么了。

我觉得相比本土宗教来讲，同性恋根本就不算是被人芥蒂，因为其实从人数上他们（本土宗教信徒）要更多。当然我也希望同志运动最后走到一个阶段，你完全可以跟父母坦然地说自己是同性恋，父母也不会因此而承受外界的压力，但我个人觉得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这件事情的。所以我觉得从个人角度，做同运并不能使我受益。

（从事同志运动）刚开始还会有成就感，比如你想让这个地方有小组，这个地方就真的有小组了。可后来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开始质疑自己最初的决定是不是对的，是不是做小组就应该有个共同的模式？你在做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就是一个标准化的过程？使什么东西标准化并不是一件好事。再有就是，你在为别人、为社区服务，你辛辛苦苦牺牲个人时间精力，（结果）为他们做事情的那群人，掉过头来一点都不领情，还破口大骂，骂你专权，骂你整个没把他们当祖宗一样供，也有这样的人啊，我看到他们都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想做同运了。

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责任感很重要，你承诺去做一件事了，你就希望可以稳定的去做，让它可以实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一些差距——当你去听一些台湾的，比较资深的运动者，或者是搞理论的人，她们讲的观点、事情，都会让你看到差距，这些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你也能看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差距在缩短。这是一种动力，促使你去进一步缩短这个差距，可能也是属于好胜心理吧。

（本文访谈于 2009 年 7 月 ~ 2012 年 6 月）

Kim:

女同志要 整个“天空”

整理 / 懒人，访谈 / 小燕，Sophia

Kim——90 年代北京拉拉社区活跃分子。

参与东西方小组、第一届全国女同志研讨会等活动，提议创建女性读书小组。北京姐妹小组核心成员、活动召集人，参与《天空》女同杂志及女同志热线的创办，多次参加“全国女性主义研讨会”并曾在会上发言。2001 年发起组织北京女同性恋文化节，被叫停后北京姐妹小组解散，Kim 离开北京并逐渐淡出拉拉社区活动。



Kim

“人不应该仅仅因为爱上了一个跟自己同样性别的人就这么凄苦、这么凄惨”

我大概是 96 还是 97 年从上海来到北京，之前在上海的一家美国杂志社工作，到北京后也是从事新闻职业，在一家美国广播电台。因为在国外媒体工作的背景，我认识的外国人比较多，其中一个外国朋友刚好是个拉拉，通过她我认识了当时最早的北京拉拉。北京那时候只能见到很少的几个女同志，我们经常去一个在联合国工作的英国朋友家里玩，他们在国外搞惯了同志运动，就发起我们也来做同运。一开始我们就是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后来有一天那个英国朋友倡议我们大家一起组织一些活动，我当时觉得很好玩，会有吃饭委员、体育委员，打羽毛球之类的各种各样的委员。

认真起来是她们说要办第一届全国女同志研讨会¹，当时也没有什么运动的概念，只是北京的女同志太少了，我们全部凑齐了也只有十几个人。那时候有个万延海，还有之前李银河和王小波那本《他们的世界》出版之后，全国各地都会有同志写信来，我们就了解到一些散在各地的女同志的信息。决定要开会是因为有一个荷兰的女同志基金会给了我们一点钱，可以为外地的女同志报销路费，当时叫做研讨会可能也是为了申请钱方便，其实只是把大家聚在一起说说各自的故事而已。

我印象特别深刻，会议是开在北大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黑黢黢的，很秘密的感觉。全国各地大概来了二十多个女同志，大家都说了自己的故事，其中大部分故事都非常压抑，几乎每个人都有曾经想要自杀的经历。虽然只是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但是对参加会议的人来说，在感情上得到的支持还是蛮大的，因为好多人，尤其是外地来的一些拉拉，从来没见过那么多女同志，她们非常激动，有些人会哭，哭完了又会笑……那感觉就是，一直以来你觉得在整个社会中你就是孤单的一个人，突然之间你见到了同类……

我本人在自我认同方面没有什么障碍，二十五六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谈恋爱，第一次爱上一个人，她是一个女人，当时我就接受自己的性取向，也没有痛苦挣扎的过

程。但参加会的这些女同志当中有些人很小就知道自己的性倾向，整个成长过程是非常挣扎、非常痛苦的，听她们的血泪史对我个人是很震撼的经历。我本来是抱着一种好玩的心态参加同志活动，对我个人来讲不是特别严重的事情，但是开完这次会之后，我就觉得是有必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我觉得人不应该仅仅因为爱上了一个跟自己同样性别的人就这么凄苦、这么凄惨，那之后我就比较积极的去做这个事情了，慢慢开始有一点意识，但还不能说是运动的意思，只是想尽可能去帮助一些这样的人。

这次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决定要成立一个女同志小组，叫“北京姐妹”，想要做自己的杂志，开通女同热线。

“当时是抱着非常朴素的想法，有一个杂志的话大家可以交流，然后发出自己的声音；热线也不是说要去指导，只是说可以谈谈心”

最初我们有三到五个比较核心的志愿者，这几个人也会经常变动，我算是其中坚持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因为我本人性子比较急，看大家老是不开会，我就去召集大家开会，慢慢地就成了召集人。之前我在美国广播电台的工作需要朝九晚五的坐班，后来因为姐妹小组这些事情，我在那个广播电台做了一年就辞职成为 freelancer（注：自由职业者），之后时间更加宽裕，我就更多的成为了小组的召集人。

资金来源主要是一些国外基金会的资助，一个是荷兰的 MAMACASH（妈妈现金）²，还有一个美国纽约的基金会，名字比较拗口，我记不清楚了。99 年的时候，荷兰有两个女同志做了一个中国文化的什么节，邀请我去荷兰做了一个报告，那时候我去拜访过 MAMACASH 基金会。最初是万延海告诉我有几个这样的基金会可以申请资金，我就写了 proposal（注：项目申请书），当时小组运作需要的钱非常少，一年也就一千美金左右，主要用来租房、印杂志和一些电话费，我们小组成员出去吃饭都是 AA 制的。



Kim（左二）摄于纽约女同志游行（Dyke March）2001 年

有了资金支持以后，我们在北京租了一套房子作为办公地点，之后组织活动、开会讨论都在这里，外地女同志来的时候也在这里接洽。当时小组里只有一个人算是全职人员，她是个农村来的拉拉，外表很 T 很 T，在北京找工作很困难，我们就把她算做小组的全职人员，让她住在我们的办公地点，每个月只有几百块钱的工资，但是解决了她的居住问题。

小组最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女同杂志和女同热线。当时是抱着非常朴素的想法，有一个杂志的话大家可以交流，然后发出自己的声音，热线也不是说要去指导，只是说可以谈谈心。

杂志的名字叫做《天空》，因为中央台有个女性节目叫《半边天》，我们女同志不要半边天，我们要整个天空，所以就给杂志取名叫《天空》。《天空》大概出了六七期，是铅印的，印刷成本非常低。内容和现在的《les+》差不多，比如我们很早的时候就讨论过形式婚姻的问题，有一期杂志封面还采访过半边天的主持人张越。现在很多人都以为《les+》是第一本女同杂志，其实不是，但是和《les+》相比，《天空》是非常简陋的，我们就几个人在一起，简单分配一下谁做美编、谁做编辑，然后大家踊跃投稿，根本没有《les+》做得好。

1.1998 年 10 月北京召开第一届女同志大会。

2. 荷兰妈妈现金基金会，支持妇女权益的国际基金会。http://www.mamacash.org

另一项工作是女同志热线，说是热线，其实就是一个手机号码，有固定的开通时间，由小组里的成员轮流拿着，轮流回复传呼。热线的功能就是陪有需要的拉拉聊天，没有什么心理咨询、培训之类的内容。当时经常会接到骚扰电话，还经常电话两边聊着聊着就产生一段感情，然后我们就流失了一个小组成员，很好玩的……一切都是以爱情为主，工作只是辅助的。

除了杂志和热线，我们也组织一些像拉拉沙龙这样的讨论，最初只有十几个人来参加活动，后来慢慢发展到20多人、30多人。那时候网络不发达，召集活动都是电话通知，到1999、2000年虽然开始有网络了，但还是很奢侈，小组的第一台电脑是那种老老的电脑，大家都不会用，拨号也很麻烦，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上网，也从来没有通过网络召集过活动。我印象最深的是打电话通知拉拉参加活动的时候，她们最在意的不是讨论什么话题，而是有谁会来参加活动。基本上打电话过去说有活动，对方就会问，某某某会不会来参加呀，如果她来我就不来了之类的。因为当时的拉拉圈子比较小，谁跟谁都会有一段往事，大家更在意的是有没有新面孔，或者会不会见到自己的旧情人这种事。没有办法我们就经常连哄带骗的，跟她们说有一个新人来啦，或者骗她们

说某某某不会来了，她不来你就来吧之类的。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找人来参加活动是很麻烦的。

北京姐妹和女性主义者的联系还比较近，我也会去参加一些讨论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的研讨会。当时女性主义者对女同性恋的接纳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最初那些女性主义者对女同志群体是不了解的，我就去参加她们每年举办的“全国女性主义研讨会”，在会上发言，给她们看我们的杂志，慢慢地跟一些女性主义者私底下也有了交往，她们对拉拉的态度也就慢慢的在改善。虽然说女同性恋和女性主义者在国际上也不是完全紧密合作的，但是从社会上接纳女同性恋的程度来看，女性主义者相对而言应该是最好的。

我们在小组运行过程中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人事问题呀，矛盾呀，首先就是人员流动频繁。经常某个工作做着做着就没动静了，一个志愿者可能因为工作调动、或者谈恋爱去了，或者有什么别的事情，她的工作就停下来了，有些时候我都不知道，就觉得某项工作怎么拖了这么久还没弄好，才知道她已经不做了。所以像杂志之类的工作就停停做做，但是断断续续的还是一直做下来了。



“从我个人来说，因为他们已经明确告诉我‘我已经在黑名单上了’，如果我再做任何工作其实都会给女同志带来更糟的压力、或者影响，从那以后我就逐渐淡出了。”

想要筹备这样一个艺术节，最初的想法是我们女同志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艺术才能，希望能尝试着向社会发出声音，让社会知道我们，我本来觉得艺术是一个很中性的东西。艺术节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邱仁宗教授支持我们搞的，挂的是社科院的名，我们筹备了有半年多，计划是在2001年的五一期间举办。因为只有放长假的时候外地的女同志们才有空来参加活动。

会议地点是在一个酒店里，有点像那种大学、医院的招待所，有专门的会议室。5月1号那天，来参加艺术节的女同志都已经入住了，我在外面办事，艺术节的议程当中有一项是酷儿时装秀，场地是租的北京唯一剩下来的一个城楼，我正在交场地费的时候接到电话说国安大队冲进了我们住的地方，我马上就赶回了酒店。当时的气氛非常紧张，在场的所有人都要出示身份证，搜我们的电脑，把文字资料全部拿走。招待所用一个什么借口就不让我们住在那里了，所有的人临时搬到三里屯的一个青年旅社，整个活动就流产了。

第二天，公安局的人来了，把我们后来住的三里屯青年旅社的二楼整个封锁了，他们不让任何人进出，警察把我单独叫去审问，明确说他们一直在监听我的电话，只是我自己不知道。我当时跟他们说，如果不让我们办艺术节你们就早点说，不要搞成现在这样，来了这么多人，我还要照顾他们吃喝拉撒，又是在五一节，也不可能很方便地买车票让她们回家。当时出动的是国安大队的国安一队，他们是专门抓法轮功的，那时候抓法轮功抓得很厉害，那个队长非常横，他对我说你要是不老实，我随时可以把你以法轮功的名义抓起来，你就消失了，没人敢查你去了哪里。审问的时候他私下对我说国家的态度是，你在家关起门来想干嘛都行，都是个人行为，但是你们不能搞集会，因为我们艺术节除了自己的活动还邀请了一些社会上的女性主义者、性学家之类的人，警察并没有提到国家对同性恋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只是说这种集会是不允许的。

在做艺术节之前我完全没有想到国家会来管这个事情，从召集人的角度讲我是有责任的，我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国安大队一早就在监听我的电话，但是开幕之前没有任何干涉，完全是突发行动。对他们的行为我非常愤怒，第一天他们穿着便装来搜我们、抄身份证，第二天穿着制服包围我们，囚禁了我们24小时，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完全是不合法的。我当时还是比较冷静的，我本身在外国媒体工作，认识很多大使馆和外国媒体的人，如果我有过激行为的话，他们会很难看的，太过分了，在三里屯那么有国际影响的地方就把我们包围了。

之后那些来参加活动的女同志都陆陆续续回家了，国安大队还一直有人跟着我，把我的Email也关掉了，我在北京姐妹小组的工作就不得不停掉了。从我个人来说，因为他们已经明确告诉我“你已经在黑名单上了”，如果我再做任何工作其实都会给女同志带来更糟的压力、或者影响，从那以后我就逐渐淡出了。此后我的雅虎邮箱一关就是六年，这期间我只有去外国旅行的时候可以上去看一看，回国内就上不了，到2007年的时候Email才又恢复正常，大概国安大队觉得我已经老实了。

这次事件对拉拉社区的打击非常大，当时有来自香港、台湾的拉拉，她们都吓坏了，大概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件。其他地方的拉拉也非常害怕，大家都出示了身份证，对女同志来说这是很严重的事，我们艺术节的组织者都不知道她们的真实姓名。审问我的人还公开威胁说要告诉我的父母，我当时好像是说了“不要把我往绝路上逼，要是那样的话大家都豁出去了”这样的话。他们也没有真的通知我父母，他们也知道这个说了又怎么样呢，只不过是父母很着急很难过什么的，把我逼急了反而麻烦。我记得小组有一个成员，是个北京的女同志，她的拉拉名叫做“张艺芳”，是个会计，我们的钱都在她那里。公安、国安来了之后，她当场站出来指责我是国安派来的，说我搞这个艺术节就是为了把中国的女同志一网打尽，说她要跟我决裂，然后就拿着我们的

钱走掉了。这件事情比国安大队对我的打击更大。但是后来也想开了，她的行为我也可以理解了，因为她是北京人，在一个国营单位的团委工作，她当时应该是很害怕才会这样的。

艺术节之后我跟原来一起做小组的这些人都很少联络了，我也很自觉，基本上不会出现在这种场合。北京姐妹的几个比较核心的成员，一个叫海底的树，后来去了广州，做了几期网络版的、电子版的《天空》，之后就没有联系了。再有就是刚刚提到的张艺芳，当时她拿着钱走了之后曾有台湾的女同志去跟她谈判，让她把钱交出来，后来就再没有听说过她的下落。

现在我还是自由职业者，和拉拉社区的工作已经没有什么接触了，偶尔有联系也只是把我个人收藏的图书捐给她们呀，或者她们请某个明星来的时候我去看一看、听一听之类的，没有再参与任何社区的工作，至于以后会不会想再参与这些工作我也不知道，目前是没有这种想法。

（本文访谈于 2010 年 6 月）

蔡一平：

探索第三世界 女权运动

整理 / 柯晓，访谈 / 柯晓，Rebekah

蔡一平——女性主义学者，性别专家。

目前是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DAWN）执行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妇女报记者、编辑，妇女国际文体部、妇女专题部副主任，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策划，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研究中心）传媒分项目负责人，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国际妇女研究室副研究员，ISIS 国际（伊希思国际妇女组织）执行主任等。曾在 90 年代女性读书小组活动中接触过 Kim 等女同志，肯定并重视女同议题在女权主义中的地位，倡导女同权益与性别平等。



蔡一平，女性主义学者

从世妇会开始——“世妇会对中国的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还是留下了很多遗产，一个是对学术界和妇女研究界，另外一个就是妇女组织比较活跃，我也有幸参加了一些活动。”

每个人，尤其是女性，在大学的时候也都会思考自己人生，思考自己作为女人的意义和价值。我认为我自己对个人的理解和对女性的理解是分不开的，也可以称作是一个 Organic（注：骨子里的）女权主义者吧。我是通过大学阶段的学习开始接触妇女研究和女性主义的，我在北大历史系学了七年，研究生我读的是妇女史专业方向，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次招妇女史方向的研究生。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学术领域，当然那时国内还没有很多学者研究这个领域。

我自己本身没有学新闻学，我的教育背景是历史学，加上妇女研究、女性研究，由于自己的兴趣，所以我到了中国妇女报。我在妇女报的第一份工作是做编辑，当时我编的版面叫做“妇女论坛”，是一个理论版。这个版于 1994 年创办，我 1995 年研究生毕业便接手了，一直编到了 2001 年。我编这个版的时候，主要是介绍一些国内外的妇女学成果、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的动态。

当年正好是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举行，妇女报也派了很多记者去报道这个会议。但我并不是作为记者参加这个会议的，我是作为 NGO（注：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当时北大妇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了一个“中国妇女的历史文化”论坛，我以这个论坛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世妇会。

会议之后，我邀请了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刘伯红老师撰写一篇文章介绍非政府妇女论坛的情况。她也是 1995 年世妇会非政府组织论坛（NGO Forum）的组织部副部长，所以她对整个论坛的情况非常了解。当时 NGO 这个概念在国内也很新，也是第一次办这么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当时我请她撰文介绍妇女非政府论坛

的一些情况，准备发表在“妇女论坛”专版。她是一个非常会写作的人，那篇文章写得非常好，既有可读性又有理论性，虽然比较长但是我也舍不得删减。由于报纸篇幅的限制，我决定把她的文章分为几次发表。其中有一部分很客观地介绍了国外的非政府妇女组织，内容很有启发性。这一部分有一节介绍了来北京参加会议的国外的一些性工作者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女同志的非政府组织，介绍了她们的一些观点和活动。我觉得整篇文章信息量很大，很多东西以前都是没有接触到的，我个人觉得是篇很好的文章，不然我也不会编发。中国的报纸也不是我想发什么就可以发，因为我们的领导——部门主任、值班的副总编也要签字的。这篇文章通过了层层领导阅读而见报了。我们妇女报的领导是很有经验的媒体工作者，也都是中国妇女运动中的活跃分子。

但是文章发表以后，却引起了麻烦，那就是来自“新闻阅评小组”的批评。我没想到他们会认为这篇文章不好。当时我很紧张，刚毕业的小姑娘就出这么大的娄子，受到批评总是不好的。不过我们报社的领导还是很开明的，也很爱护我。她们承担了责任，而没有狠狠地批评我，甚至也没有让我写检查什么的，就是口头跟我说了一下。我当时其实并不明白这篇文章到底有什么问题。我后来才知道新闻阅评其实很多情况下也是评论者个人的看法。针对这篇文章来说，阅评小组的评论只是笼统地说：发表这样的文章“不合适”，却没有说出来为什么不合适。我现在想来，这证明他们也只是一种观念上的不能接受。这和他们对这些事情的理解有关系，当时是九十年代中期，可能是他们觉得介绍性工作者、女同志是不合适的。当时中国主流媒体中确实很少看到相关议题的报道，至少在新闻领域谈论这些还是个禁忌。

世妇会对中国的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还是留下了很多遗产，一个是对学术界和妇女研究界，另外一个就是妇女组织比较活跃，我也有幸参加了一些活动。比如说，在中国开始了妇女学的学科建设，好多高校的老师开始讨论怎么把妇女学、性别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引入到知识领域中，翻译介绍了很多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和著作。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妇女史，我也感兴趣，也参加了一些译介活动，翻译了一些文章，比如妇女史研究的方法、理论等等。其他的学科比如说教育学、社会学也都是九十年代以后开始引入性别研究。



2016 年 蔡一平接受联合国电台专访



1995 年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

2016 年 3 月 蔡一平（左一）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何以思考中国——“最开始迈出国门我去的都是比较发达的地区，……都是所谓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或者是最富裕的国家，但是他们的制度是那么的。”

我起初接触的主要是一些学者，其实当时我对女性主义的理解是很肤浅的，都是书本上来的，没有什么亲身的体验，尤其是没有和当下的中国妇女有深入的接触。我觉得做记者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接触中国不同阶层的女性，有学者，有官员，还有基层妇女干部、农村妇女、打工妇女等等，这些让我对中国的情况有一些了解，所以走出学校真的很重要。另外，我 1998 年走出国门以后陆续去过很多国家，在不断地游走中，对中国的妇女学和妇女运动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同志的议题我确实是通过亲身接触才慢慢有所体会。1998 年初，那是我第一次出国，我参加了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20 世纪中国妇女和工作”的一个研习班，是以研究中国的妇女问题和性别问题著名的美国汉学家贺萧所主持的。中国有几个学者分了几批过去访学，我们主要是和当地的学者进行交流，他们也给我们请一些教授做讲座交流，我们这一批去的有李银河老师、刘伯红老师，还有一个上海社科院做近代妇史研究的老师。当时在加州的王政老师还给我们做翻译讲解。在圣克鲁兹的时候我有幸聆听了一些很有名的教授的讲座，和他们交流讨论，其中有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我们的崇拜偶像。不得不说，她这个人太睿智了，哲学家的思考太敏锐了。还有盖尔·鲁宾（Gayle Rubin），他们的书后来在中国都是很有影响力的。面对面的交流和读书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接触的很多女性主义的学术，主要是介绍“社会性别”（gender），“性”（sexuality）的概念也会介绍，但是介绍得特别少，我自己也没有特别关注过这个问题。我自己对 gender 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当时认为 gender 主要是社会维度的，基本上我把 sexuality 和 gender 割裂开来了。我主要考虑一些社会的问题，没有考虑到性的问题对女权主义学术这么重要。第一次听这些人讲，才发现“性”对于女性主义是这么重要的

议题，她们的分析很有力量。当时，我的人生的阅历也有限，我不觉得我能完全明白。美国的贺萧教授撰写的《危险的愉悦》，还有好几个挺有名的汉学家，他们用的是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因为我大学刚刚毕业，对于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感到耳目一新，中国历史研究很少用到这些方法。当时我非常受启发，感觉“哦，原来中国的妇女历史、性别研究也可以用这些方法”。

除了这些理论上的学习和影响，更多的是生活上的感悟和触动。比如我们在加州所接触到的一些学者，就是已经出柜的女同志学者，还有在那儿的一些生活体验。比如说我第一次去旧金山，第一次去著名的 Castro 街，那里是著名的同志集聚的地区。那里以男同志为主，我看到的女同志很少。我觉得这些人怎么这么不一样呢，因为在中国我以前也没有接触过出柜的男同志，我当时并不知道应该反思社会对同志群体的歧视，而是觉得他们是他们，我们是他们，井水不犯河水就行了。但是在那个特定的街道社区，我是一个“外人”和“他者”，感觉那里的人们不太友好，我自己也很不自在。但其实人家并没有做什么，只是我自己心理上觉得误入了不属于自己的领地，不太舒服。当时那种感觉我觉得特别奇怪，可以说 1998 年初的那次访问是我第一次，从学术理论上接触到性的理论，也是在生活实际中接触到同志群体。当然我其实并没有真正进入到那个领域和空间，我只是在边缘张望了一下而已。但是，在那之后我觉得我整个审美观，还有我的世界观，都发生好多变化。我以前的审美观是非常古典主义的，比如莎士比亚就应该是莎士比亚，就应该是那个时代的台词和服装，我才能欣赏。但是后来我就开始学会了欣赏一些不循规蹈矩的或者颠覆性的东西，比如新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迪卡普里奥主演的，那里面的罗密欧有一个易装的朋友，还是个黑人。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但是人物形象、穿着

打扮都不一样了，生活在现代社会了。如果是在以前，我绝对不能接受这么亵渎我的莎士比亚，因为我是学历史的，带有一种对经典的盲目崇拜，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特别能接受和欣赏这些挑战的、颠覆的、改写的东西，因为它们包含着很多我们当今的思考和批判，也更加丰富、深刻和贴近。比如除了这个颠覆莎士比亚的，还有《天鹅湖》，原版是非常经典、优美的王子公主的爱情故事，后来有一个男性版的《天鹅湖》，其中有表现同性爱、虐恋等等等等，我觉得那个也非常精彩。

学历史的可能会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学宋史的觉得宋代最伟大了，学唐史的觉得唐代最好，说实在的，如果你不爱你所研究的这个东西你也难以深入研究下去。但是也会慢慢养成那种“天朝大国”心态。走出国门以后就

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脉络；女性主义也是这样的，所以出国的经历也丰富了我对女性主义的理解。最开始我去的都是比较发达的地区，98 年一次去美国，一次去瑞典，包括 2002 年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了一年，我去的都是所谓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或者是最富裕的国家，但是他们的制度是那么的。西方的女权主义本身就有批判精神，反对白人中心、美国中心，但毕竟也有其局限。比如我觉得美国的自我中心文化已经非常深入，那里的妇女学的课堂上主要讲美国妇女的经历，或许也包括了美国欧洲裔之外的拉美裔、非洲裔、亚裔妇女的经历，但还是很少去看看亚洲本土或者拉丁美洲土地上的妇女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或者还是从美国的视角去看世界的其他地方。



2016 年 9 月蔡一平在 AWID(全球女性发展权益协会)2016 论坛上就“‘大数据’对性别平等和妇女权益意味着什么”进行发言

2016 年蔡一平在 AWID 论坛

缺席的女同志理论家——“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出现女同志自己的理论家来写女性主义理论。西方很多女性主义理论家都是女同志理论家。在中国，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看到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女同志理论家来写女同志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

1997、1998 年，国内进行女性主义学术和学科建设的时候，女同志还有异性恋的议题被介绍过来了，而且每次讨论都很热烈。从中国对于女权主义的译介就可以看出兴趣点在哪儿，最早介绍得都是一些西方女权主义的流派，比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自由派女性主义等等，其中还提到一个“女同志分离主义”¹，已经把女同志放到介绍理论里面了。

国内女同志活动家中我比较早接触的是 Kim，当时认识她是在邱仁宗老师主持召开的一个女性主义学术会议上。邱老师有好几年的时间内都在主持女性主义这些和伦理学议题的学术会议。因为我是编辑记者，有这方面的优势，可以去开各种女性主义学术的会议，认识一些作者，完成约稿。我记得有一年的内容涉及到了女同志，他请了 Kim 过去做发言，记得还有另外一对女同志伴侣介绍她们的故事。当时会议日程上写着这个单元叫做“女同志现身说法”。初看我也是觉着新奇的，没觉得可乐，毕竟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了解女同志活动家，当时 Kim 说，看着题目就挺有意思的，什么叫“现身说法”啊，像狐狸精现形似的。我初看确实是有猎奇、围观的态度，感觉特别新奇，她讲的具体东西我都不太记得住了，但我特别有感触。尤其是做学术研究，就感觉别人都是“现身说法”，自己在后面观察，有一种权力关系在里面；做记者的时候，我也经常是让当事人来“现身说法”。但现在我觉得凭什么让人来讲自己的经历？人家凭什么给你“现身”呢？我在后来的工作中，比如做记者、做培训，一直也在反思，在很多情况下真的很难不把别人当成一个对象。

后来我还参加了两个读书小组，一个是女性主义的读书小组，读女权主义的书，荣维毅老师组织的，还在冯媛家读过几次，也在 Kim 家读过。但是我记不得这是同一个读书会还是两个读书会了。女权主义的读书会主要

读女权主义的书，从特别早期的著作开始读。但我属于那种围观型的，也比较懒惰，所以有这么一个活动我觉得是挺好的，对自己的学习也是个督促。

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出现女同志自己的理论家来写女性主义理论。西方很多写女性主义理论家都是女同志的理论家。在中国，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看到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女同志理论家来写女同志理论。我就觉得这也是挺遗憾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评论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女同志的理论家？比如说女同志在中国妇女运动里、女同志的理论在女权主义发展理论里（都没有），因为中国的妇女解放理论还基本上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没有这个（女同志的议题），所以中国目前主流的妇女理论里面没有女同志议题的位置。

我觉得自己对同性恋议题、异性恋霸权的认识还是挺浅薄的，我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有一点我很坚定，我坚持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而女同志议题在女权主义中是很重要的议题，而且我也特别同意在整个同志运动中确实存在着性别的不平等或者性别权利关系的不平等。比如我在菲律宾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组织 Isis International（伊希思国际妇女组织）就对菲律宾的妇女运动对于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的看法和态度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女同性恋、跨性别或者双性恋在同志运动和妇女运动中都是很边缘化的。所以我觉得女权主义者尤其应该重视女同志的权利和参与，因为她们处于同志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双重边缘，我觉得这个不合适，应该加以改变。而且我觉得一个运动，如果没有把最边缘的人纳入到运动中，就不能说是成功，不能说是把大多数人解放了这个运动就成功了，只要有一个人还没解放，你这个运动就没成功。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与女同志运动的联合——“我自己反思，中国的对外交流，特别是女性主义的对外交流，仅仅局限于欧美，甚至只是美国，对于广大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遗产或者或理论我们了解太少了，这也是我决定去菲律宾工作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我去菲律宾工作是 2008 年底，我放弃了在国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一个“铁饭碗”，还是一份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工作。我当时知道我会失去什么，比如说职业稳定感和社会保障、事业单位的福利等等，但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的。因为我觉得在中国如果不深入了解第三世界的经验的话，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我们翻译的东西大都是美国的，欧洲的都很少。为什么我觉得西方的东西不能拿来用呢，因为我觉得它形成的历史语境是不同的，虽然表面上关注的议题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深层背景和历史发展脉络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自己反思，中国的对外交流，特别是女性主义的对外交流，仅仅局限于欧美，甚至只是美国，对于广大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遗产或者或理论我们了解太少了，这也是我决定去菲律宾工作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2004 年在泰国曼谷召开的北京 + 10（北京世妇会 10 周年回顾）亚太地区非政府妇女组织论坛上我接触到这样一个国际妇女组织——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组织（DAWN），这个组织是一些第三世界学者和妇女活动家组成的。它在理论上很有建树，从第三世界妇女的视角对主流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批判。它把发展领域看得很宽泛，包括经济、政治、环境和性和身体，以及各因素和议题的交叉关联。2007 年，我又参加了他们主办的一个亚洲地区的女权主义培训。之后，从这个组织的一位成员得知办公室设在菲律宾的另一个国际妇女组织 Isis International（伊希思国际妇女组织）正在找人，问我要不要去。这个女权主义组织成立于 1974 年，是一个很有历史的组织，95 世妇会我就听说过它了，因为他们一直致力于媒体和传播，出版杂志和简报，免费提供给世界各地的妇女组织，特别是草根的妇女组织。

我记得特别清楚，与 Isis 的主席和理事会成员只谈了就一会儿，她们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说决定要我。记得当

时他们面试我的时候问过一个问题：“性取向这个问题作为女权主义组织来说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议题？”“那当然重要了，太重要了！”我毫不犹豫地就这么回答了，“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的那不是女权主义者。”后来我听说这是他们决定要我的很大一个原因。

我去菲律宾的主要目的，一个是通过亲身参与，了解第三世界女权运动，他们的理论和方法；第二是看看国际妇女运动如何可以借鉴到中国的妇女运动中去。

我在 Isis 担任执行主任。Isis 是个女权主义组织，并不是一个同志组织，但这个组织里有一半以上的工作人员都是女同志，这个组织之前的主任也有女同志或者双性恋。而且这个组织的很多工作，比如研究课题、出版的杂志等等，都是把女同志、双性恋和变性者的权利放在很重要的地位，这是组织的一个很重要工作内容。作为一个女权主义组织，把性取向放在这样重要的位置上好像还不多。我们非常愿意做一些不同社会运动的跨界对话，比如在环保运动中怎样发出女性的声音，比如在同志运动中怎样有女性的视角，妇女运动中如何反思和挑战异性恋霸权把性取向的议题纳入进去，等等。

经过了两三年的“上山下乡”，我还是决定结束在菲律宾的工作，想把这些年学习和积累的东西带回到中国做一些事情。虽然在国外也一直关注国内的女权运动，但是毕竟人不在国内，很难直接参与其中。

我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我一直和中国妇女学界保持着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来是作为记者，一来是作为 NGO 的一员，我觉得身份的多元化能带来多元的机会跟很多不同的圈子建立联系。中国妇女研究也好，妇女运动也好，真正能和国际妇女研究、妇女运动接轨的

1. 女同志分离主义（lesbian separatism）是美国女权主义运动中“分离主义”的一种，强调切断与男性和异性恋主流社会的联系，拒绝从男权社会中获利。



蔡一平（右）在中国民间社会性别网络（二期）项目网络年会

机会还是很少。第三世界的妇女运动在我看来，是需要以草根、社区、基层妇女经验为中心，像菲律宾这种国家，它本身也是等级社会，很多妇女活动家都是来自中上层社会，我觉得第三世界妇女运动特别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如何让大部分的妇女经验和诉求得到表达和回应，特别是社会下层和边缘的妇女群体的权利和需要作为出发点。

另外我觉得第三世界妇女运动特别注重去分析整个世界的结构性的体制性的不平等关系，比如对霸权主义、军事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所带来的后果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因为这些正是当下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事实，而不仅仅是过去的事实。虽然直接把男人和女人卖为奴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对妇女的身体和心理的殖民化，对妇女的性与生育的控制，对妇女的生产力及再生产的剥削，仍然阴魂不散。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妇女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中国妇女运动的状况也引起很多探究的兴趣和关注的目光。我们今天就是生活这样的注视和关注中。我觉得第三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的妇女运动和女同志运动来说是很有启发意义，我们在这样的交流互动中应该采取更加主动积极的姿态，并且做出自己的贡献。

（本文访谈于 2011 年 3 月）

荣维毅：

男女平等到 多元性别平等

整理 / Rebekah，访谈 / Rebekah、柯晓

荣维毅——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原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

主要从事社会性别平等研究、倡导和培训；关注妇女人权与权益保障、社会性别与警察执法等问题；关注同志议题，长期参与女同社区的相关活动。



荣维毅，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

从男女平等到性别平等——“有人以为，作为女性，是因为你受到压迫了才去反抗；你关注同性恋，是因为你是同性恋你才能感觉到同性恋的不平等。其实不完全是这样。你可以通过学习、知识、经验等途径理解这些问题。”

1982 年我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分到中央人民警察学院（即现在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编者注）教哲学。在讲授哲学的过程中，需要理论联系实际，我更多的是联系妇女问题和与性别相关的议题。我在给学生开设的美学选修课中，也是和审美中的性别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我还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课，也是比较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理论。我还在学生中做过一些有关性别观念的调查，尽量把我关于性别平等的理念融入到教学过程中。

（作为女性）我从个人的角度，在后来遭遇 55 岁被迫退休以前，并没有遇到特别多的明显的性别压迫。我的“性别觉悟”，更多的是靠学习和思考获得的。有人以为，作为女性，是因为你受到压迫了才去反抗；你关注同性恋，是因为你是同性恋你才能够感觉到同性恋的不平等。其实不完全是这样。你可以通过学习、知识、经验等途径理解这些问题。在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对社会不公的感受，更多是来自政治方面。以前中国特别“左”，例如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出身不好”的人，或说了所谓对党不利的话，就有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危险，会受到不公正待遇。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对所有的不平等比较敏感的一个出发点。我不是同性恋，但是关注同性恋问题和妇女问题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两者共同的背景应该说是普遍人权和平等的关注。

20 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有一句口号，叫做“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女同志也能做到”。当时我们所理解的男女平等就是“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到了八十年代，很多原来以为不存在的性别问题出来了，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企业优化组合，使大批女工下岗；在农村，生活好了一点后，妇女不下地干活儿了。于是，80 年代有了关于“妇女应不应该回家”的讨论，解放了的妇女重新面临解放问题。这也是一个客观的原因，让你去关注妇女问题。

1986 年，北京市妇联成立了妇女理论研究会，在北京日报上发了一个关于妇女理论的征文通知。作为应征，我写了第一篇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试论大龄女性的婚姻问题》。当时社会上关于女性的婚姻讨论挺多，好

像大龄女性不结婚是个多么严重的问题。那时我不懂什么叫女性主义，也不懂性别平等，但是我觉得，讨论女性为什么不结婚就是一个问题。我在那篇文章中呼吁，结婚或不结婚、什么时候结婚，都应该是女性的自由。我对这种讨论的反应，应该说是天然的直觉，从哲学角度来讲不是自觉的。只是直觉上认为，把大龄女性的婚姻问题看得那么重要，迎合了传统文化对妇女身体的控制，即把女人看成是生育机器，过时就不好用了。刘伯红也参加了那次征文，我们都得了二等奖。由此，我加入了北京市妇女理论研究会，参加了一些活动。1999 年底，又加入了全国妇联办的中国妇女理论研究会，就这样进入了妇女理论研究的圈子。当时还是讲妇女解放、妇女理论，男女平等，后来接受了社会性别观念，逐渐认识到社会性别平等（简称性别平等）是比男女平等更科学的概念，内涵更深更丰富，于是，行动目标从争取男女平等变为性别平等。当然，根据不同场合和对象，男女平等这个词汇仍会使用。

我最初接触社会性别概念是在 1999 年初。1998 年，在联合国开发署驻华代表处支持下，北京的一些女性主义学者编了一本《社会性别与发展培训手册》。该手册的最大亮点是用参与式方法介绍社会性别概念及相关理论。1999 年 1 月，参与编写手册的冯媛和杜洁及手册资助方代表葛友俐来到红枫妇女热线，为志愿者做社会性别意识培训。我作为红枫志愿者参加了那次培训，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社会性别概念和参与式培训方法。

王行娟老师主持的红枫妇女热线是我最早参加的妇女非政府组织。红枫妇女热线是 1988 年 10 月成立的中国第一家以研究妇女问题为主要方向的民间妇女组织——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简称妇女所）于 1992 年 9 月开通的中国大陆境内第一条妇女热线。1996 年 7 月，妇女所改称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简称红枫）。1996 年我开始在红枫做志愿者。虽然红枫是为妇女服务的，但开始也缺乏性别意识。比如，有妇女来电话咨询问：我老公外面有人，我离不离婚呢？咨询员如果没有性别意识，就会说“你不能离婚，那样的话，你多亏啊”。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1999 年 4 月，在红枫和北京医科大学心理咨询与培训治疗中

心共同举办的 ’99 北京国际心理咨询热线研讨会上，我提交的《妇女热线咨询中的性别视角》、《女性性心理咨询社会性别分析》两文，都是围绕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概念与热线咨询这一主题，倡导在妇女热线咨询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

2001 年 7 月，在王行娟老师的支持下，我对红枫妇女热线督导做了一次为期二天的“女性主义、社会性别”参与式培训，效果不错。直到现在，红枫每次对新咨询员的培训和专题培训（如反家暴咨询培训、性问题咨询培训）中，都要加入社会性别及其在热线咨询中的应用等内容。这反映了社会性别概念和分析方法已经在为性别平等而行动的妇女非政府组织和女性主义学者中得到较广泛的认同。

1999 年 3 月底至四月初，我参加了《社会性别与发展培训手册》编写者在北京做的一次累计为期 8 天的培训，这次培训后成立了“京津社会性别与发展协作小组”（简称京津小组），小组的宗旨是通过参与式社会性别培训，促进社会性别主流化，促进男女平等，促进妇女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通过对各級妇联干部，公检法司等国家机关、传媒、教育、卫生、健康、扶贫项目等各类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管理人员、领导干部和参与者进行社会性别培训，促进各类人群提高社会性别意识及各项工作的社会性别主流化。2000 年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成立时，京津小组作为整体加盟，参与了对反家暴网络工作人员及合作单位人员的社会性别与反家暴培训。我参与了其中的很多培训。因为在公安大学工作，我也一直比较关注警察执法中的性别问题，参与了全国很多地方对各级公安机关民警的反家暴培训。

作为京津小组成员或个人，我还参与了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原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等妇女非政府组织承担的有关项目的培训、调研等活动，主要涉及反对各类性别暴力、农村妇女发展等议题。以上活动，促使我不断加深对社会性别概念的理解及应用，也与一些妇女组织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2004 年 3 月，荣维毅在央视《百家讲坛》“女人说话”节目上主讲



2005 年，荣维毅于一女性主义沙龙

从性别平等到多元性别平等——“我最初关注同性恋议题，与参与妇女运动和妇女理论研究有关，时间上也几乎是同步的。”

在红枫妇女热线，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性问题专家咨询热线”值班，经常接到有关同性恋、跨性别问题的咨询。为此，我在热线业务研讨会上做过如何接听关于同性恋来话的辅导。根据自己在红枫妇女热线咨询的经验，曾应邀写过一篇文章《酷儿理论与社会性生活实践》（《百花洲》2001年1期）。

我最初关注同性恋议题，与参与妇女运动和妇女理论研究有关，时间上也几乎是同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邱仁宗先生，是中国大陆比较早关注同性恋人权和女性主义理论传播的学者。我参加过邱先生组织的一些研讨会。万延海可能是通过这些会议知道了我的通讯地址，1995年下半年我收到过他的一封信，知道他在做关于同性恋权益工作。当时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了解同性恋，但在本能上觉得应该支持他，所以给了一点小小的捐助。他告诉我，1996年张北川要在青岛召开一个关于同性恋的会（后该会推迟以至流产——编者注），于是我给张北川写了封信说想参加，这样就跟张北川先生联系上了。

张北川那时正酝酿编一本《朋友通讯》杂志。我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它的整个过程，1998年2月份出了第一期，我和刘伯红都是它的顾问。（一开始）我也有压力，我不是同性恋但是关注同性恋问题，人家可能觉得你有什么问题，你研究这个问题你就是另类，因为这个问题在当时确实难登大雅之堂。现在对女权主义者来说，关注同性恋问题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性别歧视和性倾向歧视是密切联系着的。可是在1998年最开始的时候还不是这样认为，讨论同性恋问题还是很敏感的，即使在女权主义者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

其实，我跟女同志个人的接触还早一些。最早接触的是Kim、石头等人。1997年7月的一日，我和丁宁到位于北京西城六部口的柠檬树咖啡屋，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同性恋酒吧活动。记得石头是剃了个光头去的。大陆的

女权主义者和女同性恋者最早的结盟源于东西方小组。东西方小组活动停顿后，在Kim的建议下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我参加了这个读书小组，成员有冯媛、丁宁、吕频等，还有石头等一些女同志。记得我们到Kim在建德门牡丹园房子里活动过几次，在一块儿讨论过李银河翻译的《酷儿理论》、美国女性主义者凯特·米里特的《性政治》等。后来读书小组改名为“社会性别读书小组”，增加了一些新人，活动断断续续持续到2009年，但自从2001年Kim组织的中国第一届女同志文化艺术节流产、Kim消失了以后，好像就没有女同志参加了。

2004年，安可找我和郭建梅等人讨论女同志的活动。2005年我参加了安可主持的拉拉沙龙开张活动，也参加了2009年11月拉拉沙龙女同发展论坛暨北京拉拉沙龙五周年活动和2012年12月拉拉沙龙八周年庆活动。其实，我对拉拉沙龙起不到实质性的帮助作用，但好像是一种道义上、精神上的支持。所以，只要找到我、通知我，我肯定会参加的。

我比较深入接触的女同志是1998年10月初在北京中关村乡谣酒吧召开的“中国女同志全国会议”上认识的一个东北女同志。她是个结了婚的女同志，应该是双性恋，是个比较能干的人。我们通了较长时间的信，她跟我说很多工作上、生活上、情感上的问题，是那种能够有些真正的个人心灵感受的那种交流，她自己的生活经历啊，她自己的感受啊。但时间长了，慢慢断了联系。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心里有障碍，或者是我的个性问题，没能保持联系。

对女同志的权益保障，我没有做过实务工作，但因关注这个问题，参加过一些讨论，写过一些文章，做过项目支持和培训等。所有这些都是倡导性倾向及LGBT人群的人权和平等，在做这些事情中也提升了我自己对多元性别问题的理解。



2014年8月，荣维毅（前排左二）在妇女热线22周年纪念会上



2016年3月，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志愿者联谊会



2014年11月，荣维毅在“网易女人”频道上



2016年，“欧洲与中国性暴力状况与应对”主题论坛上

2014 年，同语《中国性少数群体家庭暴力研究报告（第一版）》



北京拉拉沙龙／女同志中心



2007-2009 年同语在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支持下，开展了《女同（双）性恋者家庭暴力状况调查及反暴手册编写》项目，我参与了该项目的一些讨论，并为项目报告写了序言：《促进反对性别暴力运动的扩展与深入——〈中国女同（双）性恋者家庭暴力状况调查报告〉序》。2012 年在 4 月 22 日，为 les+ 志愿者工作坊做“拉拉与女权”培训。总之，这些年来，在倡导多元性别平等方面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

“怎么继续更好的存在，那就得做点事儿。”

过去，当社会不认识同性恋问题的时候，只能通过呼吁啊，什么联谊啊，什么酒吧啊，来表现我的存在。现在人家已经知道你的存在了，那你怎么继续更好的存在，那就得做点事儿。这也不是说以前怎么不好，它是一个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阶段。

可喜的是，中国大陆的 LGBT 运动发展到现在，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女同社区通过开展能力建设、以社区需求为本开展调研等行动，使权力意识、组织建设、研究和倡导能力等方面都有长足发展。如同语做的女同（双）性恋家庭暴力调查项目、参与 11.25 反暴力行动；粉色空间性文化发展中心做的“同妻”支持项目等，都对促进边缘妇女群体融入反对性别暴力主流、推进性别平等和性倾向平等进程有积极作用。

近年来，更加年轻的有行动力的拉拉的活动引人注目。仅 2012 年，主流媒体上就出现了由她们主导发声的一波一波的女权事件，如占领男厕所、反对职场性骚扰、反对地铁性骚扰、反对高考招生歧视、现场声援李阳家暴受害者 KIM、促进反对性别暴力万人签名等。

我相信，无论男女、无论性倾向、也无论性别气质表现如何，只要大家团结起来，为所有人的平等、尊严和人权保障而行动，未来肯定会更美好。

（本文访谈于 2011 年 2 月，口述者修订于 2013 年 1 月）

1998 年 10 月 30 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欧洲妇女问题研讨会上，刘伯红、我、周华山等中方与会者和丹麦、荷兰、卢森堡等欧盟与会者自发举行了一个小型非正式圆桌会，就卖淫、性、女同性恋问题进行了交流。这次交流使我更明确了：女同性恋是女性主义的同盟军，是女性主义理解自身理论与实践的参照系。这是我作为女性主义者始终关注和参与女同志活动的内在驱动力。

1998 年 11 月在邱先生主持的《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哲学学术研讨会》“同性恋专题讨论”中，我在发言中谈到同性恋研究至少有三层意义，一是社会平等、民主、进步的体现；二是为异性恋、特别是女性主义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三是为人们深刻理解人性，特别是女性性欲望与性满足方式提供了参照系。

我非常赞同李银河在《同性恋亚文化》中谈到的同性恋现象对人类社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它提示了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它提示了超越性别界限的可能性；它是所有边缘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及话语权力的挑战。另外，我觉得中国女性主义内部对同

性恋的认知是有差别的，因此女性主义的内部讨论也十分必要。

1999 年 10 月在邱先生主持的《“面向 21 世纪的女性研讨会”——女性主义者与女同志之间的对话》会上，我以《平等，女性主义和女同志的共同追求》为题的发言，表达了几层意思：其一，女性主义与女同志两者虽然不能完全划等号，但有很多共同之处，争取性别（包括多元性别）平等是两者的共同目标，沟通是的两者的共同愿望；其二、女性主义与同性恋的沟通是自我成长的过程，是对自身无意识的恐同和歧视的超越，是加深对女性主义和性别平等内涵理解的渠道；其三，女性主义与女同志有共同的努力方向。女性主义要实际接触女同志，了解她们的生存状况和需求，女同志也需要克服心理障碍，通过各种方式为女同志社区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并以此提升自己。

2001 年 11 月，我为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别防治大会提交的文章题目是《艾滋病防治与同性恋的生活与权利》，在关于同志权利的分会场做了发言。

吕频：

从女权主义 走近女同志

整理 / 齐羽、Trim，访谈 / 典典、齐羽

吕频——独立媒体人。

妇女传媒监测网络负责人，主要从事与妇女权利有关的倡导活动。编辑了基于社会性别和妇女人权观点的独立电子周报《女声》，同时为大众媒体撰写时事评论，传播性别平等的观念。关注女同议题，曾参与北京同志中心、les+、北京拉拉沙龙等同志组织的活动。



吕频，独立媒体人

“你能找到的唯一的思想武器就是女权主义……我不抱有乐观的态度，一切都非常难改变……女权主义是一个政治身份……你不能允许自己保持沉默。”

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中国妇女报》工作，不是一个选择，但这个工作也并不是分配的。那个时候不是一个开放的市场，也没有一个特别公开的信息发布渠道，所以就是一家一家的去拜访。我拜访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是要人的，所以也有一定的偶然因素。

我在那边工作是从 94 年开始，然后就是筹备世界妇女大会的时候，我作为记者，其实说实话没留下多大感受，因为当时很多的资讯很难去理解。我想那是一个不寻常的经历，你在被安排的情况下，闯入一个你不太了解的一个场合。世界妇女大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妇女的会议，有几千人，非常非常的混乱，在怀柔它占据整个县城，没有一个中心的议题，也没有一个中心的日程。我去过外国人的活动，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在那儿有女同的信息，这也不属于我们报道的（范围）。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主要的特点就是要把妇女的劳动能力加入到社会生产当中，他会提出一些妇女权利的问题，但是前提是没有制度改变的要求。妇女一定要凭借自己的超额的竞争能力去加入到这个社会当中，然后证明你自己的能力，能够得到一定的位置。（《妇女报》）有很多这一类的话题，包括哪一个农村妇女，她的文化教育水平比较低，或者说她比较没有钱啊，或者说她的生活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她非常的贫困，但是她努力的奋斗，她终于经营起了自己的一个小生意，终于脱贫致富了。那么潜台词就是，她没有给国家找麻烦。歧视的问题，包括文化当中对妇女的偏见，其实（《妇女报》里）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但是她把它们都混在一起。如果你想成为比较好的记者的话，不想满足只去做一些宣传式的东西的时候，你能找到的唯一的思想武器就是女权主义。

我觉得（在漳县工作）¹ 是一个经验，但不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经验。我觉得在那种极度贫困，就是物质和精神极度匮乏的地方，你唯一找到的希望就是妇女的力量了，不是任何外来的东西、外来的人，当然更不是政府。

那是中国最贫困的地方，那里的贫困是触目惊心的。包括她们的那么的一种男性统治的环境。基本上她们都非常早婚，她们的生活跟大城市的非常不一样，她们可能在 18 岁之前就结婚了，有很多人是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她们（遭受的）是非常严格的一种隔离，男人不允许妇女有自己的社区。她们可能有交流，但是你观察一下，这种非正式的交流完全依赖于正式的一种关系，比如这个人是我的亲戚，是我家族的亲戚，实际上这是依赖于父权制的一个管理制，并不是妇女自己发展出来的关系。比如说我的妯娌，我的嫂子，这都是男性的关系，不是女性的关系，但是女性只能依靠这种关系来去发展，所以亲戚关系是非常主要的，我从来没有听一个妇女说谁是我的朋友，全是说这人是我的亲戚，她们没有（朋友）这个概念。我觉得跟农村妇女在一起工作让我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我对这一切都不是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一切都非常难改变。

其实我没有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因为当时我跟我的一个朋友讨论，为什么这些女权主义者，都特别害怕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理论上她的一切其实都是女权主义的，但她们不允许人们使用女权主义称呼自己。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当时我的一个同事跟我说，你这篇文章等于是给自己贴上了一个女权主义的标签，但是我并没有否认，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身份的政治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她会带来一个动力，我认为有责任把这个标签去公开出来，因为你知道女权主义者算是政治的一个信仰。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你不把这说出来是没有意义的。女权主义者，这是一个政治身份，这是一个政治性的行为，它是应该公开化的。要是你是个女权主义者，你不能否认，你不能允许自己保持沉默，你必须要把它显示出来。而且特别是现在这样一种，对政治行为，政治的这种恐惧和远离，包括人们对这种各种各样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恐惧，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下，你越发的要这样做，这越发的是一种政治行为。

“当你以为你只是为了去把她们吸引到你的话题当中，而去做一些迎合式的策略的时候，实际上你投入了她们而不是她们投入了你。说不定是你被别人吸收和消解了。”

我在那之前（对女同）不是有特别清楚的印象，在 90 年代的时候曾有一些人试图去组织一些交流的活动。当时一些比较活跃的妇女组织，去组织活动然后就有另外一些人参加，也有女同参加，但是她们是女同组织的（人），我记得其中有石头。

我觉得她们是一个我不了解的一个群体。女同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同性恋是一个知识。我想关于女同的知识肯定是来自于女权主义，但是那些东西不会告诉你一个关于女同的真实的生活，只是告诉你同性恋的一些近乎理论性的解释。我认为她们是跟我不一样的人，不是有很强的好奇，可能跟自己的状态有关，可能没有让自己的好奇心表现出来，或者是不允许自己去表现。因为这跟你受到的某一种教育有关系，就是你担心你的好奇可能是会带来一种刺探，所以就不允许自己这么去做。你担心你自己会冒犯别人，你担心有这种想法会（造成）对别人的一种冒犯，但是这个是潜意识的，其实可能没有什么机会，因为并没有人给我们创造一种什么机会可能去跟她们认识，就是这样一个环境。

我参加过很多（女同活动），我去了一次同志中心，拉拉沙龙我也去过。当时我的感受就是她们话题、组织特别不正规。比如说她们当时声称两点开始，实际三点钟也没有开始。当然后来我理解，她们的目的其实不是这个话题，比如说一个人来介绍呢，我觉得这个人也不是特别有准备，而且是很散漫的，其实整个她们的活动方式就是这样。但是我的目的可能就是去听一个讲座，就无法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包括就是看一下这种活动的形式，看一下这个活动是在做什么的，其实始终不是特别了解。后来才意识到，其实她们的目的（是创造一种社交环境）。

我对《les+》自己比较关心，曾经比较关心，现在不是那么关心了。当它出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特别的好，我认为她质量是非常高的、是非常有专业水准的，又看到它背后有一些同志群体的一些呈现，我想一个群体去办一个自己的杂志、一个媒体，这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是一种政治性的态度。

我对它不太感兴趣是后来，好像就是她们有一期做了一个类似于大片的那种，所谓大片就是时尚杂志的一种术语，人们去穿一些漂亮的衣服，去拍一些特别隆重的照片。我对这些就不感兴趣，不是质量，就是我不喜欢这种，当然我能理解她们认为这个对女同的群体是有意义的，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不喜欢这种异性恋的、时尚的、消费的，都是基于这种异性恋的假设的。你是要把自己打扮漂亮的，然后你才能有价值，男人才会喜欢你，是这样一个假设。那么你把它搬到同性恋这个当中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起码应该意识到，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本身是有（问题的）。所谓的时尚是什么东西，就是说，它用一种让你心甘情愿的方式去把妇女的钱拿走，这是个圈套，所有跟时尚有关的东西的价格都是极不合理的。

我知道同性恋其实是可以（有消费主义），但如果是一个 NGO 的杂志我会质疑为什么要去做这么一个（商业模式）？我觉得这是没有赋权的。我认为《les+》后来有这种倾向，所以后来我对它不感兴趣了。²

因为 NGO 是一个组织，它的工作是为了去赋权，那跟这些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这些其实是由市场来去做的。我对类似的这种营销策略从来都不感兴趣，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策略。其实往往是这样，当你以为你只是为了去把她们吸引到你的话题当中，而去做一些迎合式的策略的时候，实际上你投入了她们而不是她们投入了你。说不定是你被别人吸收和消解了，而不是你所想的，那就是你的想象了，不是事实。

1.2003 年 3 月，吕频从北京出发，来到偏僻的西部小城漳县，作副县长。去漳县前，吕频的身份是《中国妇女报》妇女权益部主任，也是报社最年轻的部门主管。从漳县回来后，吕频辞职，从此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http://lady.163.com/special/sense/2012renwu02.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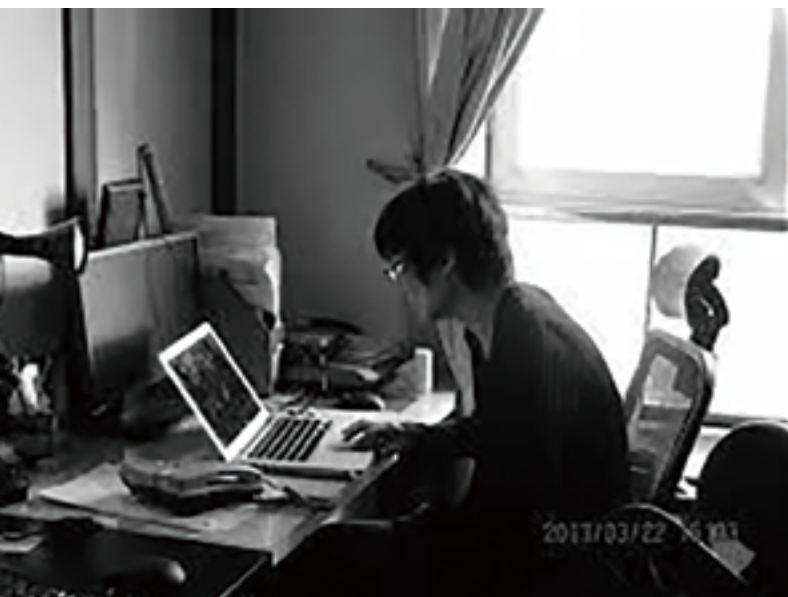
2. 编者注：当编者将此稿件发给吕频本人审阅时，吕频认为自己口述中关于《les+》的批评有所偏颇。吕频表示自己对《les+》的了解有限，且文中的段落内容并不是她目前对于《les+》印象的全部。吕频在给编者的回信中补充说明，拉拉们对《les+》的热爱，是这份杂志价值的证明。



吕频（中）获 2012 年女性传媒大奖年度女性榜样奖



2012 年 吕频剃光头抗议高考招生中男女录取分数不同的现象



吕频在为女声网工作



2011 年 5 月 17 日 “国际不再恐同日”

“女同组织的经验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是否应该机制化是要根据具体情况的。”

女声也会报道一些同志的议题，同志议题是她关心的议题中的一部分。因为从性别的角度来讲，肯定要关注性少数的话题，当然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让别人看到一些其他领域里面 NGO 在发声或表达方面的一些行动经验，这些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我觉得其实重要的是这个角度。

我觉得女同组织的经验其实有很多是可以去学习的，好多值得其他妇女组织去借鉴。当然可能跟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在任何正式的这个系统当中，都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空间有关系。女同有在极度边缘化的情况下的一种共同的诉求，其他的这些妇女是没有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而且或者说即使有强烈的诉求，她们不允许组织起来。

非机制化，可能更多的是依赖于志愿者的活动，在我看来其实是个好事。因为机制化会带来非常多的问题，它会使你为了这个组织的存在而去做事情，这可能会使你不是特别聚焦于你自己的（目标），这可能会使你缺乏选择，越组织化的 NGO 是越难动弹，因为它们缺乏对社会议题的灵活性。我认为对于草根组织来说，是否组织化，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来看，往往是那些相当不组织化，非常松散的一些组织，它们具有非常强的一种活力。有些人幻想一个 NGO 应该去做做大做强，根本就没关系，体制化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有好多可批判的，那么你又去模仿它的体制，中间就是有问题的，如果是一种散兵游勇的方式，这种灵活性可能是人们此前根本就意识不到的。

“女同运动和妇女运动是不是一回事，首先取决于女同组织自己……人们永远不可能只关心自己。没有一个民主的社会是无法解决所有人的人权问题的。”

女同运动和女权运动是不是一回事儿，这个首先取决于女同组织自己，如果你认为你是，那么你就是，如果你认为你不是，那你就不是。说到底其实（是）这些女同组织，她们是不是认同女权主义，或者说认同一个妇女运动的共同的愿景。人们永远不可能只关心自己，得看到你自己这样一个社会当中是什么样的位置，那么你自己给目前的这样一个边缘处境所开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你可以有权利去只关心自己的问题，关键是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这跟别人有什么关系？你跟别人有什么关系？你跟这个社会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社会解决了你的问题，那么你就不需要再去关心别人了？

我觉得中国现在作为一个运动的真正的生命力是在哪儿，为什么妇女组织本身是边缘化的，因为妇女组织就是不回应公共的社会问题，回避社会问题的话你是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运动的。现在关于中国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关于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的一个社会辩论，关于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发展模式的辩论。而这些妇女组织却幻想自己的问题跟这一切都没关系，这个就是妇女运动没有去发展的一个原因。女同（运动）是同样问题，就是你不参与参与到中国具体的关于中国社会的这样一个变动，如何去跟其他人在一起呢，没有一个民主的社会是无法解决所有人的人权问题的。

我认同同性恋。认同，就是说我身份是异性恋，当然有些人可能是异性恋的生活方式，但是她并不一定强调自己是个异性恋，她并不认同是异性恋，就像有些人有同性行为，她不一定强调自己是（同性恋）。我认同我是一个异性恋，因为这是我的生活经验。

看人们怎么去理解就是说只有女同性恋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这句话。当然因为当时有一些非常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们做了一些实践。然后她们就认为，但凡你跟

同性恋男人保持这种固定的性关系一定会让你的女性主义的认识打折扣。当这话移到中国来，其实不是特别适用的，首先我想女同性恋中也没有多少女权主义者，其次就是说从我的看法来说，我觉得异性恋的经验带给我们的思想体验太多了，在这个异性恋的世界上，你作为一个异性恋者你才能看清楚这个世界是什么。

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说在后女权主义者的时代，女同性恋取得了私人亲密关系的合法性，从而使她们逃避了、背叛了女权主义。因为她们被允许建立跟另外一个女同志的亲密关系，她们可以组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个人生活，在这个个人生活里面是没有男人的，然后女权主义对于她们来说就结束了。因为在整个社会这么多人在受压迫中，她们却拥有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使她们忘记了其他妇女的命运，忘记了这个社会。

女权主义最终必将跟一场全面的政治变革联系起来，它不只是一个妇女的问题，不只是一个所谓的性别跟性取向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得去参与进去，如果你不去表



贝尔·胡克斯

达你的态度，这个过程当中就不会有你的诉求在里面。没有一个整体性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拉扯的过程，至于大家相互拉扯的过程当中，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体制），我觉得谁也不会知道，不可能有一个预定。

但我觉得现在的中国，跟中国现在的社会特点有关系，就是只要你只说不说什么都可以。你是可以去看A片的，但是你不能到网上去说这个A片。你可以去做，因为它现在不能那么严苛控制每个人的行为了，它根本控制不了，它也得给你一些空间。所以你可以做，你可以呆在自己家里做，呆在私人领域里面做，但是你不能让它公开化，不管你的个人生活走到多远，整个这个舆论，整个这个主流的价值观还是这么糟糕。

所以我觉得辩论对一切更重要。你私下做的是没有任何授权的，你没有被确立成为一个权利，所以他人就可以随时去干涉你，如果你想获得生活不受到干涉的权利，你必须把它公开化。而现在是类似于一种妥协，这个不断的受到威胁的，好多东西都没有去触碰到一些真相，有一些真话并没有被说出来，有一些真话也没有被听到。女权主义就是这样，老是自己跟自己说话。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公开化的问题，（是）你的话题跟中国的社会、政治之间是什么关系（的问题）。正因为敏感本身就是标签，如果你是一个不敏感的问题，是没有人理你的。有很多人，那些比别人走的更远的人，他们是替后来者去拓宽了边界，所以这是一个搭便车的问题，每个人都想搭便车，这个社会是无法进步的。搭便车就是说我不会去出头，我希望别人去出头，然后我可以跟在后面去享受这个好处。

你看到别人都不去做一些街头行动的时候，你也不去做，那也应该不会有女同的街头行动。所以女同在这个方面应该更多的去把自己的勇敢的经验去跟别人分享，因为这种身体的行动现在太少了。街头行动绝对是重要的，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在场，它是一个身体的在场，对公众空间的一个占领，如果你说了很多你身体都不动，这是不对的，你的身体动才是重要的。所以就是像 517³ 的那种行动本身，你们本身已经把它安排成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意义的行动，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本文访谈于 2011 年 7 月）



3. 指 2011 年 5 月 17 日“国际不再恐同日”北京同志中心和同语组织的“流动的彩虹”骑行。<http://www.tongyulala.org/newsview.php?id=965>。

刘伯红：

女同志运动的支持者

整理 / 柯晓，访谈 / 柯晓、典典

刘伯红——妇女 / 社会性别研究专家。

原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妇女研究论丛》执行主编，现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兼任国家人口与计生委第五、六、七届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妇女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市妇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兼职教授，日本城西大学客座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90 年代中国妇女健康网络、东西方小组、读书小组等活动参与者，95 年世妇会中国组委会非政府论坛委员会论坛组织部副部长。她是女性问题研究者，也是女同志运动的支持者。

刘伯红，妇女 社会性别研究专家



“接触女同性恋前，曾经设想过她们也许是有点怪异有点极端的，因为第一次我看见那两个人抱着哭；结果（第二次）发现她是一个非常关心别人的人、非常有见地的人，如果我们还觉得女同性恋怪异就不对了。”

我在读硕士的时候对妇女研究感兴趣，读完硕士后回到部队，用了五年时间转业，就到这儿（编者注：指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来了。当时我也找了一些单位，比如说社科院的社会学研究所，那儿是可以做妇女 / 性别研究的，有一个婚姻家庭研究室，但该所的部门负责人说，因为我是女的，所以不要，这本身就是性别歧视。我也找过某大学的妇女研究中心，但那所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的老师说，我必须要先教一门别的课，用课余时间做妇女研究。我想，那就跟我在部队里的工作没啥两样了，白天抓革命，晚上促生产，还不是做专业。因此就到了妇联的研究所，这儿也是有利有弊，好处在于这儿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妇女 / 性别研究，是专业的；但也有弊，它是全国妇联的研究所，也要受到这个机构立场和职能的局限。

我来全国妇联办手续的时候，有人跟我说，“妇联怎么要女的了？”那个年代，可能妇联更喜欢要男的。1993 年 9 月入职后，我的最主要工作就是参加筹备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所以跟国际妇女运动，包括跟女同志运动的接触是从那时候开始。

1993 年 11 月在菲律宾马尼拉参加亚太地区妇女非政府组织论坛，在那个会之前，我一直没有全面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这次的妇女非政府组织论坛有 12 个专题，其中之一是 family（注：家庭）。我们到了 family 论坛，一进场就看到两个女士拥抱在一起，在那儿哭。当时觉得很奇怪，因为在中国很少看到这样的事情。在我的经历中，尽管是从部队出来的，部队里也有很多女兵，没有看到过两个女的抱在一起痛哭。就问她们为什么哭呢？回答说因为她们不能组成一个家庭。当时我想，在中国，在自己的经历中，自然认为有男有女才是家庭。所以，觉得很震惊，因为从来没见过，这就是女同性恋。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这样一种关系。但我印象里，好像此前没听说过女同性恋，也没见过——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见到女同性恋，是 1994 年 6 月在美国的 Rutgers（鲁特格斯大学）大学参加一个名为“妇女、暴力和人权”的 Institute（注：研究所），就像咱们的培训班，主办者是“鲁特格斯大学全球妇女领导中心”（Center for Women's Global Leadership, Rutgers University），尽管中心位于那个大学，但真正是全球的。中心的主任叫 Charlotte Bunch，是著名的 women's human rights（注：妇女的人权）领袖，那个论坛上

讨论的就是反对对妇女的暴力和妇女的人权。在那个论坛上，我才真正近距离接触到女同性恋。在培训班里，除反对对妇女的暴力和妇女人权问题外，大家也在讨论女同性恋的议题。有一种说法，feminism is the theory, lesbianism is the practice（注：女性主义是理论，女同性恋是实践），这曾经是国际妇女运动中激进派的著名口号，一些女权主义者用女同性恋的生活来反对男权中心的文化。培训班上大家讨论的问题是，即便是 lesbian 组成一个家庭，她们之间的关系是否就平等了呢，还是依然重复着一种权利关系——一个主导、另一个从属，仍然是 inequality（注：不平等），实际上还是不平等关系的复制，只不过发生在两个女人之间。我发现她们很聪明，她们在讨论家庭之间实质的权力关系，而不是形式上的性别关系，这也是那次培训班上大家关心和讨论的议题。那是我第一次去美国，也是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而且我的英文又特别差，再加上水土不服、时差、空调特别冷之类的因素，有一天全身发冷就生病了，躺在屋子里。那个学习班时间好像挺长的，二十来天。后来我发现有人特别关心我。那个人好像是瑞士人，她就老问我，你有什么困难吗？有什么需要帮助吗？你有没有吃饭呢？你怎么啦？老爱问我，我觉得她特别好，非常关心别人。后来她说，我是女同性恋，那让我觉得很震惊，我说我发现咱们班最关心别人的人

是那个女同性恋，因为之前我没接触过女同性恋到底是谁人。

其实刚看到女同性恋时，曾经觉得她们有些怪异有点极端，因为第一次看见那两个人抱着哭；后来（第二次）发现她是一个非常关心别人的人、非常有见地的人，如果我还觉得女同性恋怪异偏激就不对了。相对于两百年的妇女运动，我参加到妇女研究这个领域中仅仅是第二年，所以我就经常问她各种问题，她都给了我认真明确的解答。

譬如我问她，同性恋是生理原因吗？她说不全是，有很多人是因为社会的原因，比如说她有暴力丈夫，她是出自于对父权制家庭的一种抗议，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她的回答，比咱们国家当时讨论的要更丰富（当时国内的学者们多用“天生的”，如左撇子，来说明同性恋的合理性）。又比如我问她，是不是女同性恋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因为我看当时有名的女同志都是中产以上的知识分子或专业人士，她说不是，是因为那些穷人或社会底层的人没有机会发出声音，这些看法比当时咱们国内的讨论要前沿很多。学习班空闲的时候，我都会向她们提问题。

2006 年 刘伯红在联合国社会性别主题工作组报告发布会上就“千年发展目标”与促进性别平等的主题进行发言



2010 年 刘伯红在妇联举办的先进性别文化与和谐社会构建高层论坛上作专题报告



2013 年 刘伯红作为女性传媒大奖的评委接受采访



“我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宣传者、倡导者、活动家、行动主义者，我就是个研究者，我喜欢扎扎实实地做研究，我们研究出来的东西，谁拿去做宣传，我都高兴。”

世妇会之前，当时在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从事志愿者工作的苏茜开始组织“东西方相遇小组”，还有葛友利，之后我又在那儿又认识了何小培。那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活动也不太定时，但很国际化，因为是“东方”和“西方”这么一个 meeting（注：讨论会），外国人也比较多，跟走马灯一样，大部分是女的，个位数是男的。当时我有个感觉，只要男的在那里一说话，大家就恨不得从各种角度提醒他“少说点”，或者“shut up！”（注：闭嘴）。那时我很奇怪，怎么这么霸道，居然让人“闭嘴”？她们就说了，男性平常说话的机会太多了，好不容易有了这个女性可以发言的机会，他们就算了吧！这才让我知道在女性主义会上，男人说多了是遭人恨的，而中国的很多男性的，也有些外国男性，就没有这个自觉，因为他们各种会上随意说话都习惯了。你看我们的学术论坛也是这样，经常听到男学者说“这个问题我不懂，但是我说几句”。后来我心里想，你不懂就应该认真学习、听别人讲。而参会的女学者呢，很少发言，的确做到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工”，我要给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女性就这样谨慎认真，男的就比较糊弄，现在就是“忽悠”——他们的确不懂，但在装懂。我就在这样的会上才知道，可以制止男性在会上“发言”，那叫一个“爽”。

对于我自己，我是 1993 年才进入这一行，也是一个初学者，所以我还是愿意多听一听。我觉得作为一个研究者，研究这些问题，就要广泛倾听来自不同文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知道妇女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所以，在参与各项活动方面还有一定的自觉性。我的发言并不多，是个比较低调的人，如果不是让我非讲课不可，我不怎么爱说话，更愿意多听一听。

1995 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前，我参加了这次大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担任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中国组委会非政府论坛委员会论坛组织部的副部长。介绍非政府组织论坛，组织中国妇女参加非政府论坛，是我当

时工作的重点。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就是论坛组织部很重要的一项工作。要向中国妇女介绍国外的妇女非政府组织关注的议题，她们的组织、活动方式、特点是怎样的——当时我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介绍人。可以说，1995 年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把“非政府组织”这个概念引进了中国，不管是非政府组织，还是妇女的非政府组织。我是来自研究机构的论坛组织部的副部长，所以较多地向中国各个参会的妇女组织，包括一些具体的论坛，介绍国际妇女运动，包括不同的妇女组织，不同的国家地区地域，关心的重点问题和看待这些问题的视角，就是 priority concerns——她们叫优先领域，在我们这儿就是焦点问题、热点问题。因为中国妇女也要参加妇女非政府组织论坛，我们只有了解人家才能跟人家对话，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推进非政府组织论坛的交流与沟通，当时我还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介绍国外的妇女非政府组织。

这篇文章名字叫“我所知道的国外妇女 NGO”，国外妇女 NGO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样的，所以我在文章中也介绍了女同性恋的组织、女性工作者的组织，当然也有研究的组织，政治的组织，从事为妇女服务的组织，因为它们很多元化的，各种这样的组织我大概都写了。是民政部的一个杂志向我约的稿，我忘了这个杂志叫什么了（但可以查出来），这个杂志刊登了，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民政部有一个社会团体管理的机构，大概叫社团组织司，专门管理何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他们也关注国外的非政府组织，所以在他们的杂志上刊登这方面的文章，登了后一点问题都没有。后来这个稿子，不知道怎么的就落到中国妇女报的编辑记者手里了，她们征求我的意见后就开始编辑，把这篇长文章，分成一段一段的，加上小标题连载。最后刊登的一篇是“我所知道的国外的妓女和同性恋组织”，时间大概是 1995 年的 12 月份。之后，被中宣部新闻局负责监管和读报的部门看到并通报了，就把我们全国妇联的第一书记叫去批评了一顿，大概的意思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所有

的主导报纸，在标题上从来没出现过“妓女”和“同性恋”的字眼，《中国妇女报》怎么弄的。之后，我们第一书记也批评了《中国妇女报》的总编和记者。这件事虽然跟我没有直接关系，为什么呢——第一这稿子不是我投的；第二，原稿不是这样的标题，是编辑为了醒目加上的。但是，我是受到牵连的，作者署名是我。当然也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对这些社会现象的看法和态度。

说实在的，作为一个研究者，我没有专门从事国内女同志组织的工作。当时何小培、苏茜、还有石头那些开拓者活跃的不得了，专门做这个群体的工作，我不能班门弄斧。我只是把一些译介的资料（如《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中文书名为《美国妇女自我保健经典》）和看见的情况介绍给大家，与大家分享，其他的事，我个人认为——我一贯这样看——我只是一个研究者，研究的后边是研究成果的转化，是宣传倡导，是教育普及等等。我认为，宣传倡导和教育普及，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做研究相对来说比较难，需要比较专业的技术，不是人人都能做的，所以我更愿意做一个研究者。若给自己定位，我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宣传者、倡导者、活动家、行动主义者，我就是个研究者。我们研究出来的东西，谁拿去做宣传，我都没意见。



“我认为可能是在国内的女性主义者当中，支持同性恋的女性主义者不是特别多，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一个比较坚定的支持者，其实就是因为在这些国际妇女运动当中，提高了认识，结交了很多朋友……我觉得她们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棒。”

你知道妇联是什么组织吗？大家经常开玩笑的说，妇联是好女人的组织。我一直对我们妇联的宗旨有一个怀疑，妇联的宗旨可以看妇联的简介，在中国妇女网上写得很清楚，那上面说，“代表各族各界妇女的利益”，代表她们参与决策，参与监督，等等。我经常开玩笑问，妇联代表性工作者吗？代表女性艾滋病感染者吗？代表法轮功练习者吗？我个人认为，女同志组织和女同志运动都很有意义。很重要的就是它代表那个群体的权利，维护那些人的权利，它所代表的群体也是妇女。在我的研究出发点中，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什么人的权利都包括，但是我的侧重还是妇女人权。所以，一个是说，我支持女同志的组织；第二，我尊重她们。

记得大约在 1998 年，在北京站附近的一个酒店，我参加世妇会后邱仁宗老师主持的一系列的女性主义会议，那次会议是讨论中国妇女运动和 lesbian（注：女同性恋）运动之间关系的，我在那个会上有这样一个发言，我认为反对性别不平等和反对性倾向的不平等，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切入点的不同。但中国的妇女运动和中国的女同志运动，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中国的主流女性主义运动是看不见或轻视女同性恋的。那次会议之后，我好像被一些人怀疑是女同志。我认为那时在国内的妇女活动家中，支持同性恋运动的不是很多，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一个比较坚定的支持者，这是因为在这些国际妇女运动当中，提高了认识，结交了很多朋友，比如说全球妇女领导中心的那次讨论，我觉得她们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棒。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认识到妇女运动中还存在的的不平等，男性对女性的不平等，与性主流派对性少数派的不平等，实际上是一样的，这就是我的观点。我经常在讨论中发表这样的观点，因此在很长时间被说成是女同性恋。

对于我自己，我没有想过要尝试 lesbian 那样的生活，只是觉得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应当受到尊重。我也没有认为我必须异性恋，但是我特别清楚的就是，从小就这样认定，我必须要有自己的生活，不管他人如何生活，我必须主宰自己的生活。

咱们国家的女同志，基本上没有浮出水面。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国家对男同权利的重视实际上是因为艾滋病传播才开始的，通过艾滋病问题才逐步被主流。我还认为，目前在这个领域中，真正离 gender mainstreaming（注：社会性别主流化）还远了些，包括在性权利的问题上。在中国，连老百姓的性权利都还没说到呢，更别说一个边缘群体。所以我觉得，首先，对同性恋这事，离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就还有一段距离；然后，女同志在同性恋里面又是边缘，更有一个距离，还说不到主流。但是我认为，在性权利方面，只有少数派群体都站起来才有可能维护自己权利。我说得可能不一定对，但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这样。

在中国社会，现在最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问题，莫过于一些大家在主要领域推进的问题，比如经济的问题，这肯定是一个特大的问题，女同胞能不能平等的参与经济发展，也包括女同志能不能平等的参与经济发展，这肯定是重要的事情。相比较重大的经济问题，具体的女同权利的问题，显得弱了一些。相比民主政治问题，比如说反腐败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同志社区的民主建设就显得弱了一点，但它肯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女同运动当然是公民运动的组成部分，这也是我为什么自始至终、一直坚定不移支持女同运动的原因。虽然我不参加女同的活动，但我是一个坚定的支持者。我把很多非政府组织要我参加的邮件组都给辞了，包括《女声》，只留了一个就是 LGBT。吕频还专门问我说“刘老师你为什么留这个？把我们都给闭了。”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不在这儿，女同中那么多能人大仙，特别是年轻人。我只不过在政治上有一个底线，就是支持。

（本文访谈于 2011 年 7 月）

冯媛：

慢慢打消“恐同” 的习惯

整理 / Trim，访谈 / 闲、Trim

冯媛——女权主义研究者和实践者。

现任反对家庭暴力网络 / 帆葆董事会主席，汕头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妇女研究中心顾问，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曾任人民日报、中国妇女报等媒体记者、总编辑助理，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G A D）网络工作协作小组召集人、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社会性别和妇女权益主题协调员等。90 年代中期以来先后参与发起若干民间妇女机构和小组。曾参与苏茜、Kim 等女同志组织的拉拉聚会和讨论、读书等活动。关注同志议题，认同并支持同性恋人群，积极倡导同志权益，亲身参与 2008 年“同性婚姻立法倡导月”等活动。



冯媛，女权主义研究者和实践者

女权身份——“因为有世妇会这个事情，所以我自己开玩笑说，就是把我一个从业余做妇女问题的人变成专业的。”

我是从上大学开始就知道这个名词（注：指女权主义），70年代末或者80年代初。知道西蒙娜·波伏娃，知道一般的抽象的理论。那个时候体制里面是根本没有这些教育，更多的还是一种探讨的好奇心。真正促成严肃的思考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参加《中国妇女》杂志的一个讨论，写了文章叫《女性的理想和理想的女性》。这篇文章后来就发表在1986年的第六还是第七期的《中国妇女》杂志上。正好我就是那年夏天研究生毕业，毕业以后就去《人民日报》的国内政治部，当时担任部主任的人正好也看《中国妇女》杂志，对妇女问题有一定的关注。他就说，看样子你对妇女问题感兴趣，以后妇女问题就归你跑（注：采访）。正好80年代后半期，也是一个中国社会比较活跃、改革思潮比较涌动的时代。那个时候虽然在《人民日报》工作，但是它的官气并不那么重。民间的一些妇女研究、妇女组织的活动，我也就纳入视野范围，一些不那么主流和传统的妇女议题和妇女活动，我也在《人民日报》上给予了报道。

去美国是作为家属，1993年到1994年年中那一年半对我来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那个时候自己的关注很多，回顾80年代，一方面中国社会有强烈的改革和民主化的浪潮，但是同时在妇女问题上一些很进步的、

呼吁改革开放和分权的知识分子，同时呼吁妇女回家去。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就比较多的接触到美国的第二波女权主义的一些东西，包括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等等。出国的的时候就刚好是利用这个时间比较深入的看了一些书，听了一些课。自己觉得在有点不知怎么摸索的时候，找到了一些路，得到了一些东西，所以当时感觉真的是跟充了电似的，回来以后就更加带劲了。回来正好因为有世妇会这个事情，所以我自己开玩笑说，就是把我一个从业余做妇女问题的人变成专业的。

世妇会其实是一个过程，不光是那十几天的事儿。我觉得我作为两种身份的重叠，作为记者和作为一个积极分子的参与，我觉得其实是互相促进和相得益彰的。因为作为记者来说，我的参与可以把更多我认为重要的信息和一些重要的思路理念，带给更多的同伴或更多地读者。作为积极分子，我又是希望借这个契机，利用自己新闻工作之便，来推动这些议题、这些群体。我觉得就是一些人从性别盲点走到了性别觉醒。印象最深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非政府组织论坛不完全是非政府，有的是被政府组织的，卜卫就是被组织拉进去的，那些非政府组织论坛的筹备先就要搞培训，讨论为什么要谈这些议题，对这些议题有哪些视角。在那里一谈，卜卫说：“我几

十年人生的一些困惑，居然在这里面能找到答案。”要是没有世妇会在中国开的话，我觉得不光是中国的妇女运动，中国的公民社会，包括中国的公民社会被公众接受的这个程度，都是很难想象的。因为世妇会本身就把NGO这种概念，把公民社会这种概念，不光是带进中国了，也让我们这种所谓的知识分子可以做一些事情。因为中国社会没有这种东西，虽然很早就从名词上知道什么叫做民间组织，什么叫做公民社会，原来其实是虚的。

在我自己还不敢自我贴上女权主义这个旗号的时候，我先生已经给我贴上了，而且是从一个非常正面的角度。我记得可能是80年代末，有一次他对一个研究过他的外国学者介绍我，很郑重的说，“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当时我先生给那个学者这么介绍的时候，那个学者说，这个词在有的人那里不是一个很好的词，然后我先生很正式的说：“在我这是一个好词，是一个正面的词。”但是我自己在很多年当中，不敢给自己贴上标签，因为在中国，标签被滥用了。比如一个人申请入党的时候就会说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实际上他连共产主义者是什么，不管是从什么意义上来说都不知道。所以很长时间之内，我自己说我是研究女权主义的，但是我还真的

没敢觉得我就是女权主义者，那么到最后自己觉得自己真的够格了，也是比较晚的。

自己要想够格这个本身可能也是自己对女权主义的一种理解，因为女权主义者，它的门槛可能是弹性的。有一个理论叫女权主义大多数，它就是说70%到80%的全世界的人，它认为都是女权主义者，实际上它是要给自己扩大同盟军，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你可以说它没有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我觉得要是从我来说又是比较难的，它不光是一个简单的认同，平等，平等机会，平等权利，实际上它还要求一个人要有内在的一致性。就像有的知识分子，在一方面是鼓吹民主、鼓吹分权、鼓吹大家都平等，但是在性别问题上，他认为妇女应该回家去，或者妇女不用参政。我觉得一个真正彻底的女权主义者，她不光是在女性和性别有关的问题上主张平等，她在对待一切问题上，一切的不平等，应该都是要看到和性别之间的不平等源于同样的结构，也是有同样的根源的，那她也是都要反对。但是我觉得这些要做到很不容易，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结构很复杂，各种等级其实很无形但是也很森严的这么一个社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变成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也不太容易，但是我很庆幸我终于敢承认这么一个身份。

1995年9月4日 第四届世妇会在京开幕



2015年3月，冯媛在由反家暴立法民间倡导小组主办的“2015年两会反家暴立法专家晚餐会”上发言



2015年11月 冯媛在妇女庇护所第三届大会上介绍



感同身受——“我觉得我很难想象一个对同性恋不持同情和认可的态度的人，她宣称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说的同情不是感情上同情和怜悯，而是指一种同理心和认同。”

我记得第一次讨论这个问题，应该是 1981 年左右，在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后来到了那种无话不谈的程度，而且感情上也很近，我们经常就是形影不离。有一次我记得我们两个在学校散步，散步的时候我们就突然在探讨我们是不是同性恋，之后的结论是我们不是同性恋。这是我第一次比较明确的跟同性恋这三个字直接关系的记忆。我没觉得很害怕，我觉得她也没有。我们俩现在还是很好，当然现在她公开宣称她不是同性恋。我还不想公开宣称，因为我觉得公开宣称虽然对一般的人只是表明你的身份，但是你公开宣称好像对某些人意味着我和这个群体没关系，所以我不愿意宣称我是什么恋的。甚至公开场合我会说我喜欢女孩，我想找女孩，就是表示支持的。

生活中应该说接触过这个话题，不过是负面的。在很多年前它在中国还是一个流氓罪的时候，我（《人民日报》）的一个同事，当时他是跑政法口的，他告诉我说有一个男子在建国饭店被带走了。他叙述的那种方式让我知道那是一个同性恋的男子，另外一个可能那个人是外国人，因为 80 年代中期北京涉外的这种新饭店还很少。我说的负面意义就是当时它还是一个流氓罪，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流氓罪，是同外国有点关系的。

在北京最先接触女同性恋者就是苏茜和小培她们。这个时候已经对这个议题有兴趣，之前认识了一些外国朋友是支持同志权利。所以 90 年代中期就很有意识想多了解，而且也知道这个议题和自己做的议题（注：指性别平等）其实是一样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是挺激动的。参加方式，两个层面，一个是纯粹的个人生活，就是她们的一些 party 呀。还有一些我自己认为是工作层面，比如那时候的东西方小组¹，大概是 97 年前后。我记得那次轮到我主持，我当时的第一句话说：“我不是一个同性恋但是我支持同性恋。”当时自己没多想，但是事后，我越来越觉得这句话其实不好，在这么一个异性恋霸权的社会，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了那个霸权的一方。后来我们有一个读书小组，

里面有一个女孩，英文名叫 Kim，北京姐妹（小组）的时候也是其中的很积极得一个。除了 Kim，石头是我一直比较有联系的，是我印象很深的一个。

反思可能晚一点，2002 年初，那时候我爱人去世了，我有一段很困难的时候，在这之前，我的感情生活比较好，我很幸运和我爱人关系很好。同时我还有其他很亲近的朋友，但是那一段时间所有的困难都赶在一起，爱人去世之后，一些比较亲近的朋友，由于各种各样的缘故，也很难保持一种比较近的关系，我自己觉得很无助也很难受。有一次，在（旁听）一个讲酷儿理论的课上，望着那位很酷的女老师，我猜想她就是一个酷儿。我突然就觉得，可能很多时候还是女人更能理解女人，可能女人之间的爱是最牢靠的，突然就有那么一种想法。就导致我开始更多地来看、来想一些问题。所以有时候个人生活和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是连在一起的。我觉得我很难想象一个对同性恋不持同情和认可的态度的人，她宣称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说的同情不是感情上同情和怜悯，而是指一种同理心和认同。

工作中我觉得凡是可能的地方我都会渗透（同性恋议题）。在大学上课的时候，我的课主题可能跟这个根本没关系，但是我在讲到一些思路，比如我们怎么看主流的时候，我会有意识的讲这些。还有学生是同性恋，不管男生女生，不同原因找到我，我就会给她们一定的支持。在之前，我在做新闻工作者的时候，记得差不多将近 2010 年了，在电梯里头，一个国家企业的电梯里，来了几个人，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要把这（同性恋）三个字说出来，要刺激一下他们的耳朵。我看了他们的背影，知道他们是马上就僵住了的。有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刺激的，在朋友的聚会上，或者同学聚会上，当时大家就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要问我的个人生活怎么样的时候，我就会说，“你们谁认识好女孩给我介绍吧”（笑）。会用这种话，其中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意图，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还是要打消一种恐同的心理。

主流社会上大多数人对这个话题应该还是比较忌讳的，这忌讳里头包含着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可能主要的不是对那些作为他者的女同的恐惧，是作为自己内在的，被自己这样一个传统的观念灌输下的，对这么一个同性恋身份和同性恋概念上的恐惧。之前和一两个新认识的朋友在一起聊天，我就很感觉到这种情况，所以我就有意识的讲一些故事，希望通过这些故事慢慢的可能在他们的传统的思考中敲开一点点缝。我就讲了一个朋友和她那个姐姐的故事，成都的一个四十多岁的一个女士，她的女儿都上大学了，突然有一次她碰到了一个著名的女同性恋者，一个星期之内她们俩变成一对儿了。后来这个女士就跟我讲，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同性恋，我是不是爱女人，我只是爱上了这个人。通过这个故事我想告诉她们，就是不管是生理上决定，还是后天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使然，其实无外乎都是想给它找一个存在的理由，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存在就有它存在的理由。

策略批判——“婚姻本身这种社会制度就是异性恋霸权下面男权或者父权社会想出来的一种制度，如果我们还在这个大框架之下去争取，不见得我们能够战胜一些顽固的反对派，反而把自己的一些诉求淹没在里面了。”

北京姐妹（小组）内部的一些分歧，我觉得对这些做一点研究也是很重要的。女权主义内部或者女同内部有一些分歧，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我觉得对有些东西，应该是有些了解，看看有些是怎么分化又重新组合，我个人是很感兴趣，只是没有精力而已。我当时对她们的接触还不是仅仅从女同这个议题来的，它也是民间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像我刚才说的读书小组，我们读书不一定是只读和女权议题有关系的书。运动会把人性深处的很多东西（显现）出来，每个人身上都有她的多样性，有的人看它仅仅把它作为你的个性特征来看，但是有的人就会加上一些解读，甚至带上一些道德的评判，可能就挺复杂，也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有意思。

第一次参加过一次比较公开的活动就是那个情人节送花街头活动，2008 年在金融街那边，我现在还印象很深。

2014 年 12 月 冯媛在凤凰网大学沙龙



2012 年 2 月 14 日 女权行动派在北京前门大街开展反亲密关系暴力主题的行为艺术“受伤的新娘”



1. 东西方小组，全称东西方相遇翻译小组，1992 年成立。她提供了一个妇女独立的讨论空间，希望通过翻译努力去与世界建构一种共同的语言和概念结构，为今后的社会性别培训广泛的展开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主要召集人葛友俐和苏茜。



冯媛 在第三届妇女庇护所大会上发言介绍中国反家暴工作状况

情人节送花记得是（倡导）同性婚姻，我对于这个事情还是有些矛盾。这个社会，只有主流承认你，你才能享受和其他人同样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支持同性婚姻的，因为这样你才能享受社会的公共服务，以及一些民事权利的机会。但从更深层的架构来说，婚姻本身这种社会制度就是异性恋霸权下面父权主义想出来的一种制度，把很多不合人性、不合理、不平等的东西制度化，并让人们内化了。如果我们不跳出异性恋的父权主义的婚姻制度这个大框架，我们去争取的结果，不见得能够战胜一些顽固的反对派，反而把自己的一些诉求淹没在里面了，所以我有这么很深层级的一个矛盾心情在里面。我觉得从提升公众的意识这个角度我愿意支持和参与。从运动来说，我也能理解，有时候光谈平等权利，但是对公众来说这个权利是抽象的，它需要有具体的权利，尤其是对于很多具体的人来说，我怎么承认你的平等权利，我怎么样不歧视你，遇到具体的问题才会有歧视，所以同性婚姻从策略来说有它的好处。从社会运动来说它需要让一般的人，不用思考那么深层次的时候他就能来理解和支持你的平等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同意，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是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摇摆吧，机会主义者（笑）。

有一段时间，我自己觉得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去泡拉拉沙龙，只要不出差的周末都会去。一个是我觉得那个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闺蜜，是一个很重要的私人空间，在那里面我觉得有一些我说不出的感觉，让我可以寄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我是一个女同（笑）。其实，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一个女同在性取向上是女同，但她在一些权力关系，性别关系，包括亲密关系里面，她又不自觉的受到异性恋霸权社会的影响。要争取平等机会那就应该和更多争取平等机会的群体来扩大同盟军，这个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应该说都是有帮助的。我觉得很多东西不可能是一蹴而就，要慢慢来，慢慢的让大家愿意去思考，愿意去改善。自己认可自己的性倾向，觉得是应该和女权主义者站在同一个战线上了一个阵营里头了，从另外一方面，要在很多层面上打破这种各种各样的控制和樊篱，达到那么一致不太可能。但是我觉得契机是有的，只要大家想到了，只要大家肯这么去做，肯这么去努力，继续探讨这些议题，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思考和行动。女同小组我觉得好像还是各自为政的比较多，在我们这样一个信息手段很方便的年代，我觉得有一些东西互相通气其实挺重要的。

（本文访谈于 2011 年 2 月）

章义：

用纯真的心 善待多元

整理 / 典典，访谈 / 柯晓、典典

章义——东单公园的北漂青年之一。

90 年代中期北京同志派对的活跃参与者。曾是 " 上下线 " 前期酒吧合作者之一。03 年《时尚君子》杂志男同志长城裸照模特。09 年前门婚纱照活动男同志模特。章义不把自己定义成运动家，而是积极的参与者。他见证了北京从 90 年代初到如今各种各样的同志文化——公园据点、酒吧派对、街头行动，更理解 " 不同的东西 " 并存的意义。



章义，东单公园的北漂青年之一，90 年代中期北京同志派对的活跃参与者

“希望更多的朋友出来”

我 1993 年刚到（北京），在地铁里看到那份报纸（注：指《北京青年报》报道东单公园），偷偷看完扔了。当时我觉得他们和我没关系，只是还会想起我那个男同学，那个时候我老家还有女朋友，我打算过一段时间把那个男同学忘了，然后回家和我女朋友结婚。但是过了一年，那年秋天我还是突然很想去东单公园看一看。找到那个地方以后发现还真的能一眼看得出来，就是那种感觉。

1995 在东单公园年认识一位朋友，三天后他回沈阳，之后就去美国留学了，我们通过书信交流了一年左右。在 96 年秋东，在三里屯的 half and half 酒吧，认识了他，算是我的伴侣吧，他是美籍华人，叫他 j。通过他，应该是 1997 年吧，秋天左右，认识苏茜他们。这一帮朋友经常在一个酒吧，在北京音乐厅的后面，叫“柠檬树”。这个酒吧老板姓陈，我们都叫他老陈，老板是 gay，他是律师、他男友是一位小男孩儿。我们就是让大家每个周六下午在那里聚会。一二十人，二三十人，慢慢的人就多了，就开始讨论在中国的同性恋问题，这些朋友来自北京周边的城市，也有比较远的来自湖南和广州。大多数人不敢出柜，各种各样压力，我们大家就是去讨论怎么样去帮助他们。他们也经常让我讲，我就跟他们讲各种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包括我 94 年确定我自己是男同的时候给我姐打电话，我说我变了，她说你怎么变了，我说我喜欢男孩，我姐听了半天也没太懂，就说这事我们也不懂，反正你自己注意点儿（笑）。

我的朋友 j 和苏茜是在 half and half（注：酒吧名称），出去玩认识的，（那是）最早的一个同志酒吧，在三里屯那边。然后他们那一帮老外就会有各种 Party，有的是在家里，使馆区那边，找地方做不同的聚会，希望更多的朋友出来。就是我朋友 j、苏茜、那个美国朋友 m 还有非洲朋友 f，好像是刚果的，这四个人经常举行家庭 Party，（去的）中国人也很多。

那个时候出来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四五十人，有的家比较大的就一百来人。每次我们会提前做好卡片、纸条这些东西，然后提早两三个星期到酒吧，柠檬树，或者朋友的聚会去发。没有写（同志），也不用暗语，就写下周几什么时候，在谁家有个什么聚会，地点，然后电话，

大家都知道的。去酒吧发纸条也是认识你才会给你这个纸条。（钱）都是自己出，谁邀请谁来准备，比如去苏茜家，苏茜会准备好一切吃的玩的，就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去就行了。

我是 2001 年 7 月份，和几个朋友合作（做酒吧），上下线 ON-OFF（注：酒吧名称）。客人来了可以免费上网，01 年能上网的还不多，原来老板装修风格是西餐厅，环境算是比较优雅的。在这之前，是金星开的酒吧，那时候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去过金星的酒吧，叫：半梦。当时，有朋友告诉我说金星是由男孩变女孩时，我很吃惊很好奇，从外表上看，金星极其有女人魅力，特别是在跳舞的时候，说话声音还是能听出来偏向男声。之后，通过一位朋友，去看过金星在儿童剧场的现代舞演出，这也是我第一次看现代舞，对于我这个从山沟里出来的孩子，感觉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虽然是第一次看现代舞，但，金星舞蹈的感染力很强，我是看流泪了，金星是位有灵魂的女人。

其实上下线做起来之后我只呆了一年多一点。之后就是别的朋友继续做了，可能做到 2004 年或者 2005 年，反正 2002 年之后到 2005 年可能换了好几拨人，但都是做这个 gay 吧的。

那时候网上报道说北大是（大陆）第一次放映（《蓝宇》），实际上我们这里放映完之后隔天才去的北大。也是通过我的合伙人，他的朋友在负责出版这个电影，所以他能够拿到最早的光盘。我没有考虑到（有警察来）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那时候的合作，只是给他租金，关于与派出所交流的问题主要是店主。他知道我们经营的同志主题，但是他很放心，从来不过问。

那个时候我受我朋友 j 影响比较大，就觉得一个人很多东西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东西，不能因为一个国家这种所谓的伪道德压制自己一种纯真的东西，所以明白以后，就像我第一次明白自己是 gay，就很坦然地接受，我没有问题，就是喜欢的是同性而已。包括这个风险也是，我当时没有更多地了解中国更多的一些政治问题，我办 party 就是为了更多的大家的交流，帮助大家。



电影《蓝宇》（2001）海报



东单公园（来源：中国广播网）

“我只是一个参与者”

2002 年初，北京《文明画报》，出了第一本创刊，封面就是同性恋，整本就谈论中国的同性恋。通过我、石头、崔子恩我们三个人给他充实里头很多内容，给他们介绍 gay 和拉拉，（报道得）非常正面，男女都有。主要是中国那段时间的同志文化。从找到我到出刊大概有三个月。这是一个正规杂志，它第二期的封面就是关于刘晓庆的了，之后的第二期、第三期它都会在后面留一个版块继续讨论同志话题。我去过他们的杂志社，每一篇稿子都会再查看下。

（《文明画报》）有一位女编辑，她很想知道了解下现实生活中的同志朋友，方便她写稿，为了她，在家里开了一个小型 party，来了十几位朋友，其中除了我个头小点，还有一位朋友比我个头还小点，其他朋友都比我们要高些。这位女编辑来参加后，写出的文章里就是很明显的发自内心的那种抵触，现实和她写的根本就不一样，（比如）在她的文章里写的是参加同志 party 的人都比较瘦小。那我就完全不同意，后来我说要么这篇就不放，要么就写事实，就改，后来他们改了。



章义（2003 年摄，图片来源：《点》杂志 2009 年第 9 期）

（刊登后）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会打电话给他们编辑部，想了解更多，想了解我们这些人。

然后就是在 2003 年春和一位摄影爱好的朋友，去野长城拍了一组人体照片，那个时候我常去爬野长城。通过他告诉我说有一本《时尚君子》杂志，是做同志的，可不可以把照片放在他们的杂志上，我说你觉得可以就可以。之后我还在这杂志社上过班，负责其中一小块栏目的内容。在那工作后才知道这本杂志就是《文明画报》转给他们的，改名叫《时尚君子》。就做了一期，第二期我就不筹备了，接触后才明白他们根本不是想为同志做事情，而是想拿同志这个话题来赚钱。他们用我这个资源，写东西、要资料，但又不尊重原则。说好采访完要把稿子发给采访对象核对，但是他为了赶时间为了杂志快点出，也不经过我同意就把杂志出了，这不是害人么。那期杂志我还保留了。圈里人都说是一本同志杂志，但是同志真正想看到的東西不多。

09 年情人节前门那个（婚纱照）。是赵柯打电话问我是否有时间在 2 月 14 日可以去参加他们发起的这个同志婚纱摄影活动，我说可以。当时我也想了，这样的活动本来也不会有很多人愿意出镜，反正我也不是第一回出镜，一回两回都无所谓了。我想他们也不好找人，所以我也没想太多就答应了。（拍照）是一对一对拍的，这对拍完拍那对，也没注意她们两个，只注意到我们自己，紧张的感觉像个明星一样。我觉得有趣的是，我们送花给路人并说：祝您情人节快乐，希望您支持同性恋婚姻。大多数人都是很友善地就接受了花并说支持，然后告诉他们这些同性婚姻（的事），他们就都说支持支持。有趣的是有一位路人，是闲还是谁问他，如果你的孩子是同性恋你接受吗？他说这个我不接受（笑）。

同志运动好像说得有点大，都是和朋友们一起做的，我只是个参与者，就帮着发布信息，就做这些事情比较多一点。

“特别想过去告诉她们”

（来北京之前）没想过（女同性恋）这个问题，根本没想过会出现在我的生活中。1997 年左右吧，和我住一个院的女孩，她住在我隔壁一间，快有一年左右了，她一直都有男朋友。

有一天我记得应该是周末吧，她和男友俩人一直关着门。等我从菜市场买菜回来她朋友已经走了，她在水龙头那低着头洗东西，感觉就是情绪很低落，然后我就随意问她，你朋友走啦，她说，啊。然后我就说你一个人我也一个人，要不一起到我家吃饭吧，她说好啊。东北女孩，过来一坐，感觉挺豪爽的，就说想喝酒，我就说我去买。然后我去买了两瓶啤酒，倒了一杯，她一口就喝完了（笑）。然后第二句话就是问我：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我就说了我喜欢男孩。她就说，我就说嘛，是不是经常来的那个。我说是。然后就这样聊开了。

她说她觉得自己可能喜欢女孩，问我身边有没有女孩。我说可能有吧，然后就是为了她找女孩，我就问了身边的朋友，问有没有女孩。朋友就说有啊，苏茜不就是女孩吗？大概是一周左右了，我的朋友告诉我，一个澳大利亚的女孩她们晚上有个 party，可以问问我邻居愿不愿意去参加。后来她说愿意去，我就带她过去参加她们的私人 party。然后这个女孩就在那个 party 上认识了她第一个女朋友。第二天就带回来一个女孩，速度可快了（笑）。还是在清华上学的一个，看着挺像 T 的一女孩。

苏茜说如果有认识的拉拉就介绍给她们，她们拉拉人员少，如果我遇到感觉像拉拉的我会去注意。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在三里屯的一家酒吧内，发现旁边桌的两位女孩，一位就是比较 T 一点儿，一位比较 P 一点儿，那个感觉，我们三个人都觉得应该是拉拉，朋友们让我过去确认。我就说，你好，我可以坐下来跟你们说两句话吗？她们就说可以呀。我说那边的两位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都是同性恋，然后我们特别好奇觉得你们两位也应

该是。然后她们俩就说，啊，是吗，她们俩就笑，她们就说她们不是（笑），她们还在上大学呢，还没毕业。之后我的那两个朋友就说要不要过来一起聊啊，她们就说好啊。最后我们等的另一个朋友也到了，大家就一起去了 gay 吧。从那天开始我们每个 party 都会邀请她们两过来参加。

还有一次在王府井，有那么三四个女孩，就在外文书店，正好是我进去，她们出来，是两对儿，拉着手，“老公”、“老婆”的叫，我就想这该不会是拉拉吧。我一直想说（请她们来派对），就一直往前走，跟到车站看着她们上车也没好意思说（笑），就看着她们走了。另外一次，可能也 97、98 年，是在公交车上，是两个女孩，胆子还挺大的，还偷偷接吻，我当时就特别想过去告诉她们我也是。

那时候（判断拉拉）主要是亲眼看到她们亲密的行为或听到她们说了什么以后会觉得是。不过现在鉴定力可能会高一些，我觉得好像与一种内心的东西还是会有关系。



“女同做事可能会比男同坚持一些”



（在柠檬树）男同会比女同多些。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两个拉，对自己认同压力比较大的，穿着男性的服装，特别特别 T。有一位就是觉得自己是男人，还想变性。不管做男人还是做女人都是她自己自由的问题。

在使馆区那边开家庭 party 时，也是那时候认识苏茜和小培的。她们（两位）都会一起来参加活动，会有很亲密的举动。然后我去苏茜家，她们应该是在一起的，因为她家里有很多照片，卧室、厕所、厨房都有很多，她们两个的加其他朋友的照片。那个文字可逗了，我记得苏茜在厕所里写的，大概意思啊，她说小培是她每天要喝的咖啡，小培给她写的就是苏茜是她每天都要用的卫生纸，我觉得特别逗。这种形式的照片、文字，我觉得特别有趣，特别可爱。生活特别有情调。



.2009 年 北京前门的同性恋婚纱照行动

我们做酒吧上下线（注：酒吧名）时，刚开始女同少，后来做了几个月以后女同越来越多了。没有包场，主要还是周五周六来，原来我们也没有刻意去召集女同志。她们应该好多都是相互约的，因为那时候没有别的地方，每周末多的时候也会有几十人到一百人的拉拉。打架的基本都是拉拉，上去一巴掌，打得挺厉害的，那时候没有 gay 打架的。我觉得年龄层方面，男同一般都是比较成熟些，25 岁以上，反正小孩儿少一些，女同可能年龄会小一点。周末是收门票的，（对男女收费）没有不同，男同志会消费多一点，女同志会少一点。那时候大概百分之八十男同，百分之二十女同吧。

来我们酒吧的有一位叫乔乔，后来她组织拉拉到她们自己专门的酒吧去了（开了枫吧），把女同都带走了。我去过她们的酒吧，跟一位女孩去看了一次。她们那边就是小一些，那个环境够用了。挺好的，女同有了自己的空间，又多了一个同志文化的地方。

（参加艾滋培训期间）通过石头也认识几位女孩子，但是没有来往。还有，也就是通过闲她们。我记得第一次见到闲是在民族大学，民族大学西面有一个宾馆的会议室。我参加了一个来自澳大利亚教授的讲座，我记得是谈论同志的基因，就是说遗传性，说舅舅传给外甥的几率是比较高的。闲最后也发言了，当时我看着闲就觉得，哎呀这要是个男孩该多好啊（笑），闲看着特别清爽的感觉。那是第一次见到她。后来我记得（我）还参加过一次拉拉的沙龙，安可的，就在工体南门乔乔做的烟斗酒吧，石头她们也参加了。

（09 年哥本哈根同志运动会），闲，还有一个女孩，澳门的，叫 Eva，她们还有 les+ 的 gogo，还有 sam。男同还有崔子恩，范坡坡……还是男同比较多。（男同是）身体优先的，就体现得娱乐性更强一些。（女同）就是每个话题、议题啊去参加、去讨论，反正我感觉就是女权主义者，有一种使命感。我看女同关于这个运动会，除了运动会以外还有各种少数群体的各种议题，（我）也去参加了她们的一些讨论，我觉得她们做这个特别积极。男同主要是以运动为主，但有些（讨论会）也去了，比如闲的，还有 sam，崔子恩，他们共同的讨论会。

我觉得女同做事可能会比男同坚持一些，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反正就是一种感觉。最近几年我也很少参加（活动）了，从 2004 年 2005 年到现在都参加的少了。

我们 gay 的活动更多的是组织这种 party（1997 年—2002 年），让大家玩得更开心，男同的活动我会参加一些游泳、打球；文化的会比较少一些。我觉得（像拉拉沙龙这种）活动内容体现多些的是压力问题，还是有很多人是有压力的。（男同）也是需要（这种活动）的。1997 年的时候我认识的那帮朋友做过这样的沙龙，他们大部分人出国了。



.2009 年哥本哈根同志运动会上的中国代表队

男同做关于艾滋病的多一些，我对这个了解不多，我听朋友说，反正就是某些做艾滋病的民间机构也会因为资金的问题在争。可能也是艾滋病这个问题国家现在讨论了，所以做起来容易一些，然后通过艾滋病，间接地讨论一些别的议题，同性恋的议题，会更方便一些。我觉得（男女同志）大家都在一起玩挺好的，大家都一样，很自然吧，我觉得应该更密切一些。做的事情毕竟都是公益的，不同的阶段大家有不同的生活状态。（酒吧的分合），从我的角度都随意。你必须要有不同的东西存在，包括男同酒吧也应该有不同的这种需求的酒吧，谁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觉得就是北京同志中心，还有点杂志，还有 les+，同语还有爱白，在中国这几年做得比较好。现在的这些就已经不错了，以后再继续发展。

（本文访谈于 2011 年 6 月）

江晖：

北京要做男女同 合作的表率

整理 / 柯晓，访谈 / 柯晓、Rebekah

江晖——爱白文化教育中心负责人，爱白网站站长。

曾任北京同志中心理事，09 年前门婚纱照活动创意人。IT 工程师。中国知名同志活动家，参与同志运动 12 年。

“我认为男同和女同的组织不应该分开，在 03、04 年已经有很多的组织基本只做男同志的工作，甚至觉得女同志不重要，因为艾滋病的问题就很迫切地摆在面前……。而当时“梧桐树”小组就特别强调男同、女同一定要合在一起做……”

很早就已经知道有女同志活动家，但是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到。通过网络知道上海的深秋小屋¹，北京的石头、明明等等。2001 年第一次同志网站站长会议上见到了石头、明明、李京。还有一个女同带我们去了 ON-OFF 上下线酒吧。她告诉我，那个酒吧里每周有一个晚上是女同的包场，可能都算不上包场，只是大厅里是男同，女同则在一个更小的一个空间里。因为我们当时去的不是周末，所以没有看到什么人，就是我们自己人在一起聊天。她说这个酒吧男同这里都还挺温和，女同那间为了抢女朋友经常有人打架。当天也有别人分享了北京同志酒吧的另一个故事，说警察来骚扰的时候，男同志们吓的哇哇乱叫，而女同则冲在前面质问警察，我觉得是个蛮有趣的现象。

后来，因为认识何小培的原因，才从各个地方认识到更多的女同志成员。因为当时我们见到同志都很少，不管男同女同，能做同志运动的人都很少，大家跟一家人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当时男同志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源，没有想过说男女同能不能合作的问题，就是大家觉得在一起可以做事情。至少从我个人来讲，没有想过在运动中要去区分男同和女同。

2004 年的时候，我在福州办了一个小组叫做“梧桐树”，组织在当地的同志一起聚会打羽毛球。参加活动的男女同志几乎是一样多，有的时候女同志比男同志还多，大家就是聚会、打球、聚餐。聚餐后有一部分男同志会去渔场、酒吧和浴池发发安全套和《朋友通信》，我们也会隔一段时间组织去烧烤、海边旅游等等。当时男、女同志在团队里，不管是参与还是在团队负责层面，都很平衡。

我认为男同和女同的组织不应该分开，在 2003、2004 年已经有很多的组织基本只做男同志的工作，甚至觉得女同志不重要，因为艾滋病的问题就很迫切地摆在面前，做男同志工作的人可能就比较关注男同的需求。而当时“梧桐树”小组就特别强调男同、女同一定要合在一起做，但是很遗憾我离开福州之后，就逐渐变成男同为主了。

我 2005 年离开福州到北京。我走之前特别和其他成员强调，说活动一定男女同志不能分。但是我走了以后，女同志这边出了一点问题，当时在福州，其实是全国很多地方的女同志有一个现象叫家族。就像一个帮会一样，比如有叫“月亮家族”的，里面 T 跟 P 很明显，T 把“我的女人”带进家族里，有一些 T 不太愿意或者不允许自己的“老婆”和外人有接触。因为这类原因，家族跟家族之间没有很多交叉，或者是有些争斗，关系不是很融洽。这也逐渐影响到女同志在“梧桐树”小组中的参与，而男同没有这种普遍的现象，至少我在福州没有观察到，男同可能彼此比较独立，没有太多社交身份关系上的约束。

当时“梧桐树”小组比较初级，也没有什么特别高远的理想和追求。因为没有经费、没有压力，也没有项目，什么都没有，只是大家自己掏钱聚会，AA 制。而我只是一个发起者，因为我计划要离开福州，所以也不参与到太多具体的日常工作。发起这个小组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福建省内没有任何一个同志小组，我觉得在我离开之前有必要留一个种子下来。后来“梧桐树”和福建同志网合并，成为福桐工作组，主要做艾滋病方面的工作。

“我觉得就那个阶段特别好，所有的都刚起步……我和闲所有的东西都聊，我们住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几乎我们参与的所有的活动、我们互相有的资源我们都会一起用，我们也会一起讨论想法、看法、这些具体怎么样去做。”

爱白网从 1999 年创办到 2005 年前后，除了最早的两位创始人，整个团队大概只有五、六个人。成员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关系，工作任务也很简单，把网站做好就可以了，偶尔再去参加一些会议。因为是网站成员在哪里都无所谓，我在福州，星星在美国，大 K、小 K 在厦门（他们后来移民去了加拿大），郑远涛在广州，我们几个人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2004 年我们考虑爱白未来的发展，必须有一个落下来的点，因为同志运动需要更多更细化的工作，而网站承载不了那么多。最后决定去北京，因为北京的资源最丰富，也因此，我来到北京开始为爱白建办公室，招募团队，这样慢慢逐步建立起来。在网站的工作之外，做了很多和文化、校园有关的事情，像学生夏令营、翻译、出版等等。

我到北京以后就跟同语的负责人闲一起合租。后来搬到一个更大的房子里，也有了一个联合的办公室，也作为我们的图书室。

第一次见到闲，是 2004 年初爱知行在上海组织的一次会上。闲那时应该回国不久，算是第一次同很多人见面，她说回来就是想在北京做女同志的工作，那时好像已经在参与拉拉沙龙了。见到之后我挺开心的，因为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女同志在会上出现了。之前开会很难看到女同志，除了何小培因为有参与艾滋病工作的之外经常出现。当时大部分组织都是男同组织，而且只在做艾滋病的工作，同志运动尤其是权益的工作大家谈的都不多，这也让我觉得挺乏味。那时候我个人对艾滋病的议题不是特别关注，虽然我知道艾滋病很重要，但是做艾滋病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不希望同志的事情只剩下艾滋病这一个议题。所以认识闲我很高兴，因为她所关注的方向和我的很接近。

我们在亚运村的那个房子算是当时的一个“据点”，很多会都在我们家里召开，大小小，见国内外来的客人也经常在这里，功能有点像现在的北京同志中心。有时

候我们也在家里办沙龙，很小的沙龙，只能来十几个人。当时我们也开始做一些在校园的活动，骄傲月的活动，还一起合办了学生夏令营。加上时不时的一起去外面参加一个会，日程经常排得特别满，也见证了很多组织和活动从无到有的开始。

我觉得那个阶段特别好，所有的事情都刚起步。我也没有别的工作，就几乎全职的做爱白的事情。我和闲之间所有的话题都会聊，一同参与大多数的活动，互相的资源都会一起用，也会一起讨论想法、观点。总之，和闲一起工作觉得特别愉快，她有一种特别干净利落的感觉，我个人也得到她的很大帮助。

即使是现在我和闲虽然见面机会不多，但只要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深谈，那种感觉还是一样的，很容易讨论商量出结果。我们两个人各有特长，闲的逻辑性、条理性比较好，她时刻能够保持比较清醒的状态，能够抓到住大局。我对政治和安全的敏感性很高，比较能评估环境和机会，在创意方面也有一些优势，喜欢设计新的策略和办法。我们两个人都有一个特点，比较能懂得怎么去利用资源，我们只要商量一下就会想到一件事情要找谁来帮忙，所以很快我们就知道一个事情下面该怎么推进。

因为这层关系，爱白、同语两边志愿者相互接触的也比较多，有时候经常会在一起开会，包括我们和爱知行三家机构一起合办夏令营等等。一起为夏令营设计、写项目书、筹款和执行等等。参与夏令营的学员，男女同志、直男、直女都有，而且人数相差不多。有几届，女性的数量都超过了男性。我们办夏令营的目标是构建宽容友好的校园环境。并不是为了做所谓的“同志研究”，而是需要培养一些后备力量，能够在校园里做出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希望他们回去以后能在自己的社团里面做些同运的活动，也可以参与到当地的这些社区工作。当然，几届夏令营学员中的一部分逐渐发展成为很多同志机构的志愿者甚至核心成员。

1 编者注：女同志网站 www.ladyscn.com

“我觉得（男、女同志）最后肯定是走上一个相互、融合相互理解的道路，这是必然的一个趋势，也不仅是在北京，在其他的一些地方，或许会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我觉得北京在这方面应该做更多的表率。”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艾滋病会议，当时闲也被邀请去介绍女同的工作，闲在台上发言时，有个男同志机构的负责人站起来就说我们现在男同志的事情都管不了还管女同志。我们特别生气，当时有很多男同志组织也确实是这样的一种想法。他们拿着 CDC（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给的那点钱，就觉得自己做的是无比正确的事情，看不到、也从来不看和同志权益有关的事情，他们看不到同志不仅有男同，还包括女同以及其他更少数的群体，只觉得他们自己很重要。我们当时就很直接的回应就说这种看法是很不对的。

从目前看女同志运动的发展比较稳健，或者说从长远角度、从健康发展来讲比男同志要好得多。因为男同志现在有大量为艾滋病服务的钱，过度地依赖于项目，也有一帮人仅仅是为了自己，并不是真正在做同志运动工作。而真正想做同志运动那些人反而变得更缺少资源了。有这样一种现象，因为国外基金的撤离，很多男同志组织突然就没资金了。由于之前过度的依赖项目，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没有社区筹款能力。比如之前是花钱请人来参加活动，现在办活动希望参与者能捐款，这种改变其实很难。

而女同志因为没有艾滋病的资源，更多的是靠社区筹款来开展工作，发展之后才开始找到些有项目的钱来支持一些工作，所以可以看到一些花费都是很省的，以很经济的方法在执行。而很多男同志组织则不是，在有钱的时候就大手笔的挥霍，没钱了就不知道怎么做了，我希望这样的组织尽快消失比较好。

目前男、女同志的合作关系地区差别很严大，北京的情况还比较好，只要是在做同志运动、文化、权益方面的组织，大家都还非常合作，有什么事情大家都能凑在一起。我们还一起支持建立了北京同志中心，而其他地方很多就差别很大。

在北京同志中心创办之前，在中国，所谓的同志活动，大部分都只在酒吧、公园、浴室这类地方，即使有些在做同志运动的活动，绝大多数也还是要跟酒吧去合作。而在酒吧里面办活动，有时候不是特别理想的环境，有些人对酒吧不太喜欢。尤其是我们在做青年工作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学生不愿意去酒吧，他们觉得酒吧不是他们想要的环境。所以我们认为需要有一个新的工作形态，2006 年爱白在成都建了一个青年活动中心，应该算是在中国最早的一个活动中心的模式，也是一个尝试。以中心为平台做一些社区的活动，如沙龙之类。之后各个地方都跃跃欲试想在当地建中心，也向我们了解中心是怎么运作的、大概要花多少钱、怎么样开展工作。而当时北京还没有中心，我们和爱知行也在一起考虑在北京也建个中心。2008 年北京同志文化活动中心（后更名为：北京同志中心）建立的时《les+》和《点》杂志也被拉进来成为发起组织之一。

2009 年的前门婚纱照就是在北京同志中心这个架构下进行筹备的，很多机构一起参与。之前几年，北京的同志机构已经有情人节同性婚姻倡导的街头活动，但希望每年能有一些新的创意。我当时提出拍婚纱这个设想，说了许多理由，也谈了怎样才能具体实现，以及能有什么样的效果。我记得特别提出两点，第一，必须同时有男同、女同的存在，不能只是一对男同，或者只是一对女同；第二，男同须穿一样的西装，女同也必须都穿婚纱，不能一对中的一个穿婚纱，一个穿西装。原因很简单，如果你展示给别人的形象同性恋其实一个扮演“男性”角色，另一个扮演“女性”角色，会扩大社会对同志的刻板印象。

在同志运动上，男女同志组织合作的事情远远不止我刚谈到的这些。还有很多很多。我觉得男、女同志最后肯定是走上一个相互融合、相互理解的道路，这是必然的一个趋势，也不仅是在北京，在其他的一些地方或许会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我觉得北京在这方面应该做更多的表率。

（本文访谈于 2011 年 6 月）

口述者补注：

柯晓将这个文稿送给我审读的时候，距离当初的采访已经过去一年半，这一年多北京的同志运动环境，发生了很多事情和变化。甚至距离我所期望的“相互融合、相互理解”变得更为遥远。组织之间诉求、工作方式以及目标的差异愈发凸显，甚至变得难以调和。这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合作”到底是否还有空间。

但这一年来我们也看到，一些机构（包括爱白）在“主流”领域扩大了合作伙伴，包括企业、媒体、教育系统、医院，以及其他领域的 NGO 组织。而许多的女同志机构，则选择与谓之“边缘”的女权运动结盟，加入到“新女性”运动中，参与的议题也突破了同志方面的限制。

现在还很难去评价这种变化对同志运动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但至少在这个需要时间才能跨越的阶段里，各自都寻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合作伙伴和发展方式，也可能更是同志运动成长的机遇。

（江晖补注于 2012 年 12 月）

范坡坡：

你是拉拉还是 gay

整理 / 安镇，访谈 / 齐羽、安镇

范坡坡——同志导演、作家、活动家。

北京酷儿影展组委会成员，中国酷儿独立影像小组协调人，北京同志中心理事。纪录片作品有《彩虹伴我心》、《舞娘》、《新前门大街》等，著有《春光乍泻：百部同志电影全记录》。在同志运动中，坡坡一直与拉拉走得很近，他反感身份藩篱。如果非要有标签在身的话，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着男性肉体的 T，喜欢和他一样有着男性肉体的 T。



范坡坡，酷儿导演、活动家。北京酷儿影展组委会成员，北京同志中心理事

“我觉得（跟这些拉拉）挺有共同语言的。”

我认识的第一个拉拉活动家是 sam，2005 年时就认识了。那时办同性恋文化节，sam 看到消息就打电话给我们的联络人，说找康夫。那时我的网名叫小康，联络人就以为是我，阴差阳错找到我这。sam 跟我说她很想做一本拉拉杂志，好像最后也没有合作成。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能力，因为也是学生，但是崔老师（崔子恩）把 sam 介绍给闲，还是谁把 sam 介绍给闲了。三个月后，我忽然看到了这个杂志，做得还挺好，还激动地给 sam 发短信。那是 2006 年的时候。所以我是见证了《les+》从创刊到成长。

2005 年第一届北京同性恋文化节，我负责了青年论坛的一个部分。那时候整个论坛的负责人就是闲，她说对我印象挺深刻的。2007 年我的书出版了，当时在北大红十字会做了一次讲座，冰蓝和闲还各买了我一本书。等到 2008 年的时候，闲拉我去一起组织酷儿独立影像小组。2 月开了一次会，讨论成立这个小组的事情。当时有闲、石头和明明，还有毛雷，还有 sam，还有李昱琨。闲还有 sam，我记得当时是主要发起这事的。3 月份的时候，酷儿影展在北京做了几场放映，我在小组做了一些联络的工作。就在画楼酒吧，一个拉拉酒吧。场面非常壮观，因为那场地撑死了就装五十个人，竟然来了八九十、小一百人。4 月在单向街做酷儿文化月，有些文宣也是我帮忙做的。

石头应该是在拉拉沙龙见的。后来 2007 年酷儿影展有放石头的一个片子，《女人五十分钟》，所以我们就越来越熟悉。那时候，石头几乎每个同性恋的活动都出来参加。我也是，有一阵子我一星期参加三个拉拉活动。什么周三去山木蓝（注：酒吧名），周五去西厢房（注：酒吧名），周六是大拿的告别派对。挺开心的呀。我觉得（跟这些拉拉）挺有共同语言的。我那时候也是因为有时候跟一些 gay 没有共同语言。因为一谈，就是什么衣服啊身材啊发型啊，很无聊。男同志的圈子里有一种很规范的审美——你要身材练成什么样，衣服穿着什么样是时髦，你要用什么样的化妆品，用什么样的包，我不太感兴趣。跟石头一见面，我就问她技术的问题：剪辑软件用什么，转格式转不出来怎么办。跟大拿也会说什么艺术展啊。总之似乎情趣挺相投的。

去北京拉拉沙龙应该是 2006 年，记不太清楚了。反正那时候在乐杰士餐吧，在丰联广场。好像还每人收 20 块，还会说，我们不拒绝 gay 来，但是请大家对拉拉保持友善。你听着这个的时候就觉得还有一层屏障似的，对我们有戒心。那时候也认识了安可。去西厢房也是 2006 年，好像是闲跟冰蓝组织了一个关于同志跟心理学的聚会。当时有一些 gay 在，也有拉拉在，也有一些高校社团。因为那时候冰蓝老找一些高校社团的人来开会。枫吧（注：酒吧名）我也去过，因为有一阵子在跟程青松做一个视频的栏目，还去采访过乔乔，采访过她两次。

那时候就很愿意跟拉拉走得比较近，因为觉得同样都是很叛逆的，这种相对于主流来说是叛逆的爱。很多男同可能已经三十多岁了，就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同性恋。带他去个聚会，他会说，哇，我把我这辈子加起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女同性恋。他们甚至有人觉得，哇，你是叛徒，你到底是拉拉还是 gay 啊？我会觉得这又是一种叛逆。为什么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不能一块玩呢？我就偏要一块玩。我好像也有这种叛逆的想法。所以差不多是 2008 年的时候，特别爱去拉拉酒吧。

2007 年，范坡坡的著作



“人与人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在权益本质的一个同志运动里面，其实也更强调每个人的特点，而不再有你是女同性恋、他是男同性恋的樊篱。”

在没有艾滋病这个资源之前，像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在北京组织的一些私人聚会上，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都是在一起的，基本上。2003 年之后又因为艾滋干预的资源而一定程度上的分离。现在在北京地区来说，同志运动开始又回到反思。特别是男同志社区里也在反思艾滋干预的资源到底给我们造成了什么。其实好像也在回归同志运动的本质，好像很有必要跟女同性恋的运动又走到一起：男同志的活动会跟女同志的一起做，然后大家集合这样的资源。

如果你在做这种同志运动，你就更不应该去以别人的身份来评判。我身边也会听到，哎呀她们拉拉就是怎么怎么样，她们拉拉做事就是这样子。其实我都觉得很刺耳。譬如男同志常常抱怨说有些 T 办事比较粗暴啊。叫 gay 去拉拉酒吧，就说不去，万一跟人打一架怎么办？很多拉拉也对 gay 有歧视。有一个拉拉给我们递烟就说，哎呀，你们 gay 就是不抽烟。她好像抽点烟就觉得自己特别潇洒。你就看到，她在抽烟时候有种优越感，她觉得她是爷们。要说起来，跨性别对同性恋也有歧视。说我要找直男，因为这些 gay 都不够爷们。所以不能单纯说同性恋歧视跨性别什么的。但如果说同性恋歧视跨性别，这又是个更大的话题，又在这个社会当下太普遍了。

其实同性恋遭受歧视，某种程度是因为别人不去看你这个人是什么样子，而去看你所从属的一个群体。有的人说，全世界的同性恋骄傲游行都是这样子：头天晚上，男同性恋都在讨论明天穿什么，女同性恋都在讨论明天喊什么口号。说完这话，我都会强调，你会看见男同性恋里也有头天晚上在讨论喊什么口号的，女同性恋也有爱美的，想着穿什么衣服的。然后女同性恋也有派对十二点以后才来的，男同性恋也有来得比较早的。人与人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在权益本质的同志运动里面，其实也更强调每个人的特点，而不再有你是女同性恋、他是男同性恋的樊篱。

从国外的规律来看，同志运动做领导的人很多都是女性，是女同性恋。这本身也是性别平等的一种表现。其实在

主流社会里面，女性的能力被质疑，不真正是因为她的能力本身，而是因为她性别的印象。如果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运动在一起的话，相较于主流社会里的竞争，其实女同性恋有更多的机会。

我们去洛杉矶同志中心实习时发现，他们很著名的一个艾滋骑行活动，很多工作人员是女同性恋或者其他的酷儿女性。她们跟艾滋病的关系其实是离得最远的，但这些东西让她们感觉到社区的归属感。就说，无论我是男同性恋也好我是女同性恋也好，我所付出的是因为对自由、对平等的向往。所以一些异性恋也会参与进来，我在那边两个月，看到男女同志之间的合作还是比较成功的。

这给国内男女同志合作的借鉴是私下的沟通很重要。其实很多人他没有能够跟你有一个好的沟通，是因为你跟他产生坏的误解，是因为沟通不畅。除了工作，他们也有很多私下的交流：一块去聚会，在有钱人家里开个派对啊……一般都会男女生叫过来，除非是开性爱派对一般只有男的。彼此之间也经常串门做客。另外，建立好的制度也很重要。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制度，你就不会因为你的性别、身份而不跟他合作。是你制定的分工让你有了执行的东西，而不是说我不愿意——因为她是女同性恋我不愿意跟她。

“在同运的圈子里，基础就是性别还有性取向的平等。”

酷儿巡展本身创办时，我们就一直希望让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都能够参与，并且使他们都能够互相看彼此的片子。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但还是存在一定的障碍。譬如说我们在另外一个城市当中，因为当地既有比较有影响力的男同性恋的组织，也有比较有影响力的女同性恋的组织，然后我们在两边给了他们一些推动，希望他们能够合作，他们竟然最后就闹掰了。这是我很不愿看到的一个结果。那以后，我们也更注重怎么样让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组织合作起来。

又譬如说有的组织规定里面他们的基金的使用一定要给男性或者是一定要给所谓的 MSM，Man have sex with man（注：男男性行为人群）。有时候它就不能支持一个女同性恋嘉宾的路费，不能拿那个钱来邀请一个女同性恋嘉宾。那就要沟通。有时候就跟当地的女同性恋社区合作，用社区筹款的方法来邀请这个女性嘉宾。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方式。有的地方他们就真的合作得很好，一块儿去做这个筹款，完了之后还在彼此的圈子里宣传。

也有观念上的障碍。有的男同性恋觉得我做出来的工作要交差，要出一个成绩。他可能因为有一个任务就说我要把这个东西完成成什么样子。他可能要写项目报告。做一场活动，如果在女同性恋的酒吧做，可能来的几乎

都是女生，他的报告上就不好写。而女同志的组织没有什么支持，不需要写这样的东西，就觉得资金还有人数的压力是最大的。今天能来多少人，能筹多少款，这是最重要的。我的这个原则里面有什么的东西是不能破坏的，一定要坚持。有可能是这样的，只是我自己的理解。

我也看到一些合作比较好的，特别是年轻的男同志和女同志往往合作得比较顺利些。像云南平行，他们得到的是艾滋干预的钱，但是没有像其他一些组织一样完全用这个钱来发套、做检测，而是做了很多很权益的事情，并且还经常跟当地的女同志合作来开展活动。还有山东彩虹济宁分部的组织者，它的资源其实有时候也会拿来给女同志来做。但这些经验在全国并没有那么多，据我所知。

当然，本身没有合作在一起，并不完全是男同志这边的责任。女同志社群也需要反思是谁制造了这种障碍，例如现在有些女同志的酒吧还依然不许男性进入。她可能假想着女同志这个社区的人都不想跟男人接触，或者她假想着——甚至她有经验——女同性恋在去酒吧的时候被异性恋男人骚扰什么的，所以她后来就说所有的男人们都不准进去。我觉得，其实可以用更开放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



2009 年，范坡坡拍摄了记录前门同性婚礼的纪录片《新前门大街》

2011 年广西的一个同性婚礼上

“要自己发声，但是也（要）跟其他的声音，有共同目标的声音联合在一起。”

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女同性恋没有艾滋干预的资源，但是某种程度上女同运动可以更专心地去做更纯粹的权益和文化方面的倡导。

北京拉拉沙龙，我觉得是很典型的一个成功案例。它坚持这么多年，每个周末都选择话题去讨论。其实，与此同时也有人在北京尝试过组织什么男人沙龙，但是很多都没有坚持下来。因为他们会说，你找一群 gay 像拉拉那样聊一个下午，怎么着都不行。女同性恋的组织跨区域合作也比较显著。好像华人拉拉联盟是在女同运动里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而在男同里面没有。我听说比较多的是，关于快速检测的培训，或者是有一个关于 MSM 健康报告，要请大家来听。似乎没有听说过一个规范又能定期进行权益培训的平台。这也是在女同志运动里比较独特的一个部分。

女同性恋的运动还有一个好的机会，可以从女性主义、女权的角度展开，可以跟其他受迫害的女性结合在一起。我知道家庭暴力那个项目是要有女性的议题才能得到这样的资源的，所以中国的女同志活动家们也在发挥自己各种各样的创意去寻找这样的资源，然后来投入。

同志运动也不是单独的。中国的同志运动也应该看到发生在社会上面的其他的不平等的东西。它跟整个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有关系的。你只关注同性恋本身的话，其实对我们本质上权益的获得是没有作用的。这也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同志运动的经验之一。就像台湾的同志运动，他们其实跟外地劳工啊性工作啊这样的机构关系都很紧密，因为他们有共识。他们那边联合的一个方式就是一块儿上街去，当年人不够的时候，就把性工作者、外劳也都叫上，互相支持。我们现在跟其他的 NGO 也有合作。像爱知行他们，不光做同性恋方面的事情，艾滋病、血液感染、打工子弟……他们这些项目也都做，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在中国本身，联合其实是一个政治上有风险的事情，但是起码应该去努力。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也是在某种程度促进体制的改革。首先要让人民知道各种权利的存在，让大家每个人都有权益意识。每个人如果都能够意识到自己应该去争取权益，中国就有希望了。但是现在因为我们的人还不够，就像《让子弹飞》一样，大家都不跟你玩，都在观望。而现在政府惧怕人民得到这样的权益，所以中国同志运动的难题一部分也在于政府害怕各种形式的民权，各种形式的平等权益。

悲观地说，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其实我们做这么多事情，让中国政府在政策上面的变化特别地微小，根本没什么用。因为政体的原因，我们的声音很少被所谓的政府看到，更不可能采纳。你也不知道它们怎么样看你，它们怎么样想，没有对话。但比较好的是，我们影响了很多的民众。中国的民众现在对于同志越来越能够关注，能够理解包容。这是一个社会最根本的东西。

（本文访谈于 2011 年 7 月）



2014 年，范坡坡出席哥本哈根同性恋电影节



范坡坡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益仁平中心）



angel:

永不言弃的女同 网络平台搭建者

整理 / 西厢桔子，访谈 / Minnie、西厢桔子

angel——知名拉拉网站“拉拉后花园”站长。

网络工程师。05 年无意之中搭建的女同网络平台，没想到竟成长为国内最大的女同网站“拉拉后花园”。angel 与女同群体有不解之缘，用旁观者的目光见证了中国内地拉拉线上线下的活动历程，也用网络资源支持了拉拉社区运动。



Angel，知名拉拉网站 拉拉后花园 站长，网络工程师

“当时这个群体是不可见的，是隐蔽的，相互沟通是困难的，我希望能帮助到这个群体来搭建一个网络上的一个平台。”

我自己在做女同这个网站（注：拉拉后花园¹）之前，是一个个人站长，就是我也在做其他网站。然后，在2005年的时候，可能有一次机缘巧合，在网上看到了这些事（注：关于拉拉这个群体的），我忘了是在哪个论坛上，是在天涯还是在其他论坛上看过一个帖子之类的，就是讲到中国的拉拉有多少多少万。哇，我从来没有想象到居然有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却没有一个沟通的渠道，之前我从来没关注过，有那么一个想法，就去尝试了一下，就去弄了那么一个网站，也很简单，就放在那了，但我其实没有想到会做到现在这么大。最早的时候也不是以论坛的形式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我可能希望更多地是介绍这个群体，介绍这个文化，说这个起源，说中国的整个现状、分布，可能还有一些图片、电影这种资料的整理。

当时这个群体是不可见的，是隐蔽的，相互沟通是困难的，我希望能帮助这个群体来搭建一个网络上的平台，当时也没有合伙人，完全就自己。刚上线的时候，怎么讲，我觉得其实第一年都关注度不大，第一年只是说有人知道这个事，知道这个网站。2006年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个爆发点，有很多的拉拉网站如雨后春笋般都起来了，哦，那个爆发点我觉得或许是被我赶上了。

2005年的时候，当时最大的应该是阿拉岛²跟一个我不确定是沙龙还是俱乐部，拉拉俱乐部当时有一个服务是电影，就是收费电影，播放电影，可能是针对会员收费的，可能就是放一些拉拉相关的电影。我可能看一下他们的发展方向，或者发展模式。但其实作为我，作为站长来讲，我更多的性质是我对他们的挑战，我如何超过他们，就是对于做网站来讲可能就是竞争者一样，希望我自己比他更强一点，超越他们。

权益倡导应该是2008年的时候才在想这个事的，比方说主导社会的声音或者什么的，这些都在想，但是一直没有实施，我应该跟同语的闲或者其他人都聊过这些事，我觉得同语在这一块做的是比较的超前的。2008年那时候，拉拉后花园绝对是国内最大的，当时我想到，天天在网上做肯定是不行的，我一往国外看，国外有一些权益性的活动啊游行啊。中国游行不行，但是当时我看到了《les+》杂志，哎，我觉得这个好，这种载体可能比网络上的更可信，怎么讲，杂志有她独特的魅力。我就说，是不是可以跟杂志合作，当时我是主动地联系了les+，我忘了当时联系说做什么，反正是联系了，后来可能通过les+认识到了同语，然后跟同语再相互地了解，是这么一个过程。

好像那年情人节同语组织了一个在大街上送玫瑰的一个活动，我觉得这种走到生活中去是很好的一个争取更多的权益的一个方式吧。当时说如果有什么活动，我说我这边来组织人，可以去参加去支持，是这么一个情况，但具体的活动，好像也没有真正地实施起来。后来同语在拉拉后花园有一个专区，同语有什么活动，有什么看片会啊或者是之类的，就会在拉拉后花园发个帖子，组织大家去。

我其实愿意帮助同语更多地推广社会的声音，一直在尝试，但是从2009年开始就因为网站的事情（具体事件见下文）停下来了。我对于这种权益的活动一直贡献特别少，我唯一交流的就是北京的那家les+跟同语，其他的任何组织我都没有接触过，我觉得我就是在网络上的，幕后的。我看今年国家的那个趋势又有点开放了，我又可以好好地聊一下，因为毕竟我这个平台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人。

“我确实没有想到，但是你又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当时网站就是整个断网，网站访问不了，但我没考虑过要放弃。”

2007年的时候我们想把网站做得更大一点，我们论坛的一个版主，她愿意出一部分资金，出了几万块钱，因为当时我个人的资金也比较困难，我们就简单签了一个协议，就是合伙经营。但是后来，2009年那个事件（指网站被关停）之后呢，她也不太愿意了，我就把这部分钱全部退给她了，我遇到过钱的困难，但是确实是解决了。目前的资金是我个人出的，就是我个人垫支的，很多人劝过我说，比方说会员赞助啊，但是这块我觉得不太好，因为我自己毕竟身份特殊，我也不太想引起这方面的争论。

我觉得最大最大的困难还是2009年的那件事，政府不让你在國內开了，就只有那一次，是比较大的打击，但是我觉得它的伤害是毁灭性的。那种影响是比较长远的，对于网站来说是停滞，没有特别的发展。我记得当时国内有一个所谓的网络什么什么行动¹，应该是2009年2月份，当时还抓了一个色情网站，判了终身监禁。（笑）反正有几千家网站都被不同方式地关停了，也公开名单了。但是后花园是那个信息产业部²给我打电话，直接找到我，就说你低俗，不说你违法，也不说你色情，就说你低俗，必须关闭，没有任何理由。当时的压力不仅仅是来自这里，还有来自那个服务器托管商，通信部³可能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如果这个商家不关闭我的话，商家会受到损害，可能就不能继续地对外营业，不能进行一些其他的正常的一些服务，所以说他也必须得关我。就是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怎么样你都得关。

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是没有心理准备的，因为那个时候正是发展的时候，会员每天发帖两万多，所以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因为天天我能看到这个数据，我就也特开心，就老在这么壮大。呃，我确实没有想到，但是

你又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当时网站就是整个断网，网站访问不了，但我没考虑过要放弃。闲当时帮我找过一些律师咨询过，但是也没有什么结果，正常途径好像是解决不了这个事情，所以说我没办法，只有转移到香港去，这几年服务器都在香港。当时应该是不超过1个月就对我们原来的用户进行开放了。当然，开也不是说跟原来一样地开，只是换了一个网址，在小范围内部传播，就是说我们没有对外公开，就是不是向所有人公开，还是比较低调的，就是保守的方式。

今年在往国内搬，搬回来，在国内做，重新好好地做一做，因为毕竟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好好去管理这个网站。像我，真的，再大的困难没有想过要放弃，而且包括网上有那种负面的声音，那种负面的帖子，我面对这个比较理性，像比如说闲，或者是我们论坛的那些版主，就是知道我身份的人，就是我觉得还不错，她们比较能理解我，因为她们也相信我的信誉。我觉得至少在她们的支持下我不会就轻易地就放弃。



2007年2月14日，街头送花行动被《新京报》报道

1. 拉拉后花园域名：<http://bbs.lesky.com/>
2. 阿拉岛 <http://www.aladao.net>

1. 该行动指2009年的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
2. 这个部门应当是工信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主要职责为：拟订实施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和标准；监测工业行业日常运行；推动重大技术装备发展和自主创新；管理通信业；指导推进信息化建设；协调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等。——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3. 同上。

“社会在发生什么样儿的变革，其实拉拉也在发展。因为我们毕竟是在社会里面的，中国这个社会。”

后花园现在活跃的大部分都是比较年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变化，80 后的都不来了，90 后的都挤过来了，就是这种情况。可能是那些曾经活跃的 80 后都工作了，或者是确实结婚了，工作了。（笑）各种压力呗，上网时间，就是来后花园刷屏的时间少了。

她们（注：80 后）会回来，但就是说，不活跃。她们可能会说“我好几年没来了”，她们时不时地会发个帖子，但是不活跃，不像以前，就天天在上面，就你上学的时候跟上班的时候可能完全不是一个状态。后花园毕竟比较特殊嘛，她如果不想让同事看到，或者不想让家人看到。我觉得 80 后（现在）不会那么轻易地表露情感，不会在网上到处地说啊，公开地说，不会了。但是她们可能会把拉拉后花园当成自己一个稳定的依靠的地方来放点儿东西，发点儿自己的内心世界想说的话。无论是好事儿啊，坏事儿啊，关于这方面的事儿她们可能会来说一说。

我觉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她们（注：指 80 后）靠着这个平台累积了自己的一个圈子。因为很明显，2005 年 2006 年的时候如果没什么网站的话，她们在 qq 上认识的人，或者别的地方认识的人，可能会比较少。就是有拉拉后花园这个平台，她们很快地认识到自己的朋友，再组织了自己的一个圈子，她们也不需要这儿。

但是有很稳定的一帮人，一帮 70 后或者更老的一帮人，她们很稳定。她们还是那么多人，但是她们一直还是在后花园，很固定地聊天，上来讨论一些事情。

90 后这一帮人，就是发发照片，灌灌水，吵吵架啊，就是论坛上会出现的各种情况。她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好玩儿的，还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儿。

网上的人群其实很简单，讲拉拉的变迁就得看社会的变迁，我真觉得这就是一个小的社会。社会在发生什么样儿的变革，其实拉拉也在发展。因为我们毕竟是在社会里面的，中国这个社会。比方这些年所谓 80 后承受的压力，90 后承受的压力，70 后承受的压力，无论你是拉拉还是什么直人，你同样也是承受同样的压力。

就是 70 后，直人这块儿，80 后刚出来的时候差距也挺大的，也闹得挺凶的嘛。但是你看，90 后（出来的时候）虽然闹，但是闹到现在已经不怎么闹了，会接受了。当年主力军是 70 后，现在主力军是 80 后。80 后我觉得会比 70 后更包容一点儿，我们看现在 90 后，就觉得我们当年经历过这一个阶段，可能就不愿意再去骂他们了，就更包容一点儿了。90 后和 00 后我觉得都不会出现什么轰动，越来越已经没什么沟壑了。坎儿就出在我们这儿了，拉拉也一样。

但是我觉得 90 后真的是机会很好啊，各方面都很好啊。你想 70 后出国的机会就比较少，对吧？80 后出国的机会变多了，90 后现在不出过国好像就不好意思说自己上过学一样，他们出国留学好像就成为标配啊。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如果你出国再回来，带着你那些观念再回来，真的完全不一样。

2009 年的“拉拉后花园”论坛



今天的“拉拉后花园”（www.lessky.com）



“我觉得是我现在要做的最主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让社会发出更多的声音，就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个群体，不再是那种恐惧的或者是只言片语的一些描述。”

我现在要讲更长远的目标的话，我是希望对于社会有影响。比方说，我希望大家提到拉拉或者是同性恋，不是怪异的或者是变态的，或者是有病的，或者是异类。我希望社会上能认为这个是一个常态，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情感，或者是另外一种人生。我觉得这是我现在要做的最主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让社会发出更多的声音，就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个群体，不再是那种恐惧的或者是只言片语的一些描述。

不仅仅是通过这个网站，我是希望通过更多的渠道来利用这个网站，交换到更多的资源、渠道，来告诉大量的人这么一个事情，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平面媒体也好，网络媒体也好，希望更多的地方有这种声音发出来，我觉得是希望后花园可以做更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是社会责任的一种，需要承担的。

但是，我对社会发声得到的反馈并没有一个预期，而且短时间内不抱期望，我短时间内的目标还是说帮助大家解决现实问题，这是我目前最主要的目标。我不可能像任何人承诺说我们只要变得合法，就能公开，社会就能认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后花园的，或者说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解决眼前的问题。然后，解决了眼前的问题，我们再站在眼前的问题上再看未来。

这段时间其实我想了一些，比方说我会构建一个专门的拉拉的商家的一个平台，比方说如果你是针对拉拉服务的一些商家，比方说有那种酒吧，比方说我现在知道的那种专门的拉拉的摄影，拍婚纱的，所以说我觉得可以去搭建这么一个平台，让这些商家来添加他们的商户信息，拉拉可以到这个平台来，就可以找到这个群体的一些商户信息，这个可能是对这个群体的一些帮助吧。近期还有一个规划，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啊，我不确定这个正不正确，因为可能跟同志权益有冲突，因为我在网站上，至少我目前看来有百分之十的人有这个需求，就是形式婚姻这一块。因为网站 2005 年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的人是 80 后，我也是 80 后，所以我在做这个网站的时候，我也很热血，也没有想那么多，但是 2006

年走到现在，6 年，6 年我也快到 30 了，我相信跟这个网站一起成长起来的很多人都到 30 了。我看到很多人有这个需求，她们需要形式婚姻，所以说我可能搭建这么一个形式婚姻的平台，帮助他们，拉拉也好，或者 GAY 也好，因为好多 GAY 来拉拉后花园找形式婚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需求。我可能接下来会做的，就这两件事。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

我也不指望说未来我会担多少责任，担多少事情，我只是觉得就是把我现在想到的做完。现在能做到的责任，能做到的事情，我就做。当然，其实我也有自己的希望，我希望自己的后花园能够收支平衡，啊，甚至说有，我觉得盈利不太可能，真的是不可能。比方说以后要是又遇到经济难题，那怎么办，我还是希望收支均衡，能很健康地发展，因为现在确实是不健康的，虽然说从表面上来看，是很健康的，但是从我内部来看，她是不健康的，因为你没有达到收支均衡，你这么多年没有任何收入。这些事我还没有想明白，但是，我希望是一个健康地，能长期地一个发展。没有了我，说得很实在，真的很实在，这个网站还能继续发展下去，我觉得这是我最理想的。

越来越多的高素质的人能理解这个群体，但是更多的老百姓，我现在抓出这帮人说，可能都敬而远之，可能觉得怪怪的。所以说对于中国这个运动，我是很失望的，我一直希望寻求改变，但是很难，而且是拉拉更困难，我觉得拉拉很少公开，确实不会公开，包括名人也好，她们一旦出了名，她们不会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可能有些男生还会承认，像蔡康永，他可能会公开，但毕竟是台湾的那个社会，我觉得台湾可能也会自由一点，民主一点。在中国大陆这一块真的是问题太多了，我觉得需要咱们每一个人去不停地说说说说……，去教育市场也好，去教育社会也好，我觉得，反正我毕竟没有一个时间表，没有一个期望，也就是说我失去了信心，但是我会一直去做，我是失去了信心，但是我没有失去耐心（笑）。

（本文访谈于 2011 年 9 月）

Ana:

跟西方不一样的拉拉文化

整理 / Trim, 访谈 / Rebekah、Minnie

Ana——华人拉拉联盟第一、二届委员。

出生于福建，少时移民美国。从哈佛大学性别研究系本科毕业，本科论文是研究国内拉拉社群的 T/P 角色。Ana 在校园里负责亚裔同志社团，组织女性主义和性教育活动。曾在美国亚太同志健康中心工作。2009 年底在北京开始做“发现自我之旅”视频演绎工作坊，并参与各种跨区域的拉拉活动。2012 年夏天回美国继续学业。



Ana, 华人拉拉联盟第一、二届委员，睿己学院创始人

“（我是同性恋的事儿）没有跟家人说过，本来联系就不多，所以就不会谈到什么私人的事情。”

移民大概十岁吧，当时很不习惯，是跟我爸爸到一个特别小特别小的城市，在佛罗里达州那个地方除了他没有别的华人。而且老家是个小地方，我是读完小学去的，没有学过一句英语，我也是挺内向的，但是小朋友还是挺能适应的，除了语言都还好。刚开始没有什么沟通，也没有什么交流，所以也没有（感到）文化的不同。但后来搬到休士顿，休士顿是很大的城市，人种也比较多，我算是慢慢放开自己的。我后来很少说中文了，除了父母之外，都没有人讲普通话，父母也说的不是普通话，是方言。

我本来就跟父母不是很近，因为距离的原因吧。十几岁的时候和爸爸去美国，妈妈没有去，然后跟我爸爸生活了几年。过了三四年，我妈妈终于过来一起了。我当时自己变化也挺大的，挺陌生的。那时候是 90 年代，没有网络，打个电话也很不容易，不像现在。所以跟我妈关系就很疏远，关系不是很好，经常吵架。跟我妈呆了两年，她就又回中国了，在中国呆了两年，再来美国，这个时候我就更大了，已经在念高中了，所以还是跟他们都不和。我搬出去住是因为什么事情与爸爸妈妈闹翻了，然后搬出去住。我自己想去亚利桑那州，想换个学校，换个环境，重新开始。我就跟我爸爸说了一下换学校的好处和理由，他就同意了。然后后来我就找了工作，放学后工作。（我是同性恋的事儿）没有跟家人说过，本来联系就不多，所以就不会谈到什么私人的事情。其实，如果他们在网上搜索过我的名字什么的话，就已经很明显了。

初中的时候，我成为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基督教徒。教会那里是没有约会文化的，当然也算一种美国文化吧。

那时候特别乖，最疯狂的时候，会非常自豪，现在带着理智看待了。以前会跟教会几个特别好的朋友，每天晚上都会一起上线，向上帝一起祈祷一个小时。那时候信教，好像都是出于一个好奇。可能就是教会那些具体的人会有影响吧。比如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在教会，那个教会比较特别，是一个亚裔的教会，说的日语，但都是亚洲人，所以文化上也会有有一定的归属感。到了高二高三的时候，就开始脱离教会，因为开始约会了，宗教文化开始被约会文化取代。一部分是因为约会，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和父母有很大的矛盾。然后就搬出去住，教会对这种忤逆的行为，这种不孝的行为也（不赞成）。

我在休士顿有一个男朋友是白人，他是我高中同学。我不是因为他而搬出来住，就是想自己搬出来住，但是算是热恋期，他就跟着（和我一起住）。好像住了半年多就开始吵架，很频繁。决定上了大学后就分手，大学他在休士顿，拖了很久。也很难说到底客观上说怎么分，也很不确定是不是要结婚。因为我之前是在教会，比较晚熟，也没有什么暗恋。现在来说，也不是对他那个人有多大热情，热恋这个事情挺祸害的（笑），其实换一个人，差别也不会太大。回想起来，那段感情主要属于被动的接受，他追我，我觉得不错，就在一起了，并没有主动的喜欢过这个男孩子。其实中国人，就我接触的中国的拉拉，可能大家都很想要一辈子的长久。我现在也一直是和中国人谈恋爱，所以貌似我也是比较认同这一点。但是理性上讲，我没有很向往这样子，从来没有以和谁在一起为目标。

觉得自己是同性恋，可能是和男朋友分手以后，因为我还没有和他分手如果说自己是同性恋可能会有些矛盾。

当时就是有一群朋友都是 gay 或者拉拉的。大二的时候有和一些女生开始交往，应该是 2006 年，和有色的女生稍微交往过，之后就是亚裔了，比较认真的女朋友都是中国人。之后来上海也交过一个女朋友。

那时我是 T，就是大二的时候转型的，因为我当时看了一些有关性别是建构的理论，所以非常论证的对待这个问题。反正我就是另外一种状态，在那之前虽然从小到大也是长头发，然后普通女生那个样子，不能说 T 但是也不是一个很女生的女生，不是一个很会打扮的女生。我真的觉得那个过程好好玩啊，那个转型的过程，因为我之前也没有说很会女生的打扮，更不会男生的打扮，所以是一种要学习的东西嘛。男生本身也是要学习的，我就更没有学过了，所以我开始把头发剪了，买各种男装，一开始就各种不搭，很奇怪，头发剪得太短了，衣服穿得又太宽松了，不会穿也不知道怎么穿，开始也没什么效果，很搞笑。可能慢慢的就稍微会显得自然一些，然后你会开始觉得很舒服很喜欢这样子。

T 的时候我也有和 T 在一起过，就是那个（在上海交了）半年的女朋友之后的女朋友，是（在一起）三年的。但不能说她是 T，因为她最后很跨性别，就是女跨男。那时我还是一个 T 的样子，但是和她在一起后，两个人都变得更娘了一点。变回来是 2010 年吧，回到北京以后，就是到了北京以后就慢慢转回来了。其实不大觉得是变回来，是变了一个新的，这个过程也是挺好的，不像是变回去了。一个新的性别，以前都不是这个样的。现在也不认同 P 吧，因为我还是很喜欢美女的，所以还是说是不分吧。



“上了大学便有了更多的机会，立即很热烈的投入到关于女权主义的社团，同时也上关于性别研究的课……这些女性主义社团的经验为我以后开展同志运动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可能从脱离教会开始，在教会的时候还很保守，脱离以后越来越激进，也不是激进，可能是左派一点。可能当时男朋友是左派一点，在那个保守的环境，他是很特别的一个，有点女权主义吧。高三时，前男友介绍了一些女性主义的书给我，如《改变强奸文化》等等，书中主要介绍了性暴力不是例外，而是一种存在等等内容。或许是这本书打开了我对女性主义知识渴望的窗户。当时周围的生活环境十分保守，女性主义的内容获取途径非常之少，这些书籍便激发了我的兴趣和好奇心。高四的时候开始关注女性主义，但仍然不是很了解，在高中没什么机会学。上了大学便有了更多的机会，立即很热烈的投入到关于女权主义的社团，同时也上关于性别研究的课。

大学期间参加了许多的女性主义社团，自己也组织了一些社团活动。其中做的最好的一个就是在大一时期和好朋友发起了女性“性高潮”讲座，主要讲技巧。重点是女性高潮，不管是谁来实施，都没有区别，那个活动算是很好玩的，坚持将此讲座做了4年。其实当初做这个社团的原因很简单，我和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谈到了高潮的困惑和苦恼，便想要设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帮助大家排忧解难。现在这个社团仍然在持续做着，规模越来越大，活动成熟后，在每次讲座之前必须要看很多书，了解很多信息，然后请相关专业的老师做讲座。这些女性主义社团的经验为我以后开展同志运动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我忘了我是在什么时候认识拉拉的了。可能是大一的时候吧，那时还没和男朋友分手。到了大二，加入了一个酷儿社团，也去波士顿校园外参加当地的一些亚裔的酷儿小组。其实就是大家互相交流交流、看看片子。聊一些话题，因为专业原因，所以也开始看有关酷儿的理论，没有不接受的过程。其实大一到大二的时候，比现在激

进多了，很年轻，很愤怒。不一定就是觉得和女生在一起有多好，就是觉得和男生在一起会有很多批判。

对我来说，（影响我的）没有那种一次两次的事件，都是从小到大的。教会里，就会教你妻子要听丈夫的，情感上女性要扮演那种温柔的，要倾听、要理解、要沟通，有矛盾不应该有太大冲突，都是我不擅长的角色，比较反感。在美国作为少数族裔也会有一些压迫，比如说，比较明显的事件，如果有美国人看见你跟另一个亚裔在一起就会觉得你们是否是姐妹等。更深刻的是一种很微妙的，我至今不大能描述的一种感受，也可以说是文化差异，就是一种交流模式上的隔阂。真的很难讲清楚那些点，但是就是跟很多中国人，普通的朋友或陌生人交流，都没有问题，跟美国的朋友，如果交流到了一定程度就到了尽头。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还是中国人，就是超过了一定的境界，还有一两个是美国人，但也很中国化的华人。

我也有过身份挣扎，不过不是性倾向的，是作为亚裔华人的身份。那个时候我特别主动的去找在中国的东西。当时对中国完全不了解，但我先看到在《时代》杂志封面上关于李宇春的报道，也在新闻上看到复旦大学有个叫孙中欣的开了第一堂关于同性恋的课，然后才知道国内有这种东西。那个时候想找到一种纯中国的同志的存在，一种主体感。当时已经特别脱离中国这个东西了，有了一定的条件就开始回忆原来小时候还有那么一个过去，一个经历。

在哈佛，我主修性别研究专业，我们专业有一些实践和考察的机会，哈佛是挺鼓励学生到国外去做交换生的。2006年我休了半年假，当时在上海，就是挺想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同志都在干嘛，主要认识的是知和社和上海女爱，然后就会时常参加她们的活动。因为10年

没有来过中国了，所以出个门、跟街上走走就会觉得特别新奇。回到美国后，在2009年，为了提升自己和找到融合感，我做了一个关于亚裔健康的工作，受众面主要包括亚裔移民健康和亚裔同志健康等性传播疾病相关的课题。在这期间也在兼任华人拉拉联盟委员一职。因为自己深知会来到中国这片土地，因此毕业后我开始申请关于同志方面的研究经费，申请到之后便彻底的来到了中国，就是我现在主要在做的“发现自我之旅”¹。

2005年李宇春登上《时代周刊》(亚洲版)10月刊封面



Ana-发现自我之旅



1. 从2009年到2012年Ana一直在中国做“发现自我之旅视频演绎”工作坊。2012年7月Ana回到美国开始人类学博士的学业。

“拉拉联盟成立和打基础比较慢，但是作为国内整个活动的长期投资，不是迅速见效，但是能让这个（社区）组织比较稳健的发展。”

“发现自我之旅”更像是一个尝试，因为这个项目是我在哈佛毕业后做的一个实践项目，宗旨就是为多元性别群体提供一个发声平台。数码媒体讲故事这类项目很适合草根组织，能够（以）边缘人群（为受众）同时又很有大众基础，最重要的是可以有展示的成果，给别人的感觉很像是艺术聊天之类的东西。项目进行到现在，我个人更加深刻的体会到发现自我之旅的意义。这个意义可以概括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对于参与工作坊的人的心理治疗的效果，另外一个层面是做出来的视频的作用，这些视频，应该是一个珍贵的资料，若能以后使用上，也算是一种对性少数群体生活的不错的推广。我们做的视频不长，技术也不华丽，但是可以听到很多拉拉的故事，有很多主流媒体看不到的声音。

（华人拉拉）联盟是一个很新的组织，（刚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要干嘛，很多社区小组的作用是大家认识一下，交朋友为主，在这基础上再做一些什么，但是联盟就很

模糊要怎么定义，再加上作为一个虚拟的组织还是很难的，在不见面的情况下，沟通的时候就比较少，不可能一边吃饭（笑）一边说些什么。委员间不是很熟的话，可能效率也不会那么高。这一届我们新的委员²，选完之后大家都没有走，在鼓浪屿上继续住了几天玩（笑），先培养感情非常有益（大笑）。

拉拉营是很实在的作用，说得大点的话，都会说联盟是个串联作用，是个资源分享互助，跨地区合作的一个平台，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另外一方面，我自己觉得，联盟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它能影响中国拉拉运动的发展方向。如果没有联盟，可能各地小组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东西，也会相互学习，但是很难说往哪个方向发展。但联盟带头，作为跨地区全国性的资源，我们就经常会收到从某个没听说过的地方发来的信息，说对拉拉（活动）感兴趣，想加入但不知道怎样加入，要不然她们就很难找一个可以加入的点。



Ana 与 “发现自我之旅”

台湾有种说法，发展到一定瓶颈阶段，没什么可以发展的了，很无聊，所以来新大陆（狂笑）。然后香港的话，其实 lulu³ 觉得香港发展到一定程度，一直都是那些非常资深的一代人继续在做着，年轻一代人她是觉得没有足够的锻炼机会，没有发展空间，所以她们来（拉拉营），也需要这种基本的培训。而且还是有很多两岸三地可以合作的东西，现在大家正在讨论一个口述史（项目），算是一个联盟发起的，大陆有好几个地方在做。香港以前有先做的，爱女人的口述史，印有一本很薄很薄的小册子。（2008 年香港游行）我们这个不光是号召，还包括资助，是香港有人捐了一笔钱，资助人去参加游行，她们也把钱交给了联盟，让联盟来策划。

拉拉联盟成立和打基础比较慢，但是作为国内整个活动的长期投资，不是迅速见效，但是能让这个（社区）组织比较稳健的发展。

“搞同志运动，（我）希望中国能走出自己的道路，而不是照搬。”

我毕业以后也在一个 NGO 做了几个月。它是一个做亚裔健康的 NGO，一部分是移民，一部分是同志。那个 NGO 挺无聊的，一些方面很专业，但是就是重复的状态，（它的工作）有效果，但是不像国内，没有历史性的、飞跃的这种（感觉）。

可能（国内）做拉拉运动的这些人，10 年 20 年之后都是历史人物，她们都是很前卫的，我可能不如她们。我在美国（的时候）在哈佛上学，但是我不能超越那个环境，我在课堂上学到的已经是那么多了，但是现在国内做运动的人都是原创的，她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做了很多超越的事情，她们都是很了不起的人。当然这是后来才意识到的，开始（我）就是很喜欢这个社区，大家都是很亲切的。（因为）我在国内做这些事情，我的生活里大多数都是拉拉，自己不用去扮演少数反抗的角色，很舒适。在美国不管怎么说（我）都是少数群体，亚洲人是很不可见的。

（同运）北京是做的最好的，比较精英，国际交流多一些，资源多，阻力不是很多。（这里的）组织最多，吵架也最多，吵架是因为大家成长的好快，比如最近 gay 和拉拉，还有出不出柜等运动策略的争议。其实现在我已经不会去关注完成自我认同或者跟家里出柜（的话题），（这些）基础的问题（对我）没有吸引力了。（我）比较喜欢现在比较理论的探讨、比较宏观的思考，比如说喜欢做华人拉拉联盟的原因是会去关注全国各地发展的情况，然后有什么样的局势在出现，有什么样的一种趋向，希望引导出一种什么样的反应。

参加中国的同志运动，让我觉得很有吸引力。因为在起步阶段，发展很快，让人兴奋，同时也有很多潜在的可能性。在美国，同志运动现在已经比较成熟，对于很主



2010 年第 5 期“发现自我之旅” 小雨作品《梦醒》

2. 指 2010 年厦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二届委员。

3.Lulu，华人拉拉联盟第一届委员，香港区代表。



Ana 在华人拉拉联盟

流的文化有了很大影响力，大家都能看到他们的缺陷很明显，做了批判。但是之后还是很难看到不同的可能性——除了跟它反方向的二元对立之外的可能性。（我）还有一个担忧，不知道怎么解决的一个担忧，就是在身份政治的方面，西方引进的一种 LGBT 的身份的标签，我觉得不合适，但是我又提不出一种很好的代替方案。在我看来，中国整体的同志运动，基本没有什么很好的策略。国外的基金会要求国内进行权益倡导，我不想做权益倡导，觉得挺没用的，尤其在中国。要是撇开西方的，直接跳出历史发展的过程，搞同志运动，（我）希望中国能走出自己的道路，而不是照搬。

我一直对 T/P 的文化很感兴趣，在国内能够有很丰富的 T 的生存，（其实）中国有这么多 T 能够长大成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这个目前没有被吸纳到运动中做一个主题。我的对比就是美国，（美国）会收敛很多，不会有女孩子穿男孩子的衣服，对于那种性别的压抑其实我觉得是很明显的、很暴力的，就根本没有那么多 T。因为如果有女孩从小很 T，就会被当作很严重的问题，就比如，在国内如果男孩子从小打扮得很女性就会有很多问题，我觉得那边的女孩就相当于中国的男孩（的情况）。我自己的理论是这样的，因为美国这种环境，可能很多人在这种压抑下，T 她就可以穿女装，没有形成那种身份，可以打扮什么的，但她们长大后，我觉得就会流露出那种 T 的气质，很微妙。

我觉得在美国，那些能穿女装的就穿女装了，长大就是女同性恋，大部分没有什么 T 的身份（意识）。跨性别人群就是幸存的，有那些更少数一部分，她们真的就算压力再大，也没办法让自己更女生一点，她们很苦逼的长大了，就会认同自己跨性别，她对自己女性化的抗拒非常强烈。（所以）美国一般没有 T 这种身份，（也）很少有人会认同自己 Butch，Butch 是比较有历史性的一种名词，是在还没有跨性别的一种医疗之前（的身份）。我是认为（美国）还会有很男孩子的女生在，但是那些人也不会很明显，而且文化中也没有把她们区分开，很

多浓妆艳抹的，但是看她们能看出来一丝丝 T 的气质。中国的 T 就参差不齐，有一些很 man 的，有一些就很娘，有一些也不一定很 T，就是“不分”，T 是一种很轻松的状态。

（但是在中国）大家还是关注在性取向，只强调性取向，而不强调性别，就说我们是同性恋，这是一切的根源，但没有怎么去关注性别上的多元，因为 T 没有被当做一种身份政治里的身份，没有说我们为了 T 这种身份去做点什么。les 里的重点不在 T 上面，lesbian 只关注我喜欢的是同性，她没有说排斥 T，但它没有特别去关注。性别研究的学术背景有很多批判性的理论，我也一直都很希望在中国能够有一种跟西方不一样的运动和同志文化，（改变）身份政治方面产生的各种问题。

（本文访谈于 2011 年 7 月 ~ 2012 年 7 月）

万延海：

激进地对待事业， 温和地看待社会

整理 / 柯晓，访谈 / 柯晓、苏

万延海——中国艾滋病权益活动人士、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负责人。

从 90 年代初开始，万延海为中国的艾滋病宣传、防治、艾滋易感人群——尤其是男同志——的权益等，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称赞，2002 年被加拿大艾滋病法律网络授予第一届国际艾滋病人权行动奖。获得国际人权联盟授予的人权卫士奖，富布赖特新世纪学者奖和耶鲁大学世界学者奖。从政府的研究所以到非政府组织，这个科学工作者始终对同志群体有着热情的关怀和积极的行动。体制内外的误解，也不曾改变他对中国社会的爱与信心。



万延海，中国艾滋病权益活动人士、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负责人

“因为你做这个健康教育的话，你就不能坐在办公室里，你不仅仅要接触人群，你还要到街头，到公园啊、厕所、娱乐场所，去这些地方做这个教育。”

（1992年）健康教育研究所那里有一个艾滋病热线（注：指“艾滋求助热线”），一些心理学家搞的，我当时参与了，会有一些跟同性恋有关的心理咨询，男女同志都有，当时这个热线就在东单北大街20号那个地方。当时招志愿者，会有北京医科大学学公共卫生、医学的一些学生，北京师范大学学心理学的学生。还有些志愿者，看到热线通知，就报名了，主要是男同志为主。开始的时候，男同志的电话占到20%，后来就达到了80%。这个热线本来的目标是做艾滋病咨询的，但大部分打电话来的男同志都问同性恋的认识啊、认同啊、社会歧视啊、家庭的压力啊，还有警察，大部分的问题还是怎么样认识同性恋的事。

媒体一报道热线当中与同性恋有关的议题之后呢，可以想象一下，很多人比较苦闷，没有地方倾诉、没有地方了解这个情况，一听说这个热线对同性恋持有一个积极的看法，马上就打过来了。一打过来之后这个热线就（火了），后来（1992年）我们就打算开一个同性恋专门的支持热线，后来就没搞起来，因为公安部下文件就说不让搞。

热线开了一次研讨会，（是）1992年的9月8号在健康教育研究所。与会代表（有）社会科学的专家啊、心理专家啊、新闻媒体的记者、公安局公安部的啊、卫生部门的北京卫生处的都有，大概20多人吧，可能有30人。那个会议，可能就是说到一个屋子里谈同性恋的事情，没人敢说反对的意见，当时基本上是清一色地赞成、支持同性恋。

艾滋病领域工作比较早的那些专家们，是比较开明的，他们对同性恋的立场整体上是比较正确的。这个热线开始的时候犹豫过，就说做同性恋是怎么样对待，后来的意见就是说应该把正确的知识告诉大家。我们就请这些专家来讲课，各个组织的，像社科院的邱仁宗老师他们，他是伦理学家，我们就问他，问对同性恋这个怎么对待，他就说，要用科学的知识告诉大众。本来（我们）还有

点不敢肯定地来谈同性恋的事儿，但是邱老师这个话讲了之后，就比较明确了吧。

我们当时的想法就说，因为你做这个健康教育的话，你就不能坐在办公室里，你不仅仅要接触人群，你还要到街头，到公园啊、厕所、娱乐场所，去这些地方做这个教育。你在办公室里坐在那高谈阔论的，对社会也没有意义。

我们开始的时候就组织人去东单公园摆摊，当时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有十多个人，大概四五个桌子，上面还有横幅，还有就是发传单——当时也没更多的材料，就是一些传单，还有教育小册子呀这样一些东西，有些东西还可能不太正确。主要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些文件，国际艾滋病组织的、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寄来各种各样的教育材料，根据那些材料做些翻译，（加上）港台地区也有一些文件，卫生部下面还有一些机构是专门做艾滋病防治的，做病毒研究啊、临床研究啊，他们那也有一些材料。

一到东单公园，就炸开了锅，大家都嘻嘻哈哈地说终于有人来宣传了，因为都是看热闹啊。志愿者都是大四大五的学生，也很帅气的，所以大家（喜欢），志愿者两个人一组在公园发材料啊，大家也都挺接纳的。第一次（公园宣传）是92年5月24号，当时（我）写了一个内部通报材料。当时我们这个工作，各方面都很支持。

（但是）我们去做外展啊，组织活动啊，你老跟他谈（艾滋病）啊，这不就不开心么？后来就办一个沙龙性质的，就放放电影啊，在一起座谈啊，交流啊，组织一些社会性的（活动）（注：指“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¹）。（在）木偶剧院后面，南面是健康文明研究所研究办公室，就它的五楼会议室。（来的人）二十多岁的也有，但是主要是三四十岁，大部分都结婚了，有做生意的、开车的，都是不同层面的。有一些就是街头层面的，那种文化教育不太高的，包括个人道德修养也不是很好，再一些骂

骂咧咧的，还有一些受过比较好教育的，还有一些，在政府里工作的可能不敢公开地来。

我是（沙龙）组织者，相当于我是开茶馆的，所以行政事务、大家具体聊什么我都很少参加，不过总体上大家还是比较谨慎的，担心倡导权利就过了头会有反复吧。整体上来讲大家就是开心，因为相当于大家聚在一起，可以那么肯定地在谈很正面的东西。（当时是）如果不能处理好认同的问题呢，男同志的人他也没有心思谈这个，得不得艾滋病啊都不是最重要的。就是健康对很多人来讲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可能是认同的问题。大家都觉得这个（同性恋）是负面的，都觉得这个是错误的，认为自己白天做人，晚上做鬼，所以很多人都把自己看成一个妖魔鬼怪似的。（还）比如说对同妻不重视，因为他当时就是一个回避，他既有愧疚感，他对自己有很负面的评价，认为家属是一个负担，所以在那个环境下，大家都是能躲就躲。

“当时也不懂政治，就觉得还是一种科学工作的态度，一种求真的态度，当时就是公开地反对（政策）。”

开始的时候这种沙龙（如果）不对外说，就悄悄地组织的话，可能一直组织到现在都没事。分歧意见就是，当然有一些人会很支持，但（有些）觉得并不重要，一些行政人员或跟专业无关的人。我们研究室里有一个老先生，他就主张“健康”，就说要治疗同性恋，要禁欲，反正就是不能去推广安全套。这个老先生，是我的领导，总是在那里告状，他会向中共中央告状，会向国务院告状，会向卫生部……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卖淫嫖娼的调查、艾滋病教育做这些推广，他就会给那个领导写信，他不是给一般的人写信，是给中央写信，就是要求禁止这个东西。后来我们的同性恋，媒体一报道，成为热点的时候，他再一告状，上面就重视了。

中央部门下来个文件，对我们这个跟同性恋有关的东西下达一个取缔吧，禁止吧（注：1993年5月10日，卫生部勒令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停止万延海在“艾滋病求助热线”的主持工作，勒令停止“男人的世界”活动）。

2005年12月1日 南京郑和公园的世界艾滋病日公园宣传活动



2006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 新浪宽频《锐话题》节目



1. “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是一个专为同性恋男子开设的文化中心，1992年11月22日开设中心，1993年5月10日被取缔。

（热线）当时延续下去了，但是后来人也变了，志愿者还有一些人在参加，（但）做事的人就是说没立场吧，当时是天津还是什么地方，说是有一个治疗同性恋的地方，那个热线还介绍把同性恋介绍去。

（1994 年离职）是（意料）之外，因为，当时就觉得这个东西做得都很正嘛，没什么不当的事情吧。当时我们那个环境下面，我们所认识的政府各个部门的人，还都是很开明的，但是，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错误——就是开明的，才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开明的才和我们联系，但是我们就当成政府都这样的了。

当时的想法还是冲击比较大，因为中国人的想法，考上大学，然后到北京，到国家的研究所里面，是中央单位，那么中国人的感觉就是衣锦还乡嘛。家乡人就希望孩子在外面要有出息，所以家里人可能冲击比较大一点。对我来讲，因为当时只有一个体制，完全不知道政府外面的这个社会，虽然也在做一些民间的活动，但是并不知道这个民间社会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能走多远，这个路在哪。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致力于这个事业的，那我们这样的人被赶走了，把政府的这个研究所交给一些王八蛋，你心理上也会很难受是吧。

如果当时处理完了以后，写检讨啊、或者就不说话，对外什么都不说，那么等几年，也许政府需要有人做事的时候又会来重用我们这些人，因为毕竟我们做事嘛。当时也不懂政治，就觉得还是一种科学工作的态度，一种求真的态度，当时就是公开地反对（政策）。然后，因为当时我也还是媒体上的红人，记者一找我，就哗啦啦地全世界的新闻都（报导）。我是公开地挑战批评政府的做法，中宣部啊、公安部啊都出面了，等于说我就被两个部门给盯上了，一直盯到现在（笑）。

很偶然的机会，1993 年底北京圆明园原来（有）一个画家村，画家村的一个名誉村长被打，他就告海淀分局，在法院开庭的时候就有人来找我了。有一个小伙子就跟我到画廊聊天，聊着聊着，他说，哎，你（干的）这个工作很好，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民间的研究所啊，后来就介绍到民政部的退休的、下海的一些人，推荐到北京现代管理学院。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社会有一些很奇妙的东西。有一些私下里的关系，当中（的确）有一些落后的力量，（但）这个社会上这种积极进步的东西，他会去帮你，中国社会奇妙的地方就在这里。做我们这种工作的，上升到官方的政策场合上，没有人敢为你说话，保守的人呢就是想治你，也不会有人来替你说话。但是你自己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走到哪个角落里面，会有人来帮你。所以当时不管是当官的，还是这个下海的、普通的老百姓、媒体记者、公司的人，还是那些退休的老干部，只要私下里坐下来谈这些事情，大部分都会来帮。警察抓我，（管理学院）那些老家伙都保护我，说你做的事情都是正确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找你麻烦呢？（笑）。所以这个社会其实有很多积极的力量在那儿，像我们做这些工作的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会有人来帮，公开的或者私下里面。

“整体上来讲，就是很困难，但是还可以做事的——那种环境下反而能做事了，社会的、原创的动力也会比较好。”

（管理学院是）民间学校，你可以自由招生，比如招一个同性恋研究课程也可以（笑）。当时不知道，现在这些东西可以用了，学校有很多空间可以去做很多事。但是那个学校我没有开课，就是（1994 年开始）做“爱知行动项目”，主要是男同。

（《爱知简报》²）1994 年开始做，一直做到 1998 年。我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在）人民日报情报资料室，（另一个）新华社也有个情报资料室。人民日报情报资料室有个剪报，它就是把不同类型的新闻（做）一个剪报制作。当时没有互联网，就是说不成类型的新闻，用剪子把报纸剪下来，然后贴在一张纸上，标记上是个什么类型的，编号编好，然后保存在箱子里面。所以他那个剪下来的同性恋新闻啊、还有关于艾滋病的新闻啊，他后来转到我的电脑上做，他就把这些都给我了。新华社的那个朋友呢，每天负责审报纸，所有的报纸都要由他来分发，报纸送到他那之后，由他负责分发到各个部门。所以他每天早上就把所有的报纸翻一遍，然后跟我工作



拉米夫定（商品名为贺普丁、益平维）-- 我国抗乙肝病毒的重要药物



2012 年 11 月 30 日，重庆市市民在防艾活动现场参与防艾互动游戏

有关系的东西，他都给我复印下来。每个星期，他通知我去取一下。所以虽然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但是这些资料、信息、简讯啊很发达。就是社会上这两个朋友的帮助，历史上关于中国 80 年代，从 1980 年、1981 年开始所有报纸上的、重要媒体上关于同性恋的新闻消息文章，他们全剪下来的。国内国外跟同性恋有关的新闻，每个星期我都能马上看到。

1992 年到 1996 年吧，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我是一个很好的街头演说家（笑）。就背一个包，骑自行车到东单公园、到三里河，有的时候有朋友一起去，去发这些资料，发简报，还有一些媒体消息的复印件，有好消息就复印下来就发。比如说港台媒体上有一些很重要的新闻出来了，（或）有一篇很好的文章，那复印下来，然后印 100 份。100 份的话也很便宜啊，就 1 毛钱 1 张，100 份才 10 块钱。10 块钱，你骑个自行车到街头，一篇好的文章如果是发给 100 个人去看，100 个人在这公务员里边传阅，那这些报道就有用了。（我）那个时候

是彻头彻尾的街头演说、辩论，去说服别人。后来就慢慢地不敢了，因为一抬头看到人群的后面站着一排便衣警察，他多看你几眼、多看你几次，你慢慢地就不敢了。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开始的时候知道政府关注你，但是（不知道）那么近距离的看着你那么笑。他在那笑，也许不是很恶意的，但是那毕竟是便衣警察，看着你，你（就）毛骨悚然，压力很大。

招志愿者（时）我们在媒体上发了一个消息，写了一篇文章，鼓励大家报名。（我们把）志愿者招募的通告做成信，放在信封里，然后把我们的简报、把我们写的项目介绍、招募志愿者通告装在信封里，北京这几个大学，一个大学一个大学地跑，每个大学的信箱里面塞一个，北师大啊，北京林业大学啊，人民大学啊这几个学校，我们都是往它的信箱里塞那个信。就这样当时报名有 300 多人，后来很多人互相介绍，全国各地有 500 人左右。有一些（外地）志愿者经常有联系，你可以把东西寄给他，他可以在本地去呼应，用他的方式来做工作。

2. 《爱知简报》1994 年由万延海创办，1995 年扩展，全面介绍国内外同性恋运动的信息。

每次大概就寄 500 份吧，印 1000 份寄 500 份出去，有北京的，有外地的。我记得很清楚是四川攀枝花那边，有人会拿着我们的材料去当地媒体做节目，还有山东那边学校的老师也拿着我们的东西在课堂上讲课，还有河北那边、黑龙江那边，有人拿过我们的材料做画报。那个简报在全国各地的同志圈子里传得很广，很多街头的人看了简报之后跟我们联系。当时简报上有一条可以给我们捐款，很多人看到我们简报上面的消息，就给我们寄汇款单，捐 50、100、200，有的捐 100 美金、200 美金这样的，一年下来也就两三万块钱。两三万块钱你还要印简报、材料，所以也是蛮紧张的。那时候没有固定的资助，靠这个捐款，主要是那个时候房租也不贵，一个月 300 块钱，开始还有一个办公室，后来没有办公室就是住的地方，一居室房子，那时用传呼机也没有手机。所以整体上来讲，很困难，但是还可以做事的——那种环境下反而能做事了，社会的、原创的动力也会比较好。现在你做机构、有资金，一般很多事反而还做不了，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走机构官僚化的程序，反而很多事不能做。



上. 2013 年 万延海接受 RFA(Radio Free Asia) 专访，讨论中国的艾滋病与吸毒问题
下. 2013 年 8 月，万延海（左二）与作家贝岭等客座巴黎民主论坛，

万延海的微博



“政府的人，打击我的时候就说这人是同性恋，那这些人，在这个圈子里面为了排挤我，（说）这个人是个异性恋人士，不要和他交往。”

（1996 年悉尼大学的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男女同性恋研讨会）我是唯一中国大陆来的，我发言就是讲 1994 年那个调查（注：指“爱知行动项目”）。当时也是没有经验，出国嘛也不知道海关有什么事，当时我准备了一篇讲稿，很长的一篇报告——因为当时还是担心，中国社会很多恐惧就是人传的嘛，（笑），可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过，但是不那么普遍——所以我记得我在海关的时候，在机场过海关之前我就把那个报告撕掉了，就没带出去。后来他们有个学者来跟我（聊），我就把那个报告给他看，参加完会议之后，我就根据我的发言和那个报告的情况写了一篇文章。

后来 96 年底（我）就联系出国，做访问学者去美国南加州洛杉矶这边待了一年多。回来（后），资金（方面）开始（有）美国的朋友给一些资助，相对来讲国内的这一块就比较稳定。就是说一个朋友资助 5000 美金的话，当时就是 4 万人民币。4 万人民币在 1998、1999 年的时候，（又）因为有互联网了嘛，（做事）很方便，至少很稳定了，你不会有那种漂泊的感觉了。

98 年的时候，他们香港的人来大陆做这个（同志活动），组织了第二次华人同志大会，很多人去了，那个会议之后呢，他们就觉得要在中国做一些事情，因为之前他们认为在中国做不了事。所以 98 年在北京搞了一个聚会（注：指西山大觉寺同志聚会），之后呢，女同志就觉得那个会议，（是）香港周华山他们主导的，她们好像对周华山不满意，另外她们觉得这个会议基本上都在讨论男同的问题，所以何小培她们几个人就大张旗鼓地张罗、组织了女同志的聚会，98 年国庆节的时候，在北京。她们就跟男同的人不一样，男同的人害怕死了，都跟地下党似的躲在大觉寺里。

（男同）聚会（地点）是在（某个人）他家里，聚会给每个人通知都是单线联系，谁也不通知别的人，然后到指定地点集合，（当时）会议前一天通知我说要去参加这个会议。我个人的分析就是说，香港的第一和第二次会议，这两个会议都是周华山主导的，会议都有中国的公安部门参与了，也就是中共在香港的行政人员都有参与，所以他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发表了一个反西方化的宣言。这样就靠近了中国当局的主流思想，相当于就是说，包装成一个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的同性恋的运动。

1998 年（周华山）就要来中国发表，所以这些人就趁着那届会议之前（会议是我发起的，会议组织里我是主要的一个人）会议的前两天，香港的人突然起来说，要求我不要去，我去了会引起什么后果（引起当局的警惕）。当时我觉得很惊讶，因为我在北京，我都没觉得自己那么危险，（笑），其他人会觉得你危险。后来我还在电台里做了几个月的节目，也没觉得有什么危险，但有人会觉得你危险，所以这个感觉很不好。

政府的人，打击我的时候就说这人是同性恋，那这些人，在这个圈子里面为了排挤我，（说）这个人是个异性恋人士，不要和他交往。后来自己本来觉得自己亲自来做这个事，就好好的做，我当时还是说做一个研究人员，做一个工作人员，做一些为社会民众谋福利的事，（这是）作为一个本职工作，一个天经地义的善事嘛。那后来呢我就把一些自己个人的经历啊，一些想法啊，我就写了一下，当时我的情绪变得很激动，很恼火，写了一下我就发出去了（注：指声明自己是双性恋的文章），《上海大众卫生报》还给我发了一个头版头条，还给我加了一个图片，后来那个报纸还被检查了。写完（我）就不管这些事了，（后来想）他不用这些手段来造谣，他（也会）用别的方法来造谣。后来最近十年我们这个事情都做得比较顺当，因为很多人出来做事，我们只需要跟做事的人一起合作，自己不需要在前线做这些事，非要去回答别人的这些问题。这样的话，就做得比较顺当。

爱知行负责人万延海与河南艾滋病感染者胡女士母女



“那个时候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在做这些工作时大家都会觉得自己有一种冒险的精神。现在做这些事情也要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相对来讲人的（状态）就不太一样。”

1994 年的 5 月底 6 月初的时候，我在合肥调查，就有人告诉我说那有一个（女同性恋），想不想去访问那两个人。接头的人告诉我的，因为有一个男同好像跟那个女的是一个单位，都是银行的，他晓得她们两个的情况，那两个女的不知道他。

我当时去调查去访问她们了，她们还是很自然的，很大大方方的，她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她们也没有“同性恋”这个概念，同性恋这个帽子是别人给她们扣的。那两个女的，她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她们对同性恋的这个意识也不强。（1991 年）外界媒体报道了她们同性恋的这个事情，她们也不觉得是一个什么问题。

我见到她们的时候，有一个女人个子比较壮，着装啊（男性化），抽烟，身体很结实。我先到她们家里，她们家开了个饭馆，我到她们家饭馆坐着，她就走过来了，我本来以为（是个男的），根本就没想到，后来他们说就是那个女的，（笑）。然后就聊起来了，她们的苦恼（是）两个人想在一起，但是她们不知道两个女的怎么在一起。她们之间没有性关系，或者没有我们讲的那种具体的肉体行为上的关系。当时可以变性，媒体报道上海的变性手术做得好，她们就去了上海，询问她能不能变性。去了以后她们回家也苦恼，因为毕竟还有很多手续，心理测病啊、家里同意啊、变户口啊，一大堆的问题，她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也就搁置在那里。后来我就跟她们两个都聊了，也没聊太多，我们简报一些材料我也给她们了，也跟她们交流了一些信息。她们就是不好意思谈（性）这些事，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去问她们了。

苏茜她们，是 1995 年初在北京的聚会上面看到的，当时北京其他的人也开始出来做事情，大家就召集一些会议。1995 年初我们大概有 3 个关于心理学的座谈会，当时有一个叫吴春生的在北京师范大学搞了一个座谈

会，苏茜好像是那次去的，当时没聊，大家交换名片啊。后来苏茜就跟我联系，了解我们工作的情况。后来她们 1995 年在北京酒吧街那边有很多聚会，那么就把酒吧带出来，（或者）带到家里做聚会，跟我们这个工作不一样。我们是书生呐，我们做做学问，写写文章啊，去讲讲课啊，这种可能比较适合，这个做社会组织性的这种娱乐性的这种活动我们没办法做。

（后来）一个李京，还有石头，还有 Kim，还有几个人，她们提出来（在）北京搞一个拉拉小组。名字我忘了。她们租办公室要（资金），我还给她们从荷兰的一个基金会上申请了一笔钱，大概 1000 多美金，后来她们又去申请了（其他的）。因为我参加国际会议，会议上有一些基金会就找我说他们要支持中国的同性恋组织，当时就这么一个，后来就给他们推荐了一些。我帮她们写（申请书），然后帮她们联系，但具体的细节她们写。1998 年她们就搞起来了，1999 年有一些活动，还有一个办公室。

那个时候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在做这些工作时大家都会觉得自己有一种冒险的精神。现在做这些事情也要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相对来讲人的（状态）就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可能社会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度都很有限，比如说李京她们，当时有很多人，她可能也在报纸上写一些东西啊，或者在刊物上写什么东西啊，公布自己的联系方法啊，这样就有人跟她联系，联系呢她就去看这些人，看这些人呢，他们就会把关于同性恋的信息写在大大学的报栏上面，写下来贴给他们，然后到時候同性恋（之间）有更多的联系。那现在可能就不会用这样一个（方式），相对来讲可能就更常态化吧，一个同志沙龙啊，一个活动中心啊，慢慢跟那种主流的社区中心啊、活动中心、图书馆啊（接近），我觉得可能大小规模不一样，社会进化程度不一样，可是慢慢的在功能上更趋同了。

“十四、五年前的时候，互联网可以帮我们摆脱这种社会控制，那现在的话，我们要做的事情的规模、社会的交流、人的互动，这比十几年前的需求要大得多。”

我是去年（2011 年）6 月（底）7 月初的时候（开微博），后来还被关了三个微博了，（笑）。如果他不限制我，我粉丝大概也有个 4、5 万了吧。十四、五年前的时候，互联网可以帮我们摆脱这种社会控制，那现在的话，我们要做的事情的规模、社会的交流、人的互动，这比十几年前的需求要大得多。所以仅仅是网站是不能满足这个功能的，所以微博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社会动员有了微博在这个时代就等于做所有的事情成本就降低了，机会多了。在这个时代，就是传统的、过去政府很想限制（的），在这个时代他不想限制了，因为他也知道你连这个东西都不限制那限制别的东西也没有意义。

（微博上酷儿理论和科学之争），那也不是男同和女同的分歧。科学只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个角度，不成为人类在探寻真相、探索真理的过程当中一个统治性的东西。用不同的学科角度介入、用艺术人文的角度介入、用人本身的经验来处理这些事情，都应该值得尊重，特别是对（对）少数群体，对各个个体的经验、对未知的这种（尊重）。所以如果是一个真的科学工作者，他应该有一种敬意，因为科学研究越多的人越知道自己不懂的事情很多，真正搞科学研究的人绝对不会说什么东西是绝对对的、只有什么东西才是对的。真正搞科学研究的人，大家知道，他不应该说很多的话，（笑），真的有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儿）。所以关于科学观念和酷儿理论的争议，更多还是关于科学是什么的问题，不是运动本身的争议。你说这话从科学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你，根本就不需要来什么酷儿理论和还是科学之争，酷儿理论和科学不矛盾，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觉得女同的话，在同性恋这个运动当中，在最后这个政治实践当中，我觉得可能更坚定一点，挑战性会更强一点。男同社区的话，（在）社会运动当中有很多弱点，比如说贪玩啊还胆小啊，（在）艾滋病（领域），比如

说腐败啊。就像讲“科学”理论，在社会当中的讨巧啊、投机啊、依附权威啊。国外的我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中国的男同志社群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问题。

（社会运动的）多种力量可能是一个合力，同性恋运动本身也不是一个民主运动的力量，但是，比如同性恋社群里面出现这种极端的权利侵害事件，它是不会沉默的。其他领域的话，有很多，环境啊，青年人啊，民工啊这种，像教会啊，像各种各样现在的助教、扶贫团体网络，特别是网络上成立的，教会、律师、知识分子（团体）。因为网络上面什么都在那里，做很多工作嘛。

中国就是说，能不革命就（不要革命），能够推动它的和平的制度化（改革）最好，像台湾那样的。但是有时候也需要有社会的人来推动它，怎么来推动中国这个可能的民主的变化，可能现在很多人有很多的争论，我觉得这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需要的。那你们可能在网上看到过有人骂，有一些激进派的人希望中间派的人都让开，那么就是说，不要给民众以希望、虚幻的幻想，大家都马上起来要对抗，（我觉得）这是一种危险。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在现有的环境下，跟他周旋，在各种机会中去把握，去推动他，去创造机会。我也不一定（激进或温和），因为在艾滋病圈子里面，大家认为我是一个激进的人，你要在政治理念上别人认为我太温和了。

（本文访谈于 2012 年 5 月）

217

219

